

王明言论辑

人 民 出 版 社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王明言论选辑

人民出版社

王明言论选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0.75印张 460,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000

书号 3001·1793 定价 2.00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曾经给党造成过严重的危害。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批判王明路线、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

本书选录了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王明的主要文章，共二十六篇。内容包括反映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文章以及讲话等。这些文章一律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写作时间不详的，则按出版年月编次。所收文章一般选取最初刊载的版本，未收到最早版本或作者重新发表时附有说明的，则选其中一种版本。凡有不同版本的文章，均互相参照进行校勘，除重要校勘作注解，一般订正错字、脱字、衍字都不注明。书末附有王明的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章、讲话目录，以便读者查阅。

本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余子道、黄美真负责编选。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1981年5月

目 录

《武装暴动》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1
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17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33
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38
论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2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45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	48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	55
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	63
再论反富农问题(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68
——富农问题的严重	
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73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二十四日)	100
——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107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九三〇年秋冬)	111
中国反帝运动的新高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268
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79
革命, 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320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383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	427
新形势与新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470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九三七年三月)	514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九日)	536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	
挽救时局的关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546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一月)	555
——在武汉大学讲演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566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	
三八年十月二十日)	594
——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附录: 王明文章、讲话目录	640

《武装暴动》的序言*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武装暴动》这本小册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武装斗争的经验之结晶，它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的武库，它阐明了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俄国两次——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的暴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暴动；德国两次——三月暴动与汉堡暴动；爱沙尼亚一次——涅维尔暴动；保加利亚一次——一九二三年九月暴动；中国四次——上海三次暴动及广东暴动)。它搜罗了二十三年(一九〇五至一九二八年)武装斗争的历史教训，它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暴动问题的根本原则，同时，并揭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变节者——第二国际的领袖——对于暴动问题的可耻的曲解。它对于暴动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的问题，以及组织技术的问题，都曾给予一个明确的观念，它对于暴动有关联的各个问题都加以丰富深邃的阐明。因此，它对于每个共产主义的战斗员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我们很热烈的把这本小册子介绍给读者，我们希望它成为读者实行作战的指导，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每个共

* 《武装暴动》一书是发给党的“六大”代表阅读的参考资料。王明为它写了“序言”，曾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九年六月，《武装暴动》以《论艺术》的伪装封面在上海出版。这篇“序言”收入本书时，根据该书作了校勘。

产党员的责任，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所指出的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务。

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动问题有联系的问题。

（一）关于第一点

一、巴黎公社的教训

巴黎公社的教训，在小册子中曾有时附带的说到，但必须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第二，关于占领银行。

暴动是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律是拚死的、勇敢的、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恩格斯）。未曾应用这个规律，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暴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中部暴动时，“涅那威尔克”工厂区的暴动工人不曾把军事行动扩大到本区以外，广东暴动工人未曾设法向河南李福林部作拚死坚决的进攻，以致结果都遭受了失败。由此，可见不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暴动问题的这个主要原则，是许多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并不仅限于军事政治的行动，经济上的进攻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即仅就占领银行一事举例来说吧：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暴动者占领银行的意义，未曾夺取存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巴黎银行，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广东的暴动者对于占领银

行一事也同样的作下了错误，他们不能取出银行的存款(打不开铁保险箱)，来作为革命的急需，而将银行付之一炬。

二、总罢工与武装暴动

列宁主义者看待总罢工是武装暴动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暴动没有总罢工差不多一定要遭受失败。我们且举一事实作例：莫斯科十二月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尼可涅夫斯基铁路(圣彼得堡至莫斯科铁路)未曾罢工，以致毒把数夫——莫斯科守将——有从圣彼得堡得到援兵以压迫巷战工人的可能。广东十二月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李福林能够电调韶关军队由粤汉路进攻广州，以致决定了苏维埃政府的命运。涅维尔的九月暴动，未曾准备总罢工，以致发生极不好的结果；暴动对于涅维尔的无产阶级纯粹是“晴天霹雳”，工人阶级对于暴动不曾了解，大部分工人群众不起来参加，以致遭受了失败。广东暴动失败的原因还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它未曾吸收广大的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大。

根据许多暴动的经验，在暴动前发生了政治的总罢工，其结果则完全与上述各例相反。

上海三月暴动胜利的原因之一，便是铁路工人的罢工，使张宗昌没有运兵到沪去压迫暴动工人的可能。

我们此处列举铁路工人罢工的意义，不过是总罢工意义中之一例，其他如：邮政、电报、电话、兵工厂、财政机关……等等之罢工与占领，意义都极重大。

总罢工的爆发，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情绪最高之时才有可能，所以总罢工是革命潮流高涨的具体表现；总罢工是动员

工人群众到街上去的最灵活的动力，所以总罢工是调动群众作战的动员命令；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和平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直接前提。总罢工能破坏敌人，恐吓敌人，沮丧敌人的意志，妨害敌人的力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序幕，是武装暴动的胜利保障。

三、巩固和扩大武装暴动胜利的问题

在一区域或某几区域取得暴动的胜利，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此处还有更复杂的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胜利的问题；换言之，局部和暂时的胜利，如果不能巩固和扩大，则结果一定要失败。所以在暴动胜利后，必须组织能够代表革命利益的新形式的政权（苏维埃），必须很迅速的满足劳动群众生活上急需的要求（衣，食，居住，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土地……等），必须组织和创造保障革命阶级利益的武力（武装队，赤卫军，红军，人民警察，非常委员会……），必须深入劳动群众中去解释暴动的意义，必须使劳动群众都积极起来拥护、参加、创造、巩固和扩大暴动的胜利，必须用一切力量根本压倒和消灭反革命的反抗。

一九二七年上海胜利暴动的指导者便不会完成这一任务。他们不会组织群众，不会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府，由几个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上海市政府，只注意仰大资产阶级的鼻息，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和完全抛弃了多数的城市贫民；在它存在三个星期中，差不多完全没有活动，简直未曾解决革命民众的任何紧急问题。所以当蒋介石公开叛变，大行屠杀胜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上海无产阶级群众时，大部分上海无产阶级和劳动贫民不曾应上海市政府之号召而给反革命以坚决的反

抗。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在彼得堡爆发后，布尔塞维克能够把工人阶级和贫农组织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发出使群众都能了解的口号，迅速颁布满足劳动群众急切需要的命令（土地，和平……的命令及宣言），给反革命阶级以各种致命的打击，所以这胜利能扩大到全俄的范围，巩固起坚强的基础。

（二）关于第二点

一、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

“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

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用全副力量全副精神去实行这个决议。并且切实纠正下列三种错误的有害的倾向。

一、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

在目前状况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民主社会党”或所谓“中华革命党”……等）的领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倾向，也不仅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和不觉悟的工人的心房里

荡漾着这种思想；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有很少数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这种毒素。他们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于是就发生以合作社运动向南京政府请愿，组织地方自治机关等为目的运动主要形式的理论。对这些分子的关系，列宁在他论《莫斯科暴动的教训》一文中曾坚决的说道：“谁反对它（暴动——作者），谁不准备干它，就应当把谁毫不留情的从革命同情者的队伍中赶出去，把他赶到革命的反对者、革命的变节者和革命的畏缩者的队伍中去；因为这个日子快要来到了，就是事变的力量、斗争的环境都使我们不能不按这个征号来分别朋友和仇敌了！……”（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五一页）现在在中国从这一问题去分析每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观点是非常必要而且绝对正确的。坚决的反对这种倾向是暴动的指导者，真正同情暴动者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任务！

二、儿戏暴动的倾向

“暴动是艺术，无论何时不要以暴动为儿戏呀！”（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从中国各地所得的消息看来，证明我们的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武装暴动策略的根本原则还未曾充分了解。例如：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暴动的政治路线，划河南为若干区域，决定自十月十日至十七日为暴动时期；因为没有把暴动的企图与一般环境及群众情绪相联合，所以这些企图终归完全失败；长沙工作的同志因热中于未成熟的暴动，遭受极残酷的牺牲；湖北省委曾三次决定在汉口暴动的时日，同时又三次改期；这种冒险倾向引起许多惨酷的破坏，失去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及群众对于本身的自信心。有这种倾向的人创造出绝对冒险的理论基础，他们说：

“在中国现在谈不上什么未曾成熟的暴动”——这理论在中国少共中尤其有很多的势力，形成少共先锋主义内容之一部。每个觉悟的共产党员必须知道：由这种理论基础所产生出来的暴动行动，一定永远遭受失败，因为，即在客观条件对于暴动极顺利的情况之下，如果暴动的准备不充分，暴动的指挥者与组织者对于它不慎重其事，没有精详的暴动计划，没有坚强的暴动领导，则暴动的结果还不能免于失败。

“一部分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粹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种儿戏暴动倾向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无忍耐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不正确，他们以为可以继续暴动到很久的岁月。每个觉悟的共产党员应当知道：“以儿戏暴动代替工农群众暴动，正是消灭革命的好方法”（同上决议），“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反对以暴动为儿戏”（见上决议）。

三、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

中共中央十一月（一九二七）扩大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上有一条说：“再者，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中，有发生下列各个不正当倾向的可能：（一）军事投机主义，事前明知道要遭受失败，而竟号召群众参加暴动，这固然是军事的投机主义，但这还不算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就是只崇信军事力量、军事准备和军事进攻的计划，而不号召群众，不相信群众，这样在暴动中只见军事行动，而没有充分的群众斗争，这真是机会主义。（二）事前没有准备，而策略上采取观望态度，既不能号召群众，到群众自己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而领袖们还在动摇

不定,甚至于怠工,表示出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态度,不去指导群众,于是断送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在另一条上又说:“……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希望凭藉工农群众,而希望凭藉那靠不住的军队而和军队拉拢(在湖北的西北及湖南,都发现这种企图),这是机会主义政策之馀毒”。这是由于不了解:暴动决不仅是纯粹的军事行动,暴动只有凭藉广大的群众的参加才能得到胜利,暴动如果不凭藉群众运动,而仅仅依靠军事行动,则变成了军事的政变,而并非真正的革命。群众抱旁观态度而不积极参加的军事政变,迟早必遭失败的。群众工作是准备暴动的必要前提,群众工作是一切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二、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上有一条说:“党在指导各地农民自发的游击斗争时,应注意到:只有使这些斗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浪潮联结的条件之下,才能使这些单独的暴动变为总暴动的出发点。此处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使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种动作。因此,便须与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斗争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这只是说游击斗争必须与工业中心的暴动相联合,必须使这一区的斗争与其他各区同时联络发动,必须慎重把零星的无准备的斗争,准备和组织成广大范围的运动,这绝不是抹杀游击斗争的意义,尤其不是根本反对游击战争。

“当群众运动事实上已发展到暴动,在国内战争的‘大规

模作战’的相当休憩期间，游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二页）。这种斗争形式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在俄国是一九〇六年，即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的暴动失败以后；在中国是在一九二七年秋季至一九二八年，即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叛变以后，特别是在广东十二月暴动失败以后。总而言之，都是在“政治恐慌剧烈到武装斗争的程度，而在城市和乡村中的需要，饥荒和失业又特别加剧之时”（列宁）。“它（游击战争——作者）的发生自有其强有力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无法消灭这种原因，也就无法消灭这种争斗”（列宁）。这就是说，如果在任何地方出乎我们预料之处而自然爆发了游击战争，则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斗争，取得这个斗争的领导，把暴动者组织起来，使他们的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及广大范围的农民暴动相联系。

游击战争的反对者通常用下列言论作为反对的论据：游击战争是无政府主义、布郎吉主义、恐怖主义，堕落工人道德的行动，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使广大的居民脱离工人的行动，破坏运动和危害革命的行动。

只要某个地方发展着游击战争，就会听见这种论调，在一九〇六年的俄国听到，在现在的中国也同样的听到（“游击运动”是“原始的”、“不觉悟的”、“无组织的”，甚至于是土匪式的运动……等名词）。列宁对于这些自命为“有组织的”、“纪律化的”、“有秩序的”革命斗争的同情者——冒牌的革命家和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给以严重的反驳，“从军事便利的观点出发的对于国内战争的各种形式的批评，我们完全承认和无条件的同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我们对于国内战争的条件分析，必须毫不采用什么‘无政府主义’、‘布郎

吉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的陈腐的和滑人听闻的套语”(《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三页)。我们承认游击战争仅仅是国内战争和革命斗争的形式之一，仅仅是帮助群众运动和准备群众武装暴动的一种斗争形式；游击斗争的目的只是在扑灭某部军警的长官及显著的反革命的急需，破坏敌人的组织，扰乱敌人的后方，恐怖敌人的走狗。我们是这样(仅仅是这样)估计游击斗争的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以为游击斗争永远只是无组织的、偶然爆发的和个人性质的行动。游击斗争的确有变为“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和使广大的居民脱离工人的行动”的危险，假若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正确的组织和领导这种运动，不能阐明和解释这种运动的意义于广大的群众之前，不能使游击队本身及局外人了解游击斗争在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及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and 力量；游击斗争的确有盗贼分子、流氓和无政府党人参加，的确有“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危险；然而我们“不知道那里这些花样的斗争工兵，就是他们或者能够建立起一道中国式的万里长城，把比无产阶级高一点或低一点的社会成份和无产阶级完全隔绝起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五页)。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应当把它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光荣斗争衔接起来。谁也不否认游击斗争有时有“破坏运动”和“危害革命”的危险，但是谁也知道：“一切含有新的危险和新牺牲的斗争新形式，不可避免的要‘破坏’对于这个斗争形式没有准备的组织”(前书第八三页)。同时，谁也知道：“无论何种战争的任何军事行动，对于参战的队伍总有相当的破坏”(同上页)。再者，就是“有秩序的”、“有规则的”革命的同情者和游击斗争的反对者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就是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运动被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游击斗争发展最宽广的西境波兰与那腿世，而是这斗争比较不发展的中部俄罗斯；一九二七年秋季以来，中国革命运动在游击斗争最发展的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的浪涛，始终比其他长江各省及黄河流域的浪涛高。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游击斗争含有许多危险，游击队伍及进行游击斗争的组织中有时有许多不利于我们的成份参加，但绝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斗争根本不要了。恰恰相反，游击斗争是必要的，应该整饬队伍，巩固组织，尽一切可能来学习和改良游击斗争。

党的任务就是在于使这种“原始的”，进到“高级的”运动，“不觉悟的”变为“有觉悟的”运动，“无组织的”形成“有组织的”运动。“我们斥责游击斗争，实际上是斥责在暴动行动中我们党的能力薄弱”（同书第八二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何时未尝把游击战争看成唯一的或主要的工具；这工具应当服从其它的工具，应当与斗争的主要工具相吻合，应当与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的和组织的影响相联系”（同书八四页）。谁把游击运动看成土匪运动，谁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应当把他从革命的政党和组织中驱逐出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之游击斗争与土匪运动是有天壤之别的！

三、论 土 匪

既然有人把革命的游击运动比作土匪运动，我们便不能不把中国实际生活上的一种宽广的病态现象，即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深恶痛绝而认为“死有余辜”的“土匪”的社会根源，及革命政党对它所应持的态度等略加探讨。中国现在的所谓土匪，内容包括各种不同的成份，它的主要成份是迅速贫

穷化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加上一部分失业的工人和溃败逃亡的兵士，他们在无衣无食，欲生无路，求死不得的境遇之下，才被迫而去干那“头在脖子上转”的所谓“土匪”的勾当——抢掠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一点财富。我们绝对不能附和着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把土匪看成“天生贱骨”，“盗贼成性”的怪物。我们——共产党员——对于这种含有极深社会根源的运动形式不能袖手旁观；只有瞎子才不会看见这种事实，就是因为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在土匪队伍中发生了很多的分化；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向他们解释生活痛苦及形成他们现在所处境遇的来源，指示他们正确的出路，组织他们的运动，使与一般游击运动及革命的斗争相联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成份不是轻易的就可把他们变成革命游击队之可靠的纪律化的战士，他们可以把很多的不坚定性与散漫性带到革命游击队中来，有时甚至可以发生叛变的行动；然而其中很多的一部分我们是夺取过来的，是可以重新改造的，是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斗争的，所以我们对于土匪运动当加以应有的注意。

四、在军队中的工作

在中国现在的军队工作应该分成两部分：即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与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

一、在中国一部分同志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以为中国军队纯粹没有为革命尽力的可能，所以在军队中工作没有任何意义的；尤其是在屡次暴动被军队残酷压迫下去，和白色

恐怖空前紧张的条件之下，这种观念更有加强影响的可能。中国事变的实际，在这些同志的脑筋中回旋，恰似经过折光镜，由这一个极端转向那一个极端。原来过于看重军事行动，忽略雇佣军队本身及其统御人的军阀性，而以为军队是解决革命命运的唯一力量，转到完全否认在军队中工作的意义，完全否认军队有革命的可能。这两个极端的观点都是不对的。过于重视和过于忽视军事行动的观点，都是同样的有害，必须很客观的估计实际的环境，必须很清楚的了解中国军队的特质，必须知道我们不能利用军官成份和军事组织完全不变的军队。我们应该设法分崩离析旧有的军队，应该在军队中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影响，使军队在紧急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去。必须向军队中的农民成份进行解释工作，向他们解释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实际意义，指明他们的利益恰与军官们的利益相反；告诉他们怎样制止和救济农村的恐慌，证明他们为什么与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共同利益，指示出中国革命前进与工农兵切身的利害，使他们觉悟到他们现在被军阀利用作为工具镇压革命的可耻。必须估计到雇佣军队的特点，提出与士兵有切身利害而且容易了解的口号，指示出他们特殊生活的痛苦，揭破长官对于他们最低薪饷的吞蚀与刻扣，利用一切机会燃起和发展士兵与长官之冲突。为的进行上述工作，尤须尽力设法在军队中组织党的支部作为指导某部分军队工作的核心。

在各县警备队，大城市的警察与商团，以及乡村的民团中都应该尽可能的进行上述的工作。

我们必须知道：以雇佣军队为基础的军阀统治已日渐崩坏，雇佣军队的本身已日趋瓦解，我们如果能够加紧在军队中的工作，是可以得到极大成效的。

二、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的目的也是破坏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队,在这种工作里必须注意到在“有色人种”(印度、安南人等)的兵士和“白种人”的兵士中的工作方法的的不同;必须向他们解释中国事变的实质和帝国主义政府调遣他们来华的意义,必须依靠兄弟党和各国革命工人组织的援助。

五、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 及建设红军的问题

党在这些工作中当然要遇着许多困难,在中国一般人中——同样的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着反对军队的心理,不能不是这些工作中最困难的困难之一。这种心理的来源是延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旧式军队对于人民的残酷的掠夺与蹂躏,“好人不当兵”成为一句最流行的口头禅。但是,最近几年来的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心理已有了极大的变化。工农群众已经了解军队是一种力量,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力量可以惨酷的压迫劳动群众。工农群众已经相信,只有人民的武装,只有创造自己的军队,才能消灭旧有的强盗式的军阀军队,这种心理的变化对于共产党创造工农红军的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上海武汉工人纠察队的经验,广东红色志愿军与赤卫队的经验,以及海陆丰琼崖等处组织红军的经验,都证明这件事实的真确。因此,现在谁要借口这种心理的困难而来掩盖自己不愿党员军事化和武装工农的丑态,他便是革命的叛徒。

党现在必须执行自己的任务,利用一切公开或秘密的可能,教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以使用武器和巷战策略等基本常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地方,把游击队伍改编成正式的工农红军。

害怕武装群众的观点,在南昌暴动失败的过程中,已宣布了最后的死刑了。

在武装群众的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

城市的武装暴动一定要依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为主干,同时,也绝对不要忽略了城市里有盈千累万的贫民和苦力,是暴动时主力之一部。再者,占中国无产阶级很大一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妇女,对于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在许多伟大的群众示威中,在上海和广州的英勇暴动中,无产阶级的妇女都曾表显其伟大的作用。在湖南、湖北、海陆丰、琼崖等地的无数游击战争和广大群众暴动中,农村劳动妇女也都同样的显露出她们全副革命的精神。总而言之,各处的经验都在事实上证明了劳动妇女是工农武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因此,谁脱不了旧恶习而轻视妇女——特别是这轻视劳动妇女在暴动事业中的作用,谁就不配当一个真正共产党员。

农民武装力量的基础应该建筑在贫民(佃农与半佃农)和雇农的群众身上,应该尽力夺取在豪绅、地主、富农成份影响和指导下的农民武装组织,和非武装组织中的群众。必须特别注意在农民的半宗教性的武装组织(如“红枪会”、“大刀会”等等)中去工作,这种组织差不多在中国各省都吸收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我们必预估计这种组织的特点而采取相当的工作方法,提出特殊的口号而吸引它们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不能把这种组织变成有觉悟的革命的组织的组织(至少须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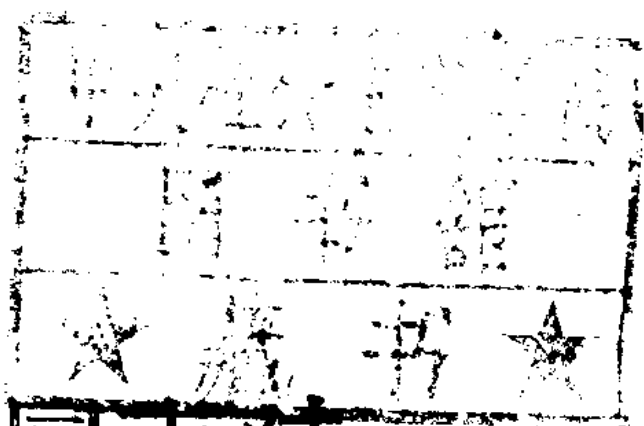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组织),中国农民运动便不会得到完全的胜利!在农民的武装组织中应该渗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成份: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农民的组织增加组织性、觉悟性和纪律性;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农民群众感觉到工人阶级不仅是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人,而且是实际作战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如此,才能够消除一部分农民不相信任何政党的情绪(在河南、陕西因国民党的叛变已发生这种情绪);只有如此,才能够建立真正亲密的工农联合,只有这个亲密的联合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没有一九〇五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大革命的胜利从来没有不经过失败的,谁怕失败,谁便没有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呀!中国无产阶级经过不少的英勇的血战中,懂得了失败的原因,种下了胜利的种子。在这些血战中,知道了谁是朋友,认识了谁是仇敌;在这些血战中,找出什么是敌人的优点和缺点,发现了自己的强处和弱处;在这些战争中,教育了自己,训练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学得了阶级斗争的艺术。他将把学得的这种艺术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怎样用法”,他将应用这种艺术来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一九二八,五,十六。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

署名:韶玉



论撒翁同志对 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在《红旗》第三十七期(八月七日)上发表了撒翁同志对于中东路问题致中央常委的信,以及中央对于撒翁同志的意见的答复。这一问题值得每个同志加以严重的注意。世界大战问题是现在历史阶段的中心,反苏联战争问题已成为目前政局的枢纽,共产党员间如果对战争问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问题有了原则上的不同见解,则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问题都不免要发生原则上的纷歧意见;从不同的原则中一定要产生各别的策略路线与实际行动。

在对中东路事变这一问题上,从撒翁信与中央复撒翁的

* 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政府受蒋介石的指使,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禁苏驻哈总领事及馆员。为此,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10日,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总办吕荣寰,下令以武力接收中东路,违反了1924年关于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协定。8月,中苏边境爆发战争。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写信给中央,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不策略,“太说教式”,“不能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主张“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来代替中央所提出的口号。中央在《红旗》上发表了撒翁的信,同时发表了给撒翁的复信,认为撒翁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于是,党内开展了对撒翁的批判。王明此文就是在当时的这种背景下写的。

信以及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各种文件中看来,显然“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因原则上的不同,才发生出策略上的差异。

详细研究中央与撒翁同志意见不同的原则实质,考究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本体与思想来源,指明与撒翁同志这种错误倾向以及和这种倾向有密切关联的其他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的必要,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当前的紧急任务!

一 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实质

——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一、当判断某个阶级、政党以及个人对于战争问题的分析是否正确的,首先便须考察它对于战争这一问题本身的了解。反动派以战争为自然的现象,是人类的“劣根性”所造成;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以战争为偶然的现象,是政府的“坏”政策所引起;无产阶级的战士——列宁主义者以战争为历史的现象,是社会分裂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结果。资本主义是近代史中战争的原因,因此,反动派以为战争是永远不能废除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动的空想主义者计划以公约或空话等去废除战争;列宁主义者指明战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即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然后才能根本废除战争。撒翁同志把支配一个阶段的历史中心的主要战争之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看成只是国与国间的“纠纷”(“中俄纠纷”),“国际间的纠

纷”，或者是某一政府的“误国政策”的结果；所以便以为只要“中东路恢复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便不会“发展到爆发战争”了！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是撒翁同志的第一个错误！

二、撒翁同志既不能了解每一种战争都是某些阶级（用其它的方法）以赓续其阶级的政治，当然便不会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去仔细研究每一次战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阶级意义，尤其是参加战争的各国的统治阶级的任务。这样，便必然的走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道路，对于战争问题只是顾及到战争中牺牲的可怕，而不考求每一战争的政治意义与归宿。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这一战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阶级意义，是非常明显：一方面是全世界的反动力量——帝国主义、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各国的资本家、地主、官僚、政客、军阀、教徒、工贼、走狗——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全世界的革命势力——苏联工农，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尽力保护地球上唯一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参加这一战争的各国的统治阶级的任务，也非常露骨：帝国主义国家与供帝国主义驱使的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主要目的是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建设一种反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劳动者的白色恐怖的统治；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世界革命。中国的统治阶级参加这一战争的目的，当然与各国反动阶级的主要任务相同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勇敢的担任进攻苏联的先锋，绝对不是与国民党“赓续其政治”的原则相违背，即绝不是所谓“误国政策”——国民党的“党国”现时的主要敌人，在国际上讲是苏维埃运动旗帜下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内看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劳苦群众。今年五

一以来,中国革命开始复兴的形势,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成为群众运动公开行动的中心;而统治阶级内部也适于此一时期加深和扩大自身的矛盾(北方、东北、西北将领的护法政府的酝酿,两广的护党政府的企图……等等)。国民党的“党国”企图在这样危机紧迫之下找出一条非常的出路,于是便:

(一)以“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行动来转移广大群众反帝国主义的目标,更加露骨的表现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忠实有力的佣仆,博得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的欢心,更加努力的来保障国民党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统治。

(二)以反对“赤化”的口号来动员和团聚资本家地主买办阶级的力量,使之加紧拥护南京政府和反对“赤化”的工作。

(三)以“民族利益”、“一致对外”等口号来维持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与延缓行将爆发的反“中央政府”的战争,特别是进一步的压迫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和日常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虽然国民党的这种企图,事实上终于只是企图,而且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但统治阶级的这一企图绝对不是“误国政策”。“国”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是不会而且不能自“误”其“国”的,个人会错误,阶级是不会错误的——尤其是对阶级利益的根本问题更是不会错误的。撒翁同志不能研究这一战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阶级意义,不能了解参战各国的统治阶级的任务;只从“酿成中国民族莫大灾难”和“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看待问题,当然是越说离题越远了!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是撒翁同志的第二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紧接着第一个错误而来的!

三、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公开

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阶级战争。现在帝国主义列强间在争夺市场上的冲突虽愈形尖锐，但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表现得更加剧烈的是划分全世界为两大营垒的根本的冲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一方面是苏联及集合于其周围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的顺利的进行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为的破坏中国革命及无限制的宰割中国及霸占全世界的宝藏和市场，为的扑灭照耀着人类幸福前途的照灯，消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最近几年来政策的战线的总标，国际联盟几年来努力的目的，便是集中在怎样实现反苏联这一战争，中东路问题只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中俄两国的纠纷”和“国际问题纠纷”，撒翁同志的意见，显然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这是撒翁同志的第三个错误！第三个错误，是紧伴着第二个错误而来的！

四、虽然因帝国主义列强彼此中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甚至在反苏联的战争尚未爆发之前，这一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在帝国主义列强间，也有发生的可能，——但当着帝国主义列强已经驱使其走狗——中国国民党公开的直接的实行反苏联的战争时，我们绝不能还从“理论上的可能”来观测问题，而应当从“事实上的实际”来决定战术。于此时机绝不能把反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看成并列而同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即不能以为如果“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则“帝国主义者援助中国的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因而爆发战争的可能；同时，如“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的可能，尤其是不能以为任

何战争的爆发,都是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否则便一方面抹煞了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比资产阶级国家间相互的冲突来得更加尖锐和深刻这一事实,使群众对于这一战争的阶级意义模糊;另一方面恰恰帮助了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使群众以为“苏联的政策”是世界和平主要的敌人!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这是撒翁同志的第四个错误,第四个错误是紧衔着第三个错误而来的!

五、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的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起因、内容和结果,有根本的差异,在帝国主义相互的战争当中,作战双方都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敌人,双方的目的都是在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之成为自己的商品、原料、资本的市场,无论那方面胜负,都是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不利的。在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战争当中,作战者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苏联与团结在其周围的全世界工农群众及被压迫民族。苏联的胜负,与他们自己解放或加紧奴役的命运有密切关联的,所以虽然“无论那一种战争,都要以中国作战场”,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两种战争的策略是根本不同的。在第一种战争中,无产阶级采取的策略是绝对的“失败主义”,即努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使交战国双方失败;在第二种战争中,无产阶级的策略是努力“变反苏联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使帝国主义列强失败。把这两种战争看成同样的只是“直接蹂躏中国人民”的东西,事实上不走反对双方的“失败主义”的策略,便走向呼号“和平主义”的策略,无论这两种中的那一种策略,实际上都是帮助帝国主义的!把帝

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是撒翁同志的第五个错误，第五个错误是密接着第四个错误而来的！

六、当帝国主义驱使其走狗国民党政府实行进攻苏联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什么战略呢？这一点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中说（第二十九项）：“在这样的战争中，因为‘敌人’是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所以策略上和‘纯粹’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相比较，必须有如下的变更：

“（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战争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国的政府一败涂地，而且要积极的努力保障苏联的胜利。

“（乙）所以战斗的策略与战斗的方法的选择不但要以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利益的标准，而且要考虑到前线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战争的结果。

“（丙）红军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队，在反对苏联的战争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必须不顾任何威吓而坚决的去拥护红军，坚决的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手段去拥护红军，以痛斥资产阶级的叛逆罪状去拥护红军。”

此外，在同一文件的第二十八项（丁）条中说：“在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事件中，被压迫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必须尽全力去鼓动欧洲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的自由的暴动或战争，反对苏联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

所以中央所提出的“拥护苏联”，尤其是“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及第四十二号通告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国反动政府公开的进攻苏联的情形之下，“武装拥护

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且要随着事变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的口号的,只有“变反苏联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

撒翁同志把帝国主义与苏联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是同样的“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对于“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当然不能不出来加以公开反对,至于“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在撒翁的脑子里,一定找不出任何丝毫的影子来!

“变反苏联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既然为撒翁所根本不联接,当然不可免的要走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空口呼吁和平”的反动路线上去,因此,撒翁便大施其苦口婆心之技,高呼:“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酿成中国民族莫大灾难”,……等等口号,企图以“空口和平的呼吁”来代替“实际武装的斗争”!

中国每次军阀战争时,“名流,元老”们总要拍几通电报以呼吁和平,第一次大战的过程中及第二次大战的准备中,社会民主党高呼“和平”、“裁军”,结果都是无济于事、而且帮助了战争爆发的本身!

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这是撒翁同志的第六个错误,第六个错误是总和着上述几种错误而来的!

七、在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中,国民党的各派从蒋系到改组派都是以“民族利益”的口号来做幌子,托洛斯基主义的反对派不只以“世界革命利益”的口号来装招牌,有些人以为“拥护苏联”,在中国民众方面,只有阶级利益了,没有民族意义,撒翁同志则以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大道理

是不相并容，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则指出进攻苏联同时即是压迫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要了解这些主张中到底是那一种最正确最合乎事实，便不能不先解答两个具体问题：（一）什么是“中国民族的具体利益”或“民族利益”？（二）什么是“世界革命的利益”或“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当然首先要问：什么妨碍和危害了中国民族的利益？这当然毫无疑问的要回答说：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民族身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与剥削！因此，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没收外国的企业与银行，不统一中国，不推翻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军阀国民党政府，则所谓“民族利益”或“具体民族利益”是丝毫没有保障的！要解答第二个问题，首先当然要问：什么是“世界革命的利益”？这毫无疑问的是回答说：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生力军之一，是为准备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国现在的工农革命阶段中所需要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更是直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呢？是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呢？是不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与赞助人呢？这些问题，只有一切反动派（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才会给一个“否”字的回答！进攻苏联的战争仅仅简单的是中俄战争，或者只是国际帝国主义进攻俄国工农的战争——抑是帝国主义压迫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特别是同时来瓜分中国的战争？这一问题，只有一切反动派和近视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肯定

前者而否认后者！因此，“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是绝对正确的主张。国民党供帝国主义驱使去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甘心任帝国主义来瓜分中国，即是无耻的合盘的出卖民族利益！由此可见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国民党是躲在“民族利益”的骗子旗下事实上出卖民族利益；托洛斯基反对派是借着“世界革命利益”的招牌来削弱中国民众“拥护苏联”的意义和行动；有些人是忽略了“进攻苏联”同时就是进攻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瓜分中国的事实；撒翁同志是只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观点！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是撒翁同志的第七个错误！第七个错误是赓续着上述各种错误而来的。

八、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的决议第一章第六点中说：“正如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直接引起了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殖民地独立自由运动的发展，引起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暴动与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个新的战争一定也照样唤起来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包括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农民国家的广大农民群众，以及殖民地无数万被压迫的民众……”，这很明显是指明这一次世界大战的前途一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这一高潮尤成为不可免的东西。为什么决议这样指明呢？因为：“国际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群众，都把苏联看做他们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对苏联的同情态度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此外，……广大的工人群众比在一九一七年更会明白下一次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将是公开的阶级战争，劳动群众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已得了经验，现在就更聪明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

更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组织，这便是共产国际……”

“……被压迫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尽全力去鼓动欧洲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自由的暴动或战争，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转变反苏联战争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之有利的条件，将要比寻常帝国主义大战时更快的造成。”

“……拥护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事，同样也是光荣的义务。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府能够战胜十四个国家来干涉苏联（世界最大的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全都在内），苏联之所以能够战胜，正因为国际的无产阶级以革命的群众行动，帮助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干涉了帝国主义的列强。将来帝国主义对苏联新的进攻，虽然他们有一切的准备，纵然有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的助桀为虐，一定会证明这种国际无产阶级巩固的团结是依然存在的。”（见同一决议）

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当中，“拥护苏联”一定成为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中心口号，在这一口号之下，一定要发生普遍的武装的反帝国主义的行动；结果一定要促进和形成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推进和促成中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公认的事实，这绝不是“在主观上也许会演成的事实”。公开的指明这一事实，只是使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显然的了解这一前途，了解在这一战争中他们的任务和在他们完成这一任务中一定产出的结果。在这一指明中，使他们更清楚的了解“拥护苏联”的必要和应当怎样去“拥护苏联”，绝不会使同志们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根据同样的事实，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总是作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结论，这非某

个人的错误与罪恶，而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的原故！

撒翁同志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错误，这一错误是综合上述七种错误而来的！

从中央所发出的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一切文件中——以及对撒翁同志的复信中，都可看出中央的观点与撒翁同志的观点立于不能并容的地位。因为中央对于这问题是根据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尤其是帝国主义战争与反苏联战争的态度整个原则路线决定的，撒翁同志是抛弃了共产党员的见解而堕落到社会民主党员的见解而形成的观点，所以中央要求撒翁同志声明放弃他这种严重错误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二 撒翁同志错误的思想根源

——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

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实质，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基点看来，是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已经充分的具体的说明了，现在我们不能不更从中国党过去的错误思想根源中，来寻找撒翁同志这一意见的根蒂。在这一追本求源的工作中，我们马上便可发现和指明：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主张，毫无疑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要证明这一发现和指明的正确，只须举出几个最主要的思想内容来作例便够了：

九、中共过去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一，便是把“民族利益”与

“阶级利益”这两个东西，完全隔绝和对立起来，以为“民族利益”只是一小群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无关，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时刻要以顾及“民族利益”为前提，既要顾“民族利益”，便不能不牺牲工农的“阶级利益”；否则民族革命中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破裂，资产阶级不能不退出这一革命同盟，结果便不能不妨害“民族利益”。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整个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放弃对资产阶级的严格批评，抛却自己的独立政治面貌，不在革命转变的紧急关系中，给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以非常手段的打击，以致牺牲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撒翁同志意见的中心精神，便是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单从“民族利益”的观点出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过失，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思想的历史继续！

十、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二，便是把中国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或是所谓“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大道理”）这两个东西完全隔离和对立起来，以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是中国民众的事，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无关。所以在机会主义领导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总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把共产国际的正确决议和指示，不公开给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因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了解而有具体更正确的了解与认识，而偏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联邦共产党的兄弟党的帮助和领导，更是加以非常忽视和轻蔑的态度；“联共不懂中国实际情形”，“联共是革命已经成功的党，其经验不能适用于中国”，“俄国人不懂中国实

际”……这一类的呼声，在机会主义领袖的口中，可以时常或明或暗的听到，对于苏联实际生活的鼓动工作和经常宣传，更是客观上表示出非常的怠工。在整个国共合作的历史阶段中，在那样利于这一鼓动宣传的环境之下，试一检查这一工作的实施与成绩，便令人感觉到异常的不满！在现在“武装拥护苏联”已成为实际行动口号的状况之下，越发使人追溯到过去对于苏联实际生活介绍工作缺乏的结果。在一般劳苦群众中，仅仅存在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观念，是非常不够的；即在群众的先锋队分子当中——甚至在一部分同志当中，对于苏联的实际了解，也非常薄弱；“苏联是工人的国家”这一观念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未曾足够的充实起来；于是便对苏联发生许多的幻想和臆测来，以致现在有时对敌人的宣传也不免发生疑虑——甚至于动摇！这一点不能不归咎于已往党对于苏联实际生活介绍工作做得不充分的原故！

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撒翁同志意见的主要精神，便是以“世界革命利益”与“中国民族利益”的不相容或对立的观点出发，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或然的感想，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思想的历史推移！

十一、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三，便是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蒋介石不要共产党员夺取军权，机会主义领袖便宣传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领导要统一；国民党不要共产党员夺取政权，机会主义领袖便迫令共产党员脱离县政府和地方政府；武汉政府的国民党领袖大骂“工农运动过火”，机会主义领袖便宣传“工农运动幼稚”；国民党不允许工农组织侵犯和代替国民党政权的作用，机会主义领袖便下令工农团体绝对遵守所谓“革命纪律”；汪精卫高唱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机会主义领

袖便附和其说主张召集长江工商业者代表会议(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机会主义领袖,早已宣传:中国资产阶级等于凤毛麟角!)。现在——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国民党高呼“民族利益”,撒翁同志便宣传“具体民族利益”;许多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确受资产阶级“民族”纠纷的宣传以及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传统思想,而不免于难于了解和接受“拥护苏联”的口号,撒翁同志便主张我们应该迎合他们的心理说话;无产阶级在历史的、革命的事变当中应有的独立主张与领导作用,在撒翁同志的心目中是绝无影响。这不是一个忽然的、临时的荒谬,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病根的历史发作!

十二、机会主义的特质之四,便是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不以为只有力量可以战胜力量,只有革命的武装可以战胜反革命的武装;而以为用“和平”方式有战胜反革命武力或取得反动力量谅解或让步的可能。在黄埔军校创立以至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的过程中,机会主义领袖始终未努力自己武装力量的树立和培养;在北伐军由广东打到武汉的过程中,更抛弃和错过了武装工农和夺取士兵的许多有利的机会;在上海工人武装占领上海的紧急关头中,机会主义领袖不知以工人武装基础而建立政权,命令武装群众等待蒋总司令的批准才实行市政府的职权;在宁汉分裂后,所谓“武汉时期”中,不利用一切可能去武装工农群众以保证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和实行革命转变,反而限制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以至于自动的缴纠察队的械;当许克祥叛变时,变十万工农军围攻长沙的行动为静候国民政府及唐总指挥解决的行动;在南昌暴动的事变中,宁将枪炮抛弃在山谷水涧里而害怕去使农民群众武装。这一切一切的主要病源,都是以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武

装行动”！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撒翁同志企图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行动，这不是一个单独的，偶然的失错，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的历史复演！

十三、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五，便是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当一个机会主义者高兴的说：“我们早已说过：现在没有革命高潮”！布哈林同志很正确而聪明的回答道：“……机会主义者始终是不认识革命高潮的，所以在革命高潮时，他们也只是会采用没有革命高潮时的策略；现在在没有革命高潮之时，机会主义者高喊几声，‘没有革命高潮！没有革命高潮’，这绝不能表明他不是机会主义者，而只是证明他是机会主义者！”这一段话非常有趣的而且正确的为机会主义者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写了一张照。在进攻苏联的战争当中，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都相信而且准备着不可避免的到来的革命高潮，撒翁同志偏表示毅然的怀疑，这不是一个失慎的、卤莽的疏忽，而只是机会主义的历史本质！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

署名： 裕 玉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一)

海牙赔款会议以来的国际政局，的确表示出国际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复杂到什么程度，尖锐到何种田地，绝不会混淆或减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与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间的根本矛盾。所以每当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加深一层或扩大一步时，它们共同进攻苏联的阴谋毒计不仅不曾有丝毫的放松或缩小，而且更加急进和周密。英美联合和平宣言，虽然一方面表示出无论如何不能和平解决的英美矛盾，更加深刻，另一方面引起日趋错杂的国际纠纷，更加混乱；然而在武装干涉苏联的意义上看，它与非战公约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爱里欧的“欧洲共和国”的宣传和企图，虽然是对英美协调的愤忌回声；然而在经济封锁苏联的意义上看，它是与白里安欧洲经济同盟有一样的用心和取意。虽然因为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让步，日本暂时取得对中东路问题更多的指挥权，在中东路占领和满蒙利益的攫取上，更加深重了与主张“由国际联盟共管”和“由国际银行团共管”的列强的反感；然而在直接进攻苏联的意义上看，它是与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心与设计不相矛盾的。不仅在两个不能永远并存的社会制度的

冲突这一基础上，国际帝国主义者不能不决心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即在帝国主义相互间，得以顺利的安心的火并这一观点上，国际帝国主义者也不能不积极实行进攻苏联的计划。帝国主义强盗们互相火并时，各个都要求有一个勇猛的前线和安静的后方。前线的勇猛与否，要依宗主国及殖民地的劳动者是否为帝国主义者所宣传的动员口号而致力作战为前提；后方的安静与否，要看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是否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为决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直接产物，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唯一领袖和忠实同盟，是帝国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和平”宣传去准备战争的唯一暴露者；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愈益紧迫，则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反苏联的战争危险也愈加紧张，这不仅是毫不足怪的，而且是势所必致的！谁不了解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更紧迫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战争的危险，谁便不会真正了解光怪陆离的国际政局；谁便会在中东路问题上把进攻苏联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并列起来；谁便会幻想在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矛盾加剧时，会使进攻苏联的战争和缓下来——谁便会放松和降低日益紧迫的拥护苏联的任务！

(二)

张发奎发动以来的混战局面，的确表示出根基于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和反映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的军阀战争，日趋深入和扩大；但是，无论各军阀间的冲突达到如何程度，无论战争的结果是谁胜谁败，绝不会变更与缓和受国际帝国主

义指使和整个中国反动阶级决意干的武装进攻苏联的政策。国民党进攻苏联战争的成份中,虽然包含有蒋介石政府以“一致对外”、“消灭赤化”的口号来移乱各派军阀反蒋战争的战线的企图,但“反俄反共”的战争,实在是中国整个统治阶级现时赓续其统治的政策的另一方式。当中东路问题发生以后,割据称雄的大小军阀,都一致的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产党的宣言通电;四分五裂的中国领土,都一致的进行反俄大会和铲共宣传的运动。改组派讨蒋宣言中,首先就说到“第三国际的压迫加紧”,《江南晚报》最近更特别加紧登载反俄反共的宣传;冯阎各系将领再三表示他们是反俄反共的忠实同志,吴佩孚也乘机标明他是有攻俄能力的第一条好汉,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反俄反共的最老前辈,国家主义派是中国“全民”中反俄反共的最老祖宗,张小胡子近来取得单独对俄的资格,更大逞狗威的更向苏联边境积极挑战。现在蒋系的南京政府也罢,将来改组派的护党政府也罢,国家主义、北洋系的共和政府也罢,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与北洋系的混合政府也罢,对于反俄反共这一点,都是列入政纲第一条。不仅因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全世界反动阶级一样的仇恨工人的祖国而必须进行反苏联的战争,即就中国军阀战争本身上论,中国军阀也不能不更积极的实行进攻苏联。中国军阀间的战争,是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的预演,是加深中国工农群众的压迫和剥削的直接强盗行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和瓜分中国的唯一领袖,是帮助中国民族解放及工农解放的有力柱石。中国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正在进行着“以武装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和“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因此,当军阀战争越趋紧迫的时候,反俄反共的工作也越加紧迫,这不是什么可怪的

事，而是理有固然的事：谁不了解进攻苏联是整个中国统治阶级现时赓续其统治的政策的另一方式，谁便不会正确了解离奇变化的中俄问题；谁便会在军阀战争中幻想对俄战争的根本改变或长期延缓；谁便会梦想蒋介石下台后的中国政府会停止进攻苏联——谁便会在军阀战争中采取根本错误的策略，谁便会忽视和模糊日益紧迫的拥护苏联的任务。

(三)

进攻苏联的战争，从国际立场看，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与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能永久并存的矛盾；从中国观点看，是整个中国统治阶级现时赓续其统治的另一方式的政策。中东路问题是进攻苏联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因此，第一，中东路问题迟早都有爆发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可能；第二，即中东路问题本身暂时因各种关系而不立时爆发巨大的战争，甚至于得到某种方式的和平解决，但这绝不是进攻苏联这一战争的危險成为过去或根本消灭。我们十二万分坚决的认定：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的根本消灭，只有在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制度和建设苏维埃的中国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我们进行“反对进攻苏联”的工作的真正内容，绝不是以为因我们的“反对”，便会不爆发反苏联的战争，而是认为反苏联战争是必不可免的要爆发。我们在“反对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积极唤起千百万工农群众了解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意义与作用，实行起来以实际行动去“拥护苏联”。以革命的武装力量，回答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以武装拥护苏联的手段，对付武装进攻苏联的手段，以“变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和“变国民党军阀战争为工农兵推翻国民党军阀的

革命战争”的实际行动，来实现拥护苏联这一历史的伟大任务。谁幻想在现在国际政局与中国政局的状况之下，中东路问题可以立时得到和平解决；谁幻想中东路问题解决了，便会延缓和停止进攻苏联的战争；谁梦想因我们“反对”便会不爆发进攻苏联的战争；谁不了解“拥护苏联”这一口号的真正内容与意义；谁不了解根本消灭“进攻苏联”战争危险的真正策略和手段；谁不了解在国际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矛盾加剧和中国军阀混战中，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也更加紧迫——谁便不免成为现时政局的落伍者，谁便不免误解、曲解以至抛却拥护苏联的任务。

载《红旗》第49期

署名：慕石

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 究竟是什么？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与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现在大吹大擂的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非常危险，这个危险的主要内容，就是党的政策过于急进，尤其是过于注意准备武装暴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弃了经常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不注意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在他们看来，现在是中国统治阶级统治稳定的时候，革命潮流继续消沉，没有群众的斗争，所以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而是专注合法活动和宣传“国民会议”。

我们当然不否认党在夺取群众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以至于错误，有些党的组织和同志还不能彻底了解从日常斗争中发动、领导、推动以至扩大群众斗争的意义和方法，有时甚至忽略和抓不住群众的日常需要来发动斗争。这些都是事实。但目前党的主要政治危险，却不在这里，自六次大会的路线逐渐达到全党以后，全党同志大体上都认识了目前还非革命高潮的形势，“武装暴动”已由直接行动的口号变为宣传的口号，现在应当努力从群众各种各色的大小斗争中做艰苦的发动领导工作，以夺取群众到党的领导下来。但对于一切工作均是走向准备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点的了解上

却是非常不够。从整个党的工作去观察，我们经常的遇到和发现忽略或不了解使一切工作联系到和汇合到准备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现象，从我们的千百个支部和小组中间，绝找不出一个如取消派的先生们所吹嘘的一样，简直不做日常工作，而只注意暴动准备的。反之，从这些支部和小组中间，仅能找出极少数很少数的支部小组，是曾经觉悟到武装暴动之任务的，是已经开始执行这些任务的。不会和不能把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到党的总的政治口号，不会和不能把党的政治口号广泛的群众化；对于武装暴动的根本观念的认识模糊，对于武装暴动的实际意义的了解欠缺，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技术的准备忽略，是普遍的现象。党团员军事化，武装工农的实施工作，即在全国工作模范区的江苏（尤其是上海）省内，都还未正式开始。且在党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中，都很少作武装暴动的经常宣传工作，对夺取和分裂敌人武装的工作也作得不充分，对驻华的帝国主义武装中的工作更是薄弱，一般同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与实际，更非常模糊；这才是非常大的政治危险的倾向！

现在的事实是，我们不但未太过注意于暴动的责任，太过注意于一般的政治口号，太过于注意一般革命运动的指导；而是相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落后特别表示得明显。在一切伟大的群众罢工中（如景德镇二十万磁业工人罢工，青岛五六万纱厂工人罢工，上海四万多丝厂工人罢工，……等），在一切伟大的群众示威中（如五卅，八一，九一，等等），在一切自发的群众武装斗争中（如北京以人力车夫为主力的武装骚动，青岛渔业工人的包围社会局等），在一切广大的群众武装行动中（如各地的游击队及苏维埃割据区、四川抗捐军运动），在一切士兵的哗变与革命化的投奔红军工作中（如四川旷旅的举事，湘

鄂皖赣各地的兵变……等),发现了我们党在暴动工作中的一切弱点和落后。这是我们最大缺点之所在,这是革命运动的实际危险。这个倾向可使党从事实上是革命的变而为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这个倾向发展下去,便可成为只注意日常斗争而忘却了根本政治任务的经济派,便成为只武装工人阶级头脑不武装工人手足的孟塞维克派,便成为在原则上反对武装暴动而维护反动统治的社会民主党徒,便成为取消一切革命斗争而主张合法运动的取消派!——由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与中国党内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结合而成的取消派,便是这一政治危险的总体的具体结晶品!

把取消派的领袖分子,从党内开除出去,这并不能表示出党已经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的政治危险;这只是表示出党内右倾倾向已经成为公开的机会主义以至叛变革命的反动思想,而使党不能不采取坚决彻底的斗争手段。党非常认识党的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党比较易于战胜和克服公开的取消主义与取消派,党比较难于战胜和肃清存在党内的各种各样或隐或现的右倾思想和行动。失去革命前途的悲观主义,害怕工作困难的消极观念,夸大敌人力量的反动倾向,忽视主观力量的怀疑心理,“无出路”,“没办法”,“慢慢交”,“等等看”,只干经济斗争,不干政治斗争;只跟着群众尾巴,不站在群众前锋;只把工作缩小到支部范围,不相信群众力量,不注意群众工作;变力争公开工作的路线为讲求“合法”;藉秘密工作的名义而避开斗争和脱离群众;这一切一切,不是别的,都是右倾思想和行动!右倾倾向是走向机会主义的倾向。右倾倾向一发展下去,便成为公开的机会主义,便成为取消派。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政治危险(当然,我们并不忽略个人英雄主义,拚命主义,红色恐怖情

绪……等等的左倾倾向的危险)。与取消派及一切不正确倾向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同样的是政治危险的倾向。调和派是懦怯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派若不迅速的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上，便要走上公开的机会主义的道路！

肃清取消主义与取消派！

反对右倾倾向和一切不正确倾向！

反对对取消派右倾倾向及一切不正确倾向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

载《红旗》第56期

署名：慕石

论陈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到现在从共产党开除以前止（其实，自一九二七年中央八七会议后，独秀便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国一般社会上，都知道有一个革命的陈独秀！现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全世界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公开宣布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把他从共产党的组织内驱逐出去，中国革命群众将都要知道有一个反动的陈独秀！

革命的陈独秀变成了反革命的陈独秀，这一件历史事实，在粗知唯物史观和各国革命历史的人们以及身经阶级斗争战场的战士们看来，是毫不足奇的；但对于有些人或者有些莫明其妙！

当工人运动初期发展时，当阶级斗争还未走向最后决战时，许多自由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以至如大学教授一类的知识分子，都有暂时同情，参加甚至领导这一运动和斗争的可能。但当阶级斗争剧烈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分子之中，有一部分不能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便不可免的要脱离革命和背叛革命。俄国的司特卢、普列汉诺夫、托洛斯基，德国的伯因斯坦、考茨基，比利时的王德威尔，意大利的莫梭尼亚……都曾经参加或领导过社会主义的组织。中国的陈公博、邵力子、周佛海、施存

统、谭平山、任卓宣、袁大时……都曾经发起或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这都是很好的例证。陈独秀现在虽然还未做出如邵力子、陈公博、谭平山、袁大时……等那些公开反动的事实，但从他现在所发表的言论，从他对于共产国际、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他对反动的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关系，从他对国家主义、改组派、第三党、蒋介石系、帝国主义……等所做的“响应”工作……等等观察，他的确已经是只起反革命的作用。

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他加入工人运动的几年过程中，无论他的主观上是否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努力，但他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只是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把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资产阶级尾巴主义的服役。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根源，便由于他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夸大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比重，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与意义。《前锋》创刊号上，他的一篇《中国国民革命中的社会各阶级》，第二号上他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便是最露骨的铁据。他现在所坚持的取消派的思想，只是他的自由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的史的继续和史的发展。他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余孽在中国的统治，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不相信工农群众的革命要求与力量，因而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合法运动”的口号来取消“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以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去“和平发展”的思想来取消“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行动。取消派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的内应；因此，他便公开的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公开

的响应国家主义、改组派、第三党等等“国民会议”的要求，公开的附和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的“共产党勾结改组派”的造谣，公开的拥护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托洛斯基间的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小组织活动。因此，他便成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一个只起反动作用的工具！

从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开除出去了的陈独秀，如果能翻然痛悔，安心做一做他自己所谓的“改造中国文字”工作，那么，或不致于更进一步的走向公开的反动道路上去。否则，他将走上陈公博、谭平山、托洛斯基等一样公开无耻的反革命道路！那么，不久的将来，或者中国一般社会上，又要轰传一个反革命的陈独秀！

载《红旗》第57期

署名：慕石

第三次暴动与 “第四次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上海的工人群众——尤其是亲身参加过上海三次暴动的人，一谈起上海三次暴动来，莫不眉飞色舞，大声疾呼的说：“我们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这的确是值得每个革命者欣庆的事情。这不仅表示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深切觉悟到：“中国革命中的一切根本矛盾，只有以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并且表示出先进阶级的群众们，时时都有准备着为武装暴动而牺牲作战的勇气与决心！

但是，我们讲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时，一定不仅仅了解第三次暴动是上海工人群众的英勇伟大的著作，并且应当了解第三次暴动的主要特点与主要错误，然后才能正确的去了解所谓“第四次暴动”的特质与我们怎样去胜利的干第四次暴动。上海三次暴动，客观上是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表现。但因为革命主观力量赶不上客观事变发展的进程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使上海暴动在实际上表现出下列的特点和错误：（一）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只是成了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二）只打倒了旧直鲁军阀统治，没有准备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三）只占领上海的中国界，未曾与帝国主义的统治起直接冲突。（四）成立

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五)临时市政府在它存在的两个星期中，对于上海广大劳苦群众的紧急问题(工资，工时，改良待遇，住房，税捐，政治自由等等)一个也没解决。

上海工人群众的所谓“第四次武装暴动”，必须与第三次暴动根本不同：第一，暴动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二，暴动的群众不仅要战胜中国反动势力，并且要驱逐外国海陆空军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第三，暴动群众不仅尽力摧毁旧政权机关，并且立即建设群众自己的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第四，苏维埃政府在他成立的第一点钟内，即须迅速颁布解决工农兵贫民群众紧急要求的政纲(如米归工人，八小时工作，救济失业，社会保险，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废除一切税捐，代之以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大资本家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当铺，将当铺的物品，无报酬的归还贫民……等等)；第五，苏维埃政府不仅设法维持保障上海既得的胜利，并且努力扩大其胜利，与全国的工农兵运动汇合起来。

只有这样大体根本上去了解第三次暴动和所谓“第四次暴动”的区别，才不致于以为所谓“第四次暴动”只是第三次暴动的重演！

上海以及全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不仅应该研究上海三次暴动的经验，尤其应该研究广州暴动的教训。广州暴动建设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存在过五十八点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不仅历史的与阶级的意义非常伟大，即暴动本身的经验与教训也非常丰富，将来的中国工农兵大暴动，是广州暴动的继续工作。上海的工人群众只

有把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也研究得纯熟，才能顺利的干胜利的所谓“第四次暴动”。

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中国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才能完成。广暴二周年纪念日（十二月十一日）与反军阀战争周（自十二月九日到十五日）均迫在目前了，全中国的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正积极准备一个伟大的暴动的预演——政治总示威。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所以对于正准备着干武装暴动的全中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时时准备干所谓“第四次暴动”的上海工人群众，必须使之正确的去了解过去的武装暴动与将来的武装暴动的主要异同，以便他们能够正确的及时的发挥他们干武装暴动的决心和勇气！

最后，据说改组派现在正在上海收买一部分军警流氓，同时，想利用一部分工人来一个反蒋的暴动。广大的上海工人群众当然不会受改组派的欺骗，但难保不有一部分工人群众会受欺骗，甚至有一部很勇敢的工人轻于上当去作战，所以明确的提出第三次暴动与所谓“第四次暴动”的性质与任务，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只有如此，工人群众才能明确的认识：反革命的改组派为与蒋介石派争夺升官发财的勾当来利用上海工人干暴动，绝对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准备领导与全上海工会时时准备干的解放中国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所谓“第四次暴动”！

载《红旗》第58期

署名：慕石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

在共产党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出现的五十六年末，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祝声里，在落后的东方的“老大”中国的领土内，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用武装暴动创造了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权。这一事变证明了殖民地革命是可以建立苏维埃国家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武装暴动”这种艺术，已不仅是先进国工人阶级善用的武器，且已成为后进国工农群众解放的法宝。“夺取政权”这一斗争，已不仅是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且已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劳苦工农的直接行动。广州暴动明显的表示出中国无产阶级已走上国际革命运动的前锋，推进了全世界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印度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高涨，显然是广州暴动有力的回声！

广州暴动虽然从客观革命形势看，是革命退兵时的一战，是中国工农兵以武装力量维持革命既得胜利和使革命向前进展的英勇企图。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它使革命的发展深入，它开始了工农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沿序着广州暴动而发展下去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前途，很明显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说：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连续到中国的“十月”！

八七会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共产党的独立政治面貌和独立政治主张，不能呈现在广大工农群众之前。广州暴动在事实上表现出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的伟大力量，提出为工农兵本身解放的政纲，建立了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因此，不仅全中国工农兵群众因广州暴动而认识了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即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如《顺天时报》）和研究系的（如《晨报》）报纸，也不能不公开的说：“共产党是有主义，有政纲，有群众的政党”，“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独立的力量”，而深深地为“无主义，无群众”的国民党和奉系军阀担忧着“赤祸之来，期或不远”！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它成立的顷刻，马上颁布了解放工农兵贫民的政纲。对工人最重要的有：（一）工人监督生产；（二）八小时工作制；（三）工厂工人和手工工人一律增加工资；（四）国家救济失业，设立劳动保险；（五）特别保护女工与童工；（六）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群众组织；（七）恢复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一切权利；（八）米归工人；……对农民最重要的有：（一）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土地归农民；（二）废除一切租税契约；（三）打倒豪绅地主，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四）保障海陆丰苏维埃的胜利；……对于兵士最重要的有：（一）兵士月饷大洋二十元；（二）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对于一般贫民最重要的有：（一）劳苦群众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身体、居住的完全自由；（二）没收资本家的房屋，分给劳苦贫民住；（三）没收当铺的物品，无代价的退还贫民；（四）废除一切税捐和欠债；……对外政纲有简单的鲜明的两条：（一）打倒帝国主义；（二）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这些政纲毫无疑义的都是中国工农兵贫民解放的迫切要求，他们永远活跃在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心坎里，中国工农兵

贫民群众正在准备和积聚更大的力量，来为实现这些政纲而斗争！

广州暴动在它经过的五十几点钟间，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第一、武装暴动是阶级斗争的最高方式，暴动前一定要有各种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汇合和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第二、它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柱石——工、农、兵——通力合作的开始；从事实上证明，工农兵大联合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反动派联合的力量。第三、在群众英勇热烈的斗争情绪之前，敌人的武装容易崩溃和转变；同时，也只有以群众的武装力量，才能征服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第四、被压迫群众不仅不能利用现成的旧国家机关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不仅能彻底摧毁旧政权机器，并且能够很快的创造合于劳苦群众解放之需要的政治组织。第五、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唯一政权形式，只有群众自己的政权的创造力和活动力最伟大。第六、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马上即着手组织正式红军。

从广州暴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怎样去准备和进行将来胜利的中国工农兵革命大暴动。第一、学习在暴动前，怎样细心的耐苦的正确的去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怎样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怎样从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中，去充分的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以避免“发动群众工作不充分”的错误。第二、学习在暴动前，怎样在农民群众（特别是近郊农民）和城市贫民（苦力，小贩，店员，学徒等）中刻苦工作，使他们积极参加暴动，以避免“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泛”的缺点。第三、学习在暴动前以至暴动时，怎样正确的和技巧的在敌人武装中进行分裂，瓦解和使之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艰苦工作，以避免“帝国主义兵队、军阀兵队、民团、警察的士兵在统治阶级

欺骗之下来压迫革命”的危险。第四、学习在暴动前以至暴动时，怎样准备和实行总罢工，以使敌人没有“从附近城市运兵压迫暴动”的可能。第五、学习在暴动前和暴动时怎样联络和配合各地（至少各重要区域）革命力量的发动和声援，以免“暴动群众陷于孤立”的地位，和“有些革命力量还不知道暴动发动而不参加”的遗憾。第六、学习在暴动前，怎样尽力党员军事化及工农武装的工作，以免重蹈“群众没有巷战常识”，“没有得力武装干部”，“大炮、机关枪不会使用”等的覆辙。第七、学习在暴动开始时，怎样立刻消灭反革命的主要机关和首领，以免去“反革命领袖得以逃走去组织反革命的反攻”的危险。第八、学习在暴动开始后，怎样迅速的坚决的毫无反顾的向敌人主力进攻，以免再犯“敌人得以乘间整饬武装向革命进攻”的错误。第九、学习在暴动前和在暴动时怎样艺术的组织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免受到“一日半兵士得不到饭吃”，“红军司令部连买小菜钱都没有”，“侦探队始终未能组织成功”，“有些人把枪领跑了，司令部也不晓得”……等等的困难。第十、学习在暴动前以至暴动时，怎样在国民党影响下的工会作夺取群众的艰苦工作，以免却“平时忽视在国民党工会中的群众工作，以致还有少数工人在工贼欺骗之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现象。只有这样细心的去学习广州暴动的教训，才能使广州暴动成为最近将来中国工农兵暴动胜利的预演！

弥漫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的战云，集中在中东路上的进攻苏联的战祸，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瓜分中国的危险，只有中国工农兵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指挥下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是唯一正确的手段！

今年当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无疑义的使广大民众感觉着反军阀战争的特别重要。广州暴动的产生，无疑义是革命群众对当时国民党军阀战争的回答。在广州暴动过去的两年中，国民党军阀战争却走到更复杂更加紧的形势。尤其在今年全国军阀混战的时候，自广东以至顺直，无一处不卷入军阀战争的旋涡。战争，戒严，拉夫，封船，加税，发公债，纸币跌价，交通破坏，米价高涨，无一样不是目前军阀战争给予广大群众的痛苦。所以广州暴动精神在今年的实际运用是反军阀战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年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周。在准备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要准备这一反军阀战争周，同样要准备用革命的群众暴动来消灭国民党的军阀战争。

广州暴动使得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力量发抖，现在的改组派领袖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等在压迫广州暴动时，三日夜（自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二时至十七日晨）屠杀广州市工人、贫民、妇女、学生、兵士达五千七百余人，第三党的领袖谭平山、邓演达等更高唱“广州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的超时代政策”，“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动”……等等的理由，来赞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的“合法”！在广州暴动前改组派与第三党还能勉强说几句“革命”的口头禅，来遮盖他们反革命的鬼脸，广州暴动便把他们的假面具扯得粉碎，使他们在广大劳苦群众前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

整个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报纸，都把英勇伟大的广州暴动事实，用“少数暴徒骚乱”，“过激分子捣乱”，“赤俄阴谋唆使共产党徒捣乱国民党统治”……等等的几句话，轻描淡写的隐瞒下去，深恐“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变”，兴奋了欧美工人斗争的勇气；另一方面，派遣代表（汤姆）到中国来作改良

主义的宣传,企图把赤色的中国工运变成黄色,邀请国民党代表出席第二国际的大会,使它深一层的与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法西斯蒂主义勾结,以便更灵巧的更残酷的压迫与缓和中国革命运动。其主要目的,便是企图使中国不再有“广州暴动”这一类的事变发生!然而中国的革命群众非常认识工人阶级的这些叛徒的鬼脸,深切地懂得,坚决的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是继续和完成广州暴动的主要工作之一!

托洛斯基在广州暴动失败后,便高声大叫:“中国革命已经死亡了”!中国机会主义者在广州暴动失败后,便幸灾乐祸的说:“广州暴动是盲动主义的最高表现”!他们就这样把含有国际的和历史的伟大意义的事变,由几万工农兵群众的血汗和生命创造的事变,轻轻地一笔抹煞了!他们最近对于中国革命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早基于他们忽视和敌视广州暴动的意义和作用而来的。中国工农兵群众正努力于继续和完成广州暴动的任务的工作,当然不能不努力铲除广州暴动的敌人——托洛斯基主义与中国机会主义!

苏维埃的斧头镰刀大红旗,虽然在广州市只飘扬了五十八点钟,但它已经从珠江到白河,从黄河到长江,时常隐现于各地!闽、粤、湘、鄂、豫、皖、赣各省中现存的苏维埃割据区,以及赤色的游击队,便是为广州苏维埃而英勇牺牲了的工农兵群众的伟大化身。他们能够在敌人的三番五次的“围剿”,“大举肃清”的计划和战争中,矗立不坠,主要的原因,便是一方面他们已学得了广州暴动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是正在努力继续和完成不可磨灭的广州暴动的伟大任务。这些割据和游击队的对于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及当它到来时都有极伟大的意义和作用。纪念广州暴动的真正工作,是尽力扩大以武装暴动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尤其是扩大巩固和

发展现有苏维埃区的和游击队胜利的宣传和行动！

当我们纪念伟大的广州暴动时，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直接因广州暴动而英勇牺牲的七八千战士和其领袖张太雷同志，绝不会忘记为继续广州暴动工作而沉痛牺牲的苏兆征、彭湃、杨殷诸同志，以及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所屠杀所监禁的三四十万工农革命的战士！我们加紧夺取群众以准备促进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工作，实行以革命群众的斗争行动，来回答以至消灭敌人的白色恐怖！为我们的死者复仇！为继续和完成广州暴动的任务而积极奋斗！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日，应当是我们战斗力大检阅的日子！我们在纪念时详细检阅我们在广东暴动以来的党内党外工作，检阅我们夺取群众工作作到的程度，检阅我们在每个工厂、矿山、铁道、轮船、兵营、学校、街道中的工作的缺点和进步，检阅我们比“五一”、“五卅”、“八一”时的发动和动员群众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有了好多的进步。同时，尽力使广州暴动的斗争方法，斗争教训和苏维埃政府政纲普遍群众化，使广大工农兵群众团结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旗帜的周围，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才能得到很大的推进！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署名：慕石

极可注意的两个 农民意识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

中国社会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目前全党党员的成分也是农民占极大的优势，许多新的无产阶级分子是刚才不久从农村中蜕化出来，许多城市工人还是做季候工作，无产阶级群众与农民群众有千头万绪的联系，这一切情形，对于工农联合的工作上，当然有相当的优点；但农民意识，就很容易在党的各种问题上反映出来。不仅在一般的乡村支部与小城市党部中，不仅在苏维埃割据区及农民游击队中，也不仅在一般对党基本组织比较薄弱的同志中，时常可以发现反映农民意识的问题，即在大城市工作的比较负责的同志中，有时也可以遇到他们无意中反映出农民意识。不过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不是现在党内存在的各种农民意识问题，而只是讲到两个这类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一)革命领导权问题；(二)反对富农问题。

(一)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工农阶级联合领导革命”？在最近有一种文件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一段话：“……这一工农阶级联合领导的革命，革命的运动，才有急剧的进展；换言之，中国革命能够很快的由广东进取武汉，把北洋军

阀打倒，也就是我们工农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发展，俱在中国工农阶级领导中进行……”从这一段话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作者是承认：中国革命是工农阶级联合领导的！这一观点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作者之所以发生这种错误是由于他不了解下面的三个问题：一、所谓革命领导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二、究竟什么阶级能够领导革命？三、工农联合与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问题。

一、所谓革命领导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在一定阶段的革命当中，有共同利益的一个以上的革命阶级之中，有一个最进步、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最有能力和具有创造新社会制度的质力的阶级，根据它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方向，领导着其他阶级，完成一定阶段的革命^①任务。所以讲到领导权问题，一定有领导阶级和被领导阶级。在无产阶级还未形成相当独立政治力量的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年）中，法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唯一领导阶级，农民是主要的被领导阶级。在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俄国（一九〇五——〇七年）与中国（一九二五——二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争取对农民的领导权而作剧烈的斗争。我们只能讲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农民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却绝不能讲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农民联合领导的革命。同样，我们只能说中国革命中，工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但绝不能说中国革命是工农联合领导的革命！

二、究竟什么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呢？革命领导阶级不仅在革命各阶级中是最进步、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最有能力的阶级，而且要是具有创造新社会制度的质力的阶级。农民

^① 原文脱句，已根据《红旗》第64期“正误声明”补入。

只是在它与地主阶级对抗的意义之下，成为一个阶级；从正确的科学的生产关系、生产地位上观察，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纯的阶级。“农民”这个涵意之下，包括有私有财产者与劳动者。农民一方面是小私有财产者，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因为它是私有者，所以它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因为它是劳动者，它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农民本身是没有独立的阶级意识、独立的阶级立场的，所以它绝没有创造新社会制度的质力。具备这种质力的，只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然有过不少的英勇伟大的农民暴动，但其结果都不能变更整个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社会当中，即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斗争，如果单靠农民本身的力量，结果都会流产的。它只有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这样或另样的去解决自身解放的问题。农民是永不会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事实上绝不会有工农阶级联合领导革命的！

三、工农联合与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问题——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中工农联合的策略，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但工农联合的意义，绝不是使工人阶级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平线，使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不超越农民意识。阶级的联合绝不能是阶级的混合。工农联合的策略，不仅要建筑在工农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时必需要建筑在提高农民斗争意识的水平线，使之随着先进阶级推进革命向前发展的基础上。换言之，即是要使在这一联合当中，取得和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把工农联合与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混合起来，把工农看成同样的阶级，把工农看成有同等性质、同样作用、同一威力的阶级，事实上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同化或屈伏于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则不仅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终成泡影，即革命当前的任务——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任务，也绝不能得到彻底的和应有的解决。

无产阶级在一切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不是而且不应孤军作战的；革命的同盟军（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获得，是首要的问题；一有同盟军的问题，便必然要发生革命领导的问题。列宁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精髓，不是简单怎样取得和巩固同盟军联合的策略，而是怎样使无产阶级不仅取得革命同盟的力量，并且要在这一同盟中取得保证和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是空喊工人对农民的领导，而忽略了工农的联合；右倾分子的错误是只知工农的联合，而忽略了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过去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是为的保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而放弃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现在这种“工农联合领导革命”的观点，如果发展实施下去，一定也是使无产阶级放弃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

中国现在阶段中的革命任务能否彻底完成，以及中国革命能否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都靠中国无产阶级能否取得和保证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权为转移；所以正确的了解工农联合与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问题，是非常迫切而严重的任务！

（二）反对富农问题。

自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部给中国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和中央根据此信的原则发出“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以后，在同志当中，已经不再听到“联合富农”，“不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只反对兼半地主兼半封建和雇有多数雇农的富农”……这一类的公开的错误的论调了。这是否表示过去许多同志对富农问题的错误见解，已经完全打消和不留影响了呢？没有，绝没有。这一点当我们和有些同志

谈到反富农的理由时，便暴露得非常明显。

有些同志在反对反对派时说：“……反对派主张反对富农，因为他们以为现在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富农是乡村资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所以要反对富农；我们主张反对富农，因为我们以为现在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正因为富农不是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半封建半地主，所以才要反对富农。……”

我们且先指出反对派的错误，然后再指出这类同志的错误。

反对派的错误是：（一）不仅对富农问题的错误，而是对于整个农民问题的错误。（托洛斯基主义者及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在理论上根本否认和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现在阶段中革命，在策略上主张应用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农民策略——中立中农，联合贫农，反对富农——）（二）不仅对农民问题的错误，而是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错误。（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打倒国民党，统一中国——已经完成，现在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勿庸再说。

至于持上述这种反富农的理由的同志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一）他们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只反对封建关系的压迫和封建剥削，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式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只反对富农的“半封建性半地主性”，而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性”。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便不应反对资产阶级了！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列宁曾再三的指出俄国当时存在着两种社会战争：一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关系反对封建残余关系的战争，另一种是雇佣劳动反对资本剥削的战争。不过在当时的俄国，是后一种战争所处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位和比重，要次于前一种。所以那时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还是未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而且客观上还是使资本主义得到更自由顺利发展的条件。但列宁从来未说过，在当时的俄国，只反对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恰恰相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无产阶级之所以参加和领导反封建势力的斗争，正是为了促进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只有在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时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促进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心、觉悟性与组织力，以造成、加速和推进革命转变的条件，中国的富农事实上还兼有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剥削，所以中国现在更应当而且必须如此。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部致中国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上，特别着重地说：“我们向你们介绍这种策略路线（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作者附注）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那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二）他们以为列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联合所有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口号，是联合富农的口号。这毫无疑问的是把列宁主义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著作中，只是以广大的农民基本群众与地主阶级看作民主革命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对立，绝未曾经过联合富农，尤其未曾忘记过雇农与富农是劳资关系的对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列宁主义不仅教训乡村无产阶级不要离开了一般农民争土地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同时，还教训它要领导一般农民的土地革命斗争，教训它不要忘记它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与富农有阶级的对立，它还有进一步和深一层

的历史任务。中国富农因特殊条件关系，兼有半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无产阶级的政党，绝不能因此作出“联合富农”，“不反对不兼半地主半封建的富农”的结论来。同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因此而去辨别某一或某些富农的压迫剥削成分中，那些是半封建性的，那些是非封建性的，而是要在我们底政纲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纯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一般农民的反封建的斗争更紧密联接起来。

这些同志的这种错误，依然是“只反对兼半地主兼封建性的富农”的遗毒，实行起来，依然是“联合富农”，至少是不反对富农。只站在一般农民的观点上去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压迫和半地主剥削，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反对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包括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这不是别的，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

这种农民意识有什么危险呢？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信上回答说：“……假使党对于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则党对于农民群众的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对富农之不正确的策略，同时，也就表示对贫农及雇农的策略不正确”。对反对富农的策略有了动摇，则党决不能坚决的去组织农村工人，绝不能加紧他们的阶级斗争，绝不能使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之最落后群众能提高他的阶级意识，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必不可免的要妨碍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失去我们在农村中的基础，以致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

这种农民意识为什么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条件之下特别危险？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信上回答说：“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

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削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的去了解现在中国革命中的反对富农的策略呢？我们应该这样的解答，我们与反对派不同的是：反对派以为富农是中国乡村中政治上经济上唯一的主要的统治者，乡村中主要唯一的斗争是乡村无产阶级反对乡村资产阶级的斗争，站在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上去反对富农。我们现在之所以反对富农，不仅是为的雇农与富农的阶级的对立，而更因为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与半封建性；即不仅是为的加紧乡村阶级斗争，为的促进革命转变而反对富农，即为的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更必须坚决的在原则上反对富农。我们虽然丝毫不放松反富农的斗争，但我们同时坚决指明中国农村中的中心剥削压迫者，是地主豪绅军阀和站在他们上面的帝国主义。执行反富农的策略，并未曾改变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不过，在这一策略坚决和正确运用之下，汇合其他一切有利的条件，必不可免的要促进和加速中国革命转变的过程。

载《红旗》第60、67期

署名：慕石

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

(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

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有一部分同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犯了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一是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倾向，二是否认或忽视中国革命现阶段中存在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倾向。

反对派说：中国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统治，根本没有什么“封建余孽(至多不过是余孽的余孽)”了；于是有一部分反对反对派的同志，便跑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或忽视中国已有相当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这件事实。否认者根本只注意封建余孽，想把从城市到乡村，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到中国各种经济，都解释成封建余孽；忽视者根本只愿谈封建余孽，生怕听到或讲到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这些人的错误来源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他们以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第二，误解中国封建余孽占优势的意义。他们不懂得：(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并不是根本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不能独立的自由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畸形的、变态的，主要的是成为宗主国的经济附庸(商品资本的市场，原料的产地)的，而不是向着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发展的。然而部分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痛苦、极迟钝、极畸特、极复杂的状况之下依然是努力挣扎发展着；至于一般资本主义的成分的发展，并且是以极尖

锐、极剧烈的形式扩大和深入着；正因如此，所以在这样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年龄要比民族资产阶级大，其力量也优于民族资产阶级。这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均是如此。（二）所谓中国封建余孽占优势，其主要意义乃是指明中国现时乡村中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仍停留在封建残余的基础上，以及帝国主义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都利用和维护这一封建剥削制度，以致形成封建剥削在全国经济关系中占着优势的局面，但这绝不是根本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些同志或者不懂得，或者未曾过细思索过，这种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有何等严重的意义！这一倾向是否认或忽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否认或忽视中国城市中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存在，乡村中有农民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阶级的对立；是否认或忽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有领导革命的可能；是否认或忽视中国已备有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相当条件，是否认或忽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是否认或忽视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反对派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于是有一部分反对反对派的同志，便跑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或忽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中已经包含有一定的相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否认者根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看成两个漠不相关的东西，机械的以为干完这一个，然后才来那一个。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成分的影子；忽视者根本只愿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生怕听到或讲到社

会主义这个“怪物”，仿佛一讲到这个东西，便是“超阶段”的琐谈了。这些人的错误来源主要的也有两个：第一，他们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民主革命之间，有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间隔着。第二，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阶段革命中存在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他们不懂得：（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分是紧密的联系着和错杂着，我们之所以严格地划分革命阶段，是因为在一定阶段上革命所要直接做到和所能直接做到的客观任务不同，因而我们的一切根本策略路线也必须不同；我们之所以严格地划分革命阶段，正因为明确的指出前一阶段是直接展开后一阶段的大门，前一阶段的革命是直接为的促成和加速向下一阶段去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工农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基本常识。（二）一定阶段的革命性质是由它的客观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内容来决定。中国现在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只是因为中国革命现在一阶段上所要直接完成和所能直接完成的任务（驱逐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国家统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差不多是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完成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未超过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范围，但现在阶段革命中的革命动力（工农为主力，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革命领导（无产阶级）以及革命斗争方式（以罢工为主要武器）等，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此外，处在世界革命时代，苏联的壮大与邻近中国，当然都是利于革命转变的国际条件）。正因如此，所以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这些同志或者不懂得，或者未曾过细思索过，这种否认和忽视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中已存在着的社会主义的成分的倾向，在理论上

和实际上有若何严重的意义！这一倾向是否认或忽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原则；是走上俄国孟塞维克与中国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道路；是使中国现在阶段革命只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范围，是否认或忽视中国革命内部包含的一切有利于革命转变的条件。

这两个错误倾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一个只是紧接着前一个而来的；所以它们有一个共同严重的危险，就是否认和忽视中国革命的转变性。这些倾向要发展下去，毫无疑问的要成为革命新高潮到来时革命转变期中的致命的敌人；它们将成为反对革命转变的公开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源泉；它们将使中国十月革命中也要发生一些季诺维也夫与康米涅夫一流的“老布尔塞维克”！我们分析这种否认或忽视革命转变的倾向的来源，不应该仅从某个或某些同志“偶然的疏忽”，理论水平的不够，政治教育的薄弱……等等来观察，而应该进一步和深一层去从它们的社会阶级基础上来寻探。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一倾向客观上是标本式为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革命的最高意识，是一切土地与自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根本消灭人剥削人的吃人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只是唯一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处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处在农民成分现时占党员全体大多数的共产党党内，随时随地的注意进行反对一切农民意识的斗争，成为每个共产党员非常迫切的任务；而反对否认和忽视革命转变的这种最主要最危险的农民意识，尤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反对派断定中国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站在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要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因而否认了革命的转

变性。反对反对派的有些同志，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在阶段革命中存在着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客观上是走向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的基础上，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不超出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因而否认或忽视了革命的转变。“左倾”与右倾只是机会主义的两个轮子呵！

载《红旗》第68期

署名：慕石

再论反富农问题

——富农问题的严重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在江西发现了只做抗捐,抗税,抗粮,不做抗租,抗债的运动,同时,发现了“革命同志家属的财产不没收”的口号。在鄂豫皖边各县发现了:“因为土地不够分,所以不要没收土地”,“保护中小商人利益”,“不提出店员的任何要求”,“雇农少,不用组织雇农工会”,“在苏维埃选举时,农村工人与农民都是按人数多少一样的比例选派代表”,“游击队在前线与敌人肉搏,后方留守的人向反动军队告密”。贫农雇农公开发问说:“我们为什么革命?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们只说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为什么不干呢”?……等等现象。保守观念,地方观念,乡村党的干部多半是富农分子,以致土地革命不能深入,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不能达到应有和必需的程度,雇农贫农不能形成乡村中的革命基础,已成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异常严重的问题!

过去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反富农问题的不正确观点,固然已经中央纠正和事实答明。但这绝不能看作富农意识和对反富农问题的各种不正确观点,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复存在或不生影响,上述的这些客观事实,深切地指明了富农意识和对于反富农问题的各种犹豫、动摇及不坚决,是有其深邃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严重的实际危险。因此,留意考察同志中对于这

一问题的各种不正确观点,而随时随地加以指责和驳斥,是目前全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最近在讨论反富农问题中,又发现下列的几种不正确观点:

第一、是对于富农的“革命性”还存有幻想——在许多苏维埃和游击区里,党及群众组织的领导权,有时落在富农成分的手中。这些富农分子,不仅口头上大呼革命,而手头上也做些于群众多少有点好处而不妨害其根本利益的行动。因此,使有些同志对于富农的“革命性”还存有幻想,以为富农现在或许还是革命的。举一明显明例,最近有同志在讨论肃清乡村富农领导的会议中,曾主张在“新干部未曾养好以前,还只得用富农以至中小地主成分的旧干部”。这种幻想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同志不了解现在还有一部分富农成分参加,甚至领导农村斗争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内容,不能了解他们参加甚至领导斗争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当一般农村——尤其是苏维埃区和游击区——的阶级斗争已经扩大和深入到现在的情况之下,富农之所以参加甚至领导农村斗争,主要的并不是为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捐税,而是为的反对没收土地,反对平分土地,反对取消一切债务,反对反商业资本的剥削,反对雇佣劳动者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改善,反对无产阶级取得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简明的说来:并不是为的革命,而是为的和缓革命与消灭革命,为的反革命。只有坚确这样一种认识,才不致于对富农在现在革命阶段及革命形势中只有反革命作用这一基点发生动摇,才不致于对富农“革命性”抱丝毫幻想,才能够坚决的彻底的从各方面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

第二、是不认识富农意识领导的实质——有些同志已经

见到，在地方暴动的行动中，只停留在抗租、抗债的运动范围内，不实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在贫农雇农中，已公开发出“为什么不真干土地革命”的呼声……等等现象，不能马上承认那个地方运动是富农意识领导这一鲜明的事实。他们的理由是：那些地方的运动领导者是几个共产党员，不是富农。这些同志的错误，是不了解阶级意识与个人思想间的区别。我们非当相信资产阶级成分代表资产阶级的意识，富农分子代表富农的意识，无产阶级分子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识；但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与富农成分中绝找不出极少数放弃自己阶级意识的个人，无产阶级队伍中找不出有资产阶级和富农思想的个人。因为阶级意识毫无疑问地是由其生产地位与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个人思想有时还受他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所支配。因此，即使不是富农分子，也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表富农意识，在农村斗争中有意的或无意的执行富农路线。因此，就作为党内没有或很少富农分子混入，我们也绝不能以为只要是共产党员领导的，便不是富农意识的领导；何况在现状之下，党员成分中（尤其是乡村党的组织），还有不少的富农成分呢！如果我们不从阶级意识及根据这种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实际领导和行动来认识富农意识的实质，而仅从领导分子个人的社会成分来判断，则不仅始终无法正确了解农村事变中富农路线领导的实质，而尤其无法去了解和解释为什么有许多住在通都大邑，现在未作农村工作，甚至长期出入工人群众中的共产党员，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有时发表代表富农利益的理论这些实际了。其结果将使反富农意识的全党斗争，变成农村党组织的局部任务了。在农村中也更只是将反对一个阶级意识的斗争，变成反对某几个富农出身的领导分子的争斗了。如此，则不仅没有可能一般地从理论上、组织

上肃清党内和群众中的富农意识，即农村斗争中富农意识的领导也没有扫除的可能！

第三、是将反富农的斗争看成只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反富农意识的斗争是反富农斗争中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毫无疑义。但反富农的斗争，绝不只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也不只是“主要的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换句话说：“反富农的斗争，绝不只是思想上的斗争”或“主要的是思想上的斗争”，而是除思想斗争外，更要进行实际的（物质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更正确更具体些说：反富农的斗争，绝不只是在文字上口头上进行指出富农意识和反对富农意识的宣传鼓动工作，而是更要教育、组织贫农雇农作为反富农的柱石；要彻底没收地主土地和分配土地以破坏富农的经济基础；要加资，减时，不付债，反商业资本以反对富农的各种剥削；要在群众组织中（如农协，红枪会，大刀会等），政权组织中（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红军，赤卫队……等），党，少共组织中坚决的排斥和肃清富农和富农意识的分子。只有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种种方面进行无情坚决的斗争，才是反富农斗争的全部；只有从物质上破坏和摧毁富农及富农意识所凭借的基础，才能使富农意识领导及富农意识减弱以至消失其作用，才能使乡村中的广大雇农贫农群众成为党和群众组织的中心，才能使革命更加深入和扩大。否则，只是口头上文字上高叫特叫大书特书反对富农意识，而不在实际斗争中摧毁富农实际利益及富农意识的客观基础，则其结果一定不能达到反富农斗争应有和必需的途径。

反富农问题与现在阶段革命及革命转变前途有异常严重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富农的特点，必须了解不仅站在无产阶级的反资本剥削，加紧乡村阶级分化，促进革命转变等

根本观点上，应该坚决的反对富农；而站在集聚乡村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基础，促进革命高潮，深入土地革命等一般观点上，也应该彻底的反对富农，坚决的无情的与一切对于反富农问题的动摇、犹豫、不彻底和各种不正确观点，以及各种各样表现出的富农意识作斗争，是全党每个同志目前的迫切任务！

载《红旗》第87期

署名：韶 玉

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一 军阀战争普遍全中国

冯玉祥回潼关后，西北军十五万已沿平汉陇海两路积极动员企图首先占领武汉；阎锡山调动三十万大兵，先锋队已再三进占山东；蒋介石亲坐军舰视察长江要塞防务，并检阅各部队；奉系最近召集最高军事领袖会议，已公开决定对关内事变不守中立；两广战争愈演愈烈；福建、四川的战争愈延长愈混乱；德州、徐州、浦口、郑州都不断地爆发着混战。所谓“讨蒋”、“拥蒋”两方面的舌战笔争，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的宣传组织工作已经结束，大家现在都是秣马厉兵，摆阵布防，军阀混战的惨祸，立刻要弥漫全中国。

这次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不仅国民党的新旧忠实同志（自汪精卫、蒋介石到张学良），不仅现在握有军权的蒋、冯、阎、张、桂各系，不仅多少有些枪支的杂色部队，即久已销声匿迹的安福系、直系、鲁系、研究系以及拚命找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赏识的国家主义派，都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大家起来拚个你死我活。

这次战争的破坏屠杀，要比前此任何军阀混战残毒。蒋介石方面新由美国运来大批军用飞机及最新式战具，由德国方面运来大批的毒瓦斯及各种毒汽弹；阎老西也从德国方面

买到大批的最新杀人器械，张小胡子当然从日本主人那边可以得到一切杀人最多最快的枪炮炸弹，汪精卫、李宗仁自己和其主人不列颠帝国主义也绝对不会睁眼吃亏，一定祭起各种杀人的法宝来，小军阀刘湘都忙着购买飞机毒汽弹，冯大帅等当然更不会不懂“以毒攻毒”的战略。最近两广战争中，双方已经拚命地用飞机炸弹和施放毒气的战术；最近这一个大屠杀正式大规模爆发时，更不知要有许多成千成万的兵士人民死于毒瓦斯、开花弹及普通枪刀之下，多少整县整乡整村的生命财产破坏在飞机、毒汽弹、野战炮之下！

二 目前军阀混战的特质

此次军阀战争，从地域上看，自长江流域到黄河两岸，从珠江流域到关外各省，都直接卷入漩涡；从参加成份看，自北洋军阀至改组派，自蒋介石到张学良，都直接走上火线。战争的决心和布置，都抱有你死我活誓不并立的态度，这一切一切将怎样解释呢？究竟此次军阀战争不过是十八年来军阀混战史中简单顺序的一幕，还是自有其特质呢？当然，一般讲来，此次军阀战争的直接动力，依然是可以从我们平素对于军阀制度及军阀战争的理论分析上得到概括的解答。但此次战争更有其特质。即此次军阀混战是整个世界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表演。苏联五年计划得到显著的成功，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东路问题受到可耻的失败。国际资本主义发生一般的危机，不仅日趋殒落的老不列颠愈益走向绝境，而所谓“例外”繁荣的金元帝国现在都表显出特别尖锐的恐慌，两千几百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合战线的斗争，成为

资本主义制度的紧急致命伤；殖民地半殖民地（印、韩、菲律宾、安南、南美、南非）的解放战争，与日俱长的扩大和深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根本矛盾及战后资本主义实行“生产合理化”的一切结果，现在都带着极深刻尖锐的性质普遍爆发出来，帝国主义及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能够想到和做到的解决危机办法，只是实行进攻苏联，重行瓜分世界及压迫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大战。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地位的地大物博的中国，在世界大战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太平洋战争毫无疑问地主要的是瓜分中国的战争，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仅同时包含有瓜分中国的意义，而且中国对于这一战争命运有很大的决定性。为要在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及一般太平洋大战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就是英、美、日——都拚命地攫取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优势。它们都嗾使、挑拨、组织和发动军阀战争，以便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一般的得到许多新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权利——尤其是直接在它们各自豢养的走狗势力圈内，得到许多特殊的新权利。南京蒋系政府，虽然不纯是美帝国主义的宠妾，但政府各部都坐着福特、胡佛派的顾问，这些顾问天天在那里严密计划使南京政府的一切设施，适合于金元帝国主义以庞大财政资本殖民地化中国的利益。虽然所谓五万万元大借款等计划还因种种原因不能实现，但不仅中美贸易与日俱增成为昭著的事实，南京政府强拆民房及征工筑路修成许多广平的汽车道，以便汽车大王汽车生意畅茂全中国，强占民地（老鼠沙）作为油池，以便煤油大王煤油交易能够更便利的在中国发展，订定中美航空合同使中国大部领空成为美帝国主义和平时期的交通工具及战时的空军根据地……等等，都是彰明昭著的事实。美帝国主义者对南京政

府也备极体贴怀柔，在关税问题上首先发“赞成自主原则”的空炮，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公开主张由南京“自动宣布撤废”的空文，在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已成立了几种或明或暗的借款，在这次战争开始准备时便运来六十架军用飞机。南京政府与金元帝国间这样浓热的雨意云情，使英日以至德法都发生无穷的醋意，英日尤其感觉到大的威胁。虽然大不列颠帝国政府从南京政府手中，也得到退回汉浔租界，赔偿镇江租界英商损失及改成永租地域，成立中英海军协定使中国海军实权受“海上王国”的支配等等新利权；日本帝国主义从蒋系政府手中，也得到北洋军阀政府所不敢承认的“西原借款”的承认，济案的倒贴杀人手续费，中日互惠关税及内河航行权等等新权利；但英日帝国主义总深切地感觉到金元帝国主义及南京政府间这些行动，给予英日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将来前途莫大的威胁。美国方面不仅对于英、日、法等在中国划定的势力范围，早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口号要求重新划分；而英国在南中国势力的恢复，日本公开武装占据北中国及东三省等行动，在本国经济危机加紧的美国看来，更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整个国际市场紧缩及争夺市场战争（英美在南美的冲突及英、日、美在印度非洲各处的冲突等等）紧迫的结果，尤其使英、美、日都深切地感觉到对中国问题只有加紧进攻的可能。英国工党政府不仅对于新工具——改组派进行反蒋战争，加以直接同情和援助，也不仅把李宗仁与汪精卫拉拢起来，并且连老走狗吴佩孚、孙传芳、杨森之流都动员出来，以便在此次军阀混战中能够尽量的取得更多的好处。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了整个北方军阀——张、阎、冯以至安福系余孽都出来冲锋陷阵，立意要在北方组织新政府。美使詹姆生不久以前特别南下谒蒋，筹议进行战争的方策。此外，恢复帝国主义资格了

的德意志，不但一年来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表现积极的努力(中德商约改订，德顾问、德教练帮助蒋政府，中德陆军协定，中德欧亚航空条约……等)，而且积极参加这一次军阀战争的制造(输送大批军火于蒋、阎、张各方，派军事顾问到作战双方)；法、意帝国主义对于此次军阀战争同样具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组织作用。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此次军阀战争是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经济政治危机加紧的反映，尤其是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世界大战的危机紧迫的反映，特别是美、英、日争夺太平洋霸权及中国市场的战争危机异常紧迫的反映。此次军阀战争毫无疑问地是英、日、美直接战争的预演和缩影。除了有意隐蔽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派军阀分别勾结以宰割中国广大劳苦群众这一事实的取消派(陈独秀等)外，谁也不会说“每一个帝国主义利用一派军阀作工具”的判断是“笑话”吧！

北洋军阀十几年统治的结果，使中国民众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地步。加上国民党三年的统治，更使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危机走到异常尖锐的程度。国际帝国主义两年来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奴役力量的迅速增多和加强，是中国经济总危机益加深刻的主要动力。非常明显的，因为帝国主义主使国民党进攻苏联的结果，使中国茶失去唯一广大的市场，因而使整个茶业陷于绝境；因人造丝及日本丝与华丝的竞争，使整个丝业完全衰颓；因欧美面粉的大批输入，使整个面粉业塌台；因日英纱厂的各种优越权利，使许多中国纱厂转移成外资企业；因为瑞典火柴的大批输进，使整个火柴业完全倒闭；因英美烟商有许多优越的利权，致使中国最大的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宣告破产；因为外国航轮的增多和不受中国政府影响，致使整个航业崩溃到极难堪的地步(招商局破产)；因

种种特殊关系，使重工业中（如煤，铁矿）的一部份中国资本急剧的非民族化；因农产品价格与种类受国际银行的操纵与支配，使整个农村经济的恐慌更趋于绝境；因励行“生产合理化”的结果，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与一般痛苦加深；因金融市场完全操在外国银行，再加以金贵银贱的影响，物价高昂，工商业破产更是随时随地的深入和扩大。南京政府及各派军阀的一切设施，都只是使中国一切更适合于财政资本统治的利益，加紧和加深中国纯殖民地化的过程，只是使经济政治危机更加深入和普遍。军阀制度不仅未因国民党的统治而减轻或缩小，反而加深和扩大；北伐的结果，虽然名义上打倒了几个著名的军阀领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而他们的武装力量还依然改编的存在着；同时，加添了许许多多多个国民党忠实同志的新军阀，增加了成千累万的新军队。

在新旧军阀之间，旧军阀内部及新军阀内部，都随时随地的加深和扩大着各种难以调和及不能调和的矛盾，经过几次“编遣”、“统一”的会议，经过几次“讨逆”和“讨蒋”的战争，各派及各个军阀的军队的增加，更是愈加迅速和愈加扩大。蒋介石领导下的第一集团军及所谓直隶中央的各种杂色部队，号称四十万人，冯玉祥的西北军经韩石两部倒戈后，还有十五万多人，阎锡山已经扩充兵额到三十几万，张学良更藉着“防俄”名义，大规模扩充海陆空军，李宗仁张发奎部队现又扩充到十一万人，其他各个大小军阀，都是拥有数千以至数万的军队。如果前三年外人统计中国的所谓正式军队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是正确的，现在则起码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不仅陆军有大量的扩充，而海军、空军都有急剧的建立和增加。至于以各种名义存在着的军阀武装部队——如教导队、卫戍师、省防军、保安队……等等，更有可惊的数目。这样大量的脱离生产

的群众——军队，只有靠剥削从事生产的工农群众的血汗来养活。以前北洋政府的每年经常收入，最多不过四万万元——四万五千万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南京政府的去年一年收入总数，便有六万万元，其他各派大小军阀在各区域及各省的收入总计起来，当然更要几倍于这个数目。南京政府两年来发行的各种公债库券款，便值四万万余元，其他各派军阀在各区域及各省发行的数目，更无明确的统计。南京政府治下的捐税名目，据显而易见可以统计的，已有一百七十余种，其他各派各个军阀随时随地的自立名目所征的捐税，更不知有多少花样，南京政府的收入总额六万万元中除去以百分之三一开支作偿还所谓“国债”及百分之二支作海关经费外，下余的款项中有百分之九五·八是完全开支作军费。①据一九二八年五月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的支付预算书的报告，蒋系军队一个月的经常饷糈，便要一千七百多万元。蒋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在德日两国购买军器的费用，便约合中国银币两万万元。购买日本四二年式步枪十二万枝之多，德国自动枪一项便有十七万枝，三十余种化学军用品——毒瓦斯等，一百五十架飞机。至于向英美购买的武器及其他秘密购买的武器，我们还无从详明的知道。不久以前中国各报都公开登载蒋阎两方都在德国购买大批的军火，前几天《革命日报》（改组派机关报）又登载蒋张两方都在德国购来几船军器的消息。军器越多，军队越多，军阀战争越来得凶猛和迅速；军阀战争越增多越广泛，越要兵多械多。去年两次蒋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几次蒋张（发奎）、蒋俞（作柏）战争，只是最近全国军阀混战的导演和预演。各派军阀的

① 此处数字可能有错误。

饷糈主要来源,都不外租税、公债和外债。不仅租税公债的来源,因整个经济恐慌而日渐涸竭;就是外债也因可以典当抵押的担保品日渐短绌而所得有限;因此,不仅占驻陕、甘、豫灾荒遍地的西北军,是专靠打家劫舍强迫恶勒以为生,不仅各派杂色军队是专干强盗土匪生活,不仅湘、鄂、赣的军队,困守孤城,专门靠黑夜出城抢掠和烧杀赤色区域以苟延性命,就是号称十几年未打仗搜括积累最丰的阎锡山军,最近也直接在平津一带实行粮食日用品强迫征发,占据最富饶江浙区的蒋家军,也是杀人绑票抢劫焚掳,无所不为,关外王也因招兵买马太多,时刻想到关内来染指。大家都只有用扩充地盘的办法来解决兵饷困难的问题,大家都拚命地进行互相火并的战争,越战争人民失业、破产、流离失所的越多,粮饷越没有来路,当兵当匪的人越多;粮饷越没有来路,兵匪越多,越要进行战争。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本身,简直找不出新出路!军阀战争不仅使整个农村经济完全破产,成千成万的农民,变成乞丐、流氓、兵匪、盗贼、娼妓;使工人的工作加重,工资不发,受军事纪律镇压,并且公开提取工人的公积金、养老金、储蓄金等充作军费;百物昂贵,捐税增多,使一般贫民简直没有方法生活下去,一般群众都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军事戒严的铁血网内生活着,失去了一切人类最初步最原始的自由;交通破坏,工商业凋零,以至于使一部份资产阶级都发出反对战争和捐税的呼吁。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斗争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要饭吃、要和平、反捐税的斗争,在贫民群

众中日益普遍和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并且其中有一部份深切同情于工农革命运动。不仅共产党和总工会正在号召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不仅共产党正在领导、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不仅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正在准备在武汉区域开始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即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觉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怒潮之前发抖！

在这样经济政治危机空前紧张的形势之下，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越加深刻和广泛。地主、买办与资产阶级间的冲突，地主与地主间的冲突，买办与买办间的冲突，各种各派的资产阶级相互间的冲突，都带着更深邃更尖锐的程度暴露出来。

各派军阀都感觉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已日趋尖锐，都只能想到扩大自己的剥削压迫地盘的解决方法，都以为自己镇压革命与欺骗群众更有手段更有办法，都拚命进行火并战争企图找到挽救危亡的相当出路！

这次普遍全国的军阀战争，名义上是“反蒋”与“拥蒋”之战，实际上是濒于死亡的各派统治阶级企图找新出路而又不能找到以致完全塌台前的混战。无论蒋介石“拥护中央”、“促成编遣”的号召，无论北洋军阀“组织军政府”、“反对个人专政”的宣传，无论改组派“护党”、“救国”、“改组”的口号，都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都只是表示他们没有新出路，都使群众更加认识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及群众死敌，都使群众认识他们之间的战争只是分赃战争和更增加群众的痛苦。所以此次军阀战争是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反映。只有有意替统治阶级捧场的取消派，才会高唱“国民党的统治真

是意外的稳定呵!”的开心曲!

三 战争的结果与前途

在全国大规模混战还未正式爆发以前,或许再来几个“大将军下野”、“总司令出洋”的把戏,但反映整个国际及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军阀混战,绝对不能真正和缓或避免的。战争的军事上的结果(谁胜谁败),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地断言;但一般的结果与前途,我们是肯定指出的。我们坚决相信:无论谁胜谁负,爆发此次战争的动力——国际的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绝对得不到丝毫解决办法,而只有更加尖锐!

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国际政局之下,在争夺市场(尤其是瓜分中国)的斗争这样紧迫的局面之下,不仅在太平洋上已布满了战云,在中国境内已布置了战备。两年来英、美、日、法、意的兵舰战艇不断的来华,陆战队、飞机、唐克、毒气不断的运入中国,在天上、海上、陆上,已分别占据军事根据地,在新加坡、菲列宾、香港、满洲已实行作战的布置。此次军阀战争的结果,不仅一般的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加强奴役的势力,不仅使胜利的帝国主义随着其工具势力发展而得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尤其是有直接引起英、日、美太平洋大战的危机。

旧北洋军阀(阎冯张等)虽然在战略上策略上还时隐时现地说几句什么“护党”、“救国”及反对“伪三中全会”的口头禅,但实际上已改树“中华陆军”、“西北国民军”的旗帜,并不积极筹备在北平正式组织“军政府”。改组派以“护党”、“改组”、“反

蒋”的旗帜，勾结各派各系军阀做升官发财的捷径。南京政府一方面高唱“拥护中央”、“讨伐叛逆”，另一方面请命直(吴佩孚)鲁(张宗昌)军阀，企图离间和分裂北洋系。旧北洋军阀虽然打起恢复北洋系统的旗帜，却又还不完全抛弃国民党的幌子，这表示北洋军阀本身也感觉到北洋系统的招牌已经早为广大群众所痛恨。国民党各派虽然把“以党治国”的口号提得极高，但同时又公开投降北洋系统，这表示国民党本身也感觉到国民党的旗帜已经不能作统治赓续的形式。这次战争把广大群众对于中国任何一派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统一”，“和平”，“幸福”)都更加打破，把形式上成为中国各派军阀的年来共同统治形式的国民党统治方式，正式宣告破产；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又正式分成几个政府。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成立新政府，只有得到太上政府——帝国主义者允许和同意后才有可能。现在的形势还是表示着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如果这一形势在相当时期内继续维持，则中国要形成两个政府(北平一个，南京一个)。如英、美、日形成三角对垒的形势，则要成立三个政府(北平一个，南京一个，广东一个)。各个政府之相互间及各个政府内部的各派各系之间以及各派各系的内部的相互间，依然是矛盾不可调和，依然是进行更复杂的军阀混战！所以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国过去一切统治方式(自北洋军阀至国民党)完全宣告破产，使中国各派统治阶级都加速崩溃。

全中国已经有七八千万奄奄待毙的灾民，工人阶级不仅将过去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条件完全失去，而且生活痛苦远超过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兵士很多是八个月至一年以上未曾领到相当餉糈，一般贫民更是处在衣食俱无的境遇，交通已大部破坏，工商业已整个恐慌，金融更紊

乱到不可收拾。此次战争的结果，将使灾荒、失业、减薪、加时、欠饷、加捐、加税……成为更普遍更深入的现象，使广大工农兵贫民群众走到更穷困更痛苦更是非革命无出路的地步！

因此，此次军阀战争的前途是：全国国民经济的总危机愈加尖锐化；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派统治阶级的相互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和深刻，统治阶级更加难于按照旧的统治方式继续其统治；工农兵贫民群众更加感觉到不能再继续忍受原有的统治，更加有觉悟、有勇气、有决心、有办法起来作推翻现在统治的直接革命斗争；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成份，更加要明显确定其政治趋向，以分别参加决死战斗的阵线。只有丧心病狂的取消派，才会估计“中国军阀战争是中国各派资产阶级相互间的战争”，其结果是与“南北美战争及日本西南战争”一样，使国家达到统一然后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

四 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 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工农兵贫民群众明白宣言：“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是反对军阀战争唯一有效而且彻底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都彻底的认识：军阀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利害的冲突，军阀制度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复杂冲突，都是军阀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我们不是反对战争中的某一派军阀，而是反对整个军阀；我们不是为“暂时的和平主义”或“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反对军阀战争，而是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我们不仅要消灭军

阀战争，而是要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真正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和银行，驱逐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收回一切租界地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真正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消灭一切封建余孽；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和实行民族自决；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使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另一更高的阶段。总而言之，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彻底消灭军阀战争及其发生的基础。同时，只有工农兵的武装暴动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英勇的广州暴动，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光荣前例。现在广西的龙州百色十几县，江西的赣州及七十一县，闽西的十几县，湖北湖南的几十县，豫皖边的几县，都发展了地方暴动，都成立了苏维埃。那里便消灭了军阀战争，那里便实行消灭军阀战争的基础，那里便只有革命群众与反革命间的决死战争。这一切事实都确切证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只有甘心拥护军阀战争及根本反对武装暴动的取消派，才会骂共产党在国际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这样紧张和中国军阀战争这样普遍深入的条件之下，布置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是“盲动”！

五 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明显地指

出因中国各种特殊条件的存在，革命有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可能。最近中共中央七十号通告，根据目前国际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确定地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口号已日渐成为行动的口号，而首先在数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前途，日益证明有实现的可能；同时，根据种种客观条件的关系，指出武汉及邻近各省有最大的可能。这种可能当然并不是单纯的军阀战争的条件所决定，然而军阀战争的确在客观上要促进和加速这一可能的实现。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湘、鄂、赣的统治阶级在此次军阀战争中表现出特别加速的崩溃，西北军由老河口进逼襄樊，沿平汉路袭取武汉；蒋政府为集中力量，缩短战线起见，曾有放弃武汉的企图；杂色军队中谁也没有独立统治武汉的能力，同时，谁也企图占取武汉。游击战争，地方暴动，苏维埃区域，工农红军，一定在军阀战争中得到更大的发展；反帝运动及工人斗争，一定在军阀战争中，激起更广泛更剧烈的勃发；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及其领导下的各种革命组织，在反军阀战争工作加紧中，一定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信仰与拥护。因此，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即是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的战争，不仅是武汉及其邻近各省的工农群众的紧迫的任务，而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夺取武汉毫无疑问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开始，它不仅能使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脱离军阀战争的惨祸，而且能变全国军阀混战为全国革命战争。共产党领导全国工农兵群众为加速夺取武汉而斗争，一切工作和斗争都应当向着这一中心任务进行，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说，除武汉及其邻

近各省(湘赣)外,其他各省——尤其是闽、粤、桂等省,便没有开始革命胜利的可能;这种可能不仅一般地存在着,而且在军阀战争的局面下特别有利的存在着。所以共产党应当坚决地领导各省工农兵群众在军阀战争中尽可能的实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及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策略;击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统治锁链中的最脆弱最主要的一环,同时,便动摇以至破碎其它的各环。在军阀混战中,我们坚决地在各派军阀统治范围内,实行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实行进行游击战争、地方暴动,建立苏维埃区域,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直到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政府的统治。我们绝不能丝毫存着在“反蒋”军阀统治范围内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是否帮助了蒋系军阀统治的胜利或巩固;或者在蒋系军阀势力范围内实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行动,是否帮助了反蒋系军阀的胜利或稳定……等等疑问。我们应当坚决地认清任何帝国主义及任何军阀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和政策是一致的,他们之间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们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态度是一致无二的。我们在一省以至数省首先进行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行动,是变全国军阀战争为全国革命战争的正式大规模地开始;我们首先在一省以至几省消灭军阀战争,是消灭整个军阀战争的开始;我们在一省以至几省首先消灭某派某系军阀的斗争,是消灭整个军阀制度的第一步。谁要借口必须在全国各派军阀统治范围内同时举行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才有胜利的可能,因而反对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以至几省的胜利的行动;谁要借口在某一派军阀势力范围内,首先以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行动是帮助了另一派军阀的胜利,因而怀疑以至反对在一省以至几省尽可能地首先实行

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谁便客观上赞助拥护和延续了军阀战争与军阀制度的生命，谁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否认了中国革命有首先在几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可能的前途，实际上是延缓和放弃了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六 加紧反改组派的斗争是反军阀战争的胜利的主要前提

我们毫不隐晦地说：我们在不久以前，对于从理论上、实际上反改组派的斗争，有客观上忽视的缺点。直到最近，我们对于这一斗争虽然已加以极大的注意和努力，但实在还没有做到应有和必须的程度。当此全国革命形势紧张及军阀战争扩大深入的局面之下，我们反改组派斗争的唯一有效方法，当然是深入革命斗争，我们以根本打倒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对抗它的“为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妥协帝国主义，为要妥协帝国主义，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我们以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理论与实际对抗它的“二五减租，主佃合作”的理论与实际；我们以阶级斗争和从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际来对抗它的“阶级调和，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际；以我们的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的理论与实际来对抗它的军阀、买办、地主、资本家、豪绅分赃会议的国民会议的理论与实际。揭露改组派的理论基础——孙文的三民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指明南京政府及各派军阀现在所实行的都是真正道地的根据三民主义的政策，绝不是什么现在国民党实行的是“假三民主义”，仿佛实行“真正三民主义”恐怕多少要好些；指出国民党民十三“改组”

的真正革命意义，只是实行所谓“三大政策”——联俄，联共，工农政策——；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到现在已经成为过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纲领；整个国民党及其政纲都已成为公开无耻的反革命的工具，绝不是什么“改组”和“恢复二届中央”可以挽救和改变万一的！改组派实际上现在不过是反动国民党的各派别中的最狡猾、最狠毒、最下流、最无耻的一派！这一切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尤其紧要的要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指出和证明改组派是两年来军阀战争——尤其是此次军阀战争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最积极的发动者和制造者！“革命评论”时代的改组派的“反对封建势力”的理论与实际，便是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西山会议派与桂系的军阀战争；所谓“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改组派领袖陈公博、王法勤等党籍，使改组派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后，《民主》、《民生》等杂志以及最近的《革命日报》大吹特吹的“肃清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际，便是拉拢、拍捧各派各系的军阀进行“反蒋”、“拥汪”、“拥阎”、“拥冯”、“拥李”、“拥张”的军阀战争；指出和证明改组派是香港总督和工党内阁的新近宠妾，与其他美日臣仆毒害中国民众的作用没有两样；指出和证明改组派的“反蒋”、“反南京政府”的实际内容，只是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争夺祸国殃民的权利；指出和证明改组派之所以成为此次军阀战争中各派军阀——自安福系、直鲁系到阎、冯、李、张各系——的共同旗帜，正因为改组派的一切理论和实际是各派军阀所共同赞赏和采用的工具，是维护和延续各派帝国主义各派军阀的统治的应时良剂，同时，即是欺骗和荼毒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最毒方策；指出和证明在广州暴动三天之内屠杀工农兵达五千七百余人之多的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在理论上实际上实行

“杀尽共产党，杀尽工农革命分子，杀尽革命青年”的主张的改组派，上台之后，绝不会与蒋介石政府有什么根本区别；改组派现在的“打倒军阀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保护工农利益”，以至于“罢工，罢市，罢课，甚至暴动”的口号，都不外是用来欺骗广大工农群众去作军阀战争及“拥汪上台”的牺牲品！此外，我们更要从事实上暴露改组派现在大捧特捧的“各派武装忠实同志”的原形；必须指出阎锡山是日帝国主义的十八年来忠实的走狗，他不仅是以“模范省”的手段，对于山西劳苦群众实行“农奴式”的压迫与剥削（“村里制”，“联保制”），而且对于他统治下的工农群众斗争，更施行残酷的屠杀（屠杀北平人力车夫百数十人，武装压迫唐山的矿工等等）；冯玉祥正在拚命找日本做姘头，同时又正在向英国送秋波，他屠杀甘肃汉回农民一百几十万，以大刀队血洗过陕西、河南八十县反抗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战争的乡村；李宗仁是在湖南、湖北血洗几十县和屠杀八十万工农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对工农革命分子“宁肯错杀一千，不要错放一个”的理论的坚决执行人；张学良是东三省的忠实李完用，他实行屠杀苏联和中国的工农比任何人都残酷，吴佩孚、段祺瑞、孙传芳这些改组派的忠实同志的罪恶，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如果这些北洋军阀在过去当权时，还没有做出象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所做的卖国殃民的勾当这样繁多和这样“伟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点上比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要好些，而是因为那时候的国际关系与帝国主义各国对于中国关系以及中国国内阶级分化和对比的关系，与现时都有程度上和范围上的不同；他们现在如果要“东山再起”，其一切献媚帝国主义与屠毒工农群众的行动，绝不会丝毫亚于现在当权的任何军阀。现在“反蒋”与“拥蒋”的各派军阀之间，都是以“攻俄不力”，“破坏对俄战争”，“剿共不力”，

“清共不力”等口号作相互攻击的中心，便是此次军阀战争中各派军阀——自安福系到改组派——的真实写照！改组派的同盟师友——西山会议派与国家主义派，是“反俄”、“反共”、“反工农”的最老祖宗，是最公开无耻地拥护军阀制度，拥护五色国旗的最老“国手”，他们与改组派手携着手积极挑动和参加军阀战争，都是积极找取升官发财的捷径。至于寂然无闻的第三党，实际上不过是附改组派“骥尾”的一条小狗。

我们必须坚决明白地向广大工农宣言和解释：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已恶贯满盈，应该立刻的打倒。但一切反蒋反南京政府的各派军阀及整个国民党，都应该立刻推翻。在工农群众中还在卖“迷药”的改组派，是妨碍我们消灭军阀战争及整个国民党的最狡猾、最毒恶的敌人；改组派在群众中散布的各种幻想的影响多一分，我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工作便困难一分；在反军阀战争的紧张工作中，加紧从理论上实际上肃清改组派及其各种同盟军在群众中散布的各种幻想与欺骗，是反军阀战争胜利的直接前提！

七 加紧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忠诚拥护者——取消派，是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彻底策略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取消派（托洛茨基反对派及中国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派）的取消主义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可知的将来——的根本特质，是完全取消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及社会主义的革命。从这一根本理论出发去分析中国各种问题的取消派，必不可免的成为中国军阀制度及军阀

战争的忠诚拥护者。他们根本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让步了”，“中国没有封建余孽了”，“全中国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了”，实际上便是否认了中国军阀制度的主要基础的存在，当然同时就否认了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他们根本以为“军阀战争只是中国资产阶级各派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与南北美战争及日本西南战争一样”——即国家统一起来“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便是否认了国际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军阀制度的各种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复杂纵横的矛盾，是军阀战争的各种动力，当然同时就否认了军阀战争的前途是使国民党各派统治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当然同时梦想某一派军阀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可以召集国民会议，使他们这些“进步的民主势力”，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中国国家中”，与改组派、第三党等济济一堂，“攒进政治舞台”！他们根本以为现在是“国际资本主义更加稳定”，“中国革命已经完全死亡了”，“现在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余波”，“现在没有群众斗争”（以上陈独秀的意见），“现在只有流氓土匪这里那里的无组织地非科学革命地蠢动”，“革命高潮只有在中国经济来个高涨，然后再来个危机之后，才有发生的可能”（刘仁静）……，实际上便是完全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硬捧台，比麦克唐纳尔、胡佛、蒋介石、汪精卫对于政局还要乐观些；当然同时要完全否认中国工农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必要与可能，当然要咒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一切工作是“盲动”！他们根本从各方面破坏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共产青年团、赤色工会、苏联、中国苏维埃区及红军、游击队等等的威信和信仰，他们根本在城市和乡村中破坏和出卖工人的罢工，破坏和分裂革命的营垒，实际上便是完全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尽忠，同时当然就是破坏和消灭以工农兵武装

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伟大工作！他们虽然在表面上也还说些“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以至“反改组派”的“革命”词句，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忠诚拥护人，他们的根本政纲已经与改组派没有分别，他们在政治上是跟着改组派尾巴后面闻香的一条小狗！他们对于革命及革命群众最危险最狡猾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打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党”这些光荣伟大的旗帜，企图在这些神圣旗帜之下，去进行最狡猾、最阴险、最下流、最无耻、最蠢笨、最灵巧的各种欺骗反动宣传，以麻醉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和缓工农群众的剧烈斗争，以延续和拥护统治阶级垂死的生命，以掩护和保持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取消派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的各种欺骗与幻想的影响多一分，我们反对军阀战争与消灭军阀制度的工作也困难一分。所以在加紧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彻底策略时，从理论上实际上在广大群众中加紧反对军阀制度及军阀战争的忠诚拥护者——取消派，是非常主要的工作之一。

八 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布尔塞维克毫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有公开的指出和努力补救。现在党内存在有各种右倾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右倾倾向的第一种表现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第二种表现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第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第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

导和对于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第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第六是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第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第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份估计得不够；第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非常明显地，第一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甚至反对党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线的执行；第二种倾向，能使党由群众的先锋转移到群众后备，因而减弱甚至丧失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与威信；第三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正应加紧进行的组织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以实现总同盟罢工的任务；第四，能使土地革命停留在“抗捐，抗税，抗租”的半途上，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不实行分配土地，不能够团结和组织广大贫农雇农作乡村中革命力量的基础，不能使中农群众得到土地，结果使贫农雇农对于革命怀疑，公开提出：“我们为什么革命？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好处？”以及“你们没收土地、分土地，为什么不干？”等等的问题，或者形成“保护革命同志家属财产”，“保护中小商人利益”，“不提出店员和雇农一样的要求”，“工人农民都是按同一数量比率选代表到苏维埃”……等等危及革命发展的现象；第五，使游击队、红军、苏维埃区域都拘守一隅，使革命最多也不过以平民式手段彻底完成土地革命，革命转变的前途沦于幻想；第六，是客观上放弃摧毁敌人主要力量的工作，是不了解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须要武装力量来解决，夺取、分化、破坏敌人的武装势力的工作是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兵变是军阀制度加速崩溃和士兵革命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第七，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影响拘于秘密工作达到的范围，使群

众斗争拘于狭隘环境和一般方式之内，而不能迅速的转变成广大群众范围及更高斗争方式去；第八，不能正确计算到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在推进革命高潮及摧毁反动统治运动中应有的力量和意义，不能正确估计到它们是中国革命胜利——尤其是开始在一省以及几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支柱，不能了解它们已经实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策略；第九，不能坚决地站在保护雇佣劳动的利益上面去发展店员学徒和手工工人的斗争，不能动员和团结广大的城市贫民群众；忽视和否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因土地革命及一般革命深入而发生动摇、破裂、分化以及反动的事实，夸大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定下对于他们的不正确策略；第十，“以为客观形势样样都齐备，只是我们党本身太不行”，“党现在既不能拿到政权，就是拿到政权也没有办法”，完全忽视和否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群众工作上的种种力量和进步，完全忽视和否认党在国际革命中及中国大革命中艰苦夺到得来的力量、经验、威信和同情，完全忽视和否认党在千百万劳苦群众心目中潜伏着和活动着无限的希望、信仰与尊崇，完全不了解受大革命几年洗礼了的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觉悟、意识、经验、勇气、决心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党与广大群众能够很迅速很敏捷建立相互的正确关系，结果便非常容易走到悲观、失望、消极、沉闷、没办法、无出路……一切失去前途的机会主义与取消主义的道路。这一切倾向都是与党的目前根本任务不能相容的，都是动摇、妨碍、破坏以至反对党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都是使党不能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战术。与各种右倾倾向在理论上、组织上、政治上采取各种各色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掩护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的有力护符，是右倾的实际同情者和赞助人。为

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九 加紧各种主要工作，争取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我们既已知道中国军阀制度的主要基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奥援和封建余孽的存在；军阀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国际帝国主义利益的矛盾，加上军阀制度的根本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纵横错杂的矛盾；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唯一策略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根据中国各种特殊条件，革命首先有在主要一省以至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在主要一省以至数省夺取政权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开始；因此，必须认清当我们实行以武装暴动在主要一省以至几省首先消灭军阀战争时，一方面固然是全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开始，是变武装进攻苏联的中国为武装拥护苏联的中国的开始，是变帝国主义大战屠场的中国为反帝国主义大战堡垒的中国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也即是中国工农兵群众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战争的正式开始，也即是全中国国内阶级战争大规模地普遍地爆发的开始。英、美、日、法、德现在这样拚命地用飞机、战船、大炮、机关枪、毒气、军用化学品武装中国各派军阀，两年来那样疯狂地加派军舰、陆军、航空队、唐克的来华，最近日本开十六只鱼雷舰到长江沿岸，英国武装商船，上海租界及各地租界街头巷尾的军事布置与炮台建筑；各派军阀及各省军阀共同“讨赤”、共同“剿共”

的宣传和布置，都把革命与反革命武装肉搏的时期迫切的问题显明地提在我们的面前。无论各帝国主义相互间及中国各派相互间的内外矛盾何等深刻、何等尖锐、何等不可调和，但他们实在有暂时联合一致共同压迫革命的可能。这一点不仅有国际帝国主义在过去和现在武装进攻苏联的行动作为充分的证明，即过去广州暴动和最近龙州事变都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和警号。所以我们在实行准备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以苏维埃中国代替国民党中国的时候，必须有必需和应有的一切实际准备工作，——尤其是针对着革命的特别需要和现有缺点的工作。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加紧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广大地和深入地实行各种方式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必须把时刻准备着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作战这一觉悟、决心与勇气，布满千百万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心目中。必须把武装拥护苏联、反帝国主义大战及各国革命斗争(工人运动与殖民地革命)与中国革命更亲密地联合呼应起来，以保障中国革命对于国际帝国主义最后胜利。过去对于反帝运动做得极不够，这是目前运动中最大的危险！

(二)不仅在政治上、宣传上、一般组织工作上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而且要在军事组织上、军事技术上、军事工作上加紧布置武装暴动的工作，武装工农(纠察队的武装训练与游击队的武装战争)，党团员军事化，都成为目前日常工作的中心，尽力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暴动，发展游击战争，加紧对于在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武装组织中的破坏、分化和夺取的工作，加紧夺取群众中的武装的和半武装的组织(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的领导，是非常切要的日常事务！

(三)加紧配合工农兵运动发展的平衡，尽可能地配合各

地方各省份各区域的革命运动,使之更加平衡发展,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兵士贫民运动的领导,加强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和工作,加紧组织主要城市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建立和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中心组织——赤色工会。

(四)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有自决权的总口号,提出各民族的特殊要求,以便把八千万回民,几千万蒙、藏、苗、瑶、僮、畲、高丽……等民族,卷进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巨潮,使他们不仅不致受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的欺骗蒙蔽而反对整个的中国革命运动,并且积极参加和拥护这一运动。冯玉祥在甘肃的回汉大战争,日帝国主义与张学良拚命对于内蒙王公的拉拢,南京政府及阎锡山的卑躬折节欢迎班禅,南京政府的设立蒙藏院及蒙藏学校,英国的积极武装西藏的王公喇嘛,浙江畲民暴动反对南京政府,四川苗瑶能耐坚苦的战斗……这一切一切都指明从政治上、组织上夺取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广大劳苦群众到统一的解放战争的旗帜之下来,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敢坚决断言: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迅速地夺取这些民族之内的广大劳苦群众到工农解放的一般斗争上来,则中国革命在国内革命战争时将要遭受到极严重的威胁与危险!过去我们异常忽视这一工作的错误,应该立时完全纠正过来!

(五)劳动妇女与劳动青年,在反军阀战争及武装暴动中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与作用。我们必须严厉纠正忽视甚至放弃在这两部广大劳苦群众中的工作——特别是武装工作的倾向,我们敢确切断言:中国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劳动妇女及劳动青年的积极参加和拥护,是不会胜利的!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工作,如果不动员广大劳动妇女和青年都起

来积极进行，则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六)最后，还有一个有决定斗争最后命运的问题，值得更加特别的注意，就是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军事上健全和巩固共产党在广大劳苦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的发展，党还不能成为现有革命形势和革命发展程度中的足够的和应有的中心，是现时革命运动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我们如果不加倍努力来战胜和补救这一缺点，我们便不能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然而，我们坚信，在伟大事变发展和千百万劳苦群众英勇战斗的过程中，我们有办法、有勇气、有决心来战胜这一缺点的。

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一策略的彻底实行，便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我们坚信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够与苏联工农兵群众在“十月”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同样地得到预期的光荣胜利！

载《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
署名：韶 玉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

——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二十四日)

组织农村工人的独立阶级组织——农村工会，不仅是为的准备、加速和保证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工作，并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的有力保障。这一根本原则，现在似乎对于许多同志都毫无异议了。但在实际上怎样呢？不仅一般地没有农村工会的组织，即在苏维埃区内都很少有农村工会的组织；这究竟为什么原因呢？党对于组织雇农工会的问题曾经不断的指出，并且指出在这个问题中，首先需要坚决的反对富农，与各地一切错误和动摇的现象奋斗，不仅指出“联合富农”的策略是根本妨害农村工人独立组织的策略，即把富农分成“兼半地主兼半封建”和“不兼半地主不兼半封建”，而决定反对与否的策略，同样是妨害和动摇组织农村工人独立的阶级组织。但这些错误和动摇，已经几次纠正和指明了。为什么各地还多不组织雇农工会呢？最近由许多农村工作同志的谈话及苏维埃区与游击区发生的事实中得到了解答。

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用不着”（?!）为什么用不着呢？他们说：“土地革命一干起来，不仅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就平分土地；土地平分之后，人人都得到了土地，根本就没有雇农了，甚至一般地没有农村雇工了……那里还用得着什么农

村工会呢”！其实，这完全是欺人自欺之谈。因为“土地私有权的完全消灭，既未消灭资本的统治，也未消灭群众的贫困，在属于人民全体的土地上独立进行经营的，只有那些有资本的人，只有那些有工具、牲畜、机器、种子、金钱……等的人；谁除了劳动力外没有别的东西，谁依然是资本的奴隶……”（列宁）“以为土地私有权取消能够给予一切雇农、日工以土地，能够破灭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基础，这是一种成见，而且异常有害的成见，应当向这一成见宣布坚决的斗争。”（列宁）“……当一切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宣布废除土地私有财产权和‘平均’使用土地的时候，组织农村工人工会不是不合时，恰恰相反，此时正是特别合时和刻不容缓的必要”（列宁）。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乡村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才特别明显。这种反对组织农村工会的理由，或者是土地革命成功便称什么革命都成功了农民意识的反映，或者是土地“社会化”便一切都“社会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

他们的第二种理由是——“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他们说：“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的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这简直是一种非阶级的观点。诚然不错，农民的教育程度一般地特别低，而经济生活最困苦的农村工人，更简直是没有一点受教育的可能，他们的文化程度特别落后，同时，教育文化程度对于群众阶级意识和斗争力量都有相当的作用和影响；然而仅从教育文化上观察某一阶级或阶层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战斗力量，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这样看去，一定要断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工人革命力量大，而有金钱时间受高等教育的大人先生们比什么人的革命力量都大了，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况且这种仅从书本学校上来观察群众的教育文

化程度的观点,更是异常错误的,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我们主要地应当观察群众所处的生产地位如何,经济地位如何,对于革命的利害如何,来判断某一阶级或阶层在某一历史时期和地域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教育,只有由革命及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普遍深入的阶级斗争,血战肉搏的革命与反革命,对于群众的阶级教育的效力是异常伟大的!中国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对于一般工农群众,尤其是亲身参加或经历过的工农群众的教育作用,胜过他们读破万卷书,听千遍讲学;同时,国民党几年来反革命的理论与实际,更给广大工农群众以莫大阶级教育!我们敢大胆地说:中国工农群众现在一般地都多多少少受过革命教育洗礼的,从群众革命的观点上看,中国群众已经不是落后的群众了。这种教育,不是普通任何教育机关,教育大家,教育方式所能办到的。黄安麻城苏维埃区的老太婆,在群众大会上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时,与妇女有什么好处?”的问题;十岁八岁的男女小孩会到处讨论“政治自由,婚姻自由”的问题;在有些群众大会时,妇女们提出“什么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第三国际……”等等问题要求解答;七八岁至十二岁的小孩子,能负送苏维埃政府或党县委的打三个加号(+++)的快信的责任,至死不愿失落或放弃;这难道不是农村群众革命教育程度提高的铁证吗?“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死对头”,“改组派是欺骗工农的骗子”,“共产党是我们工农的真正领袖”,“红军是我们工农的军队”,“我们红军的枪,不是个人的,也不是那个长官个人的,而是我们工农阶级的”,这一切呼声已经普遍的从工、农、红军、兵士的口中喊出,这难道不是工农群众教育程度很高的表现吗?雇农贫农向那些动摇的领袖质问说:“你们说土地革命,为什么

不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呢”？“这样下去，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有些雇农说：“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乡村无产阶级，我们应该打先锋”！这一切难道还不够证明雇农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觉悟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游击战争、武装暴动的斗争方式，推翻各地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设红军，建设苏维埃政权，这一切难道是没受过革命教育和阶级教育的群众所能做到的行动吗？雇农根据其经济背景和生活环境的支配，对于这样广大深入的革命教育与阶级教育所受的洗礼，只会比一般农民更普遍些，更坚强些，绝不会不如一般农民的。退一百步讲，即作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有一部分雇农的确在一般教育及革命教育上暂时均较为落后，但我们所得的结论，也恰应当是加紧建立雇农的单独阶级组织，发展他们的阶级斗争，吸引他们参加一般农民斗争，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以加强他们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地位，而绝不能得到不组织他们的结果来！这种对于群众教育程度及革命力量相互关系的根本错误观察，结果一定不是走向对于群众斗争悲观失望取消主义的泥坑，便是走向把群众教育好了再来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陷井中去！

他们的第三个理由是——“有危险”（?!）为什么有危险呢？他们说：“单独组织雇农，农民反对！（?!）……”这完全是富农意识的反映。农民之中贫农是不会反对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至于中农是否反对呢？我们应当承认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是私有财产者，他们虽然不靠剥削雇佣劳动来谋生，而且有一部份人有时也还不免要临时部份出卖劳动力，但他们之中有一部份人有时也不能不使用雇佣劳动，因此，他们之中有一部份人对于雇农独立的阶级斗争及独立的阶级组织，也不免要发生疑虑和动摇；然而这一点绝不会根本危及现

在阶段的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工农联合战线；恰恰相反，这一点恰是切实地来巩固工农联合战线。工农联合离开了工人阶级坚强的领导便要根本动摇。工人阶级只有自己有力量时，才能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成份的领导权，才能保障革命战线的联合，才能使某些阶层在一定期间守中立；同时只有将农村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才能建立、扩大和巩固整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和领导权。这是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验过了的列宁主义的真理。自始至终对于雇农组织及斗争抱坚决反对态度的，当然毫无疑问地是富农。问题应当严重地明白地这样提出：我们怕富农反对而不组织雇农么？那么，我们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就应当特别组织雇农去反对富农！同时我们应当毫不隐蔽地指出：现在许多苏维埃农村中不仅富农意识占着极大的地位，而且富农以至小地主的成份还在群众组织以至党的组织中占着不少的地位；这些人当然只是一双势利眼，只看见富农，只接近富农，只会把富农意识作为基本农民群众意识的代表。因为怕农民反对而不组织农村工会的理由，只是这些有富农意识和富农成份无意或有意地反对雇农组织的一种借口。此外，根据同一理由，他们不组织农村及小市镇的店员、手工业工人，以至小规模企业下的工人。例如鄂豫边曾公开提出“拥护中小商人利益”的口号，因此，他们不提一点店员和手工工人的要求；大冶同志怕吓跑了大冶的一些小煤矿主，于是不敢组织煤矿工人；这已不是简单的右倾倾向，而是公开的机会主义了！我们固然无论什么时候未曾梦想过以某一种激烈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手段，一下根本消灭私有财产制，连小私有财产也不允许相当时期内的存在；但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在革命现在阶段及形势之下，也绝不会和不能去与中小商人及小企业

主们讲联合战线；我们虽然不是要立刻完全消灭他们的经济，但我们毫无犹豫地要站在雇佣劳动的利益上去反对他们资本的剥削，改善劳动的地位；我们不仅不害怕雇佣劳动对他们的斗争，而且应当坚决地、积极地去发动、组织和领导这种斗争！我们现在要联合与能联合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农民不在此处范围说），不是他们这些剥削雇佣劳动的上层阶级（当然更不是那些中产阶级阶层），而是那些不剥削雇佣劳动的小商贩、独立手工业者及广大城市贫民！然而即对于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也不是基于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加紧扩大和深入阶级斗争，以使他们认识斗争出路及无产阶级领袖作用和力量的基础上。以“让步”代替“领导”，以“妥协”代替阶级斗争，只是无产阶级在激烈伟大的阶级战场上示弱的行动，结果要使小资产阶级加紧动摇、疑虑、灰心、失望、消极、悲观、怨骂，终于投降资产阶级怀抱里去！武汉时代革命失败的宝贵教训，只有陈独秀、汪精卫、陈公博、谭平山这一类的革命叛徒，才会狂呼由于“过火行动”；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由于机会主义领导的可耻的“让步”政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劳资拚死决战中，中农暂时发生动摇而中立，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与相当巩固后，它又转向与无产阶级建立坚固的同盟，这是模范的小资产阶级的模范的心理和行动！这种思想和行动是由于它的动摇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以上这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不仅是苏维埃区及游击区的一部份同志的借口之词，而非苏维埃区域内同样少有农村工会的组织，一定有与这些理由同样的观点或者更多的不正确意见！

在现在革命这样急剧发展形势之下，在阶级斗争这样扩大深入的条件之下，在革命转变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目

前之时，组织农村工会问题（苏维埃区与非苏维埃区同样重要），实在占有非常严重的地位！农村党团组织及城市赤色工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用极大努力来发动、组织和领导最落后、最黑暗、最痛苦、最散漫的农村无产阶级的斗争；建立、发展和巩固他们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使他们不仅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完成中的先锋队伍的一部，而且成为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和取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的农村柱石！

载《红旗》第102—104期

署名：韶 玉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今年五卅工作的中心路线，毫无疑问地是组织全国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今年五卅的中心任务与口号是：毫无疑问地是反帝国主义大战，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拥护苏维埃区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援助印韩安南革命。这些中心任务口号实现的程度怎样，就看我们五卅罢工示威的工作实现的程度怎样，五卅罢工示威实现的程度怎样，首先就看我们五卅的准备工作怎样。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呢？首先我们就须注意怎样组织五卅总的政治罢工？组织五卅政治罢工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注意下列各点：（一）要以五卅罢工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中心，不仅一切工作不联系到“五卅”是极端错误，就是仅仅联系到“五卅”也还是不够；（二）要尽量应用公开工作路线，使“五卅纪念”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三）不仅要有上层的号召，同时必须建立下层的群众基本组织——每一工厂作坊的由群众产生的五卅纪念筹备会；（四）抓紧一切机会组织政治罢工，尤其是要把一切政治问题与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五）加紧组织同盟罢工的工作，同时绝不要忘记只有抓紧各厂斗争才能扩大发展成为同盟罢工。

其次怎样组织五卅的总政治示威呢？仅仅组织了政治罢工，如果不能将广大罢工群众调动到街道上去示威，则我们五

卅工作的任务依然是不能算完成；如果仅能零星地调动群众到示威地点，但不能有计划地很艺术地发挥群众的示威行动和作用，则我们的政治示威的任务不能算成功。根据上海示威的经验，我们对于组织五卅示威工作必须注意下列几点：（一）事先加紧宣传示威的方式和意义，务必达到使群众占据马路中心成为“街道之王”。（二）将群众有组织地调动到示威中心地点附近，集合起来行动，然后冲上示威地点，把群众先调到预定的示威的马路两旁久待，占据马路中心是很困难的。（三）示威指挥权必须统一在公开指挥之下，各区及各种群众都必须有分指挥，指挥事先须有各种会议及计划，以便分指挥能够临时在不违背总行动的原则上，灵活地指挥示威行动。（四）必须加紧中心队伍（纠察队，宣传队，口号队，交通队）的限制和训练。

我们要决心实现五卅罢工与示威，首先就必须加紧我们的经常根本工作，必须：（一）加紧发展赤色工会的工作，尽力使工会会员在红色五月发展到特派员会议所决定的数量——十万人，必须深切认识只有赤色工会是我们的根本基础的力量，没有相当的赤色工会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和进步，则五卅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是不能实现的。（二）加紧注意青工女工的工作，不能抓住占极大百分数的女工和青工的广大群众，则伟大的罢工与示威都是极困难和不可能的。（三）加紧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使工厂委员会成为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使广大群众积极起来为这一口号而斗争，只有使工厂委员会普遍地建立起来，才能保证和扩大赤色工会对广大群众的领导。（四）加紧组织和训练纠察队及宣传的工作，使他们的发展与工会发展及工会生活发生适应的作用，使他们成为罢工示威中的中心队伍。

最后,我们必须抓住五卅运动,向一切反动势力进攻,打破他们对我们的攻击与造谣,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所散布的一切迷药与幻想。必须了解在伟大的五卅纪念之前,一切反动派别都不能不躲在纪念五卅的光荣旗帜之下进行其极无耻的反革命勾当。首先我们要指出从国家主义到取消派,从汪精卫到蒋介石,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反帝国主义的呼声,只是骗子的招牌;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就须同时打倒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必须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去对抗各派军阀受某一帝国主义指使,为某一帝国主义利益反对另一帝国主义的把戏。第三,必须以打倒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口号,去对抗反蒋军阀及拥蒋军阀各派互相攻击及各自吹嘘的口号。第四,必须加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间的正确关系及共同命运的宣传,以揭穿敌人的“同情罢工,加紧反共”,“纪念五卅,加紧反共”等类的毒恶虚伪的宣传。第五,必须使拥护苏维埃区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宣传,与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尤其要使这些政治口号与群众一切日常生活的痛苦问题灵活地联贯起来。最后,必须认清黄色工会是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直接在工人群众中的奸细和技师,是赤色工会最当前最直接的敌人,所以首先须在准备五卅工作中尽力揭穿黄色工会的法西斯蒂的真面目,揭露黄色工会的纪念“五卅”是出卖“五卅”和消灭“五卅”,夺取广大工人群众到赤色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组织里来。同时,必须注意纠正过去一切不正确倾向,不能把发展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对立,不能把发展赤色工会与反黄色工会的工作看成是漠不相关,而应认清是互为因果。只有加紧反黄色工会的工作,才能使赤色工会得到广大的发展,同时,只有加紧发

展赤色工会的工作,才能更迅快的打倒黄色工会。

载《劳动》第32期

署名: 玉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一九三〇年秋冬)

目 录

三版序言	114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116
编辑部的话(略)	
几点必要的声明	117
1 引言	119
2 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	120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120
一 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120
二 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121
三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124
四 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125

* 本文原题为《两条路线底斗争》，1931年7月15日由中共中央出版部出版单行本。次年再版时，作者加写了“（四）再版书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于延安重印第三版。

二 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127
一 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127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129
三 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130
四 革命政权问题	131
五 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132
三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134
一 对时局的两种估计	134
二 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138
三 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 革命首先胜利问题	141
四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144
A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145
B 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	154
四 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	162
五 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	165
一 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	165
二 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166
三 维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 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167
A 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167
B 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	168
六 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184
一 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	184
二 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	186
三 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底态度	187
3 结论	190
4 再版书后	192

一	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	193
	A 补充说明的问题	193
	(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 规律问题	193
	(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195
	(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	198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 问题	206
	B 纠正说明问题	212
	(一)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	212
	(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	215
	C 新加的几个问题	216
	(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 题	216
	(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 经过问题	222
二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235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	236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	238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	250
三	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	253

附录(略)

三 版 序 言

这本小册子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两条路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书后”，所以改为现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时光荏苒，我们党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迅已将近十年。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反革命的本质。罗章龙及其亲近的信徒们，早已作了反革命的公开侦探走狗，李立三路线也全部宣告破产。同时，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的同志们，有的则已英勇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始终为革命奋斗，这便是斗争双方是非曲直的最好证明。

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本无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书，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当本书第一版时，作者曾在几点必要的声明里说：“这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些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

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这一段话在小册子三版的今天，也还适用。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和空间，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所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如果我以今日的见解，来修改十年前关于具体问题的历史性的著作，则是去掉历史和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是不应当的。因此，除对个别词句作必要的注释或修正外，我对于本书现在不作任何重要的修正。

我们党进行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距今已十年了。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主要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何子述同志早已在北平监狱内痛苦而死；沈泽民（即书中所写的则名）同志早已在鄂豫皖苏区病饿而死；陈原道（即书中所写的列甫）同志早已在南京被反革命所屠杀；夏曦（即书中所写的劳侠）同志早已在红二方面军工作时英勇牺牲；殷鉴同志早已因在北平监狱中多年磨折而病死；张子之（即书中所写的戒知）同志早已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反革命奋战阵亡。当本书三版之际，抚今思昔，缅怀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殉难之各战友，无任怆然！本书之三版，或亦可作为对已故诸战友之一点纪念！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本书初版、再版时，均用“韶玉”这一笔名，此笔名，作者开始用于一九二八年夏季作者与其他同志所译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之一书上（此书系专为我党六次大会代表看的，作者在前面曾用韶玉笔名写有序言）。其后，因秘密工作关系，作者在编“红旗报”“劳动报”和“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上曾用过各种笔名，如：慕石、兆雨等等。王明这一笔名，系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采用的。近年来汉奸托匪份子，在许多刊物上故意发问说：“为什么陈绍禹又叫王明呢？”把这说成好象“不光明”的事，企图以此来迷惑还未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能不随时改换姓名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同时是最光荣的事情。这些专门出卖革命者的血腥人头贩子，大概到现在还悻悻于怀地问我：“你原来为什么不写陈绍禹于上海，而写韶玉于武汉呢？”换句话说，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几年以前未曾捉到作者去领取那十万元至十五万元的赏格。当然，对于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说？对于这种人的言论根本没有驳斥的价值。但是当本书三版之时，作者已能用真姓名问世，为使读者明白前后署名不同的原因，故特附志于次。

陈绍禹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于延安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一、这一本小册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线时所写的几篇意见书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现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

斗争”。

二、再版书后，一方面是为的补充对立三路线各个问题底说明，另一方面，是为的阐明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

三、小册子后面附录的那几种文件，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加明了反立三路线及反罗章龙派斗争的主要内容。

四、同志们要想更详细地研究反立三路线的问题，必须想法购买苏联伯力国家出版部远东分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反立三路线”的文集。这文集里面有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致中共信，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有各种反立三路线的文章。

韶 玉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庐山

编辑部的话(略)

几点必要的声明

一、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小册子的第一部份是根据我对于六月十一日决议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的发言原则(这一发言我有书面东西交中央)写的，第二部份是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及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在接到国际十一月关于立三路线来信时，我检查我所写的这一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有许多问题，我没有国际来信所说的那样深刻)，不过只在小册子后面又加写一段关于“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的那一段，同时，加写了前面一个引言和后面一段组织结

论。以后又开始了实际工作，所以没有工夫继续写下去，以致不能批评中央九六号通告以前及九六号通告本身错误的东西。

二、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所以文气有许多不十分衔接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

三、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

四、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个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

五、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斗争，绝未有丝毫的结束，而只不过是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来从理论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线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小册子对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统的节目来（原来是多少次继续写的，没有目次），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

绍 玉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上午于武汉

两条路线底斗争

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1 引 言

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成绩。在李立三路线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份领导同志们虽然犯过许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联合富农、改组派估计的问题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线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们深刻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组织上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则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千百万广大工农群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绩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部份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并存的。李立三路线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份的损失和打击。现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作残酷的斗争，每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论上实际上识认立三路线的真面目，来坚决无情地反对李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

取调和的态度,来彻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取得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2 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一 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要正确了解现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正确,就产生了现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以布哈林为首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为“第三时期具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维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认为没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决议上写下也无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计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红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说:“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

义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并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见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简单地是继续表现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现时的经济危机”。（见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

由此，可见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认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质。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之便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规律——不平衡规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

二 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立三同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的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列宁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中，又表现出来；可是，目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中，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程

度虽然不平衡,可是资本主义之总的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还可以度其繁荣的生活,可是今日,这种形式已经不会有了,英国与美国可以有程度速度范围都各不相同的危机,但必定是一样地走向没落、崩溃与死亡(这些同志惯用中国革命胜利、美国还没有革命的假说,真是美国除外主义的思想)。”我们从立三同志这一大段话当中,便可明了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想昏乱、糊涂到何等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常识的地步了。第一,他以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开展着的全世界经济总危机的事实,并且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这一点,也不过还只是将来的趋势。这样,就不仅取消了第三时期的存在,并且根本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质,以至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市侩的意识。第二,他以为英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程度、速度和范围的不同”,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以前,有另外一种趋势——不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只是到了第三时期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才和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这种“美国例外”的思想,恐怕是受了叛徒罗佛斯通的影响吧!第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表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一致’”,而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不一致”,这真是空前未闻地对于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曲解,这真是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形式底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调。实际上,“经

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规律”（列宁），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这一规律更加明显地有效。“目前的世界危机发展得不平衡，虽然总的方面都有危机，但是各国的危机是不平衡的。”（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危机现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质的不一致。在有些国家中（坎拿大、澳洲），美国危机的影响直接引起它们的危机形式；在另些国家中（东欧、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南美各国、日本），占有广大领土的正在开始着经济衰颓；在第三种国家中（德国）——一般危机正在增长；在第四种国家中（英国），许多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慢性衰颓加剧；在第五种国家中（法国）——危机现象最初的征候已经发生，生产开始低降，裁减工人，股票跌价。”（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通过的关于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群众失业与罢工运动的决议）立三同志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所以形成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有些同志公开指责立三同志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错误时，他更发出毫无常识和令人发噱的理论，他说：“有些同志把总危机与不平衡对立起来或割离起来。”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笑话；总危机与不平衡是一桩不能分离或对立的整个肌体，如果不先见到总危机，那里会发生总危机发展不平衡的论据来呢？！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不同，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之一，这一问题密切关联到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否首先胜利的问题，一个国家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式的真实状况问题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对于这一问题

的了解不正确,便不能正确的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不能正确地
了解苏联的一切对内对外根本政策,不能正确的了解国际形
势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各国革命间的正确相
互关系。

三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立三同志因为对于第三时期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
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非列宁主义的了解,于是便不能不怀疑
和反对苏联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在无产阶级革
命开始的时期,特别在苏联革命胜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暂时低
落的时候,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认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无疑义地要成为
帝国主义的伙友,无产阶级的叛徒,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必
然归宿。可是,在现在的第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到
来的时候,特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大爆发的前夜,不把
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问题,提到无
产阶级的前面,而提出中国革命是否可以维持胜利的问题……
这一提问题的方式,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从立三同志这一段话的内容看来,就是苏联共产党现在的
主要政策不是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不是领导
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援助世界各国革命运
动;而应当是马上“完成世界革命”。立三同志这种论点的来
源是,在他看来:“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决难推翻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见“布报”四、五合期立三的“革命新高
潮前诸问题”一文)同时,“帝国主义世界与苏联及苏维埃的
中国不能同时对立并存。”他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只看

见消极的方面,仅指出“中国革命的爆发……更加促起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见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而不看到积极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减弱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见中共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便得出奇怪的结论来:“或者中国革命与苏联共同一下子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在消灭中国革命时同时也消灭了苏联。”“苏维埃的中国及苏联不能与帝国主义世界同时对立并存的。”(见立三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论文)

四 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应当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一定要更加影响和推动世界其它各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爆发和胜利,同样更加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便充分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以为:帝国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革命一爆发,“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等灭亡的到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是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只有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同上“布报”论文)所以“中国革命的意义比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更要伟大得多”。(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立

三同志却完全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他说：“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一定要决定于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点是我加的——玉注)，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布报”第四、五期)他只认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劣点，但他完全不认识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条件中包含的优点，例如(一)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万几万万的大众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底世界帝国主义作拚死的战斗；(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军阀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三)无产阶级的年龄比民族资产阶级老，而且力量比它大；(四)无产阶级有千百万广大破产、失业、饥饿、贫穷化了的半无产阶级成份作亲密的战斗员，城乡的阶级斗争都极明显而且尖锐等等。他不相信中国国内的丰富的革命动力(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他不相信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伟大影响和力量，他不相信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声援的力量；因此，他不相信，在现在国际形势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尤其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中，一方面凭借本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伟大战斗力，另一方面得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暴动与骚动等帮助之下底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爆发的

可能，而且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不仅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而且有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的实际内容，可以简括起来说明如下：在革命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便是一切，世界革命，没有什么！”在革命力量上讲：“世界革命，便是一切；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前者的思想来源是孙中山式的“我大中华民族主义”，后者的思想来源是对于强有力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示畏缩、失望、投降无出路的情绪，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方面表现，其中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辩证的联系。

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地用取消主义观点来解释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公开地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成功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才有爆发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李立三机会主义者则躲藏在“左倾”的词句之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空想高调之下，来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

二 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一 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

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份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一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了，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

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来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〇年“布报”四、五期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中大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且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引起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

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三 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〇五到〇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〇五——〇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流）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

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对富农。”（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四 革命政权问题

列宁同志时常指出：“一切革命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时常指出，革命的正确阶级定义的必要。他说：“没有对于专政的了解，便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的定义。没有专政的准备，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立三同志不能了解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法（他只空喊扩大革命战争和地方暴动，但反对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和不注意创造能为这一政权支柱的红军），不能了解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发展进程上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他自己在三中全会的发言里，承认他以为“在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区域里建立临时革命中央政府，是开玩笑！”），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革命政权底正确阶级性（他所写的文章中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上，都只就地说说“建立革命政权”，但不能也不愿指出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工农民主专政），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权初步的实现；这一政府的任务有它的过去与将来两方面，即一方面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不清楚”，他在三中全会发言中自己承认的。因此，他便没有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和扩大政权的一切

应有的和必需的认识、决心、勇气、能力、准备与实施。因此他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李立三同志等以不认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作用与前途来忽视和放弃苏维埃政权。

五 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二月)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便指出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执委的历次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都确切指明和确定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前途。同时,并且指出由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相当的一定的必经的阶段,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期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前途,经过一定步骤和阶段,完成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份;而且国际的(苏联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经济危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与国内(A.反帝国主义斗争; B. 不仅与封建残余和军阀制度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 C. 共产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维埃形式的政权; D. 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革命新的高潮的最初几个时期,已经相当地形成起

来；E.工业农业的深刻危机，需要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等等）各种条件，都有利于而且促进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些条件之中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具体地主要地是由自己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争取和实现，共产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阶级策略，灵活的组织方式，灵巧的工作方法和勇敢、坚决、勤奋、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毅力去启发、教育、动员、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和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立三同志始终不能明白了解决定中国革命转变前途的那些国际的（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上说：“决定革命胜利以及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利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国内的条件（他曾经公开取消赤色工会、公开联合富农、公开主张不反对资产阶级，他忽视雇农工会，不懂组织贫农团，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等等）。他始终忽视共产党根本任务和根本政纲（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他尤其忽视和放松保障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任务（首先表现明显地，就是他忽视党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他以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主观与革命形势发展没有关系！”）。他忽视和放松了党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的领导。因此，他对于革命转变前途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他一方面说：“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 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是不会有丝毫间隔的”，摭拾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牙秽，企图跳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必经步骤

和阶段；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要幻想和平的转变”，服膺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不相信可以经过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来逐渐实行革命的转变（当然要经过极残酷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阶级斗争），以为还须再来一次武装起义推翻现在阶段革命胜利的既存政权而再去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就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转变前途。

立三同志对于上述的这一切革命根本问题，都有了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见解，都或多或少的堕入托洛茨基主义与孟塞维主义的泥坑，结果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当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长的紧急关头，完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而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

三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一 对时局的两种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于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机的具体特点，有最正确的估计，并在客观上证实了的估计。我们布尔塞维克总是尽力之所及以求忠实于这个要求，从无论那种政策的科学根据上看来，这要求无疑地是必须遵守的。”（列宁——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远方来信”第一信）只有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阶级相互关系的状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根据事变发展的特点来正确地科学地估计时局的情势，估计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才能正确地了解与规定在革命运动的每一历史阶段上的党的具体任务和为实现这任务的具体策略。今年（一九三〇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时局的实际状况究竟是怎样呢？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剧烈和深刻的基础之上，开展和加深着全中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军

军阀战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崩和破裂(国民党改组派联络北方各派军阀在北平成立政府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过去几年因为中国反动统治的结果,中外资本拚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恶化到极度,再加以现时极深刻的农村经济危机、大批的群众失业、金贵银贱、物价腾贵(首先就是米贵、米价涨了百分之七十)的结果,使工人的工资更加低落,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份简直几乎快要到了饿死的程度。战争连绵不已、交通破坏、金融紊乱、捐税加重、征发不断,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扩大和加深其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乡贫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范围与程度,成千累万的农民活活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手工业者和农村手艺人大批的破产和失业。工农劳苦群众这样痛苦颠连的生活,使他们更加认清在现在这种统治之下没有出路的事实,使他们更加对于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改良民生等等)表示绝望,使他们不能不一天一天地革命化,使他们不能不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势力的打击之后已逐渐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因为厌恶军阀战争和不满牛马生活,时常有部份哗变逃跑等事变的发生,有时也有直接投奔红军和援助工农斗争的事实发现,军阀制度的崩溃情势日益明显。革命的爆发一天一天的接近。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革命新高潮生长的过程

之中,表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和弱点,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一方面表示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不能适度呼应的相互联合和汇合,南中国许多省份里的好多县的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等群众,在共产党一般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已经实行起来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开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而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是一般的高涨,但在中心城市和中心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还极散漫而且薄弱,斗争性质也还未达到直接为政权而战斗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地域上的不平衡,农民战争广大发展的省份,还只限于湘、鄂、赣几省的区域,就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策源地的广东,比湘鄂赣也不免落后,福建农民战争还只停留在闽西的一部,河南、安徽、广西、四川的地方暴动还只限于边境的若干县,江苏、浙江的农民游击战争还不过是零星局部的现象,北方各省(山东、山西、直隶等)以及西北各省(陕西、甘肃、新疆)虽然广大的农民的半原始性的自发斗争时常发现(如红枪会、大刀会、回民骚动等等),但共产党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还极其微弱,以致运动的领导主要的还操在小地主、富农之手,还未真正走向革命斗争(虽然客观上有反军阀制度与反军阀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的轨道,云南、贵州的运动还一般地落后,东三省的情形与长江流域有着显著的差别。工人斗争比较发展的,也还只限于上海、天津、青岛及其他一切次要的城市(如景德镇、自流井等)就连武汉以及香港的斗争,也还零乱脆弱。共产党在全国各重要中心城市中组织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会员在全国十万人中,苏维埃区域便占去了绝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人团员的数量,绝对的减少(原来数量即比党少)。把上述这整个事实的全景综合看

来,我们便可正确估计当时的时局真象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日益生长,但是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走到政治上完全破产的地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没有汇合起来,农民的革命斗争,广大发展着的还只不过南中国几省的有些区域,整个军阀军队的兵士——尤其是主要军阀的基本部队,还未达到应有的和必须的崩溃和革命化的程度,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力量,还不能保证必须的力量,去根本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这种估计毫无疑问的是合于客观事实及事变特点的正确列宁主义的估计。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立三同志怎样估计当时的中国时局呢?“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见“布报”四、五期立三同志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革命运动发展,表面上是不平衡的实际上是平衡的。”“万事俱备,只候东风,只要在中心城市有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便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立三同志在中共工作人员讨论会上的结论)“目前全国的形势,无疑地是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形势。”(见立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案)这种估计显然地是不符客观事实,不计算阶级相互关系,不顾及每一阶段的事变的特点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估计。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讴歌中国统治阶级的稳

定,根本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事实,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新高潮已经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将来”的论调,毫无疑问地都是张伯伦、汪精卫、蒋介石等的应声虫的唧唧哀鸣,根本值不得客观事实和列宁主义武器的一击。

二 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革命运动高潮是什么呢?这就表示“革命运动的继长增高”(见斯大林同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一书中“革命运动的高潮与低潮”一段),即表示统治阶级的力量日趋削弱和崩溃,被统治阶级力量日益增长和强大。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党的策略应当怎样呢?“党的策略是进攻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总罢工、武装起义以及革命斗争等等。”(见同上一书)所以高潮是表示革命运动由开始发展到最高顶点整个时期的形势,革命形势是高潮发展的顶点,高潮在一定条件之下发展到适当的时候,要发展成为革命形势,只有在高潮发展成为革命形势的时候,武装起义才是直接行动的指令。革命形势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的说,什么是革命形势的标志呢?假如我们指出下面的三个标志,大概我们是不会错误的,即:(一)统治阶级再要形式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统治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或那种的‘上层’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与愤怒。通常革命的到来,仅仅‘下层不愿’忍受旧式的统治还不够,还要‘上层不能’按照旧式的统治而生存;(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的剧烈大非寻常可比;(三)由于上述的原因,大大地增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群众在‘和平的’时代,让人家安静地掠夺,而在风雹的时代,整个革命的环境以及‘上层’自己将他们吸引到独立的历史的事变中去。……没有这些既不依各种派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不

依各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变动，按照一般通例，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著“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因为武装起义及起义胜利的条件是：“第一，要起义胜利，应当不凭借少数人的阴谋行动，不凭借党，而凭借先进的阶级；第二，应该凭借民众革命的高潮；第三，起义应该凭借正在滋长的革命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即当民众先锋队伍的积极性最大时，即当敌人营垒中与柔弱的、不彻底的、不坚决的革命朋友的队伍中发生动摇最剧时。”（列宁）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是正确地了解在高潮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策略的必要前提，是正确地准备武装起义和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决条件。立三同志的论文以及以立三为领导时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上，都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成一谈，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同一范畴来相互并用（“日益逼近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当有些同志指责立三同志这种理论上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具体策略错误时，立三同志把这种严重的策略争论，曲解成“名词争论”，“翻译错误”，他的“十足”理由，便是：（一）在中国党同志的习惯上以及一般文件用法上，都是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表示武装起义形势而相互并用；（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便是“直接革命形势”。其实，这两点理由，都不过是立三同志强词夺理的遮羞之词。我们姑不引证中国党一般同志的习惯用法并未将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相互并用的各种例子来驳斥立三同志的澜言，即就立三同志自己的习惯用法来讲，也可看出立三同志这种说法的欺人自欺的愚笨可笑。例如立三同志在“布报”五期上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一文的三二、三三、三七各项上说：“工人群众罢工的高潮”、“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工人斗争的高潮”等等，难道都可以解释成“工人群众罢

工的直接革命形势”、“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工人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吗？恐怕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吧！？第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不即是革命形势一节，就决议上高潮所指的意义和事实上看，便可以明白地证明并非把它即当作革命形势，例如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上说：“……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象征，如：（一）反帝运动的复兴……（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逐渐兴起……（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已可以见到……”，难道这可以解释成直接革命形势吗？难道可以说在六次大会时中国已经见到革命形势的象征吗？恐怕就连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吧！？然而立三同志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所谓名词（含有革命现状估计及策略决定严重意义的名词）混为一谈呢？在他把这两个名词合而为一的手法之下发现了些什样把戏呢？第一，他用窜改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案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了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增长的高潮（他把去年国际执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及莫洛托夫报告中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改成世界革命运动“复兴”或“浪潮”）；第二，他用涂改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特别是工人斗争的高潮（去年国际在论职工运动的信上已经指出：“在中国已经有罢工运动的高潮。”）（去年一年中国罢工人数七十五万人，占世界第一位，印度第二位，五十三万一千人），在今年春季论改组派信上说：“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立三同志等将这些高潮都改成“复兴”或“浪潮”，直到今年对于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案争论时，立三同志还否认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他在“红旗报”上还极力否认“高潮已经到来”以至“高潮开始到来的”事实。此外，即就文字的涵义来讲（对于每

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名词涵义，有极大的具体策略意义的，“理论”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复兴”或“浪潮”绝不能代表“高潮”的意义，“复兴”是表示已经毁灭和衰亡的事物重新还元或复活，“浪潮”有“高潮”“低潮”的不同，都不能显示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真实意义；第三，他在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的混合及全国形势都是日益逼近革命形势的这一好听的名词之下，根本否认了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之下，革命形势有首先包括一省或数个省份的可能的事实，因而就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和不相信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立三同志等在高潮即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高潮。

三 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

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第一个革命高潮中，已经显明的呈露过。这一不平衡发展的来源，是根基于中国经济政治的背景。第一，半殖民地的中国被世界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在经济上政治上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在每个一定势力范围内，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有相当的独立性；第二，因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畸形，以致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生活，还保有极有势力的封建残余，政治上还存在着军阀制度的割据形势。以致全国还不能够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单位；因此，第三，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里，阶级的组成与力量的对比关系不能

齐一的一致，以致各个区域里统治阶级的崩溃的程度与速度是不平衡的，工农群众斗争的经验、决心与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会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特点和弱点以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所以在政治决议案上说：“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在这一次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过程中，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显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和特点。从地域上讲，新的革命高潮首先成熟的地方，大部份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地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从工农斗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工人运动比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武装斗争要落后些，就是工人斗争还没有表现于直接为争取政权而战的形式。”因此，虽然一般地看来，革命运动新高潮是大体上具有全国范围的性质，但这一高潮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展成为革命形势。革命形势可能而且难免只首先在那些条件最具备的地方（统治阶级崩溃破产的程度和速度特别剧烈，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经验、决心、勇气与力量都特别深广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例如湘鄂赣各省等）成熟起来，在那些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地域，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立三同志为领导的一部份中央政治局同志们，既把高潮与革命形势混为一谈，既否认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和弱点，既躲藏在“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存在的事实，当然不能不作出：“在中国革命中，只有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问题，绝对没有巩固或维持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的策

略结论，自然不能不认为“割据一省或几省来促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是极端严重的右倾错误”，是“和平割据”、“保守观念”等等。立三同志等既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特点，当然不能了解所谓中国革命首先可以在一个或几个省份胜利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究竟何在。他们不了解如果所谓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涵义，只是一省与几省首先举行武装起义，“紧接着”便是全国武装起义，那末，根本便无所谓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了。难道俄国十月革命不最先在当时的彼得堡起义，然后在莫斯科起义，然后在南俄等处发生起义吗？难道法国、德国等革命一定是全国各地同时一齐举行武装起义，而没有一点先后之分吗？为什么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不提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问题呢？为什么不说法国、德国等等革命，也有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呢？因此，可见所谓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的实质，绝不仅是说革命先在某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而是讲不仅在这一省或几省可以首先爆发，而且可以首先胜利，不仅在这一省与几省可以首先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而且有可能与必要来巩固与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以便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实行真正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实现，要引起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战斗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引起全国阶级斗争的更加尖锐化和深刻化，引起全世界各阶级的震栗咒诅与兴奋同情；同时，还必须懂得，我们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实现以后，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动员、组织与武装既经胜利区域的千百万群众，以及发动和领导反动统治区域里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各式各样的革命斗争，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

武装进攻，建立起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彻底实行我们的革命政纲，使我们既经胜利的区域，能够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点和根据地。立三同志等把巩固既得的一省与几省的革命胜利的问题，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问题分割和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巩固既得的胜利作为革命根据地，正是将全国革命运动统一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而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最实际最重要的步骤和手段之一；因此，便不能不作出“或者全国暴动，全国胜利，或者一处也不暴动，一处也不胜利”的“左”表右里的结论。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

四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根据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党的任务的了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目前时局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之下，彻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在反动统治区域里，加紧发动和

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份的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加紧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加紧去作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以争取群众中党的政治影响底斗争，加紧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加强党、团、赤色工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根据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对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里的党的任务没有丝毫的差别（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没有一点提到党在苏维埃区的任务，便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这样对党的任务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两条政治路线，两个策略，两种组织任务，两种斗争方式与方法，两种工作方法与方式。

A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一）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地方苏维埃政权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指出：“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国际指出：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真正工、农、兵群众的代表机关，真正由群众团体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政权，真正有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而团结起来广大贫农、中农群众在周围的政权组织，“每个

党部，每个党员，必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帮助雇农、苦力、工人与贫农选出精干的代表，向中农宣布要选举最勇敢、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代表，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心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民众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份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而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和苏维埃区有些党部作了些什么呢？关于在相当区域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立三同志自己承认说：“他们以为在未打下武汉以前在山头上去建立中央政府，是开玩笑。”（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他们为苏维埃区发展的实际环境逼迫，勉强地指定一些代表在今年五月在一个非苏区里（！！）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虽然决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对于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依然搁下不提。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中央努力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便统一集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领导，而立三同志等还表示反对与怠工；到经过同志们三、四次严厉督促以后，立三同志等才勉强发出一号召这一大会的宣言，成立些架空的脱离群众组织的苏准会机关；对于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样的忽视和怠工，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有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不加以应有的注意。苏维埃政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处罚”、“成问题”的同志去干这些“党外”工作，以致形成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们把到苏维埃政权中工作看成

“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见赣西南的报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经常有计划的执行,以致有些地方富农、地主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指使之下,不仅时常在赤色区围内部打游击,而且阴谋组织许多名目的反革命团体(A. B. 团,——即反共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等等),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份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以致直到现在,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二) 关于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问题

国际政治决议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同时,更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具体办法是:(一)改善红军的社会成份——使大部份红军兵士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贫农、中农和苦力;(二)健全红军的指导干部——首先就是坚强的工人成份;(三)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四)集中红军的军事政治的指导;(五)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将现有红军新编红军加以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改造和训练,使之成为真正政治上坚定、有强固战斗力而能担负大规模作战的“铁的”红军。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们对于红军建立问题的指导与实施怎样呢?最初一个时期,完全抱着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今年苏区代表会以前,差不多各地红军苏维埃运动都是由

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觉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来发展的,直到某部份红军建立起来时,立三同志等只限于派一个或几个军事同志去当军长、师长或大队长,对于红军的其它一切建设工作,都未曾采取过正确的和积极的指示。到湘赣鄂红军有了相当庞大发展时,立三同志等由一个极端又转到另一个极端,以为红军已经是“打天下”的力量了,每天调动刚刚形成的红军去攻城掠地,唯一的指导口号是:“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工作人员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讨论会上的报告与结论)至于改造红军社会成份、建立健全领导、加强军事政治教育训练工作等等,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做过,连想都未曾想到过。以致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二三十军红军,实际上战斗力真正比较坚强的还不过朱、毛、彭、黄所带领的几军。

(三) 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

国际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支柱的红军,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形成与反动统治明显对立的中心,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立三同志等始终认为这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他们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的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与意义,他们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他们不懂得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正是真正准备发展和实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必需手段,他们把巩固胜利与扩大胜利的问题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以致形

成许多苏维埃政权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随着红军游击队的来去而生灭)的现象,以致形成赤色区域的广大逃难难民的现象(跟随红军“跑反”),以致国民党便于利用红军流动的机会来屠杀苏维埃区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如安徽六安英山霍山等几县苏维埃成立后,当时红军第一军全部开赴武汉附近游击,并且地方武装亦完全开走,国民党乘机派遣大批白军杀戮民众一万数千人),以致有些苏维埃区工农群众多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以致形成红军无目的地攻城掠地的行动,以致到一九三〇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

(四) 土地农民问题的解决

国际几次关于土地农民问题的指示——尤其是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曾坚决地指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党对于这样的富农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的农民的土地上去。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立三同志等对于中国土地农民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和解决;在六次大会后的第一个时期,立三同志等

曾经公开地主主张联合富农，在联合富农的理论和实际受到国际指责与一部份同志抗议及江西农民反富农的事实的打击以后，二中全会上立三同志等便来一个“只反对兼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不反对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的决议，结果依然是联合富农的变相策略；当立三同志等这一理论与策略，受到一部份同志抗议及农民革命行动打击以后，立三同志等便又想出别种口号在客观上执行富农路线，他们说：“变动了富农的土地，便消灭了乡村雇农，消灭了党在乡村中的阶级基础。”（立三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结论）——稍有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他们反对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在当时召集的所谓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土地暂行法上，规定：“分配没收来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而未指明应当怎样和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农民各阶层的不同办法应该怎样等等。因此，很多地方实行这种分配的结果，富农不仅不吃丝毫的亏，而且得到新的土地——因而基本农民群众有时得到很少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左的”行动之下来危害革命利益；如土地暂行法令上规定着：“不分配大私有者的土地”、“立刻实行组织共耕”、“组织集体农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过早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办法，以及“在全国革命未胜利前，不分土地给红军兵士”的错误办法——使红军不能巩固和扩大的办法。立三同志客观上执行了富农意识。至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革命胜利的联系宣传，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份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 B. 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至于立三同志所谓中国北部的土地

革命的中心内容，只是抗捐抗税，这更加明显地证明立三同志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有一贯的富农路线。总而言之，立三同志等始终企图（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中国土地革命成为少数富农的，而不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的根本问题，完全与国际采取相反的路线。

（五）雇农工会与贫农团问题

国际决议指出：“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地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任务联系着，和组织贫农团的任务联系着。”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以立三为领导的有些地方党的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怎样解决呢？他们以为“雇农在分配土地后完全消灭了，完全用不着组织工会”，“雇农组织工会，农民反对，所以不应当组织雇农工会”；“雇农没有知识不革命，所以用不着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组织雇农工会的富农理论，存在于有些苏维埃区域；“减低雇农及农村手艺工人的工资来解决所谓‘剪刀’问题——即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的问题——的办法”，在有些地方曾经有时实行过。苏维埃区域中，只有闽西一部份有雇农工会的组织。至于贫农团的组织，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决定作过，而且也未曾梦想过，因为他们只听说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组织过贫农委员会，所以他们正等着革命转变时再来谈贫农组织问题。他们不懂得用组织雇农工会及贫农团的办法来彻底保障土地革命的彻底实行和准备革命将来转变的条件。

(六) 经济政策

国际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与适合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就是一方面要处处顾到工人和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尤其是雇农、苦力、贫农的利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另一方面不采取一些过早的办法，以保障工人阶级对广大基本农民群众的联合。前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军事上绝对必要时，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必要时限制和调节一部分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燃料、盐、煤油等)底价格，反对营业者投机和怠工等；后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允许商业自由，暂时不禁止土地买卖，不实行集中供给，不一般地限制境内商业和商品物价等等。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才可以调剂苏维埃区的人民经济生活和供应红军的需要，否则便要受到被敌人经济封锁及自己造成经济混乱的危害，因而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过去海陆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的经济政策，根本不谈；如果有同志提到，便骂人家是“保守观念”与“建设观念”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然，如果谁幻想在现有苏维埃区域里“和平地”实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因此忘记了革命国内战争是当前最急切的任务，自然是“土地分了，革命成功了”的不正确意识的反映；但是，苏维埃区的正确经济政策却是万分必要的东西，不仅对于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对于革命战争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当的建设工作，便不能顺利地进行革命战争。因为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没有一

定的经济政策作领导，于是有些党部及苏维埃便各随所愿地作出许多时“左”时右的行动；有些地方不懂得怎样执行限制资本剥削的办法，不抽收任何累进税，作出许多离开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有些地方却又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自己造成经济的困难。

(七) 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

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只有以民众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已认定了的原则。但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的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在自己的力量还未达到一定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时，有没有可能暂时地采取某些灵活策略，以避免在我们未有准备充分以前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准备反帝战斗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时机以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群众力量来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只以外交手腕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间的矛盾的幻想，与我们所说的上项策略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立三同志等始终不了解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他们对于苏维埃区的指导，或者是叫他们简单地避开外交谈判，或者是叫他们用些土枪土炮轰击一切外国商船、兵舰。立三同志等的策略就是或者不战而降，或者冒险奋战而死，绝不懂得怎样应用灵活策略来极力准备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作战。在立三同志看来，对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从无出路中去找出路，立三同志等就幻想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中国民众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

B 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

(一) 对于工人运动的策略

国际的决议是：“要党去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现在工人斗争，唯一方式是政治罢工与总同盟罢工，罢工口号只是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有时附带联系到某些经济要求，把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完全隔离起来，以为只有“武装暴动的口号”。才能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忽视和放弃一切日常的经济斗争，空洞地规定总罢工的计划（上海四月间五次，五月间四次），在“左倾”词句之下，宣布说中国绝对没有一点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说黄色工会已经完全破产和完全法西斯蒂化，因而实际上一般地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会员多半是流动性的；不去努力发展赤色工会，以为只要等到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马上便可以发展会员到几十万、几百万。结果使党逐渐与广大工人群众隔离，工人群众许多自发的斗争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天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跑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

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

(二) 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在反动的统治区域里现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以及一切反军阀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帝国主义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但并不一定而且也不能在一切地方都要从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做起。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全国各地,无论南方北方,无论近郊偏地,游击战争与地方起义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所以地方起义是目前农民运动中的唯一的工作内容。结果便放弃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斗争的组织和领导,结果把地方起义变成完全无条件的或者完全无配合的行动,结果是或者根本发动不起来、或者少数人发动起来、被敌人很快地各个击破。

(三) 对于士兵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要注意领导士兵群众的一切部分斗争,准备和造成兵变或军队参加工农武装起义的条件,准备和造成夺取、分化敌人基本部队的工作。兵变或兵暴一定是军队的群众行动或与工农斗争配合联系的行动,不要过早地或无目的地把我们在敌人基本部队中的潜伏力量揭露出来,或消失下去。为的是在革命紧急关头时,使这些革命军队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立三同志的策略是:兵变或兵暴的条件到处完全成熟了。有三个人也“变”,五个人也“暴动”,在上海也立即举行“兵暴”,在南京也马上组织“兵暴”。结果如何呢?使我们失去了广大军队阵地,使我们在客观上自己把敌人军队中的我们的最好力量断送和消灭。

(四) 对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国际指出我们“要加紧发展领导反帝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的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部应当利用它们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和示威”。立三同志对于反帝运动异常忽视，半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暴行层出不穷（如日本军队再四屠杀满洲中、韩农民，日军演习攻长春，日舰队在长江会操示威，法水兵淹死船板夫，芜湖日轮打死忻丁昌案等），立三同志等都未能领导党的地方组织去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抗议运动，党内许多积极干部对于这一点非常不满意。他们常常自动地做了许多英勇的反帝工作。最可笑的，当忻丁昌案发生时，江苏省委一声不响，各区委群向省委质问时，省委一个同志说：“国际决议来了，我们工作转变了，所以我们不作声，看你们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注意，那就证明你们还不懂工作的转变。”这真是一段十足遮羞息工的说话，这是对于国际决议执行上的最可耻地机会主义的曲解的最好例证，这是根本不了解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政治事变应有和应尽的责任。

(五) 对少数民族工作

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的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曾要中央加紧注意这一工作，并且要中央准备好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立三等同志对这一工作，不仅未作过应有的实际的设施，并且在重要决议案上都未曾作出对这个问题的提案或答案，

这一点充分证明“大汉族民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在立三这类同志的头脑中有极大的影响。

(六) 对于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达到目前党的策略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加紧注重争取群众中之政治影响的斗争，加紧去进行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斗争，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证实他们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不过是拚命救济反革命统治的忠实走狗。立三同志在写六月十一日决议时，把改组派与取消派看成完全无分别的东西，说它们都已经完全破产；不指出取消派虽然在主要政纲上与改组派无分别，但它们打起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企图打进工人阶级内部来作资产阶级的奸细这件危险的事实；因之六月十一日决议对于那时正在组织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及胡适民权派等都一字不提，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更说“改组派是老爷，取消派是马弁”，以及取消派根本没有多大作用等等“左倾”谰言，来忽略和轻视反取消派的斗争。对改组派、取消派等，立三同志等始终没有作过系统理论的斗争，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产生的来源，当然主要地是由于苏区内部地主、富农的积极活动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底培植和援助；但是，如果我们在肃反工作中采取了积极正确的办法，那末，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就要缩小和减弱得多了。

(七)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党担当目前历史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注意党的主观力量的加强，首先就要使党员数量发展——尤其是工人党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党报的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党的各级指导引进新积极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加强领导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的工作方法，加紧发展赤色工会与青年团组织，尽可能地扩大自我批评，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等等。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怎样呢？在理论上首先就说：“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只要直接革命形势到来，马上党员就可发展到几十百万”，“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有了足够担负伟大事变的力量”，于是在立三路线之下的实际表现就是：工人党员并未大量增加，有时甚至减少，借口“暴动事忙”，停止中央及许多省委训练班，对于各级干部及新加入同志，绝没有任何政治教育训练工作，“布尔塞维克”停版几个月，将“红旗三日刊”与其他报纸合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一切理论策略指导的刊物，仅有一张主要是刊登国际和上海消息的秘密日报。自中央到各级党部，对于培养和吸引新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在立三同志等从未加以真正的充分的注意。对于苏维埃区域，立三同志等固然不懂得指示他们准备任何秘密工作，以预防暂时挫折或暂时退却的事变到来，而致有些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机体遭受挫折的危害；对于反动统治区域内，立三同志等，更是一方面不注意和不懂得秘密工作，另一方面纯粹不了解利用公开可能来进行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工作，把利用与争取公开可能变成冒险盲动的行动。立三同志等从来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工作的原则，是尽量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影响传

播到广大群众中去，一方面我们保障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能够保证干部的安全。”立三同志所了解的秘密工作，不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掩护，而是脱离群众。立三同志所了解的争取公开可能，不是凭借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而是少数人的冒险。立三同志借口现在是“军事时期”，造出非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理论，完全公开地反对任何方式的自我批评（立三同志本来也就没有了解和承认自我批评的方法和意义），完全肯定和扩大了六次大会公开指责过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家长制度，惩罚主义，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等。对于同志们有任何原则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或方法上提供自己的意见或不同于指导机关的意见时，便马上加以各种捏造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取消派暗探”，甚至“反革命”等等），而加以组织上的处罚（停止工作，警告，严重警告，留党查看，开除等等）——而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的意见，尤其视若仇讎，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尤其仇视到极点。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当然是绝对需要的东西；然而这需要领导同志或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正确，执行纪律的条件和方法合乎列宁党的原则，党员能自觉地了解和接受纪律的制度，铁的纪律才是巩固和加强党的力量底主要工具之一。共产党内全体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绝对一致，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条件；然而这首先就需要党的领导同志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坚决反对有路线不同的政治意见的斗争，才是健全和统一党的战斗力的根本工具之一。立三同志在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前提下，来抑制一切自我批评和滥用党的纪律，于是结果就造成许多干部及同志对于策略上工作上有许多意见而不敢公开发

表,好些的沉默不言、埋头工作,坏些的消极沉闷、敷衍了事。做报告时,必定“多少要吹点牛皮”,在开会要发言时,必定先准备好“我完全同意”,使党的生活不能健全和有活气。这些不好现象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党内许多同志们的幼稚,同志们政治准备的不充分,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不够;但另一方面,立三同志等所实行的家长制权威的日甚一日,确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长制度是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密切关联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领导,不能不凭借这种权威来压制党内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拥护者。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以后,立三同志等在全国成立总行委,取消了党的经常组织和工作(一切由行委解决),取消了工会的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取消了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成立了产业委员会及许多空架机关(如各级苏准会),实际上完全混乱了党与群众组织的系统,把党与非党组织完全混合(在苏准会等系统中,都公开地把党列为与各革命团体——工会、互济会等——一律的团体之一!),使党失去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使群众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作用缩小到极度,事实上不仅取消了团的与工会的组织,而且同样地差不多取消了党的组织!

尤其重要的,国际决议特别指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因为,“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要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任务,保障真正在实际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闭关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倾向——就算是很小的

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地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它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清楚地真正布尔塞维克式地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怎样呢?根本没有所谓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始终以为“‘左些’总比右些好”,“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新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的斗争”(见“布报”四、五期立三论文),因而不仅对于左倾——以“左”的词句或旗帜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倾向(如关门主义、强迫罢工、冒险盲动、某些苏区的经济上过早办法等),始终不采取任何斗争的步骤,反而尽量启发和奖励,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只是提出“右倾”这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所指出的东西,最多不过是“尾巴主义”、“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割据观念”、“例外主义”,一些零零碎碎的空泛的缺乏实际内容的论调。至于党内当时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存在的整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从经济问题起到工作方式止)虽然许多时候是用“左”倾空谈掩盖着,立三同志等自己不仅不顾和不能指责,并且反对同志们的驳斥;当七月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我和几个同志提出党内一部份同志以“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时,引起了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立三、忠发等)狂热的愤怒,认为是反中央和反党的路线,“因为这些同志所说的右倾和左倾观点,都恰是中央(实际上主要地是立三的观点——玉注)的观点”(见立三,忠发说话)——事实上这些“左”右倾观点,确是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们的观点,而且暂时的在政治局内占着优势地位的观点。当然立三同志等自己不独不会和不能反对,同时还要

反对和打击那些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反加说话同志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立三同志等和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办法，是共产党内不可允许的办法；他们把同志们的正确发言和意见，完全不发表；另外自己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捏造许多与别人意见完全相反的谣言。或把原则斗争解释成许多无原则的个人攻击或纠纷，混乱斗争的真相，模糊同志们对党内斗争的正确观点，结果，是阻碍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阻碍了党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帮助了“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主义者在党内外的影响。

四 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

七月二十九日红军第八军及长沙近郊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这一事变，对于立三同志等简直是晴天霹雳，使他们震撼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全国武装起义形势——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因此，立三同志等虽然在中央七十号通告上，即空喊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在实际上立三同志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群众动员上，并没真正为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准备与布置；对于苏区红军并没有指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指示他们建立各地强健的苏维埃政权及各地苏维埃间的联系，并没有帮助他们强固工农红军及建立对红军的政治军事统一集中的领导。当长沙事变既经到来之后，据立三同志等估计，当时既还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则长沙的占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不可思议的事变；所以对于长沙红军及各地红军并没有给以正确坚强的指示，在长沙占领之后，立三同志等

简直不知如何办才好，在他们想来，既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红军如何会占领长沙？而红军既已占领长沙，大概全国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他们已为事变所惶惑，莫知所措，因此，在反动统治区域内，对长沙事件一声不响，立三同志等在红军占领长沙直到红军退出长沙的整个时期中（自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九日）没有发表一个决议，没有发表一个通告，没有决定采取些什么办法来帮助红军的今后行动，当胜利的红军和武装农民游击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强大武装压迫之下，不能不退出长沙城的时候，立三等又下令去再次进攻长沙，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在长沙被红军占领后，大大地讨论：“什么人占领了长沙？”他们回答说“土匪”，因为他们公开地反对占领长沙的工农红军，他们帮助统治阶级摇旗呐喊。立三同志等，在长沙占领后，大大地猜想：“为什么占领长沙？”他们回答说：“莫明其妙。”然而在立三同志等一猜再猜之后，结果猜出其中奥妙来了，他们猜定了：“我们的理论大概是不会不合乎实际吧？大概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了吧？”在这样一种懵懂幻想之下，立三同志等便决定：一方面下令集合三四五八红军再攻长沙，同时，下命令全国重要城市——武汉、香港、广州、南京、镇江、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等，马上组织武装暴动。同时，立三同志等根据自己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便企图马上“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暴动起来进行全世界的最后阶级决战！企图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同时一致地大战起来，中国革命便可“乘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来，便把原来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一跃而成为最冒险、最投机的“左的”盲动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左的”盲

动主义的形式之下，正式形成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一贯系统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然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实际不相容，当然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公开走上反共产国际的地位，因此，当共产国际指令制止立三同志等全国武装暴动行动及指斥全世界大战的可耻空想时，立三便公开发表出反对共产国际的言论。

二次进攻长沙遭受失败，南京、上海的浦东和南市及武汉各地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利用这些机会流了我们一部份英勇同志的鲜血。如果不经国际再三严厉的抗议和制止，如果不经党内干部在理论上实际上的反抗，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份同志，可以造成断送中国这次革命高潮的罪恶！血的教训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正确，宣告了立三同志等的政治路线的死刑。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斗争方式上、工作方法上正式暴露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最后原形！从立三同志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内占着优势时，即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时，正式开始了党的领导的危机，到此时，便形成立三路线领导的破产。

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份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和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

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

据上所述，可见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的产生来源，不简单地由于：(一)立三同志等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相当理论基础，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唯物辩证法也完全不懂(这点是立三同志等公开承认的)；(二)立三同志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布尔塞维克的观点来积聚经验，只是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来了解和积聚工作经验；(三)脱离群众已久，不能了解政治生活的实际；(四)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层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无穷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拚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这一部份冷意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遇到了当前紧张的革命关头，便不免被历史怒潮把他们冲激到正轨以外去！

五 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

一 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

自六月十一日决议产生，直到三中全会开幕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一部份领导同志们，不仅在理论上完全创造出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在实际上以“左的”盲动主义的行动，几乎酿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指示来到中国后，立三同志等一方面把它们隐藏起来，不向全党公布，另一方面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去命令全国武装暴动（二次进攻长沙，指定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南市、浦东等暴动，均在国际指示到后决定举行的！），到中国事变完全证明国际路线正确与立三路线领导破产的时候，才不得已来召集所谓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应有的任务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呢？三中全会应该做的是：（一）勇敢地、公开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全揭露过去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一部份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的完全破产；（二）诚恳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决议的指示，根本改变中央政治局内占着领导地位的一部份同志的反国际路线；（三）在政治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在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根据国际正确路线的基础，决定三中全会本身及全会后的各种工作，坚决号召与领导全党进行一个真正的路线上、策略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上的大转变，把党从反国际路线的破产了的立三路线领导中挽救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如此！

二 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第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尽量否认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曾经有过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一口咬定国际与中央路线是

完全一致(?)；因此，第二，就拚命把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所犯的根本路线的错误和因此错误而造成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及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涨的罪恶完全抹煞，轻描淡写地说：“犯了些‘左倾’的个别策略错误”，以自欺欺人的手段来模糊全党同志的意识；于是，第三，便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之下来曲解国际决议，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续立三路线，因而就产生了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三中全会在血的教训和事实打击之下，同意了国际指令的某些部份，停止了全国暴动的行动，取消了总行委及各级行委的组织，承认国际指出的党目前的两方面(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方针；但因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照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

三中全会决议及全会本身工作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全会的主要领导者仍然是立三同志及赞助立三路线的维它同志等，所以三中全会的一切错误，都是要由立三、维它等同志负最主要责任的。

三 维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 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A 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一)维它同志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并未表示接受最近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部决议案，——维它同志等在此次决议上，虽然因为许多原因，不便再公开采取前次立三同志对于国际来信的办法(将国际来信压下不发，先发出几号与国际来信大约相同的通告，然后再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决议上说：国

际来信恰恰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然而维它同志等决不愿诚恳依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完全接受国际决议,他把国际决议,只作为三中的参考材料。他在决议上并不如布尔塞维克党一般通例一样,在开始便写出:中共中央扩大的三次全会完全接受和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而只在决议的第二部份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这充分地表明出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决不容许的不诚恳态度。

(二)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根本否认存在过立三路线——国际决议的根本内容和根本任务,便是以布尔塞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扫除以立三为首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份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首先确定下:“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同时,坚决肯定:“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变更党的路线。”而对于从六月到三中全会前在政治局内立三路线曾经占着领导地位这一点,却一字不提,这就是根本否认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存在过,这就是根本否认过去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路线,这就根本减弱了和模糊了国际决议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根本减弱了和降低了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

B 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

(一) 对于路线问题的模糊?

“路线”问题,这几个字在立三同志等的玩弄中,变成了不

可思议的怪东西。立三同志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于革命全部问题，几乎完全错了，他们却还要说：“路线绝对正确”。其他同志要提出任何政治问题的意见或疑问，立三同志等马上便加以“动摇中央路线”，“与中央路线不同”，“党内绝不许有两条路线存在”的严厉抵抗。究竟什么叫“路线”问题呢？立三同志等一部份负责同志可以有因人而异或因地制宜的答复。但综合起来，不外下列几种主要的意见：

第一，“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路线问题。这个路线，立三同志等与国际是绝对一致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党在这一整个革命阶段上的总的根本任务问题，对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国际不会不一致也不能不一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赞同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不是党内在某个阶段上的政治意见的分歧。

第二，“国际路线是进攻的，中央也是进攻的，所以路线是一致的。”对的，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完全没有丝毫列宁主义常识的人，才会侮蔑国际路线是“退守”的。然而仅说空洞的“进攻”两个字，是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进攻”的问题，要看如何进攻及向什么方向而来决定是否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有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也有孟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有出奇制胜的进攻，也有以头撞壁的进攻，有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进攻，也有立三同志等的盲动冒险的进攻。当然，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

第三，“国际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

的胜利；立三同志等也是这样说，所以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同上两种一样滑稽，在党内发生路线不同的问题的争执，只能是如何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绝不能是根本要不要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如果谁公开说：不要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试问他还有什么资格配称作共产党员呢？

到底什么是政治路线问题呢？就是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方向与方法问题。任何阶级的任何政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战略），在这整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一定的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策略），同时，在每个阶段的总的策略路线之下，还有个别的策略问题。我们一般地讲到某个政党内部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分歧问题。立三同志等与共产国际执委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虽然这一分歧还根基于对于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但主要地还是对于时局估计和策略任务了解的不同；根据对于这种估计和了解的分歧，就产生出一条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另一条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究竟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否一致呢？我们再不拿多的理论与实际来阐明和解释，就拿维它同志写的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本身作解答就够了。决议第九项上说：“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中之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的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接着在决议第十项说：“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起义前提的斗争。”无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怎样用尽全力来证明国际与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的一致，无论此处所引证的决议本身在解释国际路线及承认错误上、还带有许多不正确性及外交性，然而即就这两段东西比较看来，我们已经有一十二万分地把握断定：是把两个绝对不一致而且相反的东西，强词夺理地说成一致！把这两段话详细看看，如果再去辩论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是否一致的问题，那不是有意多费唇舌，便是决心不顾真理了。

(二) 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维它同志等既然在三中全会上首先确定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还是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决定的，同时，又迫切声明：“决不变更党的路线”，当然在许多主要

问题中,都不能不继承立三同志的路线。

1. 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及目前世界革命运动新高涨问题,依然不了解;(乙)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一声不响,而且不懂得;(丙)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及中国革命与苏联相且关系方面依然只看到消极一方面,只看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而不见到另一方面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最有趣味而且最可证明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事实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这一部份决议底前一大部份文句,差不多完全是从联邦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联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底决议中抄录下来的,但抄的时候,它却只抄半段——例如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的那半段,而把另一段——说明更加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和增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困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更加革命化等等的那半段——丢掉了,以求与立三同志等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相吻合);(丁)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正确相互关系问题,只淡淡地指出:“只有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的公开取消派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以及“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亦是非常错误的”,而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的“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却默不作声,对于中国革命有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先进国和殖民地国家爆发、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

续的可能，依然否认！

2. 对革命转变及前途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国际决议所指出的转变条件、转变阶段的实际步骤，以及转变前途等等问题，都一字不提；(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一声不响；对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一省与几省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没有丝毫间隔的”的观点)，只淡淡然地说道：“是不清楚的、机械的”；(丙)在决议案的第八页上，维它同志等说到“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时，简直作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毫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维它同志写道：“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哈哈！看维它同志等怎样来推想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从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不仅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不能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推翻和国民党统治的死亡；而维它同志等推想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是国民党的统治是死亡日期一天天的接近而已。难道这可以作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的解答吗？！这样的观点，是立三路线的掩蔽者的观点的发展底必然的归宿！

(三) 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形势的估计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

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实质及原因问题，依然不了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决议第五段上，说到“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时，写了一大段，都只不过是说明革命运动发展在各个区域的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对于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却“忘记”了。这件“小事”的“忘记”或“疏忽”，结果便会产生出不加紧工人运动的危害策略。至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决议上一字不提，维它同志在结论中只说：“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而对于不平衡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各种原因一字未提，实际上就是不了解不平衡形势的特点和弱点；（乙）对于将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混在一起的理论原则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于时局估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一字不提，依然把它们解释成“名词问题”，依然继续着过去曲解共产国际决议及党六次大会决议的错误；（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时局估计时所犯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真正实质和来源，不加正确解释，只简单地说明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估量得过分”，企图用这些所谓“名词”问题来掩饰问题本身的真相，即掩盖对于时局估计时不从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不根据客观事实等等为基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估量的真相，以及因这种估计以致产生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的策略的真相；（丁）对于立三同志等在估计时局上把“主观”与“客观”绝然对立和完全隔绝的错误（“革命形势的到来，纯粹是客观原因，与主观没有关系”的立三理论），隐瞒不提；有意地或无意地模糊全党对于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就使同志们不能了解对这问题的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

(四) 对于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问题

1.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A 土地农民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
(一)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领导的所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法令上，及有些苏维埃区行动上所犯的“左”的错误，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和危害革命发展的过早办法，如：决定在现在即组织苏维埃农庄，强迫共耕，大私有经济的土地不分配给农民，绝对禁止土地买卖，不分配土地给雇农，红军兵士在全国苏维埃政权未建立以前不能分配土地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和打击；(二)对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个帮助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口号，不加以任何的打击；(三)对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联系宣传，根本不提到；(四)对于土地革命一定要使之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少数富农的这一点，只字不提；反而公开地继续着富农路线的要求和办法，在决议上说到苏维埃区域政策里，只含糊地写一条：“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不具体指出分配什么土地和怎样分配土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立三同志等对于富农问题，始终没有一点正确的辩证法的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或者联合富农以及完全不动富农土地的富农路线政策，或者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他始终不了解：在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中，可能要反对富农，但不可能消灭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

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这种平均分配土地当中,经过乡村雇农工会、贫农团及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运用和指导,不仅将富农所有的多于按照一般平分原则所应得的那部份土地分配出去,并且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民、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同时,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以避免混乱现时乡村阶级斗争战线的主要内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动摇中农的情意(关于这一个问题,请参看再版书后B部第1页)。

B 职工运动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过去忽视甚至反对雇农工会独立组织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打击;(二)对于有些苏区里一部份同志忽视工人运动,甚至反对工人群众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任何的斥责;(三)对于国际决议特别指出的“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这一条,完全删去;他不了解“工人生活的改良,要经过工会工作及阶级斗争中来求得,而不是简单地凭借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见国际决议),他完全忘记了和忽视了现时有些苏维埃区域对于职工运动问题不能容许的情形。

C 经济政策方面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有些地方实行的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的过早办法,如:绝对禁止贸易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二)对于军事需要及广大群众急需的物品(如煤、油、盐等)在必需时加以价格限制和由政府专卖的必要,以及对于投机怠工的工商业的处置,也未特别指明;(三)没有指出,在保障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利益之下,允许商业自由原则,而只是

笼统地说“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四)将国际具体指明的，征收统一累进税及阶级税(税捐应该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的我们阶级的租税政策，改成为一般空洞的“超阶级性的”“租税政策”。

这样一来，对苏维埃区域目前的几个根本政策，都作成了与国际不同的决议；所以虽然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接受了国际指出的苏维埃区域现在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和真正工农红军的任务，但实际上不能认真完成这些任务。

2. 对于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

A 对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

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国际决议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总同盟罢工的方针。”(见“国际七月决议”)维它同志在写三中决议时，却依然和六月十一日决议一样的说：“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党的任务是……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起义”。这两个说法在理论上在实际策略运用上，都是不相同的。国际策略是加紧领导、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同时发展政治罢工，以便真正创造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必要前提。立三、维它同志等的策略是：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

义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为的实现这些东西，不能不附带的联系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这种策略在实际上的运用，一定依然是所谓“只要大干，不要小干”，一定依然放弃和忽视工人阶级的一切日常的经济的局部的战斗，而空喊和盲目计划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实际上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在三中全会后，马上规定和计划实现北方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太原）和四大铁路（平汉、平绥、平奉、京浦）的总同盟罢工，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依然是以空洞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的计划，代替了实际上领导工人阶级各种日常斗争的艰苦工作。至于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将秘书所起草之号召广州起义纪念示威宣言上之“罢工、罢课、参加广州起义纪念和拥护红军示威”的口号中的“罢工、罢课”等口号取消，认为谁再提罢工、罢课等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继续，那毫无疑问地是一方面对国际路线的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另一方面是对立三路线的最露骨的拥护和继续。

B 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错误是：以为全国各地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的条件已完全一律地成熟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工作，便是马上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因而放弃和忽视了农民群众的一切局部的、日常的斗争的领导和发动。因此，国际此次决议特别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党另有特别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必须注重于推动一切后备军来帮助先锋队，但是，这里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从游击战争及地方起义做起。以后，仍然应当利用军阀之间一切部份的以及小的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逐渐引导他们到革

命的更高阶段，力争改善雇农的劳动条件、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减租与抗租，这些斗争都依然是中共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维它同志等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农民运动的错误，不加以指责，而依然只简单地提出“发动游击战争与地方暴动的任务”，不遵照国际指示来提出目前的工作主要内容和真正发动游击战争与准备地方起义的前提；以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是继续过去的错误。例如北方局领导同志在最近决议中，规定北方各省组织革命战争是目前中心任务，这毫无疑问地是直接阐发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议论。

C 对士兵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这一问题的错误是：无条件地发动兵变（或兵暴），以少数士兵的逃溃行动代替了瓦解敌人军队和夺取广大旧有军队到革命方面来的策略，将军队哗变看成与工农斗争、甚至军队本身斗争没有联系的行动；借口士兵运动中没有进行日常的为局部经济或政治的要求的斗争的可能，以为只有或者什么不动，或者拖枪逃跑，以致使敌人便利地消灭了敌人军队中的革命力量，放弃了广大军队工作。所以，国际曾经再三地指出过去这种兵运策略的错误，指出他们根据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日常部份斗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瓦解和夺取敌人的军队——尤其是使敌人主要部队能在革命最紧急的决定胜负的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例如进攻红军的敌人队伍投降红军，重要城市的敌人军队响应红军和工农武装起义等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的目前工作，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兵

变做起，而是加紧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加强使士兵群众革命化的工作，使兵变成为广大士兵群众投奔革命民众的行动，成为工农兵武装起义的肌体的一部，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同志这一错误，未加以严厉的打击。

此外，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指示的几个重要策略问题，都几乎完全置之不顾。(一)对加强反帝运动问题——国际决议曾郑重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险，尤其是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表示畏缩的危险，要求中国党加强领导广大中国民众的各种各式的反帝运动。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几乎是日有所闻；然而立三同志等却未能抓紧一件事变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这是极端错误的现象，维它同志等却轻易地将这件“小事”忘掉了。在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一个同志所起草的苏区工作计划上，也没有提到关于反帝运动的重要和策略，这无疑的是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没办法的错误表现。(二)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境内有几千万回、蒙、藏、苗、满、瑶等小民族，这些弱小民族，不仅同样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还受中国军阀政府的压迫和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这些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中国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及目前事实上都表现得异常明显。所以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特责令中央加紧注意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并准备具体的民族问题的政纲交第七次全国大会。国际屡次关于中国问题指示，均特别指出正确地提出中国境内弱小民族问题的策略的必要；此次来信并特别唤起中国党注意环绕中国周围的安南、朝鲜等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然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个问题依然一声不响，依然客观上表现出继续李立三同志的“我大汉民族主义”

的错误。(三)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问题——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是:(甲)将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别,都一律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乙)只指出取消派与改组派在政纲上没有分别,而不指出取消派躲藏在假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旗帜下,企图从工人内部来破坏革命是更加危险;因而不能使全党对于反改组派反取消派的斗争,有异常明显的坚定的和系统的认识与办法。而维它同志等在三全文件上,却将改组派取消派等称作“企图在反革命与革命间占一席”的所谓第三派,显然继续着过去立三路线的错误。

对于这一切主要策略问题,维它同志等都作下了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以至继续的错误,所以使三中全会不能完成执行国际决议的任务。

(五) 对于长沙事变的估量问题

红军和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大的胜利,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汇合的英勇企图,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部份开始。长沙的占领,是因为在全国革命运动一般高涨及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湖南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长沙的退出,部份地是因为立三同志领导在事前及当时没有争取和保障这一胜利的决心、准备与布置。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力量已经在相当期内准备和增强起来,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轻易错过第一次长沙胜利的机会,暂时松懈了群众斗争的情绪,轻易放过了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正确与否,对于目前策略的决定,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依然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的

错误：就是一方面，轻视这一事变的意义，认为长沙“第一次进占而又退出”，以及“第二次进攻不能得到胜利”，“是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一回事（见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却又故意暗中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的正确，认为它是“进兵的斗争”——“它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第一种估计的错误，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的观点，是与过去立三路线一般轻视长沙占领事变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没有两样；第二种估计的错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为“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失败的广州起义所谓“退兵的战斗”的反面（维它同志正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右倾观点，因为所谓广州起义是退兵的战斗的意义，是指它的失败结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高潮；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开始了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那末，就是承认在占领长沙前，中国还没有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第二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全国革命爆发的开始，却并非一省与几省革命的发展（维它同志等又恰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以为长沙占领后应该全国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的“左”倾观点；因为如果对于长沙事变撇开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而一般地提出全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的问题，无疑义地是承认在长沙占领时已经成熟了全国革命形势。至于有人以为长沙胜利的未能持久保障，恰已经是证明国际决议上所指出的：“已经看见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份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的正确，换句话说，就是以为红军退出长沙这一事变，已经是革命新高

潮部份失败退却或暂时沉寂的表现，毫无疑问地是对于国际决议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

(六) 三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维它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利用国际指出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正确指示，来作掩护“左”的盲动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护符，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只轻描淡写地说成“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而把“左”的盲动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来源，解释成“只看见少数先进份子的情绪”；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以为中国经济只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应反对资产阶级，忽视农民战争的意义和作用，忽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忽视赤色工会作用，拒绝在黄色工会内进行斗争，尾巴主义……等等），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对于某些个别领导同志在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斗争中所采取的动摇调和的态度，未加以任何的指责；对于立三同志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底罪恶行动与侮辱国际底事实，未加以丝毫的举发和申斥；对于因立三路线的冒险策略失败后，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则将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引起与加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失败情绪、消极、沉闷、无出路等等）的事实，未加以严重的指出。而在三中全会上，竟补选○○、○○等同志为中央委员，○○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是李立三第二，是南京、镇江、上海儿戏暴动底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江、浙、皖三省工作损失的主要负责人；在组织上及工作方式上是实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反对任何自我批

评的最好模范！○○同志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发挥者，是执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最标本的一人。然而○○、○○等同志，竟在三中全会上不受到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制裁，反而得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尊信；立三、维它同志等始终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方法，经常不了解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经常把党内许多原则斗争曲解或劣化成无原则的斗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最近几月来立三同志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非布尔塞维克方法（把同志们正确意见书隐藏起来，反而在会议上和党报捏造一些与正确意见书完全相反的意见，妄加同志们以右倾机会主义者头衔……如对陈、王、秦、何等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意见，河南问题对列夫（即陈原道）同志处罚等），不仅不加以指责，反而继续和扩大这类错误。这些都毫不足奇，它是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等政治错误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六 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 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 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

三中全会闭会已经两月了，就连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的组织，也还未有接到和讨论国际的决议。三中全会前，维它同志等把国际决议隐藏着不发布出去，说要候三中决议一齐发出去；三中全会后，依然不发，说要候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一并发下去；江南省委决议也出来好久了，然而国际决议依然还是停滞在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处里，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各区区委最好的不过是刚才得到国际七月政治决议；至于支部，则国际决议根本没有得到，讲到讨论国际决议和根据

国际决议来真正检查过去工作和实行目前彻底的转变，是根本没有做过。上海的工作，除了不得已停止暴动及取消行委组织以外，没有任何变更；而行委取消后，成立了广暴纪念筹备会的组织。这一组织名义上已经不是党、团、工会三者合并的组织，但是实际工作，依然是为纪念而作纪念工作，脱离经常工作，脱离厂内斗争，只有上层号召，没有群众基础的架空组织。一切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依然是照旧一样。工作情形是“九一”比“八一”坏，“九七”比“九一”坏，“双十节”比“九七”坏，十月革命纪念节比双十节更差，已经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立三路线还继续在上海一部份领导同志中占主要地位，而且继续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例如一个区委负责同志，平时不作经常工作，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一天的晚上，才急得自己出马，拿一包传单在马路边散发，引起四、五个工人的注意和拾看；这一件事却受省委负责同志大大赞扬。因为立三路线继续发展和国际路线不能传达到一般同志及广大群众中去的缘故，结果便发生许多同志的消极、沉闷、无出路的情况。因为他们一方面听说过去错了，但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现在工作还是走不通，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好。于是一部份干部，还在那里拚命努力埋头干，总想干得好结果出来，但依然是费尽心力，得效甚少；另一部份在那里找不到正确出路，只有敷衍工作；甚至两月以来，上海同志离开工作或离开组织逃跑的，竟达数十人之多——这种对革命怠工和开小差的现象的来源，一部份固然是由于这些份子中有些人的“半途革命家”的劣根性，另一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确有一定的作用。这一些现象，不能不使每个布尔塞维克党员得到警惕，警惕到因党的立三路线领导破产而同时国际路线又被隐蔽起来不能传布到全党中去，以至延续着党的混乱的现象；警惕到怎样唤起全

党来健全党的肌体。

二 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

长沙事变后，中国军阀战争已经部分地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感觉到革命势力猛进发展的威胁，于是便在张学良出兵的局面下，造成暂时休止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境况，以便反革命势力得以一致地去进攻苏维埃区域。我们只有认识进攻红军是反革命与革命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是目前政治生活中第一等重要事变，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固然不因敌人的进攻而抱消极悲观的观点，但另一方面绝不能取淡然视之的乐观态度。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这是目前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危险，我们必须设法战胜这一危险，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危险。就是我们必须向苏维埃区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广大劳苦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意义，鼓动他们积极起来以无限的觉悟、勇气、决心与战斗力来回答敌人的进攻，必须遵照国际决议，一方面在苏维埃区域，彻底执行正确的苏维埃的政策，以使用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战术（在政治上、军事上）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另一方面，在反动统治区域，加紧号召、发动、组织和领导工、农、兵、贫民、少数民族的一切部分的发动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如罢工、示威、不运兵、不运械、不造枪弹打工农红军、游击战争、地方起义等等行动来捣乱敌人后方和牵制敌人的进剿。但是维它同志等因为根据着自己的反国际路线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又完全错误了。维它同志在起草中央第十二号通告时，分析敌人进攻红军意义说：“事实上他们进攻红军，正是‘肃清后方’以准备新的军阀混战的一种步骤，甚至于各派军阀正在共同进攻红军的时候，也

有开始自相冲突的新的军阀混战的可能。”这种陈独秀的向导式的分析，陈独秀式的对于中东路的分析，不但不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警觉，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反而麻醉和模糊了群众的警觉，妨碍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和组织群众与反革命斗争。在维它同志等这种错误分析的领导之下，江南省省委常委领导同志在三次常委会上，认为现时军阀内部的冲突大过红军与军阀的冲突，即是认为反革命内部的矛盾目前还大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这真是十足的非阶级的观点。在这样一种严重错误认识之下，那里会谈到真正鼓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冲破敌人对于红军的围剿？在反动统治区域里，我们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红军的情绪和行动，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至于苏维埃区方面，如果按照维它同志等所决定的一切苏区政策去做，则是完全仍违反国际指示而继续立三路线，当然难于战胜敌人的围剿。这一切都切实证明：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

三 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来信，是彻底暴露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性。维它同志等接到这一来信后，应当如何诚恳地承认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否认有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调和以至继续立三路线底错误。然而维它同志等却不这样做，维它同志等在国际这样严厉来信的逼迫之下，不能再不承认过去有一条以立三为领导的政治路线，然而他们却不诚恳承认：（一）立三路线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暂时占过领导地位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曾经在政治局里

“占着优势”底路线。(二)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路线不能并存的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路线”。(三)不公开承认立三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尽力掩盖错误，是非布尔塞维克态度，反而认为：“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三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见中央印发的立三发言)，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员检查工作和批评错误，而是一个乡下的臭讼事在县公堂上搬弄字句的态度，他把他的政治路线错误，解释成无足轻重的错误。他拿些什么“了解机械”，“不了解今天”，“不了解过程”，“只看见前途”……等等名词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再想不到他这一路线错误如不公开揭发出来，对于党和革命本身有如何深沉的危害，他只顾到他自己和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所谓个人“威信”！(四)不公开承认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反而认为：“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五)不公开承认要立刻在国际来信指导之下来接受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而坚决地说：“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错误，解释成为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的反国际路线的供词，因为国际来信的根本用意，就是要求立三同志等改变自己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地代替着李立三等说话，因为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人，才说要求变更中国党的路线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是退守的路线。(六)国际来信说：“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争论’(维它同志等

把它改为“讨论”)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的积极党员,完全明白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际,解释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这一段话的本意是(1)立三及立三路线的一切忠实拥护者,对于立三路线错误问题,再不要固执己见地来掩护和辩论,应该无条件地向全党宣布和承认,以免引起党内的争论而致妨碍了实际工作。(2)中国党的积极党员,应该积极起来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使全体党员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而维它同志等却故意曲解国际来信这一段原文的真义,把它解释成为立三路线问题,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只限于解释工作,只要解释一下便算完事。事实上就是真正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领导同志维它等是担当不起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了解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放弃对于立三路线的拥护态度,以避免引起全党争论!(七)国际来信是给全中国党同志的,维它等同志却决定只把它发到各地方党部;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部,现在还只负责同志见到,顶多也不过区委书记见到,一般同志还不晓得有这样一封信。这种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态度,怎能不引起所有布尔塞维克党员愤激和警惕!维它同志等起草的政治局这一决议,只是在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危机,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因为现在政治局的主要领导者,一部分是立三同志的忠实拥护人,另一部分(维它等)是曾讨论和同意过国际决议的人,这些人在相当时候以后,马上换一副面孔来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他们在

同意国际决议后，依然布置全国各大城市的起义，还下命令二次进攻长沙。他们在三中全会上曲解国际决议来继续立三路线，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及三中全会后都拚命否认中央政治局内有过暂时地占据领导地位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国际路线。直到国际最近来信时，他们又作出这样掩护立三路线的决议，他们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这样一来，便使维它同志等领导表示出不能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底危机，因而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

3 结 论

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坚决断言，以立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因为对于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有了模糊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党过去的一部分领导者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陈独秀）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底影响残余，因为在六次大会后党的领导同志犯了许多个别策略的错误，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工作经验的缺乏，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历史阶段上，便产生出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领导者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开始形成于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上，正式宣告破产于长沙事变及在全国儿戏暴动的布置上。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因立三路线而产生的党的领导的

深刻危机，有引起党的危机的可能。为着尽党员对党应有的职责，为着负革命者对革命应负的使命，中共所有的积极党员，应该大家一致起来，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以预知党和革命的危机，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

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份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关于立三路线的信）印发给全党同志。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

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尤其是九十一号、九十二号通告——无效，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并且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4 再版书后

(或对小册子的补充)

当着这本小册子再版的时候，我想在所谓“再版书后”中说明下列的几部分问题：

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得不充分，或者说的有错误地方以及未曾说到的那些问题；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三，目前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利用相当机会来说明这几部分问题，不仅是为着要相当满足许多留心中共两年来党内斗争的同志们底要求，而且

对于我自己也是一课有益处的学习。

一 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

A. 补充说明的问题：小册子中写得不充分的问题，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二）关于中国经济特点问题，（三）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四）关于中国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此处所说的“不充分”的意义，是说小册子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有许多不大清楚或重要遗漏的意思，而并不是说这几个问题未能从各方面发挥尽致；因为小册子在当时是为着作反立三路线的提纲而写的，为秘密环境限制及节省读者时间计，小册子中的各问题都只能限于提出问题和简明回答，从各方面把各问题详细发挥，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中曾经着重反对立三同志的美英资本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前有不同的趋势（前途）的理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未曾进一层指明立三同志对这个问题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于他根本不了解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不平衡发展的了解，实际上是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了解一样的，他把“资本主义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状况发展底水平底不同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混淆起来”，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便走到否认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有力的事实，因此而走到完全否认在单个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离开布尔塞维克党、离

开革命的道路。立三同志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企图在“第三时期”这面盾牌掩护之下，去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底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介绍给中国同志们，是一件非常必要和异常有益的事。究竟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的结论中说：

“究竟帝国主义底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本成份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这样一回事，即是世界被帝国主义各集团已经分割了，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自由的’、未曾被占据的地域，为的占据新市场与原料来源地，为的扩大它们——那就要用力量从别的国家手中去抢夺。第二，就是技术底空前发展与资本主义各国底发展水平底均衡性加强，造成了和便利了某一群国家突进式地赶上另外一群国家底可能，就是比较弱些（但是很快发展着）的那些国家能够赶上另一些原来比它们强些的那些国家底可能底事实。第三，就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间旧有势力范围底划分，每次都与世界市场上新势力关系相冲突，为的造成旧有势力范围与新的势力关系之间的‘均势’，就发生了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来定期的重分世界的必要。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便加剧和加强了。因此——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没有用和平办法解决的可能了。因此——考茨基所宣传的可以用和平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的超帝国主义底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反对派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加剧和加强，便走到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地步。这些就是在帝国主

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特质。”

斯大林同志对于列宁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的正确说明，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了解，才能产生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可能底坚决信心与万分勇气，才不致于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泥坑中。当然，对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当基础的同志们，仅仅看了斯大林同志这种基本扼要的说明，还难于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内容的实质，还需要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问题的研究，然后才能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明的理论基础与实际内容。然而，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去研究列宁主义，毫无疑问地是绝对正确和绝对需要的一回事。

(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异常重要而且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不仅托陈取消派、新月派以及那些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特别造出许多武断的中国经济分析(如“中国没有封建余孽存在，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托陈派)“中国土地过多，中国没有土地问题”，(胡汉民、戴季陶、陈公博、汪精卫等)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论是“海外奇谈”，(胡适之等)……)来曲解中国经济性质的特点，来企图作为自己反革命工作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常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分歧意见。我的小册子中指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指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指明封建剥削占优势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的说明中，还没有做到异常扼要和显明，而且在有些字句中或许还有使人误解或难解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把共产国际决议及斯大林同志说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明正确的分

析,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异常必要的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情形问题的决议案中,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说:

“中国现在经济状况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的系统的复杂,从财政资本起到氏族社会性的经济残余止,同时,在城市和乡村中,商业资本底各种形式与小手工业及手工工业占有极大的地位。”

“中国乡村经济代表着半封建性的许多残余与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成份最密切地纠缠起来的一幅画图。”

在中国经济分析中,除了少数被帝国主义豢养的所谓学者之流的胡适等而外,对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民众以及使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但是,关于商业资本及封建余孽问题,则直到现在还是托陈派等等拿来作反革命投机事业的武器,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武断宣传还不免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某些幼稚的同志;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明,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很必要的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问题中,对这两个问题有非常明白的答复。当时的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狄克同志断言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斗争,反对封建残余还没有反对资产阶级厉害是不对的?能不能说,商业资本或者封建残余在中国统制着?为什么军阀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主而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

“拉狄克同志的确说过象你们在问题中讲的那些话。据我记得的,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发言里,或者完全否认封建余孽的存在,或者不承认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有严重的意义。这当然是拉狄克同

志底很大的错误。如果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如果这些残余对于中国乡村已经没有严重的意义，那末就没有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末，就说不上了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乡村中有没有商业资本呢？是的，有的。不仅仅有的，而且它吸取农民的血汗并不比封建主们差些。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特别地混合着，它学地主一样用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方法来对付农民。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统治与商业资本在保存对农民底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压迫方法中混合着这个特点。军阀制度、督军、省长各种的和一切的现有的混蛋的、强盗式的、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官僚们，就是在这个特点上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物。帝国主义帮助这一部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有些军阀有很多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这件事并不能根本变更事实的本质。许多俄国地主在以前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的企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许多区域的农民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交付地主及绅士；如果地主操着经济方面、行政方面和法庭方面的实权；如果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省份有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就应当承认，在这种中世纪环境中占着统治力量的是封建残余的力量，地主的力量，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与商业资本特别地混合着的那种地主官僚的力量。

这些特殊条件，就造成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将来更要发展的农民底土地运动。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与封建压迫，在中国就没有土地革命的问题——关于没收土地等等的问题了。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土地革命便成为不能了解的东西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段说话，不仅把中国经济性质方面引起争论的问题给了一个完全清楚明白和绝对正确的答复，而且把这种经济分析争论中所包含的真实政治内容的分歧，作了一个简单的答复。我们从斯大林同志这段谈话中，不仅可以了解拉狄克及与他有相同观点的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特性不懂得错误，而且可以了解这种经济问题争论中，包含着革命的与反动的政治实质。斯大林同志及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和结论，由中国千百万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英勇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等行动所证实，由中国好几省的一部分领土内存在和发展着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来证实。而且我们相信，还要由现在和将来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来证实。拉狄克的这种理论已经由国民党、托陈派、新月派、社民党、国家主义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所采用，他们用它来反对和嘲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百万工农英勇进行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

李立三同志等所讲的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与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所讲的根本不同。第一，李立三等不了解中国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简单地笼统地以“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等名词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无论在理论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第二，李立三同志等在所谓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这种笼统定义之下，实际上走到根本完全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畸形发展的事实，这种错误的实际政治内容，在小册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

题,对于革命运动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这一点,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除了立三路线否认这一事实外,很少引起争论,所以用不着多说。至于论到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我们的队伍中,则不免时常有不同的了解。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委的正确了解是:第一,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时常表现不一致(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上海及广州、香港工人运动异常高涨时,农民运动当时还很薄弱;当一九二七年湘、鄂、赣各省农民运动勃发时,许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等——的工人运动因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与农民运动同时并举……等等);第二,当许多农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区域里已经勃发着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运动时,但最主要的中心城市里的工人斗争,因主客观许多原因,还未能发展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居民,参加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社会成份,最大多数是农民;而最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未曾和未能直接卷进这一运动里去。但是这绝不是说:第一,中国农民革命性比中国工人要大些;或者中国工人比起农民来要落后些;第二,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运动,只是纯粹的所谓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阶级参加和领导的。然而在我们队伍里有时有个别同志们,不免有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过分夸大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的说法;这使得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

他们根据着“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是纯粹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企图来作出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底特殊革命性的理论,这理论的实质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农民革命性抬高到第一位,使无产阶级由对农民的领导地位降到农民的助手之一的地位;因此(这是必然的)便在实际上

走向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前途有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而认为前途是要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这类同志企图曲解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相互关系的说话来作为自己的特殊理论底基础。他们说：斯大林同志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演说），曾经说过：“民族问题从其实质上看是农民问题。”不错，这句话的确是斯大林同志说的。然而斯大林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没有农民的这支队伍，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见斯大林同志的同一演讲）但是，这是不是说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是合而为一的东西，或者说农民问题便包括了民族问题的全部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同一演讲中说：“不能把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合而为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农民问题以外，民族问题本身还包含有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等问题。”很明显的，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法，只是反对谢迷七不把民族问题看成实际上是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特别着重指明农民部队在民族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说法绝不能被曲解成“民族问题即农民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只是简单的农民运动等等，尤其不能解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有超过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即就中国革命本身讲，斯大林同志把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看成决定革命胜负的问题。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演讲中，斯大林特别讲到中国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曾特别着重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特殊革命性——超过于工人革命性的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害是

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国——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农民的阶级特点的观点的正确，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两重性——劳动者与小私有者两重性；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所以它和小资产阶级其它阶层一样，不能有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用；因为它是劳动者，所以它有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可能；但因为它的两重性，所以它的革命性能够发挥到怎样程度，以及农民革命能得到怎样结果，首先要看那个有独立政治作用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农民取得领导权。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去多论世界革命运动史上的经验，只略举中国最近的历史事变，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足以创造新社会制度的独立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作领导，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终于不免陷入一般农民暴动的悲运——以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始，以“改朝换帝”继续旧社会制度终。义和团是自发的带着浓厚原始性的农民革命运动，因为当时没有独立的先进阶级作领导，结果被中国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利用，并被它们勾结与投降帝国主义一同压迫下去。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虽然是广大农民参加的运动，但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不能起来独立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结果农民群众被自由资产阶级叛卖了，没有得到革命的真实利益。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充满着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领导权，并且创造下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实际基础的历史。正因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经过自己先锋队——共产党的政

治活动,取得和奠定下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所以才产生了自一九三〇年——现在正在向前蓬勃发展的苏维埃红军运动。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农民战争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中,不会产生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政权的红旗是广州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底用武装起义力量第一次举起来的。广州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我们有一切事实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现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它的领导者。举几个例说:

1. 中国苏维埃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上,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在各级苏维埃政权选举中被选额数的特权,并且公开地承认这是实际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参加和领导作用,承认以此来保证苏维埃政权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2.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唯一领袖;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组织中,中共不仅有政治上的绝对威信,而且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占领导地位。

3. 在中国主要红军部队中,工人成份(安源矿工、景德镇磁器工人、铁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等)有时占很大的百分数。

4. 许多人以为现在苏维埃区域只是农民的区域,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手头没有最近的具体统计材料,且把一九三〇年夏季日晖同志关于一九二九年秋季赣南各地情形报告作一个参考:

(A)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

县名	人数	成份		
		工人	农民	富农及其他知识分子
兴国	350	10	50	40
都	270	10	60	30
安远	70	40	50	10
寻邬	300	15	60	25
信丰	120	20	60	20
南康	80	10	60	30
上犹	60	5	50	45
赣州	60	50	40	10
大庾	60	80	10	10
宁都	200	10	70	20

(成份以百分数计算)

(B)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赤色武装组织社会成份统计表：

县名	成份		
	工人	农民	其他
兴国	5	70	25
都	5	55	40
安远	20	70	10
万泰	10	60	30
南康	10	70	20
寻邬	5	70	25
宁都	5	70	25
崇义	10	70	20

(以百分数计算)

这两个表当然只能作参考材料，因为它们已经是过时的旧东西。在当时赣南各县不仅城市还未被红军占领，而且许多乡村还不是苏维埃区域。最近两年以来，我们江西、湖北、河南、福建等红军，已经占领过许多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江西的吉安、赣州、安远、景德镇、宁都、兴国、瑞金；福建的龙岩、漳州、永定、上杭；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岗；河南的光山、潢川、固始；安徽的六安、寿县、正阳关、凤台、凤阳、霍丘……等）；在这些城市中，不仅有很大数量的手工工人、苦力、车夫等，而且还有些现代产业工人——如矿山、邮务、电话、电灯、汽车、印刷、建筑工人等等；虽然有许多城市（如赣州、吉安、漳州等）我们占领的时间不久，虽然有许多城市，我们因战略关系，早已自动退出，然而，最近两年来，工人成份在我们党与群众组织中的数量和比重，毫无疑问地相当增加了。而且即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赣南统计表看来，那种所谓现今中国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的说法，已经是毫无根据。此外，还有一个最近的统计材料，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在苏区中的领导作用。据一九三二年二月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党的省代表大会，共出席三二六人，其中有二五个工人，七五个雇农，换句话说，即无产阶级成份约占百分之三十。大会总结，选举省委员会正式三十一人，候补十一人；正式委员三十一人中，有生产工人四人，雇工及零工十七人，占全体三分之二以上。

至于苏区现有的苏维埃底政权形式和工农红军底武装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方式，革命竞赛、革命突击运动及轻骑队等等许多先进工作方法，无一不充分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在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此外，谁都晓得，中国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虽然还未能达到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底胜利，虽然他们对于苏区红军的

领导和赞助,还表现得不够实际上的需要;然而他们曾经用过许多方法去加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上海、广东、武汉、长沙、安远、景德镇、武长路、粤汉路、平汉路工人们,曾经在中共号召和组织之下,选派自己最好的干部,到苏区去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干部,曾经举行过集会、示威、募捐、成立红军友谊会等组织来拥护红军,曾经经常地不断地举行英勇的艰苦的罢工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起义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见共产国际执委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从这种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断言,现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底迅速发展和胜利,不仅是那些苏维埃区域里面工农联合及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结果,而且是苏区工农群众受中心城市工人革命斗争影响及帮助的结果。当然,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和胜利,同时又影响、推动和帮助中心城市工人的革命群众斗争底扩大和深入。只有这样去了解问题,才能正确了解中国工农斗争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了解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意义何在,才能正确了解共产国际所指示的中共在苏区与非苏区里面“两位一体的”的各种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和判断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当然,这里绝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取得和巩固了,争取、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是在非苏区的主要任务,同样是苏维埃区域中的主要任务,同时,这里也绝不是有丝毫轻视中国农民革命作用的意思,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动力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大的主力军,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这一切,只是说现在苏维埃运动,不是纯粹农民运动或没有无

产阶级领导而已。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当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如秦同志等)被立三同志等停止了一切工作,我们简直没有知道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的工作情形的可能;另一方面,在许多苏区里,因为立三路线的工作错误的掩护,许多反革命派别还未能及时地揭露和爆发。因此,小册子中关于这个问题未能特别提出讨论,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讲到了立三路线对于苏区及红军危害时,个别地附带地说到过,未曾一般地说明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及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系的各个问题。目前利用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苏区内部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的各个根本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或者对于许多同志了解苏区内反革命派活动及怎样与之斗争等问题有多少的帮助。

我们苏维埃区域内部有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并且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一部分所谓“共产党员”与“少共团员”,这并非什么偶然的或者奇怪的事。这些反革命派别产生和活动的原由,首先是由于苏维埃区域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化和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激剧变动。在我们苏维埃区域里,进行着激进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军阀、大买办、封建官僚等)的财产被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富农的土地被重分,在重分时,只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等)得到一定数量的质量较坏的所谓“劳动分地”,在有些资本家的企业中开始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到中农、贫农和雇农手里,工人群众得到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空前未有的新权利(八小时工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选举中的特殊权利;出版、言论、集会、罢工等自由),苏维埃政权带着显明的工农革命民

主专政的性质，一切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豪绅、富农等等的原有政治特权完全被剥夺了，而且失去了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一切政治自由的权利。工农红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失去了武装保护自己血腥利益的权利。苏区在革命前与革命爆发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世界。这样一来，不仅把苏维埃区域内部的阶级斗争紧张剧烈到前此未有的程度，而且把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紧张剧烈化起来。苏维埃区域内部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们，那些失去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的老爷、大人们，用一切力量来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受伤了的野兽十倍地发狂起来拚命报复，被打倒了的统治阶级百倍地拚命起来挽回命运”；非苏区内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们，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在苏区里遭受的命运，更加十倍地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来痛恨工农群众，他们不惜用一切最残酷最可耻的手段，来对付苏区与非苏区的劳动群众，企图以此来消灭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和保持住自己的“财产与生命”。苏区与非苏区的压迫者剥削者们，加十倍地努力去反对在苏区统治着的工农劳动民众，这就是苏维埃内部反革命派别活动的主要来源。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们，反对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是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的。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隐蔽形式，是中国地主资本家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露骨行动。然而反革命从经验中学得了教训，就是仅仅从苏维埃区域外面来实行所谓“围剿”、“大举进攻”，是很难收到结果的。于是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们，便极力企图用一切方式组织起来，在苏区内部进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阴谋——从造谣惑众直到反革命暴动等等，来响应国民党的“围剿”；帝国主义者

与国民党更动员和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别，到苏区去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结合起来，以便统一和集中“剿共”行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为的反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一切革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不仅使用一切白色恐怖手段，不仅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处设遍军警侦探机关，而且在南昌特设一个总指挥机关（由杨永泰、段锡朋等主持）专门组织和接济各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活动。这些反革命派别的名称虽然不一致——江西 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湘鄂西改组派、湘东南恋爱研究社、鄂豫皖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各地的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等，他们活动的口号虽有时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A.B.团的口号是：“红军终归靠不住的，我们大家总得想个法子，免得失败了杀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反对没收土地，实行二五减租”、“打倒第三国际，拥护第二国际”、“拥护苏维埃，打倒共产党”……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实行二五减租”、“改组国民党”等等、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等口号是：“红军是土匪”、“组织新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方法虽然因时因地而变更——例如暗杀党和红军负责领导人，造谣中伤党和红军的干部，散布红军失败的谣言，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大和“恩惠”，经过医生设法用毒药毒坏党和红军负责干部的头脑，捣乱后方，故意破坏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威信，鼓动农民“反水”，替白军当侦探、送消息，阴谋暴动响应白军……等等，但是，他们都是直接受国民党南昌总机关指挥的，他们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活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消灭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工农群众组织，使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在苏区恢复统治，预防非苏区反动统治灭亡，使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永远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使中国人都作亡国奴。帝国主义

者与国民党，不仅派遣一些侦探设法混到苏区内部的各种机关中去，苏区地主残余及富农资本家等，不仅尽量设法钻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红军、工会等等组织当中去，就是原来偶然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那些“半途革命家”们，当着这种阶级斗争紧急关头，也必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悲观、失望以至投降反革命营垒方面去；这并没有丝毫奇怪，这首先就由于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阶段的原故，有些高兴一般反帝口号和反对封建军阀口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们，在某种革命运动中，也可以混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但是当着真正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创立工农红军的时候，同时，当着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发现许多艰难、困苦和复杂条件的时候，这些“半途同道者们”便不可免的要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垒中来反对革命。斯大林同志还远在一九二六年底，在他所写的经过联共中央同意的、为宣传鼓动员用的提纲上，便指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困难；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将比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多多少。”（着重点是我加的——韶玉注）

这类阶级异己分子和害怕革命困难的分子们，当着中国苏维埃新高潮与日俱长而同时又暴露了革命过程中许多严重困难的时候（例如对帝国主义斗争，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创造和巩固红军，实行苏区与非苏区“两位一体”的任务，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有些人便公开地投降反革命营垒中去保护自己原来的阶级利益和另找出路，有些人虽然仍留在共产党内，却不自觉地执行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奸细作用，属于前一部分人的，在苏区内便是那

些干 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等勾当的假共产党员；在非苏区内便是那些干帝国主义侦探生活的顾顺章、任卓宣、傅胜蓝、廖划平、韩麟辉、王拙夫(唐虞)等一般下流无耻的家伙；属于后一部分人的便是那些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党路线和组织反党派别的分子们。不仅罗章龙派是直接响应敌人进攻红军和共产党的产物(这一点以后我们亦说到)，就是李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也是反映出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苏区反革命各派活动问题上，最容易看得明显。大家都记得：当李立三路线在苏区还占重要地位时，客观上掩护着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和发展，使反革命派别，有公开地利用当时党的口号来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可能(例如因立三路线忽视建立根据地及巩固红军任务，使反革命派别各处易于鼓惑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不相信自己胜利的情绪；反革命派直接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立刻打武汉，打到南京”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在当时一方面可使红军受到损失和失败，另一方面可把苏区根据地轻易让给地主富农来“复辟”——夺回土地和屠杀工农等)，因此，使许多地主残余和富农分子，都能在立三路线极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下，混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和红军中——甚至一部分地方苏维埃和地方党部团部领导机关中去，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立三路线在苏区对反革命斗争的实际，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或者发起狂来拚命大干一下——只知道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不懂得分别首从，不懂得对受反革命影响和利用的那些分子做思想上教育、说服的工作，当然，更不懂得加紧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加紧苏维埃政权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政治教育、自我批评和群众创造性……等等，是揭露和克服敌人在我们内部奸细的有效方法之一了；或者冷淡消极、

什么不干——如开始时根本没有肃反的专门组织——政治保卫局等和系统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全党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转变。中央为着保障和加强国际路线在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正确执行，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成立了中央一级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等），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曾经举行过全区的、全省的、全县的党和团代表大会，加强和改造了各级党与团的领导机关；改选和改造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扩大、加强和巩固了赤色工会、贫农团、反帝同盟、万国革命者救济会等群众革命组织，特别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上，巩固和扩大了我们的工农红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苏维埃区域，在最近一年半的过程中，才得到历历可数的成绩：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和巩固起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法令、建设红军提案……等等颁布和实行了，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对立形势更加明显和剧烈了；两个中国制度的斗争，成了决定中国一切政治生活底第一等事变，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都被冲破了。苏维埃中国的领土扩张到原有的好几倍以上而且巩固了，许多分立的零碎的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打成一片了，工农红军的数量增加了，质量大大地改善了，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相当地增加了；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一般地正确的解决了，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在全国劳动群众的心目中的威信，不可比拟地扩大和提高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逐渐成为全中国民众日益相信的口号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各苏区的一切反革命派别都被暴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被发觉和打倒了，如

江西的肃反胜利，闽西的驱逐傅柏翠事变，鄂豫皖的肃反胜利，湘鄂西肃清改组派的斗争，广东东江的破获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阴谋等等。在我们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别，都被广大工农群众的威力和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所压倒。当然，反革命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将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向前加深扩大程度而更加不可避免的重新发现。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获得宝贵的斗争教训和创造了相当的战斗基础。固然，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作过许多错误，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是，在我们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在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队和工农红军忠勇奋斗的条件之下，在千百万工农劳苦民众的觉悟力、创造性、组织力和斗争决心勇气与日俱增的条件之下，一定有克服一切反革命派别组织和活动、而最终地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可能的。

B. 纠正说明问题：小册子中写得有错误地方的，据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二）关于长沙事变估量问题。

（一）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在小册子中讲到土地农民问题时，根据四中全会后中央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材料，我们应当指出有两个问题写得不对的。第一问题，关于“没收富农土地”问题，小册子在批评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错误时曾说道：“（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立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擅自在共产国际政治决议上自加括弧，这是对的；因为国际政治决议原文上，的确没有这个括弧和括弧内那句话。第二，说维它同志等加这括弧

的用意，是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因为立三、维它同志等，从来不仅不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公开主张联合富农；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几个月，维它同志在中央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的指示，便是事实上最好的证明。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但同时主张富农在其土地被重分后，在不作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一部分质量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上，完全采取了共产国际及中共这些主张。这种办法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富农主要地是用半封建剥削方法去出租自己的土地来榨取大量的地租，重分富农土地的办法，在目前主要地还只是彻底肃清封建余孽底土地革命中的一种步骤；所以我们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分给富农以一定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与立三、维它同志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能够消灭富农的观点，也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小册子上说：“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段话，从现在看，有下列几点错误：第一，未能真正抓住维它同志等关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核心，维它同志等所写的“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这个口号的错误实质是：（一）未写明“没收一切地主、寺院、教堂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见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而只说没收地主土地；（二）未显明说明“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见同上决议，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及政府机关对于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

什么人的问题有明确的了解，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坚决起来纠正当时在分配土地上底那些不正确企图（或者妨碍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主张把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农民所有生产工具为原则来分配——见同上决议）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当时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各苏区各有不同的办法，其办法有时并不与国际决议所指出者相同。第二，我所写的那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从现在正确观点看来，是那时候一种不正确的流行的口号。其实，它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口号。当然，我们每个列宁主义者都懂得：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种办法的真实意义和内容。这种办法，从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观点看，是革命的，从社会主义集中生产工具的观点看，是退步的；同时，每个列宁主义者都记得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主张，即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我们应当尽力赞助这种办法——如果这种办法由农民自己提出和要求实行的时候；但同时我们应当善意批评这种办法的缺点和不彻底性，并宣传我们的“土地国有”的主张。因此，“以平均分配为原则来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以及富农、中农、贫农原有的私有土地包括在内）的口号和办法”，并不能作为我们指导土地革命的口号，而只能是在广大农民群众都自己要求和自愿实行时，我们应当赞助的办法和口号，尤其是在中农不愿或不同意这种口号和办法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中农能够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并且在平均分配原则下得到较多较好的土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根本原则，应当是：“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的动力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雇农、贫农和他们与中农的巩固联合。”（见同上决议）同时，我们不仅顾到革命的今天，而且要顾到革命的前途，我们始终是把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阶段，看作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阶段；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在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得到决定意义胜利或完全胜利时实行土地国有的必要的宣传，同时，还须有系统地极通俗地把苏联集体农庄化的宝贵经验，以及它对于基本农民的切身好处等作广大深入的宣传。

(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在长沙问题(红军第一次占领长沙和第二次进攻长沙)上，当时因为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党的工作，所以我们简直没有知道一点实际材料的可能。因此，小册子中所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只是根据着反对当时否认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以及我们承认有这一可能的一般理论原则来提出和解答问题；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可能来根据实际材料去估量长沙事变(特别是第一次占领长沙)是否盲动冒险。据最近我们收到的中央苏维埃区党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长沙事变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大会的政治决议中说：“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险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议对于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行动。”中央苏区党的最好领导和干部，他们根据着实际经验所作出的集体结论，无疑问的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绝不因此而忽略了长沙占领的历史意义，“长沙战争正确地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见同上决议)大会决议上这一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为着使这一问题有更清楚和更周到的了解，我以为还须有一点补充的说明：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〇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主义与立三路线对

这一问题的分歧，绝对不是在于：立三路线主张中国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国际路线是主张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都不占领中心城市；而是立三路线在红军力量不够，占领中心城市的其他条件也未具备的状况之下，要红军去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结果不独不能占领，而且使红军受到不必要的牺牲；而国际路线是主张红军应当逐渐准备并把自己巩固和扩大到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战斗力，同时，准备其他一切必要的前提，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有利于红军的条件之下，才去占领重要城市。

C.新加的几个问题：小册子中当时未曾说到，现时有必要说明的，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二）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问题。

（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四中全会都确定说：“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或“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然而叛徒罗章龙等当时——直到现在却一口咬定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或者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因此，他们说：“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和掩蔽立三路线罪恶”，这些叛徒们以为他们的那种说法比共产国际及中共更“左”些，所以他们更是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些。这些叛徒们在这一个“左”的词句下，企图干些什么勾当，已经是人所共知共见了。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曾采纳了李立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曾执行了李立三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是比托洛茨基主义中央和托陈取消派更坏些”——在这面盾牌掩护之下，罗章龙等不仅提出“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资格或党

籍”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实行分裂和破坏中国共产党而去另行组织所谓“第二党”的行动。现在谁都明白了,叛徒们这些“左”的口号,绝没有丝毫反对或厌恶托洛茨基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真义,而只是在这些口号之下,来企图进行诱惑一部分落后的共产党员和团员,跟着他们一路跑到托陈取消派营垒中去。他们实际上是宣传说:“看呵!中国共产党比托陈取消派更坏些,我们一路到托洛茨基队伍中去吧!”表面上挂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做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意,这就是叛徒们装腔作势的实质。这也是现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作方法的特点。

罗章龙等叛徒被驱逐出党了,但罗章龙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时在个别的共产党员中间,还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现着;而暴露这类观点的同志们,时常也是表示他们比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见解“更正确”的态度。他们同样以为不把中共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所犯的李立三路线错误看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或比它更坏的错误时,便是轻视了李立三路线的危险实质,便是袒护了立三路线。因此,把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的估计,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目前依然是很必要的事情。

为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的实质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的派别了,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斗争中的先锋队”。(见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底先锋队”呢?首先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正确的说: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例如，在我们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提纲，布尔塞维主义必然腐化等的提纲呢？这个武器是托洛茨基供给他们的。苏联境内一切反苏维埃的集团，都引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们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腐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恢复的著名的提纲，作为自己必然要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根据，这件事事实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思想上的武器，并且还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苏联的策略上的武器与组织上的武器。关于这些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接着上面一段话，就说：

“谁供给了苏联境内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苏维埃政权底公开发动的尝试呢？这个武器是企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行动，振起了资产阶级底精神，帮助资产阶级专门家的专门危害工作，这是事实。”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组织上的武器，如企图建设秘密的反苏维埃机关呢？这个武器是组织反布尔塞维克的秘密派别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秘密工作，帮助了苏联内部一切反苏维埃集团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底先锋队。”

看了斯大林同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实质这段正确精彩的说话，还有没有可能来断定，曾经在短时期内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位的李立三路线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东西

——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些的东西呢？不能，绝对不能！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当时所犯的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虽然在思想上有许多主要问题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但绝不能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部分同志在执行立三路线时，采纳过或应用过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上的武器和组织上的武器。当然，李立三同志个人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采用过共产国际一切“左”右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如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另是一回事”、“等打下武汉后再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这是铁一般事实。同时，如果李立三同志个人不及时地在共产国际及全党同志威力下屈服和承认错误，如果他把他个人的反马克思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在实际上继续和发展下去，他有可能地要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估计到执行立三路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们底错误实质时，则应当根据一切事实来作判断的根据。

当我们现在讲到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时，绝不能把他的思想上的武器和策略上组织上的武器分离开来。

因此，当我们估计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时，我们正确地指出它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这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1）因为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同时，是一种盲动冒险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在估计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时说：

“内容是实际上的投降，形式是‘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冒险癖，这种形式是用来掩盖和装饰这种投降的内容——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着的

那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制’，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跳进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资本主义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

根据斯大林同志这种论点去总结李立三路线的本性，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这样说：李立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李立三路线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穷困的那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长期残酷压迫剥削制度下，表示出无限的愤激、悲观和失望，在中国苏维埃革命新高涨的紧急关头，一方面眩于革命运动初步胜利的头昏，另方面对革命道路上的困难表示投降的绝望，他们希望或者“一下子”使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更加破产痛苦和避免革命困难（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冒险盲动），如果这样没有可能，或者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在政策上的消极性和投降性）。

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底估计，正是这样的观点。国际执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上说：“……然而这个方针（指立三路线——韶玉注）虽然用‘左倾’的词句遮盖其消极，实际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主义亦是这样的。”

（2）因为李立三路线对于革命中的许多根本问题，犯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同样的观点。这些带着有托洛茨基理论观点错误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

题信上,有很简明正确的说明;中共中央四次扩大会议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信上所指示的原则,在自己决议上对于这一点,作了个总结的说明:“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務,完全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會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有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的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观点,就是因为李立三对于许多原则问题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同。李立三同志否认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有效用,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作用,不了解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不承认中国环境的特点,不了解和忽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对革命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这些都恰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虽然曾经犯过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但他们不仅未采用而且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武器和组织武器,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当时所犯的錯誤,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的错误,不能把它与早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

锋队底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与中共中央这种估计，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罗章龙等直到现在还故意高呼：“中共中央是托洛茨基主义秽物”，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解散整个中共中央，开除整个中央委员党籍”的要求，与“组织新共产党”的行动的“合理”，企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四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罪状的正确，实际上企图以此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诱惑少数落后分子到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个臭泥坑当中去，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那些主观上还愿留在共产党内，而同时到现在还坚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远的错误的同志们，以及认为这种说法是反立三路线时所应有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过火言论的同志们，却须格外当心点，却应当仔细把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些，不然，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托陈取消派的反中共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

(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四中全会前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过程，虽然一共只有七八个月时间，然而其中详细情形，绝不是很短篇幅所能说得完的。此处要说的，只是这一斗争在非苏区经过的几个最主要阶段中的几件最主要和最显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现在之所以必要说明，因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小部分同志对于这一斗争经过的情形不明了，时常在文字上和说话中，表示要晓得这一斗争经过的必要。同时，罗章龙派及托陈取消派经常用曲解和捏造事实的办法，来企图加强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地位。这些反革命分子曲解和捏造反立三路线斗争

过程的办法,不外下列几种:第一,托陈派可耻的武断说:“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之所以反立三路线,是因为共产国际企图在反立三路线的借口之下,将不听指挥的李立三等逐出中央领导机关之外,而代之以斯大林派的人物,所以中共内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派的阴谋手段……”第二,托陈派与罗章龙派可耻的宣传说:“反立三路线的主要人物不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现在工作的那些干部同志,而是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叛徒与何孟雄同志等”,托陈派说:“我们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即反对中共中央路线,所以我们是反立三路线的始祖。”罗章龙派说:“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最早和最有力的是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领导的那些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拥护国际路线的英雄们。”第三,不久以前才恢复党籍,原来犯过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分子们,最近无耻的造谣说:“现在中央负领导工作的那些同志们,并未真正作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尤其是他们未曾用过同志关系的说服方法来帮助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同志等改正错误,而只是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党的信到中国后,在中央会议上放一阵大炮,把李立三等赶跑了,自己占据了党的领导的位置。”这些分子们直到现在还继续散布这些可耻的捏造谣言,当然是为的要来污蔑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同志,企图以此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同志,并企图以此在中国工农群众面前来破坏共产党的威信,所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破这些分子的造谣,对于使一切中共党员和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了解这些问题的真相,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关于托陈取消派所捏造的那第一种谣言,当然已经没有辩答的价值,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实质,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路线是根

本相反和不能并存的实质，现在对于任何人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至于这些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所高叫的，什么“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派把持”等等反革命论调，早已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先进无产阶级分子一致公认斯大林同志为列宁主义的最忠实、最坚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伟大事实中，暴露其反动无耻的原形了，也值不得再加任何的辩驳。关于托陈派所说的，他们是在第六次大会后，即反立三路线的问题，也是值不得辩驳；因为现在谁也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次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占领导地位前的政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一般相合的。托陈派这种谣言的目的，是在企图证明中共自从六次大会后，即是把陈独秀机会主义和以后的盲动主义完全公开宣布死刑后，特别是把陈独秀、彭述之等逐出党的领导机关后，中共中央路线便不正确了；因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坚决进行过的反对托洛茨基派及陈独秀派的斗争，特别是把托陈派一切分子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以外去的斗争，是完全不正确的；托陈派企图在他们是“反立三路线老祖宗”这面盾牌掩护之下，来达到他们的派一部分人“回党破坏”，来达到他们“无论如何设法留在党内干”的目的，这是很显然而且是无庸争辩的事实。至于罗章龙派及托洛茨基信徒们宣传的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的许多可耻的捏造谣言，因为有些人还不了解有些问题的真相，所以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以便那一小部分还不十分了解这一问题真相的同志们，能对于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

四中全会前在非苏区反立三路线经过，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阶段：（一）立三同志论文发表后至中央政治局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发表前为第一阶段；（二）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后至三中全会前为第二阶段；（三）三中全会至国际执

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信在中国发表前为第三阶段；(四)国际来信发表后至四中全会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企图用个人谈话的建议和说服方法，预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底阶段——在立三同志的许多主要论文散布在各期“红旗报”上和收集在“布报”第四、五合期上发现的时候，就有个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项同志的十数次谈话，与忠发同志等的几次谈话（当时因工作环境关系，没有遇见立三同志的可能），到六月十一日决议案通过的前夜，有些同志又有与立三同志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都曾诚恳地明白地指出立三同志这些论文中的根本观点的危险，同时，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同志论文中的意见采纳到自己的决议中去。关于这一点，有立三同志自己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书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他声明书中说：“(二)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正因为党有伟大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党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所以当立三路线形成之初，即遇到党内同志的反抗。这一反抗倾向的最明显最坚决的代表，便是陈、王、秦、何同志等反对六月决议案的斗争，还在六月决议案之前，我发表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时，陈同志等已起来反对这些错误观点。”但是，这些同志预制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立三同志的论文毕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底稿。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在领导机关内进行反对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底阶段——当一部分同志听说中央政治局根据立三同志论文通过决议时，便起来找中央负责同志（立三、忠发等）谈话，忠告他们不要把这一决议宣布，要求他们通过新的正确的决议。立三同

志等不仅不采纳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公开答复要同这些同志到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去作公开的斗争。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公开起来反对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有几个同志（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并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同志才受到当时立三、忠发等的异常仇视，不仅在政治上到处打击这些同志（骂他们是“右派”、是“取消派暗探”、是“小组织者”等等），而且在组织上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来对付。关于这一切有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的中央通过的决议作证明，在中央发表的取消这些同志处罚的决议上说：“在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发表之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已在中央居了领导的地位。这一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陈、秦、王、何四同志反对此种路线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陈同志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与处分，不仅是不应当，并且更抑制了党员对指导机关的正确的自我批评，与取消了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而复活了六次大会所指斥的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这正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四同志的斗争与处罚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后，曾经有一部分文化工作党团同志（如灵璧等）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同志，以及个别的区委工作同志和支部同志同情和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河南方面，八月间，有以列甫同志为领导的多数省委委员反对当时省委书记的立三路线的领导底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经过，同样有中央文件的证明，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河南争论问题的决议上说：“过去中央立三路线的领导，使河南省委工作上陷入严重的错误。去年七八月间，省委以昌勇同志为代表的少数拥护立三路线的同志们，认为河南全省暴动形势已经成熟，应当争取河南的首先胜利，于是不顾客观形势，到处举行盲动冒险的行动。甚至三个人也要示威，一个同志没有的地方，也要派人去立即组织暴动。这种错误意见，当时曾受以列甫同志为代表的省委中多数同志的反抗，这些同志提出反对盲动冒险和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的任务。一般的讲来，河南省委内的争论，是多数同志们合乎国际指示的正确路线反对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底争论。不幸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依照立三路线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北方局加列甫等同志以‘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与小组织行动的罪名，取消多数省委同志们的工作……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因此在河南问题委员会上，除了对北方局关于河南问题的处置加以肯定外，并给列甫同志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中央告同志书上，又认为列甫同志是破坏党的原则的派别。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中央和北方局这一切处置都是错误的。现在除对于河南工作另有决议指示方针外，特决议取消以前一切对河南问题错误处置，取消对列甫同志的处罚，通告全党，号召河南省的全体布尔塞维克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上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决议）

此外,在三中全会不久以前(九月一日),发生过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议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发言和他的九月八日声明书。中央在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也曾发表过决议承认何孟雄同志的这一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并且指责了江苏省委当时加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消他的省委工作为不正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才高叫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和右派自供的一切材料,可以毫无疑问地判定下列事实:第一,何孟雄这一反立三路线发动,不是最早的,而是在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至三中全会前最迟的一次反立三路线发动。第二,孟雄同志并不是最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代表,不幸得很,他恰是最不坚决的分子,因为他在九月三日区书联席会议上受了立三同志打击后,马上便承认了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他虽然在许多同志的帮助和催促之下,送给中央一个意见书,然而当着第二次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报告同志作报告打击他一顿时,他又公开地承认了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请求报告同志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三,根据西更后来向中央的报告,知道孟雄同志当时的这一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参加这小组织会议的西更同志,因为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曾经看见过当时国际执委给中国党的许多新的纠正中央错误的指示,所以能在声明书中写出一些与国际指示相同的意见。此外,孟雄同志曾与当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谈过多次话,这更是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罗章龙派用孟雄同志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这面旗帜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企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更用不着说:孟雄同志在四中全会前后,曾离开了自己

原有的比较正确的意见书的立场，而走到与罗章龙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孟雄同志对党的立场与罗章龙等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很相信，孟雄同志如果不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定会与罗章龙派分裂而回到党里来的。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由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中央、省委等)内发展到比较多些的党员群众中去的阶段——三中全会前，党内许多同志曾经风闻国际执委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政治决议(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及其他指示等)，并且听说维它等同志已经准备召集中央全会来决定执行国际决议；因此，拥护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都希望三中全会能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的决议。然而事实与这些同志的预料相反，三中全会的领导同志们，不仅在政治上用调和态度来继续立三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加紧实行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来对付那些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把他们任何工作完全取消了(甚至连在立三路线时还保存的一部分反立三路线的同志的工作都取消了)，而且连和同志们谈话都一概拒绝。这样一来，就逼得那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原来尽力希望说服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去诚恳接受国际指示底同志们，不能不走到党员群众中去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此，在三中全会决议发表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上海已经日渐包括更多的党员群众。不少的支部、区委同志，某一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及当时因事路过上海的(乃康同志等)苏区和外省的同志，都积极地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当时凯丰仓皓戒知等一批青年团同志及则名劳侠等一批党的同志，给了反立三路线一个极大的帮助。当时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上海来，在各种会议上，多半要遇到反立三路线的言论；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

线常遇到支部同志——首先是工厂支部同志的热烈的反抗，然而因为许多特殊条件，——革命斗争的紧张，秘密环境的困难，同志们一般理论水平的不够，立三路线主要分子握住了当时党和团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领导机关，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的盛行和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的经验不够……等等条件，当时由一部分干部所领导的下层党员群众所发动起来的反立三路线的力量，还不能使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负责同志及各主要省委（江苏、河北等）的负责人自动起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以极大限度的非布尔塞维克的顽强性来企图作继续持久的抵抗；因此，在这一时期，使党的生活更陷入非常不经常的状态。只有在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在中国党内宣布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才动员了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和团员起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领导同志底斗争，才逼迫得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出自己原有阵地，而宣布向共产国际和全党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上，特别加重地指出说：“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那些在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后高叫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先锋”和“始祖”的英雄们，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后，依然是同意立三路线的健将。试拿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几个最主要人物的发言记录中最主要点看一下，便可证明。三中全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时，罗章龙的发言上说：“听了报告，看了决议，我对于整个的系统意见完全赞成。报告中严厉的提到自我批

评,我也是完全同意的。……三位中央同志,尤其是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认为很好。”余非的发言上说:“听了特生、少山两同志报告和几个同志的发言,尤其是立三同志的发言及看了国际材料和参加了国际的讨论,以及最近参加实际工作以来,对照那些情形,深深感觉得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是没有任何不同,企图将国际与中央对立,反对个人的方法,正是过去托洛茨基用的反党方法。”而西更则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中央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我对于维它同志的发言完全同意……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

把这些铁一样的材料看了以后,同志们就可以看出罗章龙叛徒等高叫罗章龙及其党徒们是“反立三路线代表”,现在中共领导干部的同志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狂吠,是如何可耻与捏造了!当然,他们这种可耻谣言,只有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上标题为“最近共产党的内幕及总崩溃的趋势”一文,以及中国境内天津“大公报”摘要登载而改标题为“国难中之共党衰落”一文等等),才能取得热烈的欢迎和转载。

第四阶段,是反立三路线斗争普及全党而同时又是真的站在国际路线和爱护党的同志们与假的(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上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分子们)反立三路线的阵营的公开划分的时期——在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信公开在中国党内发表后,在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尤其是九十六号通告上公开宣布立三路线错误后,立三路线之危害革命和党,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当时在党内再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反对立三路线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時候,罗章龙、余非等才大吹大擂地活动起来,他们把反立三路线这几个字当作商标一样地向党员群众宣传,他们企图在假

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来达到在政治上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在组织上以自己的右派小组织来占据党的领导机关底目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同“左”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样。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高叫他们能够反对“左”的李立三路线，也和立三路线者大吹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曾经“坚决地实行过一条战线上(即反右倾)的斗争”底一样滑稽和愚蠢。“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方面，“什么地方有‘左’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有右的倾向”，(斯大林)同时，什么地方有右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左”的倾向，“左”右机会主义经常是相互掩护相互帮助和相互助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便是“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立三路线占统治时代，不仅同时还作出许多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土地问题中的错误办法，争自由运动中的幻想资产阶级当时还有革命作用等)，而且事实上正掩护和培植着那些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主张和右倾派别的发荣滋长。罗章龙等的反立三路线的立场，不仅不能丝毫反对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正模糊、混淆和障碍了真正反立三路线底斗争。“左”右机会主义都同样的仇视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唯一正确路线，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观点看来，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时。便抬起头来企图将党拉向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去，这是毫不足怪的。当然，右倾分子不能不懂得：如果他们在这种党已经克服了立三路线而实行真正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底关头，公开的提出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那末，他们就必然要马上受到李立三路线一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企图躲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偷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秽

物来,以使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抓得党的领导机关,然后再来实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狐狸无论如何灵巧,时常总不免要“露出尾巴”来,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无论如何尽力企图在未夺到领导机关前,暂时不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是,结果依然不能不在许多原则问题讨论中,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最初的发动,是采用许多转弯抹角的巧妙方式:他们不说他们不相信共产国际路线对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只说“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或者“当时中央所犯的各个问题的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他们不说国际来信中所指出的政治路线与任务不能实用,只说要由他们来“树立国际路线”和“重新讨论一切问题和制定一切新的决议”;他们不说他们估计中国当时形势已经没有革命运动高潮,只说“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已经完全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的差别”;他们不说他们正在准备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只说要“推翻整个中央——开除一切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籍,撤消一切领导机关同志的工作,党内绝对民主化”;他们不说消极怠工和破坏党的工作,只说“在反立三路线的时候,不能进行实际工作,谁提出加紧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口号,谁便是妨碍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他们不说他们反对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只说反对“C. S. S. 小组织”,而却又不说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不说他们对党的发展抱悲观绝望态度,只说“反对九十六号上未有宣布党的危机”的扩大和深入;他们不说他们不反对右的倾向,只说“右倾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或者“至少在国际来信后,右倾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一切错误意见,开始是由个别分

子在这种会议或那种会议上散布和宣布，最终，由全总一月一日党团决议把他们系统化起来，成为一些隐藏暗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当时的政治纲领。

右倾分子这些错误意见，——在上海各种会议和谈话中发现时，改组后执行国际路线的江苏省委便坚决地与这些错误倾向斗争。江苏省委当时通过的关于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决议，便是坚决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好证明——反对中央政治局一部份领导同志的立三路线残余，同时反对当时刚才抬头的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时候，有一部份同志表示对右倾调和，对右倾有自由主义倾向，这部份同志恰是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致不愿批评别人错误倾向的人，这部份同志当时曾经公开地或暗藏地主张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调和与让步；在这些分子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错误，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重性，都不过是个别问题的“词句”或“名词”不妥当，都不过是反立三路线时不可免的或应有的“过火”言论；同时，这种思想在当时刚承认错误的政治局有些个别同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才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说反立三路线便包括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全部，对于已发现的错误倾向一字不提，不说立三路线破产而说党的危机等等）。然而当时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却深刻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看透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提出的严重性；他们坚决地指出，如果这些倾向公开展展下去，便有成为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极大可能性的来源，不仅由于提出这些问题的分子们绝大多数是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成份，而且由于一方面立三路线“左”倾词句揭穿后暴露出公开的右倾消极；另一方面，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的极大可能。同

时，不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便不能真正克服立三路线。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拥护国际路线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些同志的意见是缺乏布尔塞维克的党员的警惕性。

在这小册子中，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有些问题原来写得不充分和错误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秘密斗室中，简直没有可能找到比较充分的参考材料；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对许多问题理论上的了解还不够——尤其是当时被取消了一切实际工作，简直没有在实际中来进一步证验和了解立三路线在当时实际工作中的错误的可能。在这个再版书后中我曾经尽我现在所见到和懂得的，企图把“不充分”的问题补充得“较充分”，“错误的”问题改正到“比较没有错误”或“少错误”。然而这个企图在实际上究竟得到了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自己是很难断定的。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理论学习中及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多的进步，以便将来写别的东西时能够避免和减少许多缺点与错误；同时，有可能再去检查一番这小册子及再版序言中有否其他缺点和错误。此外，并且希望其他读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也在口头上、书面上尽可能地帮助我指出小册子和这一书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一部份当时未曾写到的问题，在当时是还未曾感觉到有写的必要；而到现在，党内斗争的环境，党的发展的利益，党外敌人对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曲解的企图以及许多新干部新同志对最近两年来党内斗争内容的全部了解的意望的迫切……等等条件，使得我们不能不简明地谈到这些问题。

二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直到现在在我们党的组织内和同志中，还远没有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那样

传布得宽广和深刻。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罗章龙派不仅未曾占据住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地被四中全会后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着党的先锋部队——上海党的组织，将它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毁下去和肃清出去；另一方面罗章龙派当时的活动主要地域，只限于上海及北方（北平、天津、满洲的一部份）等局部区域。但是，罗章龙派反党反革命行动的残酷无耻，以及党把这反革命派别在斗争中驱逐出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知道和了解的。关于反对罗章龙派斗争的经过，中央、江苏省委、北方党部有许多文件，可以供同志们的研究和参考的。但因为党处在秘密环境，并且这些文件多半是对于某个人、某个问题或某几部份问题的决议的关系，所以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反罗章龙派斗争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利用反立三路线的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作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简明介绍，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即是不能了解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全部，罗章龙的政治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去掉“左”倾空谈假面具后的立三路线；当然，更用不着说：不了解反罗章龙路线斗争，便不能了解中共两年来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实质和现在与将来发展的前途了。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共产国际估计中共四中全会的实质和意义说：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地指出：中共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打退了那些企图利用一部份工人干部对立三路线错误及调和态度的不满意情绪，来达到反党目的的右派分裂者和取消派的进攻，同时，给了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方针和对他的调和态度坚决的打击。四中全会在使党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

克化的事业上作了很严重的步骤,改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同时,使党开始了在全部工作转变中来实际的和真正的解决当前紧急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关于中共任务决议)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不仅在四中全会后,而且在四中全会上便实行对党作残酷无情的进攻。在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派除去坚持四中全会前全总党团一月一日决议上的政治错误,以及其他一切右倾分子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更对四中全会本身,四中全会日程、决议及领导机关更新等问题上,提出与国际和党完全相反的意见。当四中全会宣布开会时,罗章龙、王凤飞、余非、韩连辉等,便起来反对四中全会的开会,要求立刻解散四中全会和改期召集紧急会议;当着破坏四中全会工作这一企图被国际代表和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和打击后,他们立刻反对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他们主张除了政治决议、反国民会议宣言、告红军书、告同志书、改选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议程以外,还要讨论和通过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等决议。因此,他们要求把开会时间延长到三——四天。当着他们这些提议被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后,他们马上便提出“立刻退席”的要求来威吓会场;当着他们这种非党行动受到斥责和打击后,他们便企图在夺取领导机关问题上作一最后的挣扎。当进行改选政治局成份时,他们提出一个整个的政治局名单,这名单中除去被他们诱惑的两个工人同志外,其他的完全是与中央指出和为大多数到会代表赞成的相反。他们提出的这一名单九个人当中,顾顺章、韩连辉不久便成了国民党的侦探,罗章龙等不久便成为托陈派的伙伴,此外,他们并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开除了党籍

的托陈派份子王仲一，要求恢复其党籍和中央委员资格。他们的名单和提议，当然被大多数否决了，大多数代表一致通过了由中央提出来的新政治局成分。在他们夺取领导机关的企图失败以后，罗章龙信徒——四中全会后不久即成为国民党公开侦探的袁乃祥，便拍案咆哮，企图给警察侦探以破获的机会！叛徒的这种可耻的罪恶的企图，当然立刻被到会大多数代表们的镇静力镇慑下去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四中全会，在极短时间内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完成了自己各方面应有的任务。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罗章龙派的反党阴谋（在政治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代替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组织上以右派小组织的领袖占据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四中全会上受到严重打击后，他们便马上公开地实行反对四中全会底小组织活动，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第一个理由是：他们原来要求召集的是紧急会议。同志们都知道，在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中——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当时特别提出请求国际召集全党紧急会议的口号。当时提出这要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占领导地位的一部份同志不愿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用调和态度拥护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请求国际采用紧急迅速的办法来纠正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以便迅速执行摆在目前的紧急任务。这一要求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未发出以前——特别是四中全会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和范围内是正确的。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前，对于这一口号还是很冷淡的。只有在四中全会上受到失败后，他们才把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已经放弃，但是原来在党员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影响的这个召集紧急会议的口号，大叫起来，企图在这个口号之下来

达到他们反党的目的。

共产国际执委根据着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是异常合乎当时政治上、组织上、工作环境需要上的要求的。这些理由，同志们在附录中“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于中共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上，可以完全看到的。

罗章龙派反对四中全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未能解决它应有的任务。罗章龙派这种意见底根据的第一点，就是四中全会只通过了政治决议、告红军书、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未有讨论和通过其他问题（土地、农民、职工、组织、军事……等）的决议。同志们现在都知道：罗章龙派这种意见的真相，并不是真正为的要通过新的决议来解决这些任务，而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些问题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通过的那些决议。四中全会认为共产国际的那些决议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依然完全有效，因为当时的革命情况及党的任务与国际决议指示的没有不同，因此，党对这些决议的任务，是在于在实际工作中来执行它们和实现它们，而不是另外再通过些与它们不同或相同的决议；具体执行和实现这些决议的指示和办法，不仅没有在四中全会短时间内做到的可能，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全党组织的经常工作。罗章龙派则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新高涨已经过去，所以国际执委的一九三〇年七月那些决议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必须照他们的退却路线来通过一切问题的新决议。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二点，就是四中全会决议依然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四中全会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同志们现在都知道：四中全会决议不仅宣布了立三路线

的完全破产，不仅宣布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的绝对错误，而且最严厉批评了六月十一日以后至四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各种主要文件上的严重错误。并且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实际恶果，作了一个正确的总结。当然，四中全会在这些主要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采纳罗章龙派的提议，因为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提议中，包含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私货。例如：第一，在对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和九十六号通告的估计问题上，他们企图造成“党的危机越·过·越·扩·大·加·深”的理论；他们的立场是，三中全会决议比六月十一日决议更坏，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通告比三中全会决议更坏，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比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更坏，四中全会比起三中全会来是“更可耻的、更背叛阶级利益的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走狗同一作用”的会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越·过·越·坏，党是向崩溃的道路发展下去。”党能不能采纳右派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据四中全会估计，中共自国际七月决议——特别是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后，换句话说，就是在立三路线逐渐宣告破产后，党的一部份领导同志，虽然未能迅·速·地·转·变·到·国际路线，同时，虽然在转变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和经过许多困难，虽然领导同志这种迟缓和困难转变的错误，妨害和延缓了国际指示的执行，同时就是妨碍和延缓了革命任务的正确解决；但以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来，党在立三路线破产的过程中和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中，是表现出党日·益·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党的健全化的程度如何，首先要看党在克服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和执行国际路线底程度如何来决定。坚决不移地执行国际路线，是保障党日益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有力保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日益向前崩溃”的理论，就是他们分·裂·党·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的·理·论。

论根据。第二，在估计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上，他们企图贩卖“革命新高涨已经完结”的理论；他们的论断是：“立三路线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中国革命，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和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了任何群众的基础，工人运动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了。”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必须把对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和对于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这两种估计分别开来；如果我们估计到对立三路线本身包含的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实质，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断定，立三路线实质上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没有好坏的差别；而且从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讲，立三路线正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到当时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底新表现。立三路线如果不受到党内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双方面的、及时的、坚决的打击和纠正，毫无疑问地它可以而且必不可免地要对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同样程度的危害。但是，当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已经造成的结果时，换句话说，即是估计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几个月执行立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时，更确切点些说，就是估计到革命领导错误对于革命主观和客观力量造成的结果时，我们就不能不很郑重地很实际地来考察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只有根据这种估计才能得出对时局估计和党的任务的正确结论。因此，四中全会决议一方面正确地指出立三路线执行期间对于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一切严重恶果；另一方面正式向全党宣布它“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完全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换句话说，即是完全同意国际一九三〇年七

月决议及十一月来信对于中国时局估计及党的任务的指示。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和中国革命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的理论，就是他们离开党，反对苏维埃和红军（骂红军是土匪，说苏维埃没有前途等），反对一切罢工示威，反对工人政治斗争等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纲的思想基础。第三，在估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形成前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工作情形问题上，罗章龙派企图偷运来托陈取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底私货。他们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或者“因为中央犯有个别严重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甚至“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共六次大会的路线就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那些因为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们（陈独秀、彭述之、王仲一等），都应当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如果党采纳了他们这种提议，就是替那些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队员们底回党破坏阴谋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四中全会决议很正确地一方面指示“六次大会以来的党的成绩，因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大部分已经消灭了”，另一方面却坚决肯定“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为止，中央虽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的成绩”。四中全会深切地懂得：任何方式地对于国际路线正确性的动摇和对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的掩护，都有加以严重打击的必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中共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的理论，就是他们与托陈取消派公开合并起来的思想武器。第四，在估计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的

错误实质问题上，他们企图大贩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他们的立场是：“执行立三路线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道路还远些，比陈独秀领导更坏些”；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应当整个解散和开除出党。”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党很清楚地知道：罗章龙派这种说法是托陈派自命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漫骂诬蔑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叛徒”的改头换面的把戏，是他们很久以来企图达到解散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以造成党的混乱和解体的阴谋的另一方式，党不能不给这些可耻的分子以严重的打击。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这种“中共不如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就是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高叫共产党必然崩溃，实行加入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武器。

党不仅不采纳罗章龙派这些反党的提议，而且四中全会给了他们这些提议以致命的打击，四中全会坚决的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使用了十足的火力。因此，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在政治上是比立三路线更坏的东西”，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三点是：“四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完全是与立三路线调和的，完全没有解决它应有的任务。”他们这种论点的根据是：第一，四中全会的到会代表成份，最大多数依然是立三路线的主要分子；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我们要说明的——连罗章龙派当时也同意的，就是怎样了解和决定“立三路线分子”的问题。如果说“凡是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党员，都是立三路线分子”，那末，我们可以说，当时全党党员中，除去在立三路线时代害病或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参加党的任何工作的极端少数同志外，其他的全党党员都

是曾经在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执行工作的。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上，每个下级党部和个别党员虽然对上级指示有不同意见以至抗议的权利，但是在问题未解决前还须执行上级决议的。立三路线在几个月内曾经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内占领导地位的路线，所以如果要从这种意义上讲，那末，不仅当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未曾反抗过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是立三主义者，就是那些虽然自始至终坚决抗议，但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根据中央决议还进行了多少的党的工作的同志们，也都是立三主义者了。这种论断显然是不合乎事实和有害于党的，这种论断显然是对于全党同志的侮蔑。因此，在四中全会前和四中全会上，党即曾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认为应负立三路线主义责任的立三主义者，除立三同志个人外，只有当时积极赞助他的路线而且负党的主要责任的那一部份同志。即是当时政治局工作的一部份主要领导同志，加上江南省委书记、北方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等几个同志。这当然不是说，除他们几个同志外，其他负比较主要工作的同志们，都不负一点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而只是说他们几个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他们几个人在当时可以而且应当被称为立三主义者。根据党这种正确了解的观点来考察问题，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四中全会到会代表成份是一般的令人满意的。到会代表三十九人中，只有七人是上述那种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其余的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立三路线的干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干部、各主要群众团体的党团负责同志、北方工人干部、少共中央代表、支部同志等。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七个人所以必须到会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及最主要的省委内一部分主要的负责人，需要他们来报告工作和发言，同时正因为他们是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要

他们在四中全会上向共产国际及全党公开宣布和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第二，罗章龙派说：“四中全会上政治局的改造，完全是不正确的，政治局被‘C.S.S.派’的小组织中人包办了”，在四中全会后的头几天，罗章龙派拚命高叫反对C.S.S.小组织，但不说明这小组织的内容，所以弄得有些人莫明其妙。过了几天之后，他们自己把假面具完全揭穿了，他们公开说：“C.S.S.在英文就是 China Stalin's Secton的缩写，在中文就是中国斯大林派，斯大林派不独在中国有，而且在德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内都有小组织，斯大林特别指定一些人来包办中国革命和垄断中国党，陈某等就是C.S.S.派的人物。”“反对斯大林派”——这是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用惯了而为觉悟的无产阶级恨极了的口号，这是一切反共产国际、反各国共产党、反共产主义的分子们无耻的宣传。整个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先进工人群众用一致地热烈地承认和拥护“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挥者，斯大林同志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宣言，答复了这些“左”右叛徒的阴谋诡计。这些托陈取消派的伙伴们，高叫“反对斯大林派”的口号，当然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斯大林的学生，这是很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斯大林的学生，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组织上不正确的主要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们痛恨立三主义的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最厌恶真正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分子。在他们看来，真正拥护共产国际的分子们，对于他们比立三主义者更要危险些（这当然是的确的）。四中全会后，王十人公开找当时的一个主要立三主义者罗×同志说：“还是你领导江苏省委好，我们赞成你来干”；达汗对另一个当时的主要立三主义者××同志说：“现在我们联合起来反对斯

大林派，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处得来，斯大林派比你们立三派更要危险得多；他们真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如果他们将来永远不错个什么路线，那就越过越糟了；所以现在要乘他们还未巩固时，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一下子。”事实上四中全会上改造的政治局，在正式与候补委员十六人中，有十个工人成份。这在当时有三个工人同志还未表示出他们被罗章龙派利用的情形下，这种改造，是异常正确的。在这一改造当中，撤消了维它、立三两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忠发同志等是在他们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等等条件下，继续担任政治局工作。同时，并吸引了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最坚决的那些同志和工人干部参加中央的领导。然而，在罗章龙派看来，四中全会在组织上自然未曾解决它应有的任务，因为四中全会否决了他们右派小组织提出的名单，打碎了他们夺取党的领导机关来干取消派活动的企图。因此，他们这种无耻叫号，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所以对于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示和党的利益及革命需要来解决的，它应解决的任务，正是因为它不仅彻底地击碎立三路线，而且同时在全党面前揭穿了罗章龙派等取消派暗探们的反党诡计。因此，在四中全会后，全党绝大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团结地象一个人一样坚决拥护和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在政治局领导之下，残酷无情地来打退那些立三主义残余和罗章龙派的反党活动。同时，罗章龙派、不改正错误的立三路线的分子、托陈取消派们，直到现在都拚命咒骂四中全会。这一切好恶的不同，都是必然的和丝毫不足为奇的事。

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后特别地积极地活动起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党内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残余，而且是由于当时的两种情况所促成：第一，罗章龙派是在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假面具完全揭穿之后，暴露出露骨的右倾消极失望的反映；第二，罗章龙派特别是直接反映和响应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加紧进攻。讲到第一点，读者总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立三路线实质时，根据斯大林同志对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所作的正确估计的原则所下的定义；现在如果我们应用那种同一原理来估计罗章龙路线的实质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罗章龙路线是公开露骨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罗章龙路线一般地反映出那些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本家长期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同时对革命胜利表示完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特别是反映出在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失败后‘左’倾空谈揭穿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到政策中来，便是公开露骨的取消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便不仅包括了一切右派的分子，同时还参加进去那些不承认错误的立三主义分子。这种“左”右联合的反党派别，是有它的同一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下面这一段话，恰好作为这些反党分子的写照：“‘极左’的情绪，经常总是与公开的机会主义情绪符合着这事实——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列宁不止一次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塞维克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底反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极左’的反对派之所以干革命，只是因为他等待革命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地，如果革命发生障碍，如果革命明天还不能胜利，他就一定要对革命表示悲观失望。”（见《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演

说)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暂时地“兴奋了”“激动了”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便经常表示消极怠工一部份分子(罗章龙本人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之一)的积极性,使立三同志曾经傲然自得地说:“我的路线无论怎么不好,可是它的确曾经把许多很久消沉的分子都变成过积极的干部。”立三同志不了解,那些消极分子之所以一时变成“积极干部”,只是接受“明天革命便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同时一齐胜利”的投机号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罗章龙路线公开发现时,那些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用过极大努力来干冒险盲动的一部份分子(顾顺章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之一),便不迟疑地投到罗章龙派队伍中去(顾顺章在四中全会后,曾经三次找右派份子谈话,表示他与右派合作反党),使罗章龙到现在还扬扬自得地说:“许多很好的干部,(?!)都拥护我们的路线。”罗章龙很懂得,他的路线能够团结一部份对革命完全悲观绝望的分子。

从一定意义上讲,罗章龙路线便是冒险盲动干不通和“左”倾空谈揭穿后的李立三路线。因此,如果李立三用“全世界革命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悲观失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宣告“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李立三用“全国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几个和一个省区的首先胜利的可能底否认,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李立三用“立刻打下武汉,立刻打下南京”等等冒险盲动来损害红军的主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红军是流氓土匪”,“红军没有前途”等等咒骂造谣来损害红军的威信和帮助敌人进攻红军;如果李立三用统一行动、组织暴动等等“左”倾空谈取消团、取消工会和涣散党的力量,那末,罗章龙便公

开用“反对罢工,反对示威,根本反对暴动,现在还不能组织赤色工会,党已经要崩溃了”等等谰言来实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第二工会”底活动。罗章龙派这种公开的取消主义的政治路线,不能不使他们在组织上走上离开革命而另找出路的道路。讲到第二点,读者还记得,一九三〇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赞助之下,正组织第一次围剿红军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运动。当时帝国主义、蒋介石、改组派、托陈取消派、新月派、国家主义派……等等的刊物和报纸上,同声一气地高呼:“三个月内,中国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必定消灭”的论调;当时国民党除却遣兵调将进攻苏区红军外,同时,还特别加紧组织些新的反共机关(在上海以杜月笙、黄金荣、杨虎等流氓头子主持,在江西由段锡朋等负责,在北方由张开运主持),一方面在苏区内部去组织和帮助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派的活动;另一方面在上海及其他各大城市专门派遣奸细侦探,到共产党内去,同时并威胁利诱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和异己分子去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党组织。同时,在这个时候,因为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使有些苏区的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失以至部份的失败,有些非苏区——首先是大城市的党的组织及其他群众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形,更使那些对革命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们容易发生响应敌人的情绪。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公开提出取消主义的政纲,这除却直接反映对敌人进攻革命的动摇、悲观失望情绪外,还有什么解释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实行起来分裂党、分裂团、分裂工会并企图分裂红军及其它群众组织(组织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所谓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在北方组织非常委员会,并派几个人企图到苏区去破坏红军等)的行动,这除却直接帮助敌

人来进攻红军和共产党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份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它公开地方去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捕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拙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获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信徒韩连辉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罗章龙派这些政治上的纲领和组织上的活动，除了直接执行反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革命新高潮时引起共产党内部的破裂和混乱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这种公开帮助敌人和实行敌人指示的罗章龙派，还能称为共产党内部的派别，那末，什么东西才算党外的反革命派别呢?!罗章龙派从它散布“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反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宣布党的主要干部名单及国际代表姓名，向敌人告密的文件)和实行组织所谓第二党那一天起，它便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派别，而是党外的与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A.B.团等等一样的反革命派别了。罗章龙派早已不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派别了，它早已是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支小分系了!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在上面所讲的话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章龙派之所以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加紧活动，以及它由党内派别迅速转变成党外反革命派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上面一段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

罗章龙派的活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反党小组织做背景的。因此，当它初宣布反党时，曾经诱惑过党内一部分落后分子跟着它跑——当然这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原来参加右派小组织的和不改正错误的立三主义者。然而除此以外，一小部分同志及少数工人干部对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愤恨，也曾经被罗章龙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口号之下利用过。罗章龙派当时用欺骗口号（如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等），武断宣传（把“新”“旧”干部对立，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反对C.S.S.小组织——当初许多人不知C.S.S.是什么意思）和反党方法（例如用原来工作关系，欺骗一部分支部同志及外县同志当时与党隔离关系，不经领导机关同意，私自在各处召集秘密会议……）。然而，罗章龙派领袖们自鸣得意和决心反党反革命的那一天，同时就是它宣告完全破产的那一天，当罗章龙把全总党团秘密印刷机关窃据和印发向敌人告密式的宣言和小册子的时候，当他们的秘书长把全总经费拐到北方放高利贷的时候，当他们不顾一切秘密工作而召集一切反党会议以致牺牲干部时，当他们对共产国际及中央尽量地谩骂造谣时，一部分好的干部（原来是受罗章龙欺骗的人物）马上便表示不愿走上反革命道路而立刻向党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在罗章龙派反革命面目揭穿的过程中，在四中全会决议、国际各种决议在党员群众中扩大深入的过程中，在中央、省委、区委及支部同志积极动员和积极斗争的过程中，在对犯错误同志的坚决斗争与忍耐说服工作的过程中，到二月末，罗章龙派在上海已经只剩下了残余的挣扎，绝大多数曾被欺骗的干部和支部同志，都诚恳地接受中央当时所提条件（“（一）立刻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向党承认错误；（二）在党所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

正自己的错误；(三)把原来担负党的、团的、工会的……等等工作向党和相当党团交代清楚，向党公开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派活动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反革命派别的一切情形……”)，脱离了罗章龙派而回到无产阶级的党内来。只有很少数的始终不承认反党错误和已经不能挽回到党内来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如罗章龙、王十人、韩连辉等等)，被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以外去。上海的罗章龙派的反动中心塌台后，马上使他们的北方组织也受到影响而逐渐崩溃；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罗章龙派在北方的活动便成了奄奄一息了。这样，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的活动，便在三个多月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及进行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打得烟消云散，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同样受到可耻的破产与完全的失败。

罗章龙派这样迅速可耻的破产，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的取消政纲及反革命活动在党员群众及工人阶级面前迅速揭露了；另一方面还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及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正确地运用了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法。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一月至四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两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打击和镇压了苏区内部各种反革命团体的活动，提高和巩固了红军的战斗力，改善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改良了苏区的经济状况。在非苏区内恢复和巩固了被立三路线及右派涣散了的党的组织，恢复和巩固了青年团、赤色工会、反帝同盟、贫民协会、济难会等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加强和注意了群众经济斗争及政治发动的准备和领导。这样一来，就把罗章龙派所高喊的“革命已经失败了，党一天一天塌台了”的无耻谰言，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了。党在反立三路线和反

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一方面表示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不调和性，另一方面采用一切必需的和正确的斗争方法（在全党内作极广大的教育工作，对犯错误同志作极忍耐的说服工作和批评工作，领导机关直接到党、团和赤色工会的支部内去教育和说服那些对问题不十分了解和受罗章龙派欺骗愚弄的分子，与罗章龙派迅速地断绝和隔离一切组织上的联系，驱逐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和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等等）。因此，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能够使一切立三路线主要分子对党屈服，在组织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克服了立三主义者。在反罗章龙派斗争中，能够使绝大多数暂时犯错误和受愚弄的同志们，在完全自觉地心悦诚服的条件下对党承认错误（例如好些同志曾经自愿地写三、四次以上的声明书来逐渐深刻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证实改正错误等等），在组织上在肃清少数异己分子的情况下，打碎了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组织。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和赤色工会队伍里，没有了罗章龙这类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越健全、越巩固和越发展些，驱逐和肃清自己营垒中的异己分子，就是驱逐和肃清敌人在革命营垒中的奸细，是我们在与阶级敌人残酷战斗中必需的和不可少的步骤和方法之一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史曾经千百次地证实这一点，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史，也完全证实这一点。

三 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

“列宁在我们党内经常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的’和明显的孟塞维克的倾向。”“我们的党在和两种倾向——右的和‘左’的斗争中生长和巩固的。”（斯大林）所以“两条战

线上的斗争应该是党的一切活动和领导的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立三路线早已宣告死刑了,立三路线在全党面前早已宣告破产了,主要的立三主义者和立三同志早已向共产国际和党实行屈服了;罗章龙路线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托陈取消主义的一个小分流了,罗章龙路线早已在全工人阶级面前宣告死刑了,罗章龙及其主要的同道者早已被驱逐到无产阶级队伍以外去了,然而立三主义和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更正确些说,“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时常在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分子对个别问题上时常发现着。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事。因为第一,使主要立三主义者投降和驱逐主要的罗章龙主义者出党,这是一件事;把他们的思想肃清,这是另一件事,这是比较困难些的事。斯大林同志在讲到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说:“把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和流放起来——这是一件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件事,这比较要困难些。”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党内现在没有了如立三路线或罗章龙路线那一类的已经完成的系统的整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件事;但是,党内还有——也不能没有个别的分子对个别问题的有“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是另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完全形成了的机会主义不一样的,倾向是还未完全溶化于机会主义而且还能改正的。同时,我们更知道:对任何问题的“左”右错误,如果不能及时改正而任它们发展下去,都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任何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地受到批评和改正,如果放任它自己发展下去,都有成为一贯的机会主义系统的可能。第三,这些倾向是敌对阶级思想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来的反映,是我们队伍中薄弱的、落后的和动摇的分子们受

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底反映。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立三路线的残余呢？正确些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有“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更确切点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时常有“左”的错误呢？这主要地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忽视革命运动本身还包含有的困难和弱点的倾向（例如忽视革命不平衡发展，忽视主观力量比客观情势相对的落后……等等），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无条件地在各地组织暴动的企图，无准备地以空洞号召来实现各地总同盟罢工的企图等等。在苏区工作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而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在军事上冒险盲进的倾向，不顾巩固根据地而盲目地到处进攻的倾向，过早地进攻大城市的企图……等等。第二，不估计群众情绪，脱离群众的倾向，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以至个别组织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继续采用指定罢工、命令群众的方法去“领导”工人斗争，不愿深入企业、农村和兵营中去作群众工作，硬用赤色工会纲领——甚至党的全部要求口号去与黄色工会中工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工会中的民主制度，一切由党来指定和包办，拒绝利用公开环境工作的可能……等等。第三，以“左”倾词句掩盖右倾消极的倾向，例如在非苏区有个别地方同志拿“不要破坏了中日无产阶级团结”，不要煽起“民族仇恨”等“漂亮”词句，来放弃反日斗争的发动和领导，把“拥护苏联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第一等任务”的口号来和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只有组织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才能胜利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个别企业中

罢工斗争放弃的消极等等。第四，在苏区有些地方所采取了过早的(如消灭富农企图)和有害的(如忽视与中农联合、有时侵犯到中农利益)“左”的倾向等等。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罗章龙路线的残余呢？换句话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还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呢？这主要的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在对于革命运动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不足的观点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是以一部分工会工作同志们为代表的最近职工运动中的某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据我们最近得到材料看来，有以下各点：(一)以为在目前经济危机条件下任何罢工没有胜利的可能；(二)认为工人斗争在现在阶段上，只能有防御的性质和合法的范围；(三)平时不去作准备罢工的工作，到群众自动罢工时，又借口罢工要长时期准备来阻止罢工；(四)提议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灰色工会来代替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五)完全忽视和轻视女工和青工的力量和斗争要求；(六)对组织反对日本进占上海的总同盟罢工的口号，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甚至完全否认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和一般政治斗争的必要；(七)企图把赤色工会与党对立起来或脱离党的领导等工团主义的倾向等等；其次，便是那些对于群众的武装反帝斗争情绪的估量不足，以为“谁要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否认民族革命战争有胜利的可能；对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前途抱悲观失望的情绪；否认党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成绩，对党的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问题不相信和怀疑……等等。在某些苏区内一部分人中表现得最明显地，便是(一)曲解巩固根据地的策略为“退却路线”、“保守主义”；(二)曲解在一定条件之下去争夺和占领城市的国际

路线为无论何时都不能占领任何城市；(三)遇有敌人进攻，不顾及敌我力量对比，便主张“逃跑”、“躲避”和“退让”的政策；(四)不相信红军胜利及工农群众力量能保证革命运动能胜利地开展；(五)根本害怕帝国主义，不准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等。第二，在对于不站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领导权观点上进行工作的问题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例如不愿组织独立的工人反日会；不愿提拔工农干部作领导工作；不积极征收工人入党(前此的河北一部分党员有此现象)；不愿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不以同志的说服态度去对付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等等倾向。在苏区中，有些个别地方延缓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使地主残余、富农分得较好的土地，把地主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中农；轻视赤色工会在苏区中的作用和意义；不积极组织雇农工人的独立工会；不作工人改良生活斗争。第三，表现在一部分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上——如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等等。

因此，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是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和得到更伟大的成功的保证。

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护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底保证。

这些手段和方法主要地有下列几种：第一种是对任何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调和派之中，有些是对于党内一切反倾向斗争，装做出不懂得和没有兴趣的样子；有些是作出部

分地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央，部分地同情于不正确倾向的态度；有些是把一切党内斗争都解释成无原则无意义，同时自命为不参加任何斗争的“清高分子”；无论调和派采取的手段如何，然而调和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调和派是懦弱的机会主义者——是变相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派实质上是腐败的自由主义者。第二种是两面派，两面派之中，有些是在口头上拥护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实际上不执行而且反对这个路线；有些是表面上拥护和接受国际与中央的各种正确决议，暗地里却进行反对这些决议的斗争；无论两面派的手段如何，然而两面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两面派是对党的正确路线底阳奉阴违和口是心非者”，是用阴谋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进行反党斗争者。第三种是各种机会主义的“私贩者”，“私贩者”之中，有些是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偷运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到党的队伍中来；有些是用表面上反对某种机会主义而暗地里偷运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到党的营垒来的方法。无论“私贩者”的手段如何，然而“私贩者”的实质终究是一个：“‘私贩子’是用‘偷运’的方法来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分子。”第四种是企图用制造无原则派别的手段来达到反党斗争底目的之分子，这般人之中有些是企图把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有些是企图把所有“新”“旧”干部对立，有些是企图把实际工作同志与曾短期学习同志对立，无论这些人用的是那种手段，然而他们的实质终究不外下列各项：“用制造无原则派别斗争的方法，或者来掩盖自己所犯的不正确倾向的错误，或者在反对别人派别的旗帜之下去进行组织自己的反党派别”；这类人的口号是：“党内有些什么派，什么派，人家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不组织起来呵！”。这些反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最近之所以特别被采用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

以及中央在四中全会后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性，已经成为铁一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那些反对、怀疑和不相信国际路线的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另有某种企图的分子，时常多半不敢公开地表示出反对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态度，时常不能不采取比较隐蔽些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反对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活动。

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早已被揭穿了的、被宣布死刑了的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转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

在我们队伍中，有时听到有一小部分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不要闹了！闹够了！什么‘左’倾右倾呀，两条路线上斗争呀，闹得够了，都是同志们，何必要闹得一塌糊涂呢？！同志们关系简直闹坏了！”。发出这类呼声的主要的是两种人：一种是那些犯了“左”右机会主义倾向错误，而又不高兴党来批评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人们，他们企图用这一类呼声来模糊和放松党内同志们对他们错误的注意和斗争。另一种是那些在革命斗争及党内斗争战线上感觉到厌倦的人们，或者是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的人们。为使这些同志们能够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内底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著名的话介绍给读者们，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讲到联邦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来源时，曾经说：

“……可以这样想，俄国人太爱闹了，喜欢争论，制造

些分歧意见，然后经过克服党内矛盾来使党发展。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是什么爱闹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原则的分歧。事实是这样，矛盾只有用斗争办法才能克服。为这种或那种原则、为这种或那种斗争目的，为使达到目的底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克服矛盾。对于党内关于临时政策问题，纯粹实际工作问题等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各种协调。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联系到原则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协调，任何‘折中’路线，都是与事无补的。对于原则问题没有也不能有‘折中’路线，或者是这种原则，或者是那种原则，应该成为党的工作底根据。对于原则问题的‘折中’路线，是使人模糊头脑的‘路线’，是抹煞分歧的‘路线’，是使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思想上死亡的‘路线’。”

同时，斯大林同志坚决认为：

“我们党的历史，是党内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地巩固了我们的党底历史。”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来源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同上这一演讲中说：

“这些矛盾和分歧，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第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无产阶级中最不稳固的阶层，同样，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不稳固的阶层，时常接受和反映这一压迫，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完全与社会分离或者站在社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是与社会的各种阶层经过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的社会之一部

份，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阶层发生联系和不能不受其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习惯、情绪，时常经过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某些无产阶级阶层而侵入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成份不一致，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我想，无产阶级，从其整个阶级看来，可以分为三种阶层。第一阶层——这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常备军，这就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群众早已与资产阶级断绝了联系。这一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支柱。第二阶层——这是不久才从非无产阶级出来的，从农民、市侩、知识分子等出身的人，这些从别的阶级出身来的分子，不久才加入无产阶级成份中来，把他们原有的习惯、习气、动摇、犹豫等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种阶层对于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和‘极左的’派别是最好的基础。最后，第三阶层——这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证的一部分，这些人们带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希望，带有很大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带有‘出头做人’的情绪。这一阶层对于露骨的改良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是最好的基础。

“虽然外表上有些差别，但是工人阶级中的后两种阶层，都是或多或少地接受机会主义洗礼的部队，公开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贵族的情绪，用‘左’倾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阶级中那些还未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半市侩等阶层的情绪……

“很自然地，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斗争剧烈化和困难增加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各种阶层的观点、习气和情绪的不同，便不可避免地要在党内的某些分歧形式上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迫不可避免地要加剧这些分歧，使这些分歧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部斗争的形式上寻找出路。

“可不可以避开这些矛盾与分歧呢？不可以，不能够。要想避开这些矛盾，这就等于自欺。恩格斯是对的，他曾说过，长久抹煞党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只有由斗争来解决。”

斯大林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斗争的来源底这种说明，对于我们中共原则上一般的同样是完全正确的。

当着一九二七年革命处在紧急关头时，爆发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它把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对立，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底尾巴主义，最后并公开走到否认阶级斗争的孟塞维主义，毫无疑问地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队伍中最不稳固的阶层的压迫底反映；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和一九二八年初，爆发了瞿秋白盲动主义，它不去耐心地刻苦地重新集聚革命的力量，以准备革命新高潮之到来，反而用冒险盲动的方法去找求投机取巧的出路，以致使革命组织加倍地受到敌人的打击和摧残，毫无疑问地是那些半市侩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底反映；当着一九三〇年——三一年，中国革命新高潮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关头，爆发了李立三路线与罗章龙路线。这一切都证明斯大林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矛盾和为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斗争等底来源等指示底正确。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的许多严重困难性(首先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困难)，更加重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紧张关头中，中共内部矛盾的爆发和斗争尖锐性。有些分子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各种困难的本身含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条件，于是时常发生对困难投降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临阵脱逃”或“中途变节”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上，便早已指明了这一点，他说：

“这件事实——帝国主义主要地用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象在十月革命时那样的分裂和战争，那些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得多些的困难，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逃阵和变节，比起苏联在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将更不知要多好些。”

斯大林同志这段先见的预言，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每当紧急困难关头时，在党内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一部分分子的动摇、犹豫以至消极失望；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内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大部分都公开地跑向敌人营垒中去找反革命的出路。

同时，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意义和必要，斯大林同志同样有一段非常正确和明显地指示，他说：

“如果不同时与我们党内倾向斗争，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够。所以不能够，是因为在后方，在我们党内有敌人意识的反映，在后方留有不相信我们事业和用尽一切方法阻碍我们的运动向前进步的人们，与阶级敌人开展真正的斗争

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是党的经常任务。”（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因此，恩格斯还远在一八八二年便说过：“大国家的一切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与辩证的发展规律完全符合的。”因此，斯大林同志说：“用斗争办法来克服党内矛盾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不仅是联共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其它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是所有较大的党——不管是联共也好或欧洲各国的党也好，都是一样——的发展底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克服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着和巩固着。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加紧了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央会议虽然犯了个别错误，却继续着使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死刑，使党更进一步地走进布尔塞维克化。一九二九年党在打击和驱逐托陈派的斗争中，表示出党在理论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坚定性和进步。一九三〇——三一年党在克服李立三路线和驱逐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使党在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中创造了不朽的成绩。没有这些严重的党内斗争，没有克服这些反列宁主义倾向底斗争，中共布尔塞维克化事业的进步，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正在日益向前扩大深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任何胜利与成功，都是不会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以上所特别着重指明的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解为把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有些同

志误解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有时把任何不必要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拿起来举行争论，有时把某个或某些同志对某个问题的错误，而且不坚持主张的错误，便当作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来举行斗争，特别是时常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变成口头清谈，变成无内容的时髦名词，不仅与实际工作丝毫不补，而且甚至在清谈斗争的方法之下放弃和阻碍实际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和有害于党的办法。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也讲得非常明白的。他说：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而且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党内分歧带有原则性，就不能抹煞和忽视这些分歧；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为原则路线而斗争的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影响；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克服党内矛盾的方法，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

因此，只有使党达到健全与巩固的党内争论，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和应该进行的争论。

党内争论的目的，在使党更加健全与巩固，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把党内政治争论变作个人攻击或个人仇视的现象。一方面，有些犯了某种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时常不仅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不高兴和痛恨那些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因此，拚命坚持着自己的错误，同时，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些曾经或现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人。他们不了解，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不仅为的是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同时也就是为的帮助他们脱离政治错误的泥坑。他们把同志的好意当作恶意，这诚然是非布尔塞维克的表现。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时常遇见另外

一种幼稚的不正确的现象。就是有些同志对于犯过某个问题或某种问题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的人，当然更用不着说对于那些犯过某种问题错误倾向的人了，永远抱着敌视的非同志的态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之一，在党内斗争中，时常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斗争双方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尤其是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们坚持着自己错误并向党进攻的时候；然而这绝不是说，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的人们，一定要抱着敌视的态度，抱着不以同志关系来帮助他和教育他改正错误的态度。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驱逐出去，以便整洁我们的队伍；同时，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能够纠正和愿意纠正的同志们，却要设法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方法，以免减少我们的队伍的力量。同志们，试把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及中共史检阅一遍，便可明了这些说话的正确。

坚决的和正确的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使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布尔塞维克的巩固与统一的前提和保证。

一九三〇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上对于中共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指示，应该成为每个中共党员随时随地的指南针。

“现在，除开解决组织任务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之外，党应当保证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纯一性，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些，但是，要保证坚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任务，要保证党的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只有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

争才有可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左’的盲动的狭隘情绪的倾向，同这两种倾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作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如果在共产党内部不进行不调和的、无情的反对那些那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底斗争，同时，便不能最终地战胜托陈派和完全克服对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进行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精确的和真正的按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的任务。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成为党一切行动和指导的根据。”

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署名：王 明

中国反帝运动的新高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沈阳各地的事变，迅速地引起了中国千百万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的高潮。

这一反帝高潮，在其开始涌起和汹涌澎湃发展的过程中，便显露出下列的特点：

(一)这一运动是真正广大群众性的——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是中国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广东、陕西及甘肃边界的苏维埃区域的几千万劳苦群众，这几千万英勇战斗的劳动者，在日本占领沈阳的消息传播以后，马上便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广大群众的集会、示威和武装游行，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所共知的事实。同时也不仅是东三省的广大民众，东三省的劳苦民众，在万宝山事变及鲜案发生以后，便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经常进行着武装的和其他各种方式的英勇斗争。在日本出兵占领沈阳及其他各地的事变爆发以后，更加激动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和反抗。在东三省，广大的工农和一切反帝群众正在联合着那些不服从反动长官命令，不愿缴枪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革命士兵，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与武装骚动。当日帝国主义军队进占沈

* 本文最早刊载于1931年11月出版的《共产国际》(俄文)第32期。这里选刊的是原文的摘录。

阳时，兵工厂工人立刻举行总罢工，广大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强盗军队曾经过英勇的巷战，这也是全世界和全中国有目共见的事实。此外，在全中国许多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广大民众，迅速地都卷进了这一反帝怒潮的激流。在上海，有三万五千日本码头工人的罢工，有日本橡皮工厂八百人的罢工，有十万学生的罢课，有三五成群和百十成队的手持红旗的几百队宣传鼓动队占据着一切重要街道，有精神抖擞的千百队工人学生的反日纠察队与日货检查员，在工厂、学校以至兵营里都充满着反日群众的演讲集会，在九月二十六日，有七万人的反日露天大会与示威游行。在十月十日，有八万以上的工人、学生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在十月四日，有几千工人、学生在国民党五区公安局门前示威，打伤巡官并捣毁公安局。在十月五日前后两三天内，有五千以上的学生捣毁北火车站，殴打国民党市党部及市政府委员，强迫站长下令开车送他们到南京去示威。从九月十八日到十月十日，有过三次几千工人、学生群众包围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战士，并得到胜利。在全上海每天每小时都充满着群众的反帝演讲和集会，在全上海许多墙壁上都写满和贴满反帝反国民党和拥护苏联、拥护共产党与中国红军的口号标语与传单。就是平素很少参加政治生活的那些小商人、小贩和手工业者，随时随地地也都畅谈起所谓“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因愤慨帝国主义暴行及中国国民党统治卖国无耻而举行自杀的，在九月十八日以后的两三个星期以内，在上海一处便有五起；其中有两个是从云南跑到上海来参加反日义勇军，因被国民党拒绝以致失望愤而自杀的下级军官，有一个是失业的青年学徒，有一个是青年学生，有一个是日本纱厂服务十年以上的工头。群众在街市上

痛殴贩卖日货的奸商和购买日货的人，焚毁和捣毁日货的事件层出不穷，贩卖日货的商店主或经理，时常被群众拿获，处罚他们带着“我是贩日货的奸商某某”在街上游行，或者站木笼任人参观。广大群众的愤怒和威力，威逼得连上海总商会也不得不带起“商人自动的抵制日货”的招牌去进行所谓抵制日货运动，连在日本各工厂、商店和其他各企业当买办的人，也不得不登报声明脱离业务，以企图保全所谓身家性命的安全。上海各日本码头的岸上行人寥落不堪，长江日本轮船经常地空来空往，差不多在上海每个人的每一呼一吸中都充分感觉到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的空气。这一切一切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后未曾有过的现象，各帝国主义者的报纸都愁呼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到来，国民党狂呼着“反动势力又占据了上海市”。在南京，一切大中小学校的学生，都在反对国民党命令之下举行反日的罢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总司令部门前，经常地发现工人学生及士兵的游行示威。中央大学学生及几千上海去的学生联合起来举行热烈的示威，包围外交部打伤王正廷。七百个宪兵学生举行激烈的集会，在会议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联合苏联！”“拥护中国共产党！”等主要政治口号，许多士兵都沾染了“革命流行症”而发露不稳情绪。国民党哀号着群众“受共产党利用来袭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在广东、香港，一部分码头工人举行着热烈地反帝罢工，海员工人不断地举行示威集会，学生举行罢课和出发演讲。广州市的学生全体罢课，工人不断地举行会议和示威，几万群众三次包围广州公安局，三次捣毁贩卖日货的商店，两次包围广州国民党政府，工人群众提出“还我们的政权”的口号。省港罢工失业的工友又大大地活跃起来，香港政府与广东政府共同皱着眉头说：“第二个省港

罢工”的到来，害怕着“又恢复起一九二七年‘四一五’以前的现象”。在武汉，广大的工人市民及几千政治军事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举行过三次以上的“水上示威”，群众都赤着双足涉着深水进行热烈的示威运动，武汉工人群众随时随地高呼着“我们自动起来收回日租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中国去，我们再夺回我们收回过的英租界啊！”各帝国主义者一口同声地警告着自己和国民党说：“须赶快用一切力量去防止第二个武汉时代的到来”。在北平、天津，学生举行罢课，工人贫民举行集会，在严重的中日军警包围压迫之下，在北平、天津都曾举行过三四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和示威。在长沙、南昌、九江、芜湖、安庆、开封、宜昌、重庆、镇江、西安、太原……等重要城市，都充满着学生的罢课，工人的示威，士兵的愤怒。此外，在许多县城以至乡镇都举行着工农兵学生市民的会议，露天大会及游行示威。在全中国在这两月多的反帝运动怒潮中，到底卷进了多少千万的群众，虽然我们因为许多困难不能很快地作成确定的统计，然而就我们已有的材料已足断言：这一运动已经卷入了千百万的广大群众！

(二)参加这一运动的一部分群众带有极高的政治觉悟性——参加这一运动的一部分群众的极高政治觉悟性，可由下列许多具体例证可以证明：

甲、运动很快地由反日范围发展成一般地反帝运动和同情苏联的运动——美国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虽然用尽一切方法去欺骗与和缓中国民众的反帝情绪，企图使运动的范围最多不超反日的限度。但是，许多劳苦民众从国际帝国主义百年来对中国民众的血腥统治中，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帝国主义压迫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从最近上海的美、英、法水兵不断屠杀中国民众的血的经验中，从英、

美、日、德、意各帝国主义共同组织国民党军阀三次进攻工农红军的惨痛经验中，已经认清了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第二国际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鬼脸。因此，在许多群众示威中通过的决议上，在许多群众的传单宣言和报纸上，都绝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也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压迫剥削的口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国际联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等等口号，在有些地方成为极普遍的口号。国际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蒂、中国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虽然用尽一切可耻的造谣污蔑的伎俩，企图将群众反帝的情绪转移去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他们宣传日本出兵东三省是为的“日俄在满洲的冲突”，他们说：“俄国出兵北满洲与日本平分春色”，“日俄对满洲问题已有默契”，“日本是仿效俄国对中东路问题的行动”等等），但是，中国劳苦民众从苏联对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切同情和援助的事实中，从苏联对于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帮助和同情当中，从苏联北平大使馆被反革命派搜查及苏联广州副领事被国民党军阀惨杀的血的教训当中，从中东路冲突时苏联采取的和平政策与友谊协商当中，已经认定了苏联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有力的好友，因此，在许多群众集会示威中，在许多群众宣言传单及报纸中，都热烈地提出“拥护苏联，联合苏联，恢复中俄邦交”等口号，同情苏联运动的迅速高涨，以致逼得北平、天津的总商会、教育会及报界联合会都不能不公开提出“恢复中俄邦交的要求”，上海总商会不得不假意殷勤地致信苏联政府以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援助反日运动。李烈钧、徐谦等不得不在国民党的“统一会议”上提出“恢复中俄邦

交及联合苏联”的意见。甚至连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在朝要人都不得不在谈话中声明“恢复中俄邦交的可能与必要”，企图以此来和缓群众的革命情绪与向帝国主义撒娇。

乙、运动很快地由反帝范围发展成为同时反国民党运动与拥护苏维埃政权运动——在反帝运动怒潮激荡当中，国民党用尽一切狭义国家主义的宣传煽动及造谣侮蔑，来企图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及反国民党情绪，（例如：“一致对外”“对外时期不应对内”，……甚至造谣说：“红军领袖要求投降南京政府”……等等）然而，一部分觉悟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深切地认识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运动是不可分离的任务。没有反帝国主义的胜利，绝不能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不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绝不能取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彻底胜利，这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公认的真理。因此，虽然在沈阳事变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当中，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许多政治伎俩，在一部分群众中——特别是学生群中，曾经短时期地酝酿过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积极对日政策”。但是，事变的发展很快地推动和促进更多群众走上反国民党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上海的两次群众示威，三次群众包围公安局，南京和北平的学生行动与广州工人学生的行动。就拿上海的两次群众示威作例吧，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本来是国民党市党部被群众运动逼迫召集的，国民党企图用参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消灭群众运动，国民党企图把这一群众大会与示威的领导拿在自己手里来减弱运动的政治意义和缩小运动的革命内容。但是，结果恰与预料相反。上海的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武装驱逐走了国民党指定的主席团（主席团的成份是：国民党市党部代表，国民党市政府代表，公安局长，保卫团

长,上海总商会代表,黄色工会领袖……等),将主席——商会代表王延松从主席台上丢到台下,痛殴一顿,将公安局长陈希曾从台上推到台下,将拿着盒子炮作预备放姿势的保卫团长推下台去,不允许国民党代表及其走狗们说一句话,重新选了共产党代表,红军代表,赤色工会代表,反帝同盟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及赤色救济会代表……等组织大会主席团。在几十个人热烈演讲以后,到会几万群众一致高呼下列的主要政治口号:“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拥护苏联!反对美国和国际联盟乘机瓜分中国!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中国工农红军!共产国际万岁!”此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当时到会的工人群众主要的是上海邮务工人,法界电车工人,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等工人。这些地方都有比较有力的黄色工会,平时黄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国民党才敢于特别号召和组织他们来参加这一大会和示威。至于其他广大的工人群众,国民党不愿而且不允许他们来参加的。然而这些工人群众却违反着国民党及黄色工人领袖们的意志而表现出他们的极高的政治觉悟性,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口号与组织领导。上海双十节的各区群众大会和示威(沪中区三处飞行集会,吴淞浦东区飞行集会,群众大会及示威举行在东、南、西、北四大工人区域里),是由共产党直接召集的,这个大会的主要旗帜是:“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帝的工人市民!”因此,这些大会当时的直接目标是反对着反革命的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参加沪东区大会的有一六〇〇〇以上的电车、水汽、自来水及纱厂工人,以及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和苦力,大会主席台上的讲演者在三十个以上,在各处分头演讲的达数百人,大会后,举行热烈的示威、游行达四小时以上(自上午九时至下

午一时)。参加沪西区大会的有一二〇〇〇以上公共汽车工人、纱厂工人及黄包车夫,有数千大中小学校的革命学生,大会及示威的经过与东区不相上下。南区的群众大会示威,连国民党的《上海报》消息,都不能不承认“真是人山人海”,示威群众狂呼着各种口号,游行整个法界和南市中国界主要街道,参加群众的成份,除去法电工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棉织工人、挡磁工人、丝厂女工、橡皮厂工人以外,还有广大的小贩贫民。北区的开会地点,在中国界青云路商务印书馆附近空场上,这一空场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纪念。“五卅运动”、“三次暴动”及“反抗四一二屠杀”等事变,上海工人都多半是在这一空场上集合的。自“四一二”以来,国民党便把这一空场看成“禁地”,严厉地禁止任何群众会议在此地举行。同时,这一空场又恰巧在国民党五区公安局附近,自五区公安局因屠杀反日群众被捣毁以后,国民党更特别封锁进到这一空场的任何必由之路。当群众还未达到空场以前,国民党已经派遣了大批的军警及铁甲车,包围着广场的周围。到会的英勇群众,却不顾一切地冲破了层层军警阵线,占据了广场,举行起热烈的集会。散会后,举行热烈的示威。参加这一行动的主要群众是邮务、电话、黄包车、码头、丝厂、商务印书馆等工人,暨南等学校的学生,反帝同盟会员,文艺研究社社员与左翼作家联盟会员以及贫民小贩,其数量也共达一五〇〇〇人以上。沪中区在南京路、四马路、北四川路、新闻路等重要马路上,都举行着群众的飞行集会与演讲。在这一天差不多有六〇〇〇〇——七〇〇〇〇以上的工人、革命学生及城市贫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露天大会和示威游行。“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拥护共产党”的空气弥漫了全上海市,群众的威力,逼迫得国民党在报纸上及群众集会上

暂时地不敢公开进行反对“共匪”及“赤匪”的宣传鼓动了。在十二月一个月过程中，自北大南下示威团在南京举行示威以后，各地到南京示威的学生集聚到十万人以上的数目，这些革命学生群众不顾严重的军警压迫，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火烧了国民党中央日报馆，将国府卫队及卫戍司令部卫队武装完全解除了。

丙、运动中极明显地表露出群众的极大的斗争决心和勇气——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经常地是建立在劳苦群众的血海尸山上的；当着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到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是更加凶残地，更加无耻地实行白色恐怖的政策来维持他们的“秩序”。但是，英勇的劳苦群众及革命学生，在这一次反帝高潮中，充分表露出自己的斗争决心和勇气，他们绝不害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他们采取起各种可能与必要的斗争方式来进行战斗——从一厂、一校的演讲集会，市街演讲、罢工、罢课、露天大会、游行示威、直至武装行动（如反抗军警捕人的流血冲突，包围巡捕房及公安局，捣毁公安局及殴打国民党外交官及警察官，直至反日反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对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暴行，都随时随地地给以有力的回答和打击。例如：英租界巡捕房三次逮捕参加演讲和集会的工人学生市民，群众对它的回答是：三次包围巡捕房逼迫它立即释放被捕战士。国民党三令五申地禁止上海、南京及全国学生罢课和参加示威，群众对它的回答是：全国学生一律罢课，上海学生乘专车到南京去与南京学生联合起来举行反国民党的示威并打伤王正廷。国民党政府逮捕和枪毙七个宪兵学生领袖，群众对它的回答是：七百个宪兵学生自动解散，跑向全国宪兵及人民中去进行革命工作。国民党五区公安局屠杀了两个反日的工人市民，群众对它的回答是：立刻捣

毀五区公安局，毆伤巡官并号召组织人民革命审判法庭去裁判刽子手游伯麓、陈希曾、张群及蒋介石。广州公安局屠杀反日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对它的回答是：罢工、罢课、停报及三次包围公安局与广州政府，要求立即枪毙刽子手杜煊泰、陈庆云及处罚汪精卫、陈济棠，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广东政府关于公安局屠杀反日群众的布告贴出时，惹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怒，几万群众聚集在各处布告张贴处，把布告扯在手中纷纷奔向广东政府去质问汪精卫：“为什么不写‘警察屠杀人民’而写成‘警民冲突’？”结果层层包围起广东政府几点钟不散，继之以热烈的群众示威。十月十日，英日帝国主义派了十几辆铁甲车及几百个武装陆战队去压迫沪东区的工人集会示威，群众对它的回答是：夺回十几个被捕战士，打伤八个日本警察，用石头、砖块、木棍与铁甲车及陆战队战斗。日本帝国主义的“侨民武装队”及陆战队在北四川路撕毁反日标语口号，群众对它的回答是：流血的肉搏冲突，张贴更多的更激烈的标语口号。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凶横屠杀，群众对它的回答是：游击战争与武装骚动。此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运动中群众要求武装的情绪表现得极普遍极热烈，“工农贫民及革命学生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随时随地都可见到和听到，义勇军、纠察队、自卫队、学生军、反日救国军……等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工厂各学校各企业中组织起来。在一切集会示威中，都通过要政府立刻发给工人学生武器的决议，群众自动地搜取武装来武装自己。结果威逼得黄色工会领袖及大学校长都不能不要求政府迅速颁发枪枝。国民党也逼得不能不发五千枝枪械给上海大中学校学生，不能不选派军事教官到南京、上海各工厂学校去担任军事训练，不能不在上海、南京各学校各工厂举行军事

操练和添设军事课程。国民党报纸(如《上海日报》等)不能不登载“到兵工厂拿枪去”的论文,群众这种要求武装的热烈情绪和行动,给予了此次运动以新的内容和更严重的政治意义。

(三)这一运动使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的士兵革命化,一部分士兵革命化的事实,有非常明显的例证:(一)上海、广州群众与警察流血冲突的行动,都是由士兵引起和发动的,上海是由于闸北警察禁止北站铁道炮队士兵及护路队兵士张贴反日标语而开始的,始则警察与士兵肉搏,继而民众助士兵与警察进行流血的战斗。广州是由于伤兵捣毁贩卖日货商店与警察发生冲突,然后人民才因援助伤兵参加进去与大批警察血战。(二)闸北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当着群众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反帝国主义?为什么压迫人民?”等问题时,急得向群众作揖打躬,声明他们也是革命的,只不过不得已暂时还听长官的命令来作这些“对不起人”的行动。(三)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几千学生及士兵的几次武装示威,南京宪兵学生的光荣革命行动。

正因为运动本身含有上述这些主要特点,所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群众的反帝运动的新高潮。这一反帝运动新高潮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简单的现象。

载《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1933年苏联印行

署名:王明

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 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两个中国的对立

去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福建省交界区域里的一个城市(瑞金)里,开过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到会的有:

- 一、中央区
- 二、闽西区
- 三、湘赣区
- 四、湘鄂赣区
- 五、赣东北区
- 六、湘鄂西区
- 七、琼崖区

各苏维埃区内的工农贫民及红军兵士的代表,加上上海、武汉的区域工人代表,到会代表共有二百九十人。(只鄂豫皖苏区代表因战事阻碍交通及二十四军代表因路程太远关系,未能如期到会。)出席的代表们代表着八千万以上的居民,三十

* 本文最早发表于1932年《布尔塞维克》(俄文)第5、6期合刊,题为《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万以上的工农红军，百万以上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及各种游击队，几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和雇农。全国苏维埃区域已经包括了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领土。在这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八十一人，工农成份占极大数，人民委员会以十人组织之，下设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外交、内务、教育、工农检查各部。这样就把原有的中国鲜明地划成为两个根本原则相反的营垒：苏维埃的中国与国民党的中国。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特质，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明白地显示出来，这一宪法大纲是几年来中国红军苏维埃运动的宝贵经验的总合，是现时和最近时期的苏维埃区域政治经济生活的实际反映。

宪法大纲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任务第一条说：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阶级性说：

“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

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宪法大纲第二条)。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别规定逐渐实行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制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第九条)^①。

苏维埃政府对待帝国主义的关系是：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区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第八条)。

苏维埃政府下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是：

(甲)关于劳动改善方面是：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对失业的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第五条)。

(乙)关于农民生活方面是：

^① 这段引文有脱字，已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颁布的宪法原文订正。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第六条)。

(丙)关于一般经济政策方面是：

“中国苏维埃政权为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群众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地镇压中外一切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

(丁)关于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方面：

一 苏维埃政权选举：

“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要使工人、农民、兵士劳苦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律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作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

导广大的农民与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第四条)。

(戊)一般政治自由：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第十条)。

对于几千年来完全处在奴隶地位的中国劳动妇女，实行彻底的解放：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的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的生活”(第十一条)。

对于中国境内的弱小民族的关系是：

“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以及自己的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

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第十四条)。

对于全世界劳动群众,革命战士及苏联的关系是:

“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于苏维埃区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走到革命的胜利”(第十五条)。

“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受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第十六条)。

“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第十七条)。

由此可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是建筑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武装力量基础之上的反帝国主义反中国地主资本家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政府,是能够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中国几万万工农劳动群众从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少数民族由大汉族的军阀、官僚、高利贷资本家、投机商人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的唯一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政府,它不特包含有极大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而且充满着国际主义的革命内容。

国民党政府是国际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地主资本家的政府,是军阀制度与官僚制度的政府。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保障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及占人民极少数的地主资本家的利益的,是与人民中的极大多数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工人作十二——十四小时以上的工作,得到不足饱暖的饥寒交迫的工资,受着非人的牛

马奴隶的待遇；农民把百分之五十一——七十的生产品交给地主，还要受地主阶级的各种“非经济的”奴役；一般劳苦群众忍受着不可忍受着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剥削；不断的军阀战争，经常的经济恐慌，更使广大劳苦群众经常地处在饥寒、疾病、灾荒、死亡的状况之中。广大劳苦群众没有政治上最低限度的自由，罢工、罢课、罢市、抗租、集会、结社，都成为绝对禁止的行动，非人的白色恐怖，牺牲了成千累万的劳苦群众。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境内弱小民族经常地施行压迫和剥削，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同时，对于蒙、藏、回、瑶、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残忍的屠杀和压迫，对于高丽、安南、台湾、印度、菲律宾等的革命战士，经常地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给英、日、法、美帝国主义刽子手处死。

苏维埃的中国与国民党的中国完全是两种根本相反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每月、每日、每时都进行着武装的、非武装的、流血的、“和平的”斗争。

满洲事变与上海事变的发生，更加把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尖锐化到极度，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中，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向全中国劳动民众宣言说：

“兄弟们，姊妹们！苏维埃中国革命临时政府，向你们宣告：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革命政府，我们以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的独立与解放为目的，我们反对一切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公开与秘密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反对秘密外交，我们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中国去，我们主张没收一切帝国主义的银行、矿山、企业，我们否认一切外债，我们认为南京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卖国政府，他们没

有任何权力代表中国的劳苦民众。他们与帝国主义间一切交涉与协约，苏维埃政府一概认为无效。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中日一切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但是为了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了求得民族解放战争的实行与胜利，必须首先打倒反革命的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形式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统治！”（摘录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

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统治的区域里，热烈地举行着千百万群众的集会、示威，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反抗；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热烈地准备着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卫。

国民党政府在这些事变中告诉中国民众的只是：“不抵抗”，“镇静”，“等候国际联盟解决”，“静候美国主持公道”，“逆来顺受”。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中，从上海到广东，从北平到武汉，从南京到重庆，到处都流着罢工、罢课、罢操、集会、示威的反帝工人、学生和士兵群众的鲜血。

在这两种制度剧烈的斗争中，明显地照示出两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苏维埃中国正在扩大和统一——江西全省除了南昌、九江少数城市外，都成了红色版图。鄂豫皖苏维埃区扩大到原有几倍以上，闽西区、中央区与湘赣边已经形成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红军二军团、第九军、第六军已取得联系，鄂豫皖与湘鄂赣及其他苏区逐渐取得联络的形势，湘鄂赣豫皖形成打成

一片的苏区，已经是最近不远的前途。

国民党的中国正在缩小和分裂——国民党实际上分裂成广东、南京两个主要中心，原来的非国民党军阀纷纷脱离国民党而树立自己的旧旗帜——如吴佩孚的出山，冯阎系的大肆活动，孙传芳、张宗昌均跃跃欲试，东三省及热河形成了朝鲜第二……等等。

苏维埃政权日益壮大和巩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的改选和改造，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势力（江西 AB 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鄂豫皖的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湘东南的恋爱研究社等）的逐渐肃清。苏维埃政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宪法大纲等的制定和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的建立和巩固等等……。

国民党政权日益削弱和崩溃——南京政府的塌台，南京与广东各派的内部相互间的分崩离析更加剧烈，国民党政府及党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在十二月一月间除极少数的边区外，被工人学生及城市贫民的示威群众捣毁……等等。

苏维埃政权下的工农红军的日渐扩大和巩固——红军正式部队已超过三十万人以上，红军辅助组织的武装队伍——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警卫队等已经形成广大群众组织，红军的政治工作、社会成份、军事技术、战斗力量在冲破国民党三次围剿的战争过程中，都大大地增强了。

国民党的军阀制度却加速地在崩溃破产着——甲、广大士兵群众的投降红军和举行哗变；乙、国民党各派军阀都受到补充士兵的困难——冯阎等抽丁当兵，蒋介石企图以征兵制度来代替募兵，许多地方招兵旗挂得很久，结果招不到一人；劳苦群众宁愿作“盗匪”不愿替帝国主义军阀当炮灰；丙、主要

军阀的迅速削弱和崩溃——蒋介石在三次围剿中计动员七十万军队，被红军击溃和消灭的在二十师以上；张学良在满洲事变后大大的削弱了，冯阎军阀直到现在还未能恢复起力气来；丁、各派各系军阀相互间及内部的冲突矛盾与日俱长。

苏维埃和红军的政治威信和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最明显地莫过于：甲、上海一月十日、一月十七日、一月三十一日的几万工人学生群众大会及示威中，都通过了拥护红军及苏维埃的决议和口号；乙、在北大南下示威团及济南南下学生示威团的几千学生中，高呼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结果逼得国家主义分子也不得不与群众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丙、上海、香港、满洲等工人选派代表到红军中去，进行群众的募捐慰劳红军运动等等。

国民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日益破产和减弱——最显明地莫过于：甲、国民党的一切报纸都不能不公开地宣布“党治末日”，都不能不承认“国民党统治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乙、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厌恶心理与日俱增，公开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禁令而自动地组织起来和活动起来（如国民党禁止工人组织反日会，禁止军队参加反帝运动等等的命令等等，都受到可耻的失败……）。

在这两个中国显明对立的斗争中：明显昭告全世界及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只有苏维埃能把中国从痛苦和贫困中解救出来”（斯大林）。

在英勇的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以后，事实上使全世界和全中国的劳苦民众相信：新兴的日益向上发展的苏维埃的中国绝不是腐朽的日益向下崩溃的国民党所能战胜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一切反动派别在苏维埃中国的伟大威力前抖颤着！

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是决定现在国际全部政治生活的第一等重要因素；在这种两个世界的斗争中明显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远胜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是决定中国目前全部政治生活的第一等重要事变；在这种两个中国的斗争中，明显地证明苏维埃制度必不可免地要完全战胜国民党统治。

（二）瓜分中国与民族革命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进攻上海的事变的原因，从中国内部事变发展的过程看来，首先就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在三次围剿红军失败及全国反帝运动高涨以后，已经失去为帝国主义“保障在华利益安全”的能力，帝国主义者不能不对蓬勃发展的中国苏维埃化的运动加以公开的武装干涉，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之时，公开向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宣言是：日本的对华行动，是预制远东的完全赤化的危险；从国际环境的观点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行动，即是进行武装进攻苏联的直接步骤，在满洲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日本陆军武官曾亲到南京说明“对俄必须先对华”的理由，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强盗行动，本身包含有帝国主义强盗间的争夺中国市场的剧烈冲突；此外，日本政府这种行动，同时即是企图把本国广大工农劳苦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转向对外，并且利用所谓军事环境来更加加紧对于本国劳苦民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进攻，因此，日本武装进攻中国的事变，绝不单独中日两国的问题，而是一切帝国主义者

企图用战争政策来从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危机中找寻出路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过执行全世界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进攻苏联，进攻本国工农劳苦民众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苦民众以及燃烧起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先锋队的作用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这种可耻的反动行为，是得到第二国际英雄以及其各支部的积极参加和赞助的。日本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片山哲最近所著的《日本无产阶级应如何视满蒙问题》一书，便是日本社会民主党及整个社会民主国际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积极准备、参加和拥护的最好供状。他在这书上对于中日战争问题说：“吾人自无产阶级之立场言，日本在满蒙经济活动的自由，乃为日本国民生存最少限度的要来，同时亦定为其权利，如有根本上欲拒绝我之势力者，当断然与其战争而无所踌躇……”（四十页）“……吾人认为满蒙经济活动之自由，乃我无产阶级生存不可缺乏的条件，吾人在此等确固信念之下，反对吾人被逐于满蒙者也”（三九页）。对于进攻苏联战争的必要说：“日本人苟自满蒙完全退却，我国之经济破灭迫在眉睫，姑勿庸论，抑尚有预须考虑之重大问题，即因此所受之政治影响是也。假令吾人自满蒙退却，其后将由谁继欤？此勿待言，其即刻握有政权者当为张学良氏，抑彼绝不能担任开发满蒙资源之重任，甚或因其执政反致资源荒弃，盖满蒙开发，首须重大资金，张学良固无此项资金，即吾人预想之天津、浙江等土著资本家或对彼加以援助，虽如此亦尚不为优裕，因而不能不赖外国资本之吸收，则提供此资本金者将为何国？美国乎？抑英法乎？但在满洲拥有实力之苏俄当推捷足，盖苏俄进取满蒙之态度，其热烈绝非英法美之与比论者也（?!）。假令其在满蒙苟能前进寸隙，则宛如水之涉下，不移时而即倾注浸入，苏俄虎视眈眈，窥视满

蒙，殆远超过于吾人所想象，其跨越茫茫旷野之西伯利亚，纵断无有涯际之满蒙，进逼大连之形势，在今日政体离异，而为帝制精神则非无异乎？……苏俄今日犹雌伏晏然静待时机者，盖因日本势力存在于满蒙之故，苟日本一旦衰退或被驱逐，则苏俄被常久积压之高度蒸汽，将时不稍待，而立刻以猛烈之势整个放出，此吾人不难想象者也……”。

中国的广大劳苦民众对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与其走狗——社会民主党英雄们的这种可耻的企图，给以直接有力的反抗。在满洲事变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便马上提出如下的具体主张——“以武装人民和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来保障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号召“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向广大群众指出：“推翻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一战争胜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唯一的彻底的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政府，红军是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主张，很快地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和拥护。满洲的广大工农兵贫民的反日游击战争，上海的工农兵贫民学生等的反帝战争，全国各地民众反帝反国民党的群众革命运动不断地高涨，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突进的扩大，便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主张的开始现实化。

只有千百万群众参加，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制止中国完全被日英美法各帝国主义者瓜分完结而成为奴隶牛马的命运！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主张和口号，曾经受到党内党外敌人不少的反抗。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为中国现时的政治形势还

未发展到群众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阶段，他们以为“谁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底残余”。这些机会主义的分子完全不了解中国现时政治生活底特点，完全不了解在两个中国对立的形势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武装占领中国领土和屠杀中国民众的情形之下，在中国千百万民众之前提出非常明显的问题：或者完全永远变成日本及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奴隶，或者起来作直接武装的反抗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他们不了解千百万群众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目前中国民众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式。

党内党外的另一部分分子，企图用早已被列宁彻底驳斥了的卢森堡同志底错误理论来作为反对民族战争的武器，他们以为在“中国这样被国际帝国主义划分成一定势力范围的国家内，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争是民族的，但是它一定要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合乎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集团底利益”。这些分子完全忘记了列宁同志对卢森堡同志错误的最好批评，他们记不得列宁所说的：

“民族解放的战争，例如波斯印度中国联合起来反对那些帝国主义的列强的战争，是完全可能和可靠的，因为，这个战争是从这些国家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同时，这个战争是否会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帝国主义的战争，那要以很多具体情势为转移，担保这些情势之到来，那是可笑的”（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四四〇页）。

他们不懂得：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底基本原理，就在于：自然界和社会里面的一切界限，都是相对的和变动的，没有那一个现象，不能在某种条件之下而变为它的反方面去。民

族战争可以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帝国主义的战争可以变为民族的战争”(同上)。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之下，如果反日战争被南京政府、广东政府或其他类似的军阀派别取得领导和不仅没有而且反对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参加去进行，则这个战争虽然在开始时虽然表面上是民族战争，结果不仅是可能而且必然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首先是日美战争，在目前国际局面之下，日美战争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变为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但是，如果这一战争是中国工人兵士农民学生等广大群众反对着中国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进行，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日益卷进千百万的民众，则这一战争将由开始是反日战争转变为中国广大群众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及非国民党各派别军阀政客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任务，就在于自始至终地用一切力量和信心去号召、组织与进行真正卷有千百万广大民众的反帝解放战争，用一切力量去制止和妨碍把这一民族战争变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任何企图；但绝不是因为害怕这一战争会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于是便根本放弃或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党内党外的懦怯分子们，拿另外一种理由来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就是以为民族革命战争没有胜利的可能；因此，不应当去作这一明知不可免地要遭受失败的冒险企图。这些失去对革命胜利信心的取消主义的分子，在帝国主义庞大武装力量之前害怕得发抖。但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塞维克却完全不仅不能同意而且要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主义观点到底。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中国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是有胜利可能的。列宁在上举一文中说：

“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是不可免的、进步的、革命的。不过它底胜利，当然应有：或者是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例如我们引作证例的印度和中国中几万万人民底综合的努力），或者是国际状况底条件，有特别顺利的联合（例如帝国主义列强底因为它们的削弱，它们底战争，它们底矛盾等等，足以阻止它们的干涉行动），或者是各伟大列强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同时作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

我们必须明白地了解：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能否胜利的问题，即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最残凶的最强顽的和最后的敌人，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镇压和干涉，则中国革命便没有最后胜利的希望。怀疑和否认中国革命有战胜帝国主义的可能的分子，或者变成公开的悲观和失望的取消派（如托陈派罗章龙派等），结果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而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或者在“左倾”词句下（例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同时一齐胜利）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结果放弃和忽视反帝运动的领导和党的当前战争任务（如李立三路线），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我们必须对于中国革命能否胜利（首先能否战胜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个彻底明确的了解；这一了解在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没有这种明确了解，便不能确立我们组织、领导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坚信，便不能使我们相信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大巨流汇合起来的苏维埃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到底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有否使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呢？试把胜利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环境与中国目前革命环境一般地来作一个比较，

便不难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据斯大林同志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环境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情势，就是十月革命开始的时期，是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间正进行拚命斗争的时期，此时，这些集团，因为忙于进行彼此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抽出严重的注意来进行反对十月革命的斗争。这个情势，对于十月革命，曾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能以利用帝国主义内部剧烈的冲突，来巩固，来组织自己的力量。第二个情势，就是十月革命底开始，正在帝国主义战争底进程中，此时被战争所苦恼而渴望和平的劳动群众，已被事实底逻辑本身，推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推上了摆脱战争的这个唯一的出路。这个情势，对于十月革命，也曾有最严重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得到了强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它能够易于将苏维埃革命与受人痛恨之战争底结束，联合起来，因此，它并给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以及东方工人被压迫民族中间，造成了群众的同情。第三，就是在欧洲具有强有力的工人运动，长期的战争，在西方以及东方，造成了革命恐慌正在成熟的事实。这个情势，对于俄国革命，曾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保证十月革命在自己反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俄国境外得到了忠实的同盟者”（《十月革命与布尔塞维克底策略》）。

同时斯大林同志指出，十月革命在国际环境上，还有一个弱点，即是：

“……十月革命曾有相当的孤独性，俄国邻近，并没有十月革命可以恃为依靠的苏维埃国家”（仍见前处）。

中国革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比起十月革命来一方面没有全部类似十月革命的优点，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与十月革命时所类似的以至十月革命时所没有的弱点。首先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现在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爆发的环境——但只才开始(如满洲事变，上海事变)的环境，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们还未曾实行相互间的难分难解的拚死命的战争，它们还有时间，还有财力来干涉中国的革命，此其一；第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国际帝国主义者(首先英、美、日、法等)经常握有中国的重要经济命脉(银行、矿山、航路、重要工业等)，经常屯驻有海陆空武力在中国一切重要口岸和城市；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武装干涉，在中国革命未曾在主要区域胜利以前，就成为无法避免的行动；这比起十月革命在俄国胜利后才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情形要困难得多了。而且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的半殖民地，中国革命遇到的敌人是整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统一反革命战线。这种情形也不能不引起中国革命更多的困难和需要更大的努力。第三，社会民主党完全法西化，公开地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苏联及中国革命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然而无论如何不应忽视和忘记了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时类似的以至十月革命所没有的优点，这些优点之中，最重要的有：一、胜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存在，而且在中国与苏联恰恰是亲近的邻国；二、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存在和发展——在十月革命时，世界无产阶级的原有组织宣告破产，工人群众处在混乱散漫的状态；三、布尔塞维克战胜帝国主义干涉的宝贵经验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所得到的痛苦教训与党

悟；四、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常的几千万的失业工人的斗争及殖民地(印度、南美洲、安南等等)国家革命运动一般的高涨。与十月革命时所类似的国际环境的优点则有：一、欧洲许多重要国家中革命危机(西班牙等)及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的成熟(如德国、波兰等)，在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发展着有力的工人运动，同时，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如印度、安南等)经常地发展着群众的罢工、示威和暴动；二、中国革命目前处在帝国主义相互间大战——特别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中国革命——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实际上是“以战争反对战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这就可以博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的深切的同情和赞助。三、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虽然还没有公开战争起来，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已到极点；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不能不减弱它们的地位，不能不被革命方面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利用。

这一切国际环境的优点，不能不是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中国革命的国内环境中所有的使革命有胜利可能的优越条件，主要地有下列几种：

一、中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几万万的广大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的世界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

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对军阀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及大多数士兵群众作同盟军。

三、革命的国内主要敌人是对内对外政策已经宣告破产而且为广泛群众的土地革命，反帝运动和工人斗争所震撼了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派别(从国家

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等)都在苏维埃革命及反帝民族战争过程中宣告破产;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有力维持,革命或者已经把国民党政权推倒了。

四、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大和年龄老,中国无产阶级的奴隶生活地位及其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使之舍革命外没有其他可能的道路,这就使共产党较易于取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使无产阶级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

五、中国无产阶级有千百万广大破产、失业、饥饿、贫穷化了的半无产阶级的成份作亲密的同盟军,城乡阶级斗争都极明显而且尖锐。

六、中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军阀官僚制度斗争和主张民族自决的政纲中,能够取得几千万满、回、藏、苗、蒙、瑶、黎等弱小民族的同情和赞助。

七、中国革命在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临时中央政府和为这一政府支柱的几十万工农红军,并且有占全国土地六分之一——五分之一的面积的苏区根据地。

八、中国共产党虽然比起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布尔塞维克来还比较幼稚,但中国共产党有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已经有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的经验,三十万以上的党员,能够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党的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

九、中国地理上有三大优点:甲、与苏联接近;乙、离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远(日本除外),中国附近周围大部分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丙、中国的幅员虽然没有俄国大,但她也是世界上领土广大的国家之一,在军事上有伸缩自如的余地;物产对于生活程度很低的中国民众能够供应较久的军事行动的时期。

当然，我们绝不否认而且应该特别注意中国革命内部环境的主要弱点，例如：一、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实际上武装占领了中国全国中各主要城市和口岸；二、革命运动发展得不平衡；三、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四、共产党的力量及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比革命的客观形势的需要来还要落后……等等。

然而从国际环境及国内环境一般看来，中国革命是有战胜国内国外的敌人而取得胜利的可能与保障的。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中国整个革命运动中的最主要组织的一部分，它能否胜利的问题，应该以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问题来作出发，只有在尽力发展土地革命、劳资斗争与反帝运动的广泛坚强基础上，才能动员几千万万的广大中国群众自求解放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广大群众的力量是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保证。

上海战争，给了上述争论问题一个最有力的答案。它首先就给了那种以为中国民众还没有要求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与勇气的右倾观点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民众反抗日本占领上海的英勇战争，已经继续一个月以上。中国民众这种伟大无畏的勇敢、牺牲、坚决、奋斗的精神，给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劳苦民众以莫大的兴奋。它唤醒全中国及全东方民众对于自己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勇气，大大地打击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威信”！

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在实际行动上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正确，不仅证明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的民族战争，是可能的与必然的，而且证明民族革命的战争的胜利是有可能的。坚持一个月以上的上海战争告诉了我们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战争中享有一切军事优势——从兵力上讲，日本参加作战

的海陆军兵士已达六〇,〇〇〇以上的数目,中国陆军参加作战的数量也不过如此;从技术上看,日本有二〇〇架以上的重炮,中国方面不过一五〇架炮,日本有一五〇架飞机作战,中国方面不过五〇架。以地势上看,日本军队拿上海公共租界作根据地,因此,日本的后方不仅是日本的军力,而且有英美法各强盗们作后盾,日本军队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不用顾虑到中国军队的进攻日本在租界内的阵线;日本在地势上处在“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优越地位;中国军队方面在地理上明显地处在非常困难的地位,中国军队因各方面关系不能越公共租界一步,中国炮火不能袭击日本军队的根据地和后方,此外,十九军士兵还须时刻担心着蒋介石派来的军队乘机在后方缴他们的械(蒋介石派三旅人到上海缴十九军的械,因十九军士兵与日本作战,兵士不仅不缴他们的械,而且帮助十九军士兵作战)。在上述这样军力对比的情势之下,中国阵线能够坚持一月以上,在相当程度和范围讲,已经是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何况日本军队曾经受好几次的惨败,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呢!(此外,我们必须估计到,在上海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武力方面还有极多极大的弱点,例如:一、十九军士兵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还不坚强,士兵委员会的领导作用还不够;二、参加作战与扰乱敌人后方的群众数量及工作还不充分;三、上海各区的工人与近郊的农民还未能作广大的动员;四、上海以外的工农兵贫民学生还未能对上海战争加以应有的足够的援助和响应……等等。因此,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了这些弱点,如果我们的党能够取得、实现和巩固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如果我们能够动员、组织和调动千百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前线 and 后方去作战,那么,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有极大的可能的。)

上海反日战争为什么能够坚持一月以上而且取得部分的对日胜利呢？谁是这一战争的领导者及组织者及参加者呢？国民党南京派公开反对和妨害这一战争，直到现在蒋介石及徐谟等还公开宣言：“中国无论从何种方面观察，都不能对日本作战”，“对日绝交或对日宣战，等于自杀政策”等，蒋介石当日本进攻上海时，公开下令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和不许抵抗，及至十九军兵士自动抗日时，不允许其他军队和航空队去帮助十九军，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南京派国民党不是这一战争的领导和组织者，而是反对者，已经毫无疑义了。在最近的中外报纸上，时常看到孙科、陈友仁大叫对日宣战主张，于是有些人便以为广东派国民党是赞成或组织上海战争的，实际上究竟是怎样呢？广东派国民党在满洲事变前当蒋介石特派蒋作宾使日时，曾经特派陈友仁赴日本进行“中日亲善政策”，满洲事变是预先得到广东及南京国民党双方同意的。因此，当满洲事变发生后，全国民众在反对整个国民党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和投降帝国主义怒潮中，特别反对广东派国民党，指骂孙科、胡汉民、陈友仁、陈济棠等广东派领袖是勾结日本出兵满洲的直接罪人，陈友仁在广东也与南京王正廷一样，受了工人学生示威群众的一顿毒打。当所谓“宁粤统一”告成的时候，孙科、陈友仁等因为受民众反对及蒋系实力压迫而退出南京政府，于是乃装腔作势的说：“我们辞职的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反对对日绝交”，事实上不过是他们一种骗人的借口。此其一；第二，当十九军兵士及广东军其他部队英勇地向日作战时，他们不能不说几句漂亮词句来维持士兵群众对他们的幻想；第三，当上海战争得到部分胜利及全国民众反帝反国民党高潮怒发的时候，他们想用这些“左倾”词句来作投机的事业，想以此来积累一点政治资本去维持行将塌台的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事实上他们一样是上海战争的反对者。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原来依附广东派军阀陈济棠，现在又投降在蒋介石怀抱里亲吻，现在他当然以蒋介石的主张为主张，说“对日绝交，对日宣战均为不可能之事”。

十九军的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或者投机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是这一战争的领导者吧？不是！他们的参加作战，纯粹是“不得已的”（被兵士及民众的压迫），而且他们时时刻刻准备找投降和休战的机会，二月九日《大公报》所载《守沪军抗日记》中明白写道：“……沪市商界及银行界领袖，深恐战争扩大，地方糜烂，且足以影响商业之年关总结，特派代表赴十九军司令部谒蔡军长，敬致慰劳之意，并劝以息战，请由外交方式解决兹事，蔡军长当时接受，但以日兵进攻益急，迫不得已乃亲赴前线指挥……”二月一日上海的《反日民众》报上载的《上海各工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宣言》上说：“……在革命武装群众和革命兵士拚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北站作战的时候，十九路军的长官蔡廷锴等和无耻的国民党市政府竟和日本领事谈判退兵议和，但是革命的士兵是在拚命和帝国主义作战，而且节节胜利了。在这种情势下十九军的官长蔡廷锴、蒋光鼐和一切失意的军人张发奎、黄琪翔等又想用革命士兵的血肉和我们革命武装群众的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用卖国贼马占山用过的方法去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的兵士，实行投降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现在战争的组织者既不是国民党任何派别，也不是上海资产阶级，也不是十九军的官长，而且他们实际上都是这一战争的反对者。因此，谁宣传“上海反日战争是国民党领导的，上海战争是国民党的政策的继续”，谁便是有意地在群众中散布国民党“还能领导反帝革命”的幻想来麻醉群众的

觉悟。

究竟什么人是上海战争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呢？

在满洲事变一开始时，提出“以武装人民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解放、独立与统一”的主张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事变一开始时，提出：“工人，市民，学生们，士兵们！自动作战起来，自动武装起来，保卫革命的上海”的主张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上进行号召、动员与组织工农兵贫民学生群众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上海战争虽然还不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但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现。虽然运动的本身主要地还是极大的自发的性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战争还有一部份的组织上领导作用，共产党所号召、组织与领导下的工人、贫民、学生群众是这一战争的积极参加者。

开始作战的不是十九路军，而是闸北的邮务、商务和丝厂工人的武装队伍，十九路军兵士是在这些工人武装反抗的热情之下激动起来参加作战的。

上海工人群众是这一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据二月九日《大公报》所载的《守沪军抗日记》上说：“其最激发国人爱国心者，为华租两界之多数劳工界同胞，均奋不顾身，响应十九路军，担任种种后方工作，誓与日浪人相抗抵”。据二月一日上海《反日民众》报所载：“上海工人于一月三十一日宣布总罢工，成立了全上海工人抗日罢工总同盟委员会”及日本报上均屡载“妇女积极参加作战”（闸北是丝厂区域，有六万以上的女工）。《反日民众》报载该报记者在与十九路军士兵战地谈话记中说：“该地一带贫苦民众俱未搬走，帮助士兵搬运煮饭，……民众士兵一致，但闻他们谈有钱的人二十五日就跑光

了，……能拚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只有我们劳苦人民和兵士”。在上举《守沪军抗日记》中说：“日兵无法乱窜，同时我方临时集合之义勇军及便衣队，沿北四川路各巷内突出袭击，日兵便衣队猝不及防，遂向东败退”。此外，各大中学义勇军均参加运输、慰劳及作战，吴淞附近农民已实行游击战争扰乱日军后方。

上海工人、兵士、学生、贫民、农民的在战争爆发就形成了自己的领导组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站在上海工农兵贫民学生后面的是中国广大群众的反帝高潮。上海反日战争是中国民众百年来反帝运动的政策继续，是万宝山惨案以来的反日罢工、罢课、示威及群众武装向前发展的运动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游行、游击战争、日本士兵因本国革命斗争及中国革命怒潮的影响而发生动摇以至同情中国民众（例如奉天的二百日兵暴动，上海几百日兵不愿作战，日本国内工人农民革命学生的反战争的罢工、罢课、示威运动等），也是上海反日战争能够坚持很久和部分胜利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上海反日战争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可以由十九路军革命士兵的反日宣言及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罢工纲领中的主要各点，便可完全看出。十九路军革命士兵的宣言说：“（一）中华民众，全体总动员协同军队杀日贼；（二）民众杀贼的手段，就是在贼后方割电线，拆桥梁，断贼的交通，在租界罢市罢工，绝贼的接济，民众应各人拿起菜刀、锤斧、手锤、木棍、石头向日贼一齐进攻；（三）民众们，军士打贼前，你们攻贼后，一齐歼灭日贼，没收日贼在我国的全部财产，交由民众自由使用，民众们，起来助军队任运输，探消息，抬伤兵，扰敌人，此次决战，是我们民族生死的关头，各界民众一致团结起来，对日本

贼进攻,争最后的胜利;(四)我们专一的目标在压迫我们的日贼,其他各文明国人应切实亲善;(五)日本被压迫的工农兵群众,我们要保护他们并帮助他们回国去革命,打倒天皇及军阀;(六)欢迎朝鲜、台湾各民众起来革命……”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纲领中主要点有“(一)武装民众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中国去,自动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二)武装民众,推翻出卖中国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三)取消一切压迫工人限制工人自由的法律命令,实行真正保护工人的劳动法,确定工人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信仰的完全自由,不受政府及国民党部的任何干涉和束缚,释放一切被捕工人,启封一切被封工会……”这纲领共十条,其他七条均为工作时间、待遇、工资及失业接济、社会保险等要求。

当上海反日战争得到部分胜利及坚持很久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首先就是美国)及国民党各派都企图利用这一民众英勇事业来有利于他们的要求。他们到底是企图把上海战争变成日美资本之间的战争,或者使上海反日战争在国民党进一步投降及各帝国主义利益均沾的条件下暂时结束,以便共同去压迫中国革命怒潮和准备进攻苏联战争以及最近将来自己相互间更大的冲突,还要看许多具体条件来决定。当然,他们首先企图达到的目的,是建立各帝国主义的统一反革命战线去反对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因此,他们对于上海反日战争的利用企图还是小于他们直接破坏这一战争的企图;因为上海反日战争是在最大工人中心城市的群众革命行动,在上海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人中心城市里和共产党势力及影响最大的一个工人中心区域里,反日战争多坚持一天,不仅是对日帝国主义多一分打击,而且是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威信多一分打击;

同时,就是使中国民众革命化的过程更加快一分,使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和勇气更提高一分。然而无论如何,绝不能因为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希望利用的企图,便否认上海反日战争的民众性和革命性,便害怕向前扩大深入和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共产党及每一个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在于使上海反日战争发展成为更有组织,更广大范围,更有广大群众参加和更加在共产党政治领导之下的千百万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战争的本身和果实为任何帝国主义及中国任何反动派别(国民党、国家主义等)所利用;只有如此,才能使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破坏和扰乱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阴谋归于无效;才能使民族战争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和胜利。

上海战争之所以能够如此持久及得到部份的胜利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一反日战争的革命性与群众性。很明显地,第十九路军在过去一年中没有一次能够在江西战胜技术比它还落后的中国工农红军,而且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今年初它竟能以战败后重行纠合之众,抵抗武器精良及有其他一切优越军事条件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一月以上,而且有好几次打败过日本军队。同是一个军队在异时异地的一种环境下,便能表示出完全相反的战斗力,其中关键,就在于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及它为什么目的而战来决定。

被中国工农红军打败后的十九路军兵士,在广大群众帮助和拥护之下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时,能够敌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这就一方面表示出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近代战争的第一个决定意义的条件,另一方面证明我们的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

“我想红军已作的一切，红军的斗争及其胜利底历史，对于东方一切民族，将有伟大的意义。红军的斗争，向东方各民族指明：无论这些民族怎样薄弱，无论利用技术上和军事技术上一切机巧的欧洲压迫者底力量，看来如何不可战胜，——可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果能真正地唤起几百万的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它即具有这样一种可能，具有这样一种神力，竟使东方各民族底解放，不仅从世界革命之前途看来，而且从直接的军事经验看来，现时都是完全可以实际实现的，这种军事经验，是曾受帝国主义一切强大国家军事之进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亚洲，在西伯利亚所已经造成了的”（见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全俄代表大会上列宁所作的演说词）。

列宁的这种种预言在上海反日战争中开始证实了。如果上海反日战争能够唤起更广大的真正千百万劳苦群众与被剥削者积极参加，如果这些群众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团结在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周围，它的胜利是有可能的。

据今天报纸的消息，上海的十九路军英勇的士兵以及武装的工农贫民学生队伍，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捣乱后方（例如蒋介石不派接应队伍，不供给粮食，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秘密谈判，收买和威胁将领们下令退兵，用机关枪大炮在后方威逼兵士撤退等等），不得已，有秩序有计划地退出上海闸北、南市与吴淞区域。这一退却，绝不是表明中国民族战争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而只是证明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正确——推翻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和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使广大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深切相信：国民党的任何派别及其高级

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之中有些是公开无耻的投降者——如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张景惠、熙洽等，有些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如马占山、孙科、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黄琪翔等。他们之中有些是不战而降的奴才，有些是利用民众英勇牺牲的热血来与帝国主义讲生意。只有真正人民的工农兵贫民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彻头彻尾地为中国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解放而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第十九军士兵及武装民众因蒋介石、汪精卫各帝国主义如此捣乱后方在上海的暂时退却，当然是民族革命战争整个战线上暂时的部分的损失，然而民族革命战争运动绝不因此便完全停止或完全消失，相反地，将因此而更加激起中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的忿恨，将因此而更加使千百万群众根据上海反日战争教训而更加有决心、有勇气、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去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帝战争；因马占山的叛变而激起满洲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与震动全世界的上海反日之战，因此次国民党的无耻叛变，将激起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更坚决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巨流，这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前途。

（三）中国革命形势的生长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主要任务

在两个中国斗争尖锐化，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广大群众在许多最重要的城市中心的罢工、罢

课、示威和捣毁国民党的国家机关，以及全国国民经济破产和八千万的灾民决死奋斗等等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确切断言：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的统治已经不能照旧不变的统治下去，而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忍受它们的统治，正在起来为推翻这一反动统治而斗争。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及被统治阶级不愿和不能再忍受这一反动统治的情形，在统治阶级各派的言论机关中都不能不公开承认了。任举一例，都可证明。例如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公报》社论——标题为《送民国二十年》上说：“奇耻巨痛危险暴露之民国二十年，尽于今日。然而国家之痛与耻及其危险，则不与今日以俱尽。国民于送此不幸之民国二十年，更须决心担负今后一切之危险，以勉求舒痛雪耻之道。顾当此岁尽之日，愿与我亲爱同胞作悲痛之回顾与前瞻。时至今日，证明此二十年来之民国建设，彻底失败；人无论南北，党无论新旧，曾经或现在参预政权军权者，皆负此失败之责任，而为国家罪人，权愈大者，罪亦愈重焉。夫二十年来所虚耗之光阴，诚万劫莫挽之痛事。民族立国，本无幸致者，况复自摧残之。中国之获存，非己力也。故一旦暴日凭凌，而危象全露，粉饰之新政，真相揭穿，悲壮之士气，于事无补。盖诚如南宋之状，而当局之拖延挡塞不负责任尤过之，此入谋不藏，不得咎环境与运命也。今年一年，在种种方面，表现山穷水尽。第一，近年国民党施行训政，同党内哄，纠纷莫解；最近虽京粤言和，统一再见；然而领袖全未入京，人才不能表现，以势度之，新阁殊少艰任巨肩之力量，而后顾茫茫，暂时又别无可以寄托全国信仰之制度人才（只以地主资本家的阶级眼光看是对的——作者附著），此政治方面之穷也。第二，中国民穷财尽，非一朝一夕，然近年实业不兴，游资集沪，故公债发行，反得便利；五年来超

过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然而尽耗于炮灰。至今年夏季,上海市场,已无以应国库之需求,故当统一政府开幕之日,殆公债财源已竭之时,此财政方面之穷也。第三,连年西北多灾,今年东南大水,其灾情之重,区域之广,乃半世纪来所未闻。被灾人民竟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自秋徂冬,惨状日烈,然而暴日之为祸,遂使救灾事业,不能全力进行,当此严冬,凌寒受饿,困顿待死,至少有数千万同胞,此民生方面之穷也。有此三穷,而横来日本侵略之祸,占领东三省,而借口保侨;肆戮吾民,而借口自卫。此诚乘我灾难而肆其侵略邻邦之大欲。不惟民国二十年所未经;实通海数世纪所创见。既因内忧而招外患,复因外患而增内忧,相互煎迫,以至此民国二十年之末日……”。的确,中国统治阶级之“耻痛与危险”,实在未曾与“民国二十年末日以俱尽”,民国二十一年虽然还只两个多月的过程,然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之统治比起民国二十年来还要更加危险,日本占领上海事变,不特不能消灭或减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危险,而且更加速这一反动统治塌台的过程。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有充分根据来估计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是:革命形势已经不但包括着湘、鄂、赣、豫、皖、闽等省的许多主要区域(在那些区域里,有些地方已经胜利地发展着苏维埃红军运动,有些地方正在进行着推翻国民党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制度的斗争),而且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许多最主要中心区域里(如上海、南京等区域)正在成熟着或生长着革命形势。

“并不是每一个革命形势都产生革命,只有对于上述的那些客观条件再加上主观条件的那种革命形势才发生革命,就是:加上革命阶级所加于革命行动的力量,使革命行动成为真正有力量的,能够摧毁(或者打毁)旧有的

政府,这种政府即使处在各种危机的时代,如果不‘推倒’它,是不会自己‘塌台’的”。(《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九页)

因此,对于每一个列宁主义者,当估计到革命形势时,绝不应丝毫忽视主观力量的条件,只有有了上述的主观条件,革命形势才会产生出革命。

对于中国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关于客观条件方面,无论党内外,都很少争论的余地;因为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乃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对于主观条件的问题,时常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一个革命阶级,它的力量能够使革命行动真正达到推翻旧有的政府而代之新的政权的统治呢?

共产党的一切敌派(从国民党到托陈派)及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有!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少,年龄幼稚,能力薄弱;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很幼稚,共产党既没有俄国的列宁、斯大林那样的领袖,又没有能够管理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材。因此,即使中国有了客观的革命形势,结果也不会产生革命”。国民党及其走狗们——第三党、托陈派、人权派等,用这种理由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用这种理由来反对党领导工农兵贫民夺取政权。

然而,在我们列宁主义者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中国革命形势中不可否认的主观的主要动力而且是领导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比起全国人口总数来占少数,然而它的生产地位、经济地位及政治地位都决定了它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坚决最革命的领导阶级,它的力量绝不限于三、四百万的产业工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二〇,〇〇〇,〇

○○的雇农及千百万的手工工人都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战斗员；它比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老而力量大，它的先锋队虽然年龄幼稚，然而在它存在的十二、三年当中，经过了伟大的历史事变，获得了丰富的革命教训。中国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领导之下，曾经领导过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曾经举行过著名全世界的省港罢工，曾在上海举行过三次武装暴动打败直奉军阀，曾经武装收回汉浔英租界，曾经领导湘鄂赣几省几千万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曾经以武装暴动在中国南部一个最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广州)里建立起苏维埃政府，曾经并且正在领导着几千万人民的苏维埃红军运动，在中国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领土内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它本身虽然还没有如列宁、斯大林那样伟大的领袖，然而它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领导，它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集体领导——中央和几十万英勇奋斗的布尔塞维克党员。它有能力立刻吸引千百万工农兵贫民劳苦民众参加管理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千百万工农兵贫民群众自己管理国家机关的能力，要比几十万地主资本家的军阀官僚政客豪绅的力量要大无数倍。俄国无产阶级在地球上占六分之一的领土内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彻底地打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教师们所宣传的，工人阶级还未到夺取政权的程度的谬论，证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经领导农民及其他劳苦民众在六分之一底中国的领土内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苏维埃人民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然而，这还并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力量及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以及它与其他劳苦群众的联

系性比起客观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已经足够，很明显地，主观与客观条件相互比较起来，主观条件还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然而，从此所得到的结论只是：怎样加强主观条件的努力使之尽可能地赶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而绝不是根本否认主观条件的存在。

革命形势在中国生长还是不平衡的，在中国有些区域里还不过正在生长着革命形势的那些必要先决条件（例如北部、西北部、西南部许多区域等），在有些区域里正在成熟着或者正在生长着革命形势，有些区域里早已成熟过这种形势了。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在目前形势下已经有了部分的克服，但这一弱点在目前依然值得严重的注意。党在决定自己的主要任务时，首先就需要善于正确地估计到各区域革命运动发展的范围、程度等具体的特点，根据每一个主要区域的具体形势来决定和执行党的任务。

在目前形势之下，党的总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尽量使主观的力量赶上客观的发展，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两大革命巨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汇合起来成为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及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统一，来取得中国工农兵贫民劳苦民众的自由与解放。

在这一总的任务之下，党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尽力把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运动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联系起来，利用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来实现巩固、扩大与统一工农红军与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彻底肃清苏区内部各种反革命团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等），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占领我们能够占领和能够保守得住的比較重要的中心城市，把中华苏维埃人民

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在这种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里建立起来，给予全中国反帝民众一个新的真正反帝国主义到底的政治中心，使他们不要因国民党的再三无耻投降而根本对保障民族独立解放与国家独立的伟大事业失望，使他们认识和相信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到底的政府，在这一政府领导之下，能够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保障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使广大民众认识国民党把成千累万的军队不用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而用去打人民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和人民自己的武装（红军）的罪恶，使他们相信，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使千百万民众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彻底地实行苏维埃全国大会通过的一切法令，尽可能地改善工农劳苦民众的生活状况，使苏维埃中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与国民党统治区域完全明白对立起来，以此把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斗争更亲切地联系起来。

在非苏维埃区域里，首先在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区域里，党首先就应该把上海事变的教训在广大群众中普遍通俗化起来。使广大群众认识民族革命战争的可能，必要与能够取得胜利；使广大群众认识上海中国军队及民众武装队伍的退却，其罪恶纯粹在于国民党的捣乱后方（不送补充队伍，不接济粮食，把大批军队送去打反对帝国主义的红军，勾结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者从各方面捣乱，蔡廷锴等反动军官在士兵后方开炮等等），号召十九军士兵及其他部队与武装人民不服从国民党任何指令而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周围、满洲及其他各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用一切力量去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号召他们组织士兵革命委员

会，自己选举官长，自动与工农贫民学生的反帝队伍联合起来，使他们不愿用一枝枪一粒子弹去打红军和工农贫民及革命学生分子，而把自己最后一滴血都有决心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奋斗；用一切力量去武装工人、农民、贫民及革命学生群众，在这些武装队伍中要保障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与工人干部的核心；用一切力量把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口号联系起来，以便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上海、南京、武汉、满洲等区的游击战争，使他们到处扰乱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和断绝日本帝国主义交通和接济，用一切力量去组织工人群众的经济罢工、政治罢工以至总罢工——首先就是与帝国主义军事及交通有直接关系的工厂和企业中的工人的罢工和示威。号召被日本关厂或者炸毁的工厂而致失业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占领在中国反日武装势力区域里的日本工厂和企业，变卖这些工厂和企业中的财富来作为失业工人的生活费，号召和组织这些失业工人群众参加武装抗日战斗。把千百万无衣无食的灾民用各种方法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他们积极从反帝反国民党的英勇斗争中去找活路，同时，尽力在各个可能的区域里建立起民众的政权组织。在我们有武装力量及群众组织的基础的区域里，应当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树立起民众自己的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在武装力量及群众组织的基础还不够的地方，应当用一切方法去建立民众革命的政权雏形的群众代表机关（上海人民反日会一类的组织），以准备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基础。在我们已经有了几个地方性的革命政权，这些政权对于广大民众有极大影响而且有了相当足够的武装队伍作支柱时，我们应在可能与必要的中心城市里，建立起比较统一集中的新的民众革命政权，宣布国民党政权的死亡，逮

捕国民党的主要军政领袖，审判和宣布他们出卖民族利益及危害民众的罪恶，把民族革命战争的责任勇敢地担负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死的战斗。同时必须把苏维埃与红军区域里的一切经济政治生活尽力普遍化起来，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使非苏维埃区的反帝斗争、农民斗争、罢工运动、士兵骚动等，都成为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组成部分。在有可能的区域里，创造新的苏维埃政权、工农红军和赤色游击队。

同时，必须特别注意：不但在那些革命形势的许多条件还未完全具备的区域里，党必须把群众的日常要求和日常斗争更积极地更广泛地发动起来，就是在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区域里，党的任务也绝不是放弃和忽视劳苦群众的迫切日常要求和部分斗争，而只是更加艺术化地尽力地把这些要求和斗争与党的根本政治主张联系起来，使工人要饭吃，加工钱，农民要土地，反税捐，兵士要欠饷，要改良待遇，贫民反捐税，反高利贷，灾民要衣食住……等等日常要求与驱逐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连接起来，才能使广大劳苦民众参加决死的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在反帝斗争中要特别注意于广泛地灵活地应用与广大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但须特别注意维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目前形势之下，在实际上思想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用一切方法去反对、揭穿和打击国民党各派别宣传的那些什么“一致对外”，“对外时期，不要阶级斗争”，“共产党不要民族利益”，“红军是帮助日本的力量”等等无耻谰言，特别要反对那些表面上拿些“左”的词句——什么“民主政治”，“保障民众利益”，“保护工农”等等来欺骗民众的那些国民党派别——改组派、第三党等，用一切

方法去揭穿他们投降帝国主义和反对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要用一切方法去抓破那些表面上站在国民党的政府反对派地位的那些反革命派别——国家主义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派等的假的“保障中国民族利益”的鬼脸。使广大群众认识和相信：这些反革命派别实际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中国民族及工农劳苦民众的死敌。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唯一彻底的领袖。要用一切方法去反对和揭穿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所散布的什么“美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同情中国”等等的可耻的幻想，指出和证明美、英、法、意帝国主义者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的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强盗们宰割弱小民族的工具。同时指出只有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同情和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国家。中国民众只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建立亲切的反帝联盟，才能达到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的胜利。以此去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拥护苏联的斗争。

在目前形势下，在党内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对于客观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对于主观力量的忽视和不相信，把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土地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对立，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的怀疑和动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消极怠工，对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等的民族武断宣传的幻想等。同时，丝毫不放松对“左”倾立三路线的残余——例如，随时随地可以无条件暴动的观点和企图，借口“保障国际阶级同情和不要燃烧起民族恶感”因而忽视甚至放弃反帝运动的倾向，不愿利用公开工作路线可能，忽视发展党及群众组织的倾向……等等——的斗争。这个倾向在目前依然时常在

个别党部或党员中或明或暗地发现着。同时，在党内斗争中必须注意到目前党内斗争形势的特点，就是党在四中全会以来的一年过程中，不但在理论上组织上战胜了“左”右机会主义的派别，而且在实际工作上证实了国际路线的正确。因此，现在党内的反党分子，已很少敢于公然打起反对执行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中共中央的旗帜，他们斗争的方式是比较狡猾些隐蔽些，他们之中有些是用两面派的手段去进行反党的活动，有些是用攻击个人制造派别的武断宣传去进行反党的企图，有些是用曲解党的历史的方法来否认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共中的领导作用（如说中共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都有的等等），以此来动摇党员们对国际路线的坚信；有些是用咒骂立三路线的方式来进行贩卖托陈取消派私货的企图（例如说：“托洛茨基比陈独秀右些”，立三路线领导时的中共中央“比托洛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道路还跑得远些，比陈独秀派还坏些”等等），有些是用消极怠工的方法来妨碍党的紧急任务的执行。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在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原则之下，尽力提高每个党员的党的警觉性，不仅要对那些明显的“左”右机会主义的倾向，加以无情的打击，同时，对于那些懦弱的狡猾的隐蔽的反党分子，也要给以尽力的暴露。

此外，在组织上来巩固与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尽量发展党、团、赤色工会、反帝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农民、贫民、学生等各种革命团体组织——是目前党的紧急主要任务之一。在中央一定正确路线之下和不妨害秘密工作条件的范围之内，尽力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检查各级党部各种群众组织中的工作上的优点、缺点和错误，从实际工作中

的教训来求得实际工作的进步。广泛应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尽力发挥每个党员、团员、赤色工会会员、反帝组织的革命热忱、积极性、自动性和创造力。

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成为列宁主义的坚定统一的政党，而且在党的周围团结着千百万工农兵贫民及革命智识分子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利地担当和解决摆在它面前的这些伟大、艰难和复杂的历史任务！

单行本，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

1932年6月印行

署名：王 明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 中国共产党底任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第一章 中国——革命,战争 和武装干涉底舞台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全同意全会提纲上和古西宁同志报告中,对于国际形势底估计,就是说:“现在国际形势简直已经逼近到战争与革命底新周期”了。“由于本身最深刻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破坏了,与资本主义总危机最密切关连着的世界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社会底一切根本矛盾紧张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即是把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中国的状况便是对国际形势这种估计底最好的实际证明。

还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时,因为当时全会估计国际状况,是资本主义稳定底终结和转变到战争与革命底第二个周期底过渡。中共代表团那时便指出:“中国已经正在进行革命和战争”,“中国已经是革命与战争底整个连环当中主要

* 这是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演,又名《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

的一环”。

十二次全会以后已经一年了，现在世界既已紧紧迫近到第二个革命与战争底时期，试问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一）革命更向前发展

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苏维埃革命更进一步的胜利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底强大

第一，它首先表现在苏维埃革命更进一步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强大——大家都知道，当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正组织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去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在这次围剿当中，国民党动员了八十六师以上的军队，组织了许多地主富农的武装队伍（民团，剿共义勇队等），直接参加这次围剿军事行动的，一共差不多有一百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武装队伍。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说，他们这次围剿一下子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永远消灭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临时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反革命罗章龙派底残余，曾大声高叫说：中共和红军绝对不能冲破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使这些机会主义者公开地跑到国民党营垒里头去；此外，甚至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有些共产党员们，也不免抱

着悲观的态度,他们以为,这次红军和中共恐怕很难胜利吧?然而不管这些分子的狂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会议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说:那个在一九三二年秋天开始底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在一九三三年春末夏初时已经完结了。其结果是:国民党军队的大惨败和工农红军的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得到的。(大鼓掌)

这种胜利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呢?

(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更进一步的 巩固、扩大和统一

红军在五次战争^①胜利中,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北部共占领了七十六个县和三个府(福建的邵武府,四川的绥定府和阆中府)。虽然因为军事行动的关系,这些新占领的县城有一部分是时得时失;但是直到现在,差不多有四十个以上新占领的县份是保存在红军的手里。红四军在五次战争当中,在四川省创造一个很大的并且很强固的苏维埃区域。中外报纸都说得很对:四川省对于红军行动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就是四川是一个很富的省份,是帝国主义难得达到内部的省份,但是红军很容易防守的省份。四川的新苏维埃区域,也和中央苏维埃区域一样有很好的顺利发展底前途。

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结果使中央苏区的许多领土能够表现这样的巩固:在最近两年战

^① 本文中所说的“五次战争”或“五次‘围剿’”,都是指的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王明把1932年7月中央红军反击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的南雄、水口战役称为第四次反“围剿”,故把在这次战役后举行的、通常所说的第四次反“围剿”,叫作第五次反“围剿”。

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敌人没有一次能够侵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主要的根据地里去。

此外，在六次围剿^①战争开始时，红军又新占领了十五县和两个比较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这就是福建的延平和四川的万县。

这样一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已经发展到比任何西欧与东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都大些。

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占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六分之一的面积。同时，这个领土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域。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是说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的总面积，已经占中国内部十八省的总面积四分之一了，而固定苏区已占内部十八省的六分之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总面积，共计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平方基罗米突（即二百五十八万零八百三十五平方里），其中固定苏区面积共占六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五平方基罗米突（即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九百五十平方里），如果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西欧及东方的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下列的结果：

比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定领土来：

法国领土等于百分之八十小数点九

德国领土等于百分之六十八小数点七

英国领土等于百分之三十五小数点五

日本领土等于百分之五十五小数点九

仅仅一个中央苏区就要比荷兰加上比利时的领土大两

^① 这里所说的“六次围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倍。

(乙) 红军更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红军在冲破五次围剿战争中，打破了国民党四十师的军队，其中有十八师差不多完全被打溃了。红军俘虏敌人八万人，其中有很多师、旅、团长等等（例如只在一个中央苏区，只在一九三二年一年当中，就俘虏敌人的三个师长，十一个旅长，十八个团长；从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四月俘虏敌人两个师长，两个旅长。），夺获敌人十四万支步枪，一千三百九十架轻重机关枪，二十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架炮，六架飞机。此外，差不多有三万国民党军队的兵士投降红军方面来。（鼓掌）

因为有这些伟大胜利的关系，红军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正式红军有二十万到二十五万人，非正式的武装队伍（就是有新旧式枪械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有四十万人以上。现在正式红军已经约有三十五万人，非正式武装已经有六十万人以上。

在这个时期内，新成立了六军：在鄂豫皖苏区，在第四军主力退走后，新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在中央苏区新成立了第十一、十五和十九军；在四川苏区新成立了一军。新成立了五个师，其中三个模范师是在中央苏区的（一个由青年团组织起来的少共国际师，两个由工人和雇农组织的模范师），在这些模范师当中，党员、青年团员占红军战斗员的绝大多数。这些模范师是一切红军的铁的骨干和突击队。在四川新组织了两个师，一个在川东北，另一个在川西。

在质量方面，红军在这一时期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就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骨干加强了。在中央苏区许多基本的红军队伍当中，党员占全体成份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八，无产阶级的成份，即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平均占百分之二

十五到百分之三十。至于工人模范师中，差不多完全是工人、雇农、手工工人、店员等无产阶级的成份。

(丙) 苏维埃建设方面底新成绩

从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号,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这一时期,可以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的时期。最近这一年,可以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向前发展和壮大,并且得到全世界在事实上承认这个国家的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最近一年来,对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基本法律和指令,做了很多具体化、补充和在实际上实现底工作。例如:

(1)在苏维埃行政系统方面——颁布和实行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命令;颁布和实行了地方苏维埃组织系统条例和工作条例;颁布和实行了各级苏维埃选举和改选底章程和细则等等。

(2)在经济政策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专门关于合作社条例(譬如在中央苏区在这一个时期中就成立了五百个以上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国家和私人的借贷条例;关于允许在苏区工商业投资条例;关于征求专门人材启事;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和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以及关于禁止不断平分土地的指令(这种不断平分土地,特别是湘鄂西苏区等地方很流行的现象,实际上不断平分土地是振兴农业经济的很严重的障碍)。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极力设法改善苏维埃区域的农、工、商业。他们努力领导春耕运动,秋收运动和修堤运动;他们组织犁牛站、农具、种子和肥料等去帮助那些没有耕牛,

没有农具，没有肥料和没有谷种的农民；他们在经济工作中，组织了广大的革命竞赛运动和突击运动；他们领导农民开垦了很多原来的荒山、荒地；他们努力改良苏维埃工农银行的工作；他们实行正确的赋税制度；他们实行了广大的节省运动，以便尽量节省经济来保障红军底给养。

(3) 在使苏维埃国家机关改良和节省方面——在这个时期里，开始真正组织和实行工农检查局，轻骑队以及其他考查苏维埃各级机关底群众组织底工作，在很多地方，工农群众已经广大地起来对苏维埃机关实行自我批评，并且得到很大的结果。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实行预算和决算制度，并且每经一个月或三个月公开向群众公布收入和支出的账目，同时，把苏维埃各级政府底预算和决算来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做个明白的比较，使群众在事实上亲眼看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所希望出现的。

(4) 在发展人民教育方面——虽然苏维埃区现在经济和人材都感觉很大的困难，但在最近一年来，在一切主要的苏区里，都开始了认真地组织人民教育底工作。例如，在中央苏区宁都一县，就组织了三百五十个初级列宁小学校，八十五个平民夜校，许许多多的识字班，十三个俱乐部；在这一县，仅仅在列宁小学校读书的就有七千五百六十人以上，这些小学校不仅仅不要钱，而且供给学生教科书和伙食，在这些小学校里，只有富农的子弟才缴学膳费。这样的人民教育制度，这样广大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现象。根据我们得到的材料，在今年年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城内，已经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在第四军的苏区内，已成立了各种苏维埃中学。

(5)在解放妇女方面——中华苏维埃政府不仅坚决地实行婚姻条例(如离婚结婚自由等等),不仅坚决地主张劳动妇女在分配土地当中与男子完全平等,而且坚决主张在每个苏维埃机关或委员会领导成份当中,至少要有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是劳动妇女,同时,在每个苏维埃里设有改善妇女生活委员会。

(6)在群众组织方面——过去这一年,是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的一年。首先就是赤色工会,——它是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最可靠的支柱。虽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关于整个苏维埃中国领土内赤色工会会员的统计,但是据我们已有的个别材料,已经可以证明,赤色工会在苏维埃中国领土内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例如,只在一个中央苏区,还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赤色工会会员便有十八万到二十二万。现在有十个省总工会。在每个苏维埃区域里,最近一年来都召集过工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代表会。

赤色工会在苏维埃中国内起很大的和领导的作用。举一个例子看:从今年六月到八月三个月中,由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所发起,组织了红军两个工人师,就是一个农业工人师,一个手工工人和店员工人师。兵工厂工人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总是加倍地工作,在有些地方甚至于一天出产比较平时多三倍以上的子弹和枪械来供给红军。

贫农团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反富农和反地主残余当中底群众柱石。他们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了。例如,在中央苏区内八县里,贫农团团员便超过十四万九千人以上。

国际革命者救济会——根据今年八一在瑞金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底统计,只在中央苏区便有会员六十万人。在这个代表大会上,不仅讨论了救济会在中国的工作和任务,不仅通过

了给国际革命救济会总执委主席斯塔数娃同志贺电，并且通过了致在德国法西斯蒂统治下和日本血腥天皇统治下奋斗的战士底慰问电。同时并通过了募捐款项去帮助德国和日本的兄弟们底决议案。这件事，只不过是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劳苦群众，对于德国在以特尔曼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下而英勇斗争的德国无产阶级广大同情的一种具体表示。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共产党之所以表示这种广大的拥护，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有系统的工作去反对法西斯蒂；拥护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拿到政权以前、拿到政权时和拿到政权以后所采取的正确布尔塞维克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路线，拥护共产国际主席团今年通过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我们党和中国劳动者对德国党和无产阶级这种热烈同情的表示，就是在事实上坚决打击莱姆麦尔和来以曼等对于德国共产党领导底侮蔑。

同样，中国劳动群众对于日本英勇的无产阶级反对日本资产阶级和天皇统治底斗争，表示广大的同情和赞助，绝不是偶然的一回事；而是由于中共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去动员群众拥护日本革命斗争的结果。同时，日本共产党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行真正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民众进攻底斗争，在实际上也就更加巩固了中、日劳苦群众互相间革命同情。中、日两国劳苦群众非常迫切地希望，在中、日两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反帝同盟在中央苏区内就有五十万人以上的会员，苏联之友会在中央苏区和救济会一样，差不多有六十万会员。

(7)在苏区内部反对反革命底斗争方面——在这个时期，我们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和组织，已经大大地改良和加强

了。因此，虽然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企图在我们的后方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但是在最近一年来，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已经没有任何发生过象从前那样的反革命暴动了。（鼓掌）我们底政治保卫局已经能够及时地暴露和破坏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对苏维埃中国的许多反革命阴谋和诡计。

（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底唯一的、可靠的柱石了！

在以前，虽然苏维埃政权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一开始就提出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在中国统治底任务，虽然在我们苏维埃中国内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但是，因为苏维埃区域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原故，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广大劳苦群众首先容易看到的，就是苏维埃政权是唯一执行土地革命的政权。然而，在最近一年来，因为共产党实行灵巧的和正确的策略，因为共产党极力造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够及时地实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底行动，苏维埃政府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底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了。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真正领导和组织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便取得中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已经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在最近一年来，在实际上证明了：虽然直到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能在地域上把所有苏维埃区域统一起来，但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切领土内，实行统一的行政制度，统一的经济政策，统一的财政系统，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统一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底领导。这样，中华

苏维埃政府就在实际上证明了：它和南京政府及其他军阀、官僚底政府底不同之点，首先就是由于它是工农政府，所以虽然它在地域上还没有能够把各个苏区统一起来，但是，它在实际上是唯一的能够使中国达到革命统一底政府。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国内所谓“中央”政府，但是，实际上，在南京政府统治的范围内，每个军阀，每个官僚以至于每个土豪和绅士，都是各自为王，各自为政，都有权利收捐、收税，都各有自己的法律和命令。

从以上这些事情看来，很明显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美洲或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和形式上正式地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外国政府和中国军阀政府，已经不能不在实际上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了。这首先就可以从它们的言论机关上看得出来，它们之中，有的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另一个承认苏维埃政府是中国组织得最好的政府；第三个承认苏维埃中国人民底生活要比国民党中国人民底生活幸福些；第四个说苏维埃政府是唯一能使中国国家统一底政府……等等。举几个例子来看：

在国际联盟底报告当中(李顿报告书)我们看到有下面这段话：

“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仅成了政治的学说，在中国不仅创造了独立的共产党，并且共产党已经成为南京政府的竞争者了。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创造了自己的特别的法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并且有自己底领土的势力范围”。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正式机关报《太晤士报》上，在今年十

一月十三号和十四号两天的报上，登了一篇题目叫着《中国底共产主义》的论文，这个论文底作者，自己不久以前，曾到过江西和湖南的苏区边境。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了，它统治了，并且现在还统治着许多区域。经常固定的中心区域，是江西的中部和南部，以及福建的西部。但是，湖南、广东和湖北的一部份，也渐渐地归到它的版图里面去了。有许多人这样想，这里所谓共产主义，只不过是通常对于土匪，不满意的行动和失业现象等的称呼。然而他们错的太远了！根据我们在江西和湖南南部剿共战线上得到的印象，可以供给我们许多材料，使我们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但是更令人不安的结论。中国的象征——散漫消极。但是中国共产党员绝对不是消极散漫的人。赤色区域完全是在首都瑞金底总参谋部——中央政府底严格管理之下”。

美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新共和周报》，在今年九月第二十七期上登载了一篇题目叫着《红色中国》的论文，在这个论文里写道：

“苏维埃区域是处在比邻近军阀统治区域兴旺底状况，苏区的米粮收成要好些，捐税要少些，而沿江沿河的堤坊要高些……，苏维埃政权存在以后，实行了自己的货币制度，并且在人民教育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六年不断战争当中，苏维埃证明了它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北方军阀是日本的奴仆，他们靠日本的津贴过生活；广东派在英国的影响之下；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准备着替任何外国政府效劳，只要人家给他借款和军火。他们服从日本人，但是他们更特别同情美国的资本主义。

苏维埃得不到任何的借款，任何的武装，除了它从敌人方面夺来的武装以外。它一天一天地实际证明了，假若江海沿岸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各政府一旦失了西方和日本底帮助，那末，全中国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将要完全成为共产主义的了”。

在日本出版的英文刊物也不得不承认说：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运动，在使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上所起的作用，将要比从辛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变所起的作用要大些。很明显的，红军在四川之所以能得到胜利，首先就是由于江西红色势力的响应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底结果。如果这一种互相配合和互相呼应的行动，使南京大感不安，那末，当然它们也使列强感觉不安，因为这一种情形当中埋伏着真正统一中国底希望。但是中国统一，对于有些列强完全没有好处和没有利益的”。

（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号日本大事记）

日本帝国主义的报纸大阪《每日新闻》在今年十月十四号登载了一篇自己的九江特约通信，在这通信上面说：

“中国苏维埃区域人民底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中国天津的资产阶级底《益世报》，在它的社论上说：

“……内部的冲突我们始终主张应持‘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的见解。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打倒了俄皇，俄国并没有亡国。列宁抢夺了克伦斯基的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俄国也并没有亡国。国家内政上变了何种局面是次要问题，亡国的惨痛是不能忍受的……”。

最后，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最近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这一类的现象，即个别的军阀派别、在和红军屡战屡败

之后，在兵士群众和一部份下中级军官革命情绪压迫之下，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或者继续和红军战，那么，毫无疑问地他们将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枪头掉转过去反对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以便从绝路上另找出路。

苏维埃中国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已经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二、非苏维埃中国群众革命斗争 更加扩大和深入

第二，近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底更向前发展——表现在非苏维埃中国群众革命斗争底更加扩大和深入；表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北方和福建等处广大群众反日的武装斗争更向前发展；表现在工人群众斗争更进一步的革命化和扩大；表现在农民运动广大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影响和作用底加强；表现在军阀军队中士兵群众更加瓦解和革命化；表现在极大部份小资产阶级从反动党派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日益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康生同志在他的发言当中都要讲到的。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看来，很明显地，中国在目前这个时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这样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正在进行着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底胜利的苏维埃革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成为现在中国一切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中心，而且已经成为决定世界政策底主要因素之一了。

这是最近一年来，国际政策中所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新事件。

(二) 战争与武装干涉底扩大和深入

在中国不仅进行着革命，而且同时发生着战争与武装干涉。在近年来，战争与武装干涉也都扩大和深入了。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很久就发生战争了。但是，直到现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工人和劳动者，对于中国战争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中国现在到底发生些什么战争呢？就是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革命战争表现在各种形式上：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底武装人民所进行的战争，这个战争同时包含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性质和反国民党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性质。而且这两种性质是相互地混合着。它的最初形式和阶段，就是现在东三省、热河等地方真正反日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是广大民众进行的，这个战争是民众决心武装驱逐日本强盗和卖国贼蒋介石、黄郛、溥仪等情绪底具体表现；它的最初形式和阶段，就是反国民党反军阀底民众战争，这种民众战争，有些地方是采取抗捐军的形式，有些地方是采取反对地主、官僚、警察制度底地方农民暴动的形式，而这些战争向前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的反革命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底干涉战争，而且这两种战争在基本上也是相互混合着的。

在最近一年来，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都是更加扩大和深入了。

我首先说明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英勇工农红军底

干涉战争。我已经说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在红军冲破五次围剿以后，蒋介石、刘湘及其他国民党军阀，在国际帝国主义更多金钱军火帮助之下，又在组织和实行比以前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反苏维埃的围剿。为的使这个围剿能够得到胜利，美国帝国主义借给南京政府五千万美金，即所谓“棉麦借款”，以及四千万美金所谓“航空借款”。根据这一批航空借款，美国计划建造八百五十架军用飞机给南京政府，而其中一百五十架飞机，已经送到中国了。英国帝国主义借给蒋介石五百万英镑，借给四川军阀刘湘两千万英镑。日本强盗一方面和蒋介石签订了所谓“北方休战条约”，以便蒋介石能够公开地把一切军队动员去反对红军和苏维埃；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把南京政府借到的美棉承买去一大部份，然后将军火作为棉价交给蒋介石去反对红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面前加紧地示威，表示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表示它准备着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帮助蒋介石消灭中国赤化的危险，以便把蒋介石从美国资本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把他变成日本的公开的和忠实的走狗。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波兰和其他的国家，不断地有大批的轮船运输机关枪、大炮、坦克、飞机、军装、化学毒品等到中国各地——到上海、南京、九江、南昌、武汉、广东……等处。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五次围剿中已经打败得一塌糊涂的国民党刽子手，才能够又组织新的大规模的反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在这一次围剿当中，蒋介石和其他刽子手们，在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边界上，便动员了四十四万二千以上的军队去反对中央苏区。十三师到十五师的军队去反对鄂豫皖苏区。八师军队去反对湘鄂西苏区，二十师以上的军

队去反对四川各苏区。然而事实还不止这样呵！第六次反革命反苏维埃的围剿与过去国民党各次反苏维埃围剿的主要不同点，就是在于全世界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这次围剿底军事行动。一百五十个美国的和加拿大的飞机师，在江西福建战线上往来盘旋。许多美国的和德国的化学技师和军事技术专家，正在替蒋介石服务。过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和另外两个德国将军维撒尔及克雷伯尔，以及七十个德国参谋部底军事顾问，不仅仅制定了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而且直接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行动。正是这些国际资本雇佣的走狗们，现在正在进行可怕的航空战和化学战去反对自由的苏维埃中国，去屠杀中国人民。过去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格山斯基和他的助手社会民主党党员魏一士，已经到了南京去帮助国民党改组警察机关，以便保证国民党在反对红军战争中底后方安全，以便加紧逮捕和屠杀成千累万的中国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民众和青年。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德国社会法西斯蒂和整个第二国际首领们的真正的血腥面目。此外，美、日、英、法、意各国军舰，正在升着火，脱着炮衣，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能开始实行军事行动去反对中国暴动起来了的工农兵贫民和革命智识界。在万县（是长江沿岸和四川省的重要商埠之一），在英、日、意军舰和红四军以及暴动起来的工农贫民之间，正期待着爆发残酷的战斗。

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不顾他们内部相互间有多少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在财政上和军事准备上一致地帮助蒋介石，而且用自己的军力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六次围剿的军事行动，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苏维埃中国及其工农红军在五次战争中，已经表现出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已经表示出反

革命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能够摧毁中国日益发展的苏维埃革命；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和胜利，已把苏维埃事业实际上变成了全中国广大民众的事业，他们都力求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革命斗争，来取得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其原因也不仅是由于苏维埃中国对于安南、印度、日本、高丽、台湾、南洋群岛、古巴、整个东方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极大革命化的影响，他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榜样，来学习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去反对外国和本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在国际事变发展的观点看来，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参加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行动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苏维埃中国是苏联以外的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把中国民众们从完全贫困和衰败中挽救出来底唯一的柱石和希望，由于苏维埃中国几年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就是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进行革命斗争底强有力的号召，就是坚定他们对自己力量和胜利底信心，同时，也就是明显地表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已深刻腐朽到如何的程度；由于苏维埃中国妨碍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妨碍他们把中国变成军事根据地，妨碍他们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妨碍他们统治中国这样广大的市场，而这个广大市场对于国际资本在目前尤其特别需要的，因为国际资本想利用这个市场，来多少地减轻一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基础上产生的长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痛苦的和不可救药的病症。摧毁这个太平洋上的革命根据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太平洋世界大战，首先就是从东方进攻苏联的干涉战争底必要条件。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严重的打击。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底必要手段。

现在我讲到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底强盗战争。在最近一年来，日本帝国主义除原来占领的东三省外，又用武力占领了热河、察哈尔，并且实际上又取得了整个北中国底完全监督权，同时，在收买内蒙古王公实行所谓“内蒙独立”底阴谋之下，实际上又取得了整个内蒙古的统治。英帝国主义经过西藏的王公喇嘛实行帝国主义战争（根据英国自己报纸的消息也说：西藏军队穿着英国式的军装，用着英国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在英国的军官指挥之下），这种西藏军早已经占领了整个川边，并且侵入到四川和云南边境。此外，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在新疆组织各种各样的暴动和骚乱，其目的是在完全瓜分新疆省。法帝国主义也绝不愿在瓜分中国行动中表示落后，它不仅派兵舰占领了南中国海的九个小岛（珊瑚岛），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加紧准备着武装侵入云南和贵州省。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许多原因的关系，在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公开的军事行动，但是他一天一天地把自己的海、陆、空军力在中国增加起来，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夺全中国。

在最近几个月，日本在北中国和长城一带开始了部份的撤兵行动，这绝不是象日本强盗及其走狗们——日本社会民主党和蒋介石宣传的那样，所谓“中日军事行动中止了”，或“远东战争危险减少了”，恰恰相反，这只是明显地表示日本强盗加紧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开始大规模的反苏联的冒险战争罢了。

最后，我讲到关于军阀战争问题。因为军阀们在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面前表示发抖，所以近年来曾暂时地没有爆发过那种大规模的包括全国主要各省的军阀战争。然而，在过去这一时期中，仍然是有五省（山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

发生过军阀战争；特别是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之间的战争，曾延长七八月之久。受这次战争痛苦的不仅仅有几十万的兵士，而且有千百万的人民。而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消息，大概在最近的将来，还要爆发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参加这个战争的，将是蒋介石的主要力量和其他反蒋军阀的力量。所有这些事实，不仅是证明中国军阀制度已经深刻腐朽了，而且证明，是在他们的主人之间（美、日、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化。所有这一切事实，无条件地证明全会提纲上分析的正确：“新的世界大战的火焰正在太平洋沿岸燃烧着”。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事实看来，很明显地在中国同时发生着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从现在国际状况和中国国内状况的观点看来，中国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在现在特别是进步的革命的和神圣的；因为这个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达到几万万中国民众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且是为消灭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底大战；由此可见，国际帝国主义为完全把中国民众变成亡国奴所进行的强盗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在现在条件之下，是加倍地反动的反革命的和令人痛恨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底目的，是为的要造成实行全世界帝国主义太平洋大战和从远东实行反苏联战争底必要条件。

（三）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全线总进攻 和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崩溃

在中国最近一年来所发生的事变当中，第三个主要的新

事件，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民众全线总进攻和国民党更加分崩离析。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深入的关系，因为全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底矛盾空前紧张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尽力把危机痛苦结果转加在本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底劳苦群众身上的关系，特别因为中国有革命与战争的形势底关系，国际帝国主义者特别更加紧对中国全线总进攻。武装占领中国领土，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用新的军事借款的方法取得新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底特权，实行商品廉价倾销（首先是日本的丝、纺织品；美国和加拿大的麦子，美国的棉花，印度和安南的米等等在中国倾销），中国原料价格空前跌落和银价大跌——这一切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更进一步进攻底全副锁链当中底各个主要连环。

当帝国主义这样加紧进攻关头，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国民党政策底卖国辱国的性质。为的明显地证明国民党底卖国政策，我们可以举出所谓“怀柔协定”即所谓“中日妥协原则”作个例子，这个协定的内容有下列几点：

-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中国察、绥两省境内，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须事先通知中国。
-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经济的友好的提携，及内乱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排货排满之制止。
- 四、中、日、满正式协定，于中国认为可能时开始协定。

中满国界之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之后，始会同确实划定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成立之翌日实行之”。（见《中国论坛》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专号）

这样一个公开的卖国的协定，蒋介石、黄郛、上海总商会、胡适等还厚着脸皮说：中日停战协定只限于停止军事行动，决未牵及政治问题！并且他们还宣传说：北方协定是南京政府底外交成绩之一。无怪乎连《大公报》的社论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底政策和言论加以下列八字的批评：“好话说完，坏事做尽”！

在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更进一步的进攻和国民党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投降底结果，首先就是使已经完全破产的国民经济和异常穷困的群众生活更加恶劣化。一九三三年的水灾，包括了全中国（从广东到东三省），产生了一万万灾民；一半以上的产业工人和手工工人处在严重的失业状况之下，而一切在业工人差不多每星期只能做三天或五天的工；民族工业和交通业更进一步的破产和非民族化，农村经济大破产——这一切事实已经足够说明国民党中国经济破产更加深入和扩大的情形了。

国民党统治的六——七年来，只是一个南京所谓“中央政府”便发行了十六万万万元的国内公债（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十五年以内也不过发行了五万万到六万万万元的国内公债）；在今年每省都发行了五百万到四千万元的省公债；每月南京政府要开支一千六百万到三千万元“剿共”军费；南京政府用公开贩卖鸦片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公开增加广大民众几十年来

所誓死反对的盐税和米粮税来增加收入；——这一切事实，已经足够证明国民党政府财政破产的情形了。

国民党区域底经济状况，在最近这一时期破产得特别厉害底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刽子手对于中国内部十八省六分之一的面积底领土（就是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底固定领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其实，这种经济封锁，实际上使非苏区的人民比苏区的人民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在苏维埃中国内，人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还采取许多恢复、振兴和发展农、工、商业底办法，使劳苦群众生活状况得到很多的便利和改良。而在国民党中国里，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而且也不会有。关于这一点，举一事实，便可以显明地证明了，例如有些军阀已经不得不自己提议取消对苏区底经济封锁了。

正因为中国近来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这些变化，所以国民党在最近一年来也就更加表现崩溃和塌台。国民党更加崩溃和塌台，一方面表现在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另一方面表现在那许多被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打倒了的军阀政客派别（例如安福系黄郛和北洋系军阀等），现在又公然出头来与国民党竞争着去替帝国主义效劳和榨取人民血汗了。同时，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更加证明这一点。如果国民党在其有史以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那末，现在国民党正式分成三个党了，就是蒋介石党（蓝衣社）、胡汉民党（即所谓新国民党）以及所谓“农工党”。而在每一个党内，又分成许多小派，在每一个派内又分成许多小组织。在这些党与党，派与派，小组织与小组织之间，现在正在闹着严重的分离和纠纷。在最近的将来，在这些党与党之间和派与派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这一年，同时也

就是一切国民党附属组织和对国民党抱假的反对态度底那些党派崩溃的一年；在邓演达被蒋介石刽子手枪毙以后，所谓第三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便烟消云散了；托陈取消派在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以后，尤其是在他们在法庭上公开揭穿自己反革命真面目以后，也崩溃到不成其为一个派别了；所谓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毫无疑问地也正在塌台（譬如在北平一处，就有一千多个国家主义青年党党员共同发表宣言声明脱党）。反革命的罗章龙派，早已在南京、上海和北方警察侦探机关当中“为三民主义效劳”去了。

此地应当指出一件事，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反革命营垒当中发生的一件新现象——即是在中国开始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蒂”运动。这里问题的中心，当然不在于国民党采取法西斯蒂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和革命运动，也不在于国民党实行广大的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这一切都不是新的，这一切都是国民党从背叛革命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都应用的。而新的是在于：第一，在最近一年来，法西斯主义问题，不仅蒋介石蓝衣社所出版的各种专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章和志杂上（例如：《社会新闻》、《社会主义月刊》、《汗血》、《剿共半月刊》、《青年志杂》等等）广大地吹嘘；而且差不多在一切法西斯蒂朋友和仇敌的刊物上，都不断地加以讨论；第二，新的就在于，在最近这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蒋介石的公开恐怖组织（蓝衣社），而且这个组织自命为国家社会党；而其他的反革命派别（例如胡汉民派等等）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已经挂起“反对法西斯蒂和拥护民主政治”的招牌了；第三，新的就在于，蒋介石等在最近这一时期，已经不是专在所谓孙文主义旗帜之下来拢络旧的军事干部和创造新的军事人材，而是更努力地打出希特勒主义的旗帜来企图拢络自己的干部和在兵士、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当中散布自己的影响。

中国这种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蒂”运动底主要来源，任何人都很明瞭的。这就是(一)国际的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二)各国帝国主义者，都在企图经过自己底走狗来在一部份小资产阶级当中，创造下某种的社会基础，以便更加适于其准备和实行帝国主义战争(由此，国民党和非国民党底各个派别，大家互相谩骂对方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同时他们之中每个派别，都更加明显地公开地采用法西斯蒂的方法和口号，都更加公开明白地出来拥护自己帝国主义后台老板底利益)；(三)革命势力底发展和反革命势力底崩溃。由此可见，中国这个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运动底目的是非常显然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企图夺取那些非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成份；这些份子之中，许多人现在因为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进攻，因为自己生活极端痛苦，所以抱一种绝望情绪。因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就企图把他们对国民党底仇恨变成对共产党的不满；把他们对帝国主义底愤恨变成对苏联底仇视。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尤其想利用这些份子，作为反对苏维埃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底工具，以及在反革命营垒内部作相互火并的工具(例如在蒋介石蓝衣社所发表的暗杀的勾命单上，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共产党领袖、著名作家、有名新闻记者，以至一切反蒋的军阀和政客都在内)。如果我们任何人都不怀疑，无论德国的、无论意大利的，无论其他国家的法西斯蒂，无论社会法西斯蒂在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玩弄什么“反对法西斯蒂和拥护德谟克拉西”底把戏，都绝不能挽救正在死亡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底命运；那末，对于任何人都更加相信，无论孙中山主义，无论蒋介石的特殊所谓“希特勒主义”，无论胡汉民和农工党所玩弄些什

么假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把戏，都丝毫不能挽救那已经被整个世界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宣布了死刑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统治的命运。虽然如此，绝不能象有些共产党员一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为中国这种特殊的法西斯运动，对于共产党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革命的危险，不仅在于它能够做到用比较更有组织些底恐怖行动来反对革命运动，而且还在于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民族武断宣传很有夺取一部份小资产阶级的可能。而这种危险目前特别含有实在性，因为我们党在最近一年来，的确有减弱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工作的趋势。

尽力地随时随地揭穿蒋介石的各种各样的法西斯蒂的手段和口号，是我们党目前紧急战斗任务之一。

从以上所讲的这一切东西看来，很明显地，在中国同时进行着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中国事变底更向前发展，有使世界完全进入到革命与战争底第二个周期底可能。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预制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在远东反苏联大战底爆发；还是帝国主义大战尤其是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前爆发；——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要靠斗争力量来决定。但是不管怎样，以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来制止在远东爆发世界大战底危险，是中国共产党最近的目的和最重要的最伟大的任务。全世界和全中国事变的发展，把中国革命底意义提高到为世界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底第一等重要地位，除苏联以外，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中一个最主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成份了。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 革命底唯一领袖

中国事变到底向那个方向发展呢？这首先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的政策、策略、工作和斗争如何而决定。

我们完全有权利说：过去这一年是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一年。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内底革命运动，在最近这个时期，所以能得到许多胜利和成绩，就是因为我们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战斗力强的策略，有毫不疲倦的工作和勇敢牺牲的斗争；就是因为党中央坚决执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总路线。

（一）在什么地方具体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呢？

一、“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首先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开的）所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以求达到预定的目的。什么是我们革命在这个阶段上的总的政治路线呢？我们现在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尽

力地和及时地把苏维埃中国和非苏区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无产阶级统一领导之下联系和配合起来，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和一切军阀官僚底统治，并在全中国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底苏维埃政权。

同时，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只是规定了正确的总政治路线，而且能根据这个路线，具体地把最合乎中国革命运动每个时期条件底那些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提到计划的第一位。从四中全会到“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我们这个路线曾经具体化为两位一体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创造和巩固真正的铁的红军，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区域广大的开展群众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我们这个总路线就具体化成下列三位一体的口号：（一）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三）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彻底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

根据这些基本口号的观点，我们党提出更加巩固红军，发展苏维埃区域和广大开展反帝和反国民党的群众革命斗争等任务。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六个任务，事实上不过是上述这些基本口号更加具体化和显明化而已。在执行总路线和这些根本策略口号的过程中，我们党遇到过而且正在遇着许多非常多的巨大困难和复杂问题，特别是在最近两年中。大规模的五次围剿和马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六次围剿，以及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中国所实行的日益公开露骨

的武装干涉——这一切已经足够说明我们的困难和复杂性了。

然而，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这一点不仅是革命运动胜利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使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主要条件。

这一点对于象我们党这样的党更特别重要，因为在四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类现象，就是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物不去执行国际路线，反而曲解、修改以及公然离开国际路线，结果使他们自己堕入到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泥坑中去而莫能自拔（如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的陈独秀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的瞿秋白盲动主义，一九三〇年夏秋之际的李立三路线），同时，使党和革命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现在，根据四中全会后新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二、策略战斗性和灵活性底加强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第二点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只是能够规定和提出这些基本的策略任务和口号，而且会根据这些口号采取和实行那些具体的、灵活的和出奇制胜的策略办法，以便保证我们总路线和基本策略任务底实现。

为的明白地证明，一年来我们在这类具体策略办法方面底进步，可以举出下列几个问题作例子：

(甲) 在胜利地打败国民党大规模围剿，更加巩固和扩大红军以及统一和发展苏维埃领域问题方面——我在开始时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苏维埃中国得到了新的大胜利。同时，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胜利之所以能够得到，都是由于我们党正确领导底结果。现在就要问一问：在过去这一年来，在我们党中央所采取的那些为争取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底策略办法之中，有那些办法是最主要的和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在我们看来，有下列三点：

第一点——形成、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国家性——在这个问题当中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上底经济政策，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和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底过渡时期底经济政策。但是，因为现时苏维埃中国底领土散漫和经济落后，以及长期不断战争环境底关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实行其经济政策底过程中，不能不遇到许多补充的困难和复杂性。因此，虽然在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底各种根本原则和法令；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还是弄不清楚。于是，在苏区里，时常在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职工会的工作人员当中，对于经济政策犯着时“左”时右的错误。而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在最近这个时期，就特别更加严重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中央给了全党以清楚明白的理论方针，中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经济政策底根本思想出发点，应该以下列各点为根据：（一）中国现阶段革命底

性质，即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二）苏维埃共和国底实际情形，即是不断的长期的国内战争，现在领土底经济落后和不统一等情形；（三）革命底前途，即是为将来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而斗争。

除了理论和原则指示之外，中央还对于经济政策实行方面作了许多的补充和确定，以便恢复、振兴和发展农、工、商业，并尽量利用当地所有一切可能的富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苏维埃中国经济状况上得到许多好结果。正因为苏维埃中国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保证了红军的给养，才能改善了工农生活状况，才能引起红军战士和广大劳苦群众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斗争中，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热烈情绪和牺牲精神。正因为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保证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战斗联合，只有这个巩固的联合，能保证我们的胜利。正因为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明白地在实际上显示出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区域之间底状况根本不同，才能引起非苏维埃区域广大劳苦群众——首先就是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厦门、福州、重庆、成都、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工人群众，对于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热烈深切的同情和赞助，才能动员他们的战斗力量去为拥护中国苏维埃，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围剿和为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而斗争。

第二点——更加巩固和扩大红军并提高其战斗力——为的达到这个目的，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过去一年中曾采取了下列的办法：坚决实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优待红军条例（首先就是动员群众替红军战斗员及其家属种田收谷，邮政、交通对红军战士一概免费等等）；改良动员群众加入红军和扩大红军的办法；加强红军中工人和雇农的骨干及共产党的领导；由好

的共产党员、少共团员、工人、雇农和贫农成份组织红军模范师和模范军；根据新的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将红军编制加以适当的改组；巩固和扩大各种军事学校以培养大批新的军事干部（例如，只在中央苏区中央军事学校内，最近一年来便有两期学生毕业，每期约一千五百人）；最后，加紧配合和联系正式红军队伍与其他群众武装队伍（武装的赤色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及没有武装而直接参加前后方战事工作底群众组织（交通队、探报队、看护队、慰劳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补衣队等等）之间底行动。在苏维埃中国内，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每个劳动者都坚决地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连每个妇女和小孩都起战斗作用。妇女在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底斗争中有极大的作用；其作用绝不限于在看护伤病战士和替红军洗衣、补衣等方面帮助，而且是直接参加作战行动。譬如举这样一个活的例子吧：

“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士在红军离通、南、巴北上时，率农妇赤卫队五百余人，保护负伤官兵三百余人，驻于苦树坝附近。有田颂尧部一团，由小路袭去；张率农妇应战，敌军官长发现红旗，见前面山头有缠红布之农妇，即下令‘八百米达发现敌人，各放’！士兵不发一弹，山谷中口号大震：‘欢迎！革命的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红军是打日本的先锋’！‘……’官长下令‘快放’，‘齐放’，但士兵仍不动。及团长率同马弁（即卫队）到来，以手机关枪督战，不前进者即用机关枪扫射。此时士兵大哗，其中有一下士向团长大声质问：‘老子们打了十几年仗，从未见过保国卫民的军队，放着东洋人帝国主义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堂客（四川呼女人为堂客）两个打仗！真岂有此理’！官长立即枪毙发言士兵。不料突来一片‘打死

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一时大乱，团长亦被绑，营长以上者无一人幸免。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事件，已传遍全川(报纸亦略有登载)。”(见《中国论坛》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九期，登载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成都蜀笑通讯)。

关于青年和少共作用，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少共)，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和蒋介石军队作战当中，有一次在战胜之后检点俘虏时，他发现了其中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他询问俘虏士兵，才知道将领和上级军官在前一天晚上就带着六十个卫队逃走了。于是他立即翻身上马，率同骑兵连追踪赶去，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奔驰，他终于将逃将赵冠英和其他上级军官及卫队全数活捉回来。因此，现在在红四军有一首军歌中，有这样一句话：“英雄陈昌浩，活捉赵冠英”。(鼓掌)

关于我们党善于组织群众帮助和拥护红军，以及人民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已深恶痛绝这些事情，就连蒋介石也不能不公开承认的。蒋介石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记者谈话时曾公开说：

“地方人民，良莠甚难区别。正式赤军外，又有步队，游击队，即所谓农民游击队。此等游击队之编成，系于共产军占领某地后，即由共产军强制(?)被占地域之住民与强健之农人编制为队，应客观事实之需要，群起作游击战争，扰乱讨伐军后方，或袭击讨伐军之输送部队。其他如侦探，谋叛，掩蔽正式赤军之所在，均各尽其能，各致其用。平常时期，彼辈从事耕作，洎至必要时期，即全副武装为共产军队尽力。故无论任何良民，政府军队均不能不严为防范。最近政府军队数师覆灭，师长阵亡达二人者，

实皆因此种游击部队，群起与共产军前后呼应，有以使然。再则游击队与良民无所辨别，因之军队出动讨伐，辄不禁起草木皆兵之感。即在未加入共产之良民区域，军队亦觉非杀尽良民，无从安心。杀时苟为游击队，自亦无可訾议。唯区别孰为游击队中人，孰非游击队中人，甚属困难，有此困难，于是讨伐上遂引起困难之结果。即：（一）粮秣给养杂役之补给，陷入不可能状态；（二）匪区附近一带之良民，深恐讨伐军到达，泾渭不分，玉石俱焚，因之良民区域，渐为赤色浸润……”。

蒋介石这个自供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是他的这个自供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他这个短短的自供中，他无形中把他和托洛茨基派对共产党和红军底侮蔑造谣完全打得粉碎了。蒋介石和托洛茨基派不是经常侮骂红军为“杀人放火”的“赤匪”吗？现在，蒋介石在全世界面前不能不公开自供说：在苏区和邻近苏区干见人便杀遇屋即烧底勾当的，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

第三点——有系统地及时地用联共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来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红军冲破五次围剿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斯大林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报告底发表。我们党曾广大地在群众中宣传斯大林同志在今年一月联共中监联席会议上底报告，——特别是报告中直接有关于中国问题的部份。例如，当斯大林同志讲到把工业化计划丢在末位底危害时，他直接说：“那时候，我们的情形就会与现在中国的情形多少相象，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于是现在只要不是懒汉，什么人都去欺压它”。我们党应用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些话和苏联五年计划胜利底事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坚决地

明确地宣称：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没有重工业，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设备，成为外敌经常军事袭击对象这样的国家，变成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国防设备和能够抵抗一切外敌侵略底国家。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不独立和殖民地地位这样的国家，变成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经常不断而且年甚一年地发生水灾、旱灾、虫灾、饥荒、失业，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屠杀和苦死千百万人民，变成那样的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中，人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没有饥荒，没有失业，完全消灭了麻醉人民底毒剂——鸦片，全体人民都过幸福的生活，并要建设没有阶级的，完全没有人剥削人，完全没有人压迫人的，光明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象现在在苏联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所作的一切那一样。这种宣传和鼓动工作，曾把我们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威信提到空前未有过的原则上的高度，同时就取得了极广大民众对我们的热烈同情和赞助。这件事情又一次地在事实上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断言底正确：“五年计划底国际革命意义简直是不可限量的”（见其在一九三三年一月联共中监联席会议上底报告）。

我更用不着说，应用联共的革命竞赛和突击运动等经验，曾经给了我们党在苏区和非苏区底党和群众工作以极多好结果；我也用不着说，在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召集以后，我们党马上在中央苏区召集了江西八县的第一次贫农团代表大会，这一代表大会在深入反地主残余和反富

农斗争方面,以及在动员农民加入红军方面,都收到了极大的效果等等(例如,代表大会曾决定在三个月内动员八万人加入红军)。

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苏维埃中国所作底一切——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所作底一切,已经有伟大的全世界历史意义了。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实际上证明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思想底绝对正确——证明苏维埃政权是世界制度。我们党在实际上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不仅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底需要,而且能适合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底需要。我们党在实际上证明了,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唯一国家形式,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工农民主专政底国家形式,同时,它并能保证这个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此外,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更加充实了列宁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和创造革命根据地(那怕最初在很小地域以内)有极大意义和作用底理论方针。我们党在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中所积蓄的经验,不仅已经成为我们中共的最有价值的收获,不仅已经成为安南、印度、高丽、台湾、古巴、爪哇和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解放斗争底模范,而且已经成为值得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员努力学习底教训。

(乙) 在揭穿国民党是卖国党和证实苏维埃政府是英勇的武装民族自卫底政府这个问题方面——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以来,以民族武装自卫去抵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底问题,成为了现代中国一切政治问题底核心。谁在这个问题中得到胜利,谁就成为中国的主人翁。但是,关于这一点不仅我们懂得,而且我们的敌人——蒋介石和其国民党也懂得。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无论怎样再三

地不断地作下降日卖国底勾当，但随时随地却用尽一切手腕和武断欺骗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作绝望的争斗。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是否会揭穿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底各种欺骗手腕和武断宣传，而使群众相信我们党的口号底正确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在基本上我们是作到了的。

如果想把最近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底斗争作一个概括的总结，那么，大概可以分作下列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至一九三二年初上海战争前夜止。在这个时期中，国民党的主要欺骗口号，一方面是散布南京政府准备对日宣战底空气，使民众幻想和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另一方面是高唱“静候美国主持公道”和“静待国联制裁暴日”。

我们党是怎样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把戏呢？为的揭破国民党这副假面具，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绝不限于提出和宣传我们总的策略口号——“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或者“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党在实际上组织了各种各式的群众反日运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扩大组织反日义勇军，由群众向国民党要求立刻发给反日义勇军枪械，立刻出兵收复失地等等。结果，逼得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自己实际行动中把自己的假面具揭穿了（国民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枪杀反日工人、学生和市民，公开禁止一切反日运动和公开禁止主张对日宣战等等）。

第二时期——从上海战争至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占领山海关之时止。在这个时期当中，国民党的主要欺骗口号是：“上海战争失败是因为红军捣乱后方”，因此，“抗日剿共必须并重”，但“对外必先对内”。

我们党怎样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把戏呢？为的揭破国民党这副假面具，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作了很多的事情：不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努力帮助参加上海防卫战底工人和十九路军兵士；同时，党更积极地参加了英勇上海防卫战底一切政治上和军事上底行动；中央苏维埃政府还在一九三二年初便公开对日宣战，同时，并发表了动员红军和民众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底专门训令；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广大民众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李顿报告书；党制定了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底策略，并且把这个策略在东三省、热河各地实际应用起来，以便广大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特别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就是当日本进攻山海关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表的告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出他们要武装抗日底诚恳热望和积极准备，他们公开宣言愿在最简单条件之下（一、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给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等自由；三、允许人民自由地广大组织和武装反日义勇军）与任何军队订立共同武装抗日底战斗协定。结果，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被逼迫得自动地公开地揭破自己的假面具。蒋介石公开对军队和民众下令说：“在共匪未肃清以前，绝对不得言抗日，有敢言抗日者，定严惩不贷”，这样一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又不能不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出自己降日卖国的鬼脸。

第三时期——从蒋介石公开发表禁谈抗日的禁令之日（今年四月底和五月初）至现在。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宣言停止抗日，其借口是说中国太贫太弱，目前没有抗日的可能。我们党怎样揭穿国民党这种骗人鬼话呢？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为的用自己的革命政策来显然对抗蒋介石这

种公开降日卖国政策,主要地采取了下列的步骤: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发表禁谈抗日命令的第二天,马上发表告红军和民众书,号召组织一百万红军,以便对日作战;同时,号召一切军队和民众不顾蒋介石的禁令而自动起来与红军一起去武装反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党坚决地拥护革命反日民众团体提出来的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底具体纲领,这个纲领之中的要求是非常简单明瞭的,但是真正能够组织民众武装抗日的,这个纲领是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最广大民众所能够了解和接受的。纲领中心内容是:(一)全体民众总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方和后方工作;(二)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到前线去对日作战;(三)把国内一切兵工厂、军械局、火药库内的枪炮子弹和从外国购买来的军械拿来使全民总武装;(四)具体解决抗日军费问题底办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作坊和商品,停付日债一切本息,没收一切卖国贼财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在本国和外国(首先是华侨)当中募捐……等等;(五)建立人民武装抗日底总领导机关(如“中华全国人民武装抗日自救会”)等等要求。此外,我们党普遍地在民众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底革命性、进步性、现实性和胜利可能性底理论,广大地阐明俄国布尔塞维克胜利地打退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底经验,英勇上海防卫战底经验,东三省反日游击战争底经验,红军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屡次围剿底经验等等,以便尽力在实际上证明:在现时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武装人民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有组织和实现的可能,而且其胜利有可能性与现实性。

正因为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了这样长期的、系统的、灵活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斗争,我们才能逐渐地揭破蒋介石

石和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和把戏，才能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政治经验中来信服我党口号底正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是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彻底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战士”等——变成广大民众的口号。正因为我们党进行了这种毫不倦怠的艰苦斗争，来组织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东三省、热河、福建和全中国，民众才越过越多地团结在我们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底周围，把他们认作是唯一能真正领导神圣的反日民族解放战争底政党、政府和军队。

此外，必须指出，除上述这些主要成绩之外，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在策略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还得到有其他的许多的进步——首先就是在组织、准备和实行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中，在企业内建立工人战斗的统一战线底工作中，以及在黄色工会内部工作中底进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康生同志将要讲到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进步，所以才能使我们党在赤色工会和在黄色工会方面底工作达到了初步的转变。

三、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第三点底具体表现，就是其组织上底更加巩固和增长。党员在最近这一年从三十万人增加到四十一万〇六百人。而且不仅在苏维埃中国增加了，同样在非苏区有很大的发展。在去年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我们在非苏区实际上不过有三万党员，而且因为严重白色恐怖的关系，差不多其中有一半不能与党经常发生联系。现在非苏区里有统计的已经有六万以上党员了，而且其中有一半

以上已能够经常交党费和在党组织内工作了。在党员质量方面,也有相当的改善,工人党员成份以前在全党中平均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现在已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底具体性和生动性,对企业中支部工作底注意力,都比前此改善和加强了。许多地方党部和群众组织底独立工作能力和自动性增长了。党报作用加强了,党报质量相当改善了,在非苏区和苏区底党报份数都增多了。引进了许多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干部政治的和理论的水平以及工作积极性都提高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底无情的两条战线上斗争和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底自我批评。——这一切就是说明我们党更加巩固和增长底主要事实。最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其各种走狗们,以及党内个别机会主义份子们,对我们党和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下如何卑鄙齷齪的造谣、侮蔑、谩骂和阴谋诡计,不管他们如何狂吠中国共产党底分裂和殒落,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 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在其十三年存在底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一、团结和一致。(鼓掌)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党和革命在最近这个时期能得到胜利底根本基础。中国共产党现在是联共以外,在全世界上第二个胜利地领导苏维埃国家和工农红军底共产党了。

这当然绝对不是说,在最近这个期间,在中共内已经没个别工作人员犯过这样或那样“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了。如果象在我们党这样一个大的群众的政党内,在这样非常复杂和困难环境之下工作的党内,没有一些工作人员犯过个别问题的错误,那简直是一件怪事了。我们大家都记得,中

共在其中央领导之下，在最近这个时期，经常进行了而且进行着锐利的两条战线上底斗争。党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这个倾向主要表现在，党内一部份份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底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同时，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同样坚决地反对个别领导同志的左倾情绪，例如有个别领导同志还在五次围剿时，便把国民党估计成为“死尸”等等。

中央帮助苏区中央局反对一部份工作人员在苏区各种重要问题上底各种不正确倾向：在职工劳动问题上，——反对那种表面上“左”的，实际上是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底孟塞维克式了解底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把个别工人阶层的局部的和经济的利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底具体表现，就是有些个别的工作人员，有时不顾苏区军事环境和经济状况，提出一些不仅不能办到而且甚至有害的要求（例如要求雇主不用苏维埃纸币而用现洋发工资等等），这些份子用以掩盖自己错误的是一些“左”的词句，例如什么“在苏区工人斗争的形式应当与国民党区域没有什么分别”等。同时，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底另一种态度，就是有些工作人员在军事环境和经济困难借口之下，完全否认有改善工人群众物质状况可能，并且否认赤色工会应尽保护工人日常切身利益底作用。在土地农民问题上——首先反对右倾倾向，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就是不顾基本农民要求和情绪，延缓或阻碍实行平分土地，同时，反对另一种表面上好象“左”的，实际非常有害的倾向，就是有些地方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了底土地。在军事问题上——一方面，反对那种对于国民党军

事围剿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反对那种经常提议红军采取防卫策略，甚至要求将正式红军分散成为零星的小的游击队伍，以及完全否认巩固根据地底可能和必要等这类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份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之下应战；或者为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中央同样领导非苏区党部在党和群众工作各方面进行两条战线上底斗争，例如：在工会工作中——反对个别党的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这样一种不正确的右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以为我们党和赤色工会独立地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是不可能的，以为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尤其是反日反帝斗争联系是不可能的，或者以为赤色工会底向前发展和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是很少希望的；同时，反对“左”的狭隘的关门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不了解建立和巩固一切工人在反对资本家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统一战线底必要，不了解加紧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和在其内部建立赤色反对派组织底必要，以及机械地把党的基本政治要求与工人部份的经济口号混淆起来。

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中央在全国——特别是在东三省和北方进行坚决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这些分子不相信广大民众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有实行和胜利底可能。同时，反对另一部份人的有害倾向，那些人不了解、不愿意和不善于根据各地

各个时候底具体条件，来建立和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一切反帝力量底统一战线。

在农民和士兵群众中底革命工作方面——中央领导地方党部反对以为北方和西北根本没有武装行动，或者没有夺取暴动胜利可能底这种右倾观点，同时，反对有些地方党部把农民或士兵武装行动当作儿戏，没有相当的足够的准备，便实行武装行动等冒险盲动的倾向。

中央领导全党在苏区和非苏区无情地反对那些破坏党的铁的纪律，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等坏倾向，反对任何人的任何派别倾向底企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进行毫不留情的两条战线斗争底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增长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增长成为真正列宁主义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了。

（二）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表现 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我们要问，除上述的这些成绩之外，在最近一年来，我们党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错误和弱点，主观力量比较起客观形势来相对落后底现象，是否已经完全克服了呢？

在非苏维埃中国党和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是很多的，而且并不是不重要的，它们主要表现在下列各点：——

直到现在，还不能保证在广大发展的反帝运动当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骨干，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党和工会在许多重要城市和中心地方（武汉、广州、九江等）底工作和组织太薄弱，特别是在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太薄弱；在这

样严重的革命和战争的环境当中，许多地方党部在敌人武力当中，还没有经常的和系统的工作，这简直是不可允许的弱点和错误；在广大农民和贫民群众当中，只做了很少的工作；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群众斗争，抱着忽视的态度；对于在劳动妇女和青年当中的工作和意义估计得不够；最后，为秘密工作基本原则而斗争和反奸细斗争都作得不够。

在苏维埃中国，我们在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中，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弱点和错误，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对于在中农当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够，而且有时候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首先就是左倾幼稚的态度），党和苏维埃组织相互间，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相互间，时常没有足够的正确的关系（或者相互混合，或者互相代替，或者互不相关等等）；有一部份共产党员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惕性有减弱的倾向等等。

虽然党和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中国现在的客观环境已经是这样：假若我们的党更加紧工作，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那些誓死不愿当亡国奴，誓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那些忠实的“民族武装自卫者”（或者所谓“爱国志士”）夺取到我们方面来；同时，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那些贫民、失业工人和饥寒交迫的劳动者，夺到我们方面来；我们有完全的可能把他们都变成为民族解放，为米粮，为土地，为工作，为房屋而斗争的积极战士，把他们实际上变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统治而斗争底英勇战士；同时，就使他们变成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而战底生力军。而这类忠实的反帝战士，这类无衣、无食、无住的劳苦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东三省

各地，事实上不只是几百万，也不只是几千万。但是，直接在我们党组织和领导之下而进行革命斗争的，还不过其中的一部份而已。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得到的成绩与客观环境的需要和可能性比较起来，其落后性依然是很大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

第三章 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

(一) 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

现在国际和国内一般状况，毫无疑问地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便利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发展和胜利。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最近将来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决定意义的胜利，预知太平洋上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战争底爆发；或者是帝国主义大战——首先就是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战争，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还未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前就爆发起来。关于反苏联战争很快到来的可能，关于这个战争在每分钟都有爆发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在中东路上不断的公开的挑衅和阴谋，在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远东边界上实行军事试探的行动，就可以明白看出了。但是，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或者用莫洛托夫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打溃敌人和使红军

胜利”。据我们的意见，莫洛托夫同志这句话不仅合乎联共在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的任务，而且也合乎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主要任务。

然而不管一般的环境是如何顺利，但是必须严重地估计到这一点，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其向前发展和争取决定意义胜利的道路上，将遇到不会比现在小而是更大些和更多些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困难和复杂性。不过从这些困难和复杂性的本身性质看来，他们主要的都是我们运动向前发展中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不能克服或不能战胜的。同时，因为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内部事变向前发展的关系，所有这一切的困难和复杂性，——至少是其中许多的和并非不重要的困难和复杂，完全有可能不仅逐渐地而且是突变地成为容易战胜和克服的东西。

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虽然中国离欧美帝国主义中心较远，但是，中国在海陆双方和这样一个强盗的、专倚劫掠为生的封建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明治、荒木底日本帝国主义毗连着。这个凶悍的强盗，已经用武力把中国整个活的肌体上割去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这个暴徒时时都准备着更进一步的向中国人民进攻，这个贪婪无厌的野兽，可以从本国和殖民地在最短时间内，派遣大批的海陆空军到中国底一切腹地。中国底一切主要经济命脉，都早已掌握在国际帝国主义底手里。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江海口岸，早已实际上被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了。帝国主义公开地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时期一天一天地快要到来了。

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

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虽然这种不平衡在最近一年来，已经有逐渐减少的趋向，然而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苏维埃革命发展当中底主要弱点之一。

此外，一方面，现在苏维埃领土底经济落后和不统一，以及红军在军事技术方面的缺点；另一方面，我们党在非苏维埃中国，首先是许多大的中心城市和东三省当中，党和群众工作底薄弱，以及我们在敌人基本军队中工作底不够等，就形成了我们的补充的困难。

用一切方法，首先就是加紧动员和组织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区域几千万以至几万万劳苦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旗帜之下，为有饭吃，为得到土地，为民族独立而进行广大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战胜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及夺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底最可靠的和最正确的办法。

(二) 新任务，新条件之下要用新的方法做工作

为的巩固革命既得胜利和实际上创造争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底前提，中央向全党提出下列最近的任务：一、动员一切力量冲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第六次围剿，更加用一切方法巩固和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底国家性，加紧为更加巩固和扩大苏维埃领土而斗争；尽最大可能在国民党中国去发展和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要创造无产阶级的骨干，以便保证无产阶级取得

和巩固领导权，广大地开展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工人以及无组织工人中的工作，夺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以便把赤色工会变成广大群众的组织，加紧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底罢工运动；用一切方法发展反日的群众游击运动（特别在东三省和北方）并夺取这个运动的领导；坚决地作夺取士兵群众底工作，并提高党在国民党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中底作用；最后，更加紧巩固和发展党，首先就是使党员成份和领导机关成份的工人化，教育和引进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在那些原来没有我们党的地方，或者有，但是很薄弱的地方，去建立坚固的和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地方党部，在军事工业和交通工业当中，建立强有力的党的组织，加紧反奸细的无情斗争，加紧为保证秘密工作和铁的纪律底斗争，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统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

有些人猛然看起来，或许会以为这些任务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同志们！这种观点完全是不对的。那一个要看不出这些任务当中的新东西，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不从实质上，不从真正内容上，而从形式上，从名词上来了解问题。其实，时常同样的名词所说明的任务，应当随具体环境来作不同的了解和实行。举几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例子，关于在苏维埃中国形成、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国家性底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出的。但是，如果在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对这个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就是成立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和制定及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各种基本法令和条例；而在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新式国家在中国形成后，我们对于这个任务底了解和

执行，就是把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令和条例具体化起来，并且根据新的具体环境将它们加以补充和校正，以便在实际上逐步实行；那么，我们现在能否象前此一样去了解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谁都会回答说：不能。现在我们对于这一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应当比较有更高的程度，应当比较有更具体的形式。例如，更加开展经济上和文化上底建设，更加发展和肯定赋税制度和国家预算决算制度，更加严格注意各级苏维埃底选举、改选和召回代表权底实行，更加改良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局底工作，更多地尊重革命法律等等。

第二个例子，关于开展反帝运动底任务，我们时时都说的。但是能否无论什么时候对这个任务作同样了解和执行呢？譬如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现在，一方面，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和言论上完全暴露出卖国贼真面目；另一方面，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更加紧向中国进攻，以便完全瓜分中国；我们能否说现在反帝任务与前两年所说的反帝任务作同样了解和执行呢？谁都会回答说：不能。因为以前这个问题——“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取得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为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没有象现在这样迫切地摆在广大群众底面前，而国民党卖国辱国底真面目，也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暴露得明白和深刻。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反帝运动任务底了解，已经是直接组织和实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了。现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民族危机底出路问题，不仅公开地和半公开地提到全体人民各阶层中去讨论，提到一切群众组织、一切群众会议和一切群众日常生活中去讨论，而且易于在实际上对群众证明我们的革命口号底正确，并引导他们走上坚决战斗底道路上去。

在以前，譬如说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以前，能否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呢？当然不能。

第三个例子，关于在敌人武装力量中工作底任务，我们时时都说的。但是，在现在政治条件之下，我们党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有没有点新的东西呢？我们回答说：有的。新的是什么呢？新的就是：（一）我们现在对于敌人军队提出的任务，已经是夺取敌人军队要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些。因为根据东三省、热河、上海、江西、福建，四川和其他地方底实际经验，在现在革命力量和影响发展的条件之下，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们作了相当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于简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这个军队从帝国主义后备军和中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变成为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卖国贼底战斗力量；（二）我们的军事工作，现在当然仍和以前一样，主要的是夺取士兵群众。但是，现在我们同样应当注意在敌人军队的下级以至中级军官成份当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级军官和各种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的热诚的所谓“爱国志士”，他们真正愿意为民族解放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拚命，他们到军事学校或军队中去的目的，很多只是为的得到军事智识和武器。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暂时地曾被国民党民族武断欺骗蒙蔽过，但是，他们现在一天一天地感觉到国民党卖国殃民的滔天罪恶，感觉到靠国民党绝对没有希望，因而极力企图在革命和共产党方面去找新出路。

第四个例子，关于在灾民和失业工人中工作底任务，我们以前也说过的。但是，在现在条件之下，在我们了解和执行这个任务当中，有没有什么一点新的东西呢？我们回答说：有的。新的是什么东西呢？新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些群众中

工作底目的，首先就为的是，一方面应用他们这些最广大的人力后备军来扩充红军和赤色游击队底队伍，以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底武装斗争；另方面，预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有可能利用这部份力量做后备军去反对革命（例如蒋介石不久以前下命令要在三个月之内招收六十万新兵，而他首先就是要在灾民中去招募）。

或者最后一个例子，关于夺取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到革命方面来底任务，我们也是时常都说过。但是，现在在这个阶层当中发生了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没有呢？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是的，有的。一方面，因为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因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广大群众生活痛苦到极点，而且广大民众的身家性命都没有丝毫保证；另方面，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巨大的胜利，在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当中，发生了一种显然的变化。就是发生了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的左倾情绪。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任务，首先就是加紧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当中的工作，把他们之中许多人变成为反帝运动的积极战士，应用他们作为宣传鼓动员的力量，并且把他们之中的各种专门人材吸收到我们方面来去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工作。

此外，必须严重地指出这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在党和群众组织当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党的任务底了解和执行，时常是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机械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的转变。

(三) 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中底新胜利和兄弟党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任务

你们大家大概都还很清楚记得,在不久以前(今年九月六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正主席毛泽东同志,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曾经共同发表宣言,告美、英、日、法、德工人、农民、智识份子和一切劳动者,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仇敌和中国人民底朋友。在这个宣言中,他们号召全世界劳动群众起来帮助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六次围剿。他们在这个宣言上说:

“**兄弟们! 姊妹们! 同志们! 朋友们!**

为保卫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千累万男女老少劳动者,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头颅,生命等,英勇地打退了那人数比他们多,军器比他们好的国民党的一连五次的围剿。现在,这个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

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且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宣言给了很大的响应。

一切中国革命的朋友和仇敌们,每天都盼望知道关于六次战争的消息。大家都想急于知道,在赛克特——过去德国国防总长,现在国际资本走狗(蒋介石)底走狗——直接指挥

之下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次与红军作战时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

现在在十二月初，在六次围剿战争的三个月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上，可以向全世界宣布：

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反苏维埃的六次围剿，在基本上已经溃散了！（鼓掌）

只有在赣北战线上，在红军和蒋介石主力之间，现在仍在进行残酷的战斗。红军在这条战线上，还未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但在其他一切战线上，在福建、广东、四川战线上，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取得了反六次围剿的决定意义的和完全的胜利。

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我们军事胜利的全部消息，但是，据我们已有的个别材料看来，在各方面的胜利已经是大有可观了。例如：在福建战线上，十九路军还在十月初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胜利：十九路军的六师人有四师人（第七十九，六十，三十一，三十二师）被我们打败了。卢兴邦的一师和刘和鼎的一师也受到了严重的失败。十九路军有三团人投到红军方面来。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三千三百兵士，一个旅长，三个团长，四个营长。在占领延平时，红军得到了十二隻满载军火、粮食、盐和金钱底大轮船（例如，要一万以上的工人才能把其中八隻大船上的物品卸下来），红军得到了四千六百枝步枪，五十枝重机关枪，三十架轻机关枪，五百支盒子炮，二千顶钢盔帽，四十万发子弹，五百个手榴弹和三架军用无线电机。（鼓掌）差不多闽西、闽北各县都完全苏维埃化了。

在四川战线上我们的胜利也同样的不小：田颂尧的四十六团军队，差不多完全被红四军打溃了；结果，我们得到六千枝

步枪，一百架机关枪，俘虏了他们的几个上中级军官，他们的兵士，死、伤俘虏等一起损失约一万以上。刘湘和杨森的一部份军队，同样被打败了。赖心辉的第八旅在马边、峨边等川西各县暴动起来了，暴动的士兵和农民游击队已经组织成为四川红军第一独立师了。这样，在川西就创造起来了新的苏维埃区域。广东军队，在赣南战线上，因为他们的后方闹问题，因为他们接连打了好几个败战，现在已经暂时的完全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在赣北战线上，红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第九十六师，第五师，第六师，七十九师，二十三师等，同时仅仅在打破蒋介石第五和第六两师的胜利当中，红军便得到了七千八百枝步枪，两架军用无线电机。红军曾经好几次地给赛克特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以严重的打击。现在已经时常使他们在许多地方不能不从进攻的策略变成保守的策略。因为最近福建事变的关系，那个原来已经感觉后方不安的蒋介石军队，更加感觉到楚歌四面了。失败的空气现在充满着蒋家军的后方。

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中共直接领导之下最近得到的这种胜利，是空前未有过的胜利。从军事的观点看，这个胜利的空前意义是：第一，它是在这样短的期间中得到的；第二，在这个胜利的过程当中，红军不仅占领了而且能把万县和延平这两个大城市和商埠拿在自己的手里；第三，在这次战争中，红军更加表示出它的伟大的威力，以致逼得有些敌人也不能不换副面孔来和红军说话，并暂时地停止了对红军底军事行动；第四，红四军和红二军在四川万县附近汇合了，这一点是我们很久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从政治的观点上看，这个胜利底空前意义是：第一，这个胜利把红军的威信更加提高了，使人们相信它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把苏维埃

政府底地位也更加抬高了，使人们更加不能不在事实上承认这个政府；第二，因为这个胜利底结果，在许多民众和军阀军队士兵群众中间，很快地发展着革命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苏区邻近各地方。福建的最近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福建独立政府底成立，福建政府发表许多激进的口号，不仅是反蒋反日，不仅是宣布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罢工、示威等自由，不仅宣布召集所谓生产者代表大会，不仅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不仅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而且甚至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中国完全独立自主，宣布按人口来平均地权，以及将一切森林、水利和矿产等均收归国有。福建政府之所以提出这许多“左”倾动人的口号，不仅是由于十九路军上级将领玩弄手腕和“左”倾词句，不仅是由于其他军阀政客们叫些好听口号以求得保证自己反蒋斗争底胜利，而且是由于广大民众，士兵群众以至一部份下级军官成份的革命情绪对上层压迫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士兵和下级军官之中底许多人，曾经和共产党及上海工人一起，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参加了英勇的上海抗日民族保卫战，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篇幅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可以断言，福建事变绝不会孤立无援的，在福建事变之后，接踵而起的，料还大有人在。福建事变客观上应当引起全国新的更大的更广泛的反蒋反日的群众运动底怒潮；第三，如果以前我们每次的胜利，使反革命派别更加团结和更加一致地去进攻红军，那么，这一次因为反革命在自己经验中感觉到红军是不可能战胜的力量底缘故，我们的胜利却反而临时地加紧了反革命营垒中底分裂、冲突和公开火并，这一点就必然客观上有利于苏维埃革命底向前发展。一方面，根据红军和全国革命运动力量底增长，另方面根据帝国主义者相互间冲突底极度紧张和因之而起的

国民党内部斗争底加剧,我们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和英勇工农红军一定要共同欢呼庆祝完全冲破六次围剿的胜利!反革命营垒内的这种紧张局面,是由于最近日本行动和蒋介石完全公开投到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中去等事件引起的。据最近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蒋介石和日本又签订了新协约,这个协约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几点——日本允许蒋介石的条件是:(一)放弃领事裁判权;(二)借款;(三)用日本顾问替代德国顾问;(四)保证蒋介石底军事供给。蒋介石对日本的交换条件是:(一)互免商品入口税——实际上就是免一切日货进口税;(二)承认中国北五省是日本势力范围,日本负责担负这五省的外债,中国只有在日本同意之下,才有权利租给别国新租界;(三)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美、日、英之间底冲突特别紧张起来了,日本在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以后,现在实际上又取得了北方富庶五省底完全监督权;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帮助之下,时时有进占全中国底危险。美国一方面尽力企图恢复自己在南京政府中底原有地位,另一方面在南方和北方更加积极活动起来——首先就是在福建和广东,美帝国主义希望经过十九路军上级将领来加强自己在福建和广东底势力,同时将英日走狗从这些省份中排挤出去;英国则一方面与法国签订了共同瓜分西北和川边及云南等省底协定,另一方面在总的方面赞助日本反对美国底斗争;而同时又进行严重斗争去反对日本在北方和长江流域影响底增长,并且利用自己在华南地位来进行抵制日货底运动。这样一来,就把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冲突也非常剧烈化起来了。

如果要问:在最近的将来,如果在红军完全冲破六次围剿以后,在中国将发生什么情形呢?据我们推测,大概不外下列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或者因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因为对于革命运动发展发生极度的恐惧，于是又暂时地把自己相互冲突和缓一下，以便延迟相互之间的公开火并，而得以共同力量去组织新的反苏维埃围剿；并且就是很快地爆发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的公开的对苏维埃革命底武装干涉，也并非不可能的——首先就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在四川、福建和江西等底武装干涉行动；

(二)或者因为帝国主义者暂时还不愿采取那种代价太大的公开武装干涉的办法，因为这些强盗相互之间冲突得厉害，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在一连六次围剿战败后，不能不需要相当时期来重新搜集和准备力量去进行新的反苏维埃战斗——红军或许在许多战线上得到某种形式的暂时的(虽然是为时不久的)军事休息(即是说，敌人停止对红军底军事行动)也并非没有可能的。

但是，应当着重地懂得，帝国主义者很快地组织新的隐蔽形式或公开形式的武装干涉底可能性，目前还是大于其他的可能性。而且，无论在这种情形也好或那种情形也好，在完全冲破六次围剿以后，中共为争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底斗争，为胜利地抵抗帝国主义者公开方式或隐蔽方式的武装干涉底斗争，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地减轻，而应当是更紧张的和更严重的战斗任务。

我们的兄弟党——首先是日、英、美、法、德各国共产党，在真正拥护和帮助中国革命和中国苏维埃方面，也应当这样地提出和解决问题。

然而，应当用布尔塞维克所特有的爽直性，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虽然在反对六次围剿斗争中，在欧洲和美洲兄弟党工作中看到初步的转变，首先就见到在党和群众刊

物上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问题较前加多，对于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拥护中国苏维埃底工作也较前广泛；虽然我们的日本兄弟党，英勇地、布尔塞维克式地、用尽一切所有的力量，起来反对那血腥的以明治和荒木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起来拥护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虽然我们的德国兄弟党，能不顾残酷的法西斯蒂白色恐怖，用尽一切力量，起来揭发赛克特和其他德国将军参谋参加国民党反苏维埃围剿底兽行，起来暴露社会民主党领袖格尔仁斯基和其助手魏一斯替蒋介石警察机关服务底罪恶；——然而，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我们的兄弟党所作的拥护中国革命和反对远东帝国主义战争底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在反对苏维埃中国组织和进攻苏联战争及瓜分中国世界大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

我们兄弟党在这个有严重意义的工作中，表示出这样长期的落后性，其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我们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底国际意义和作用估计得不够呢？他们或许以为，中国革命是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某种不甚重要的助力，所以值不得对中国革命加以严重的注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一个极蠢笨的错误。这种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态度，一般地就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而对于现时中国革命，尤其是不对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现在的革命，绝不是某个极小殖民地国家内发生的某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不过因其有反帝性质，所以客观上带有革命性。中国现在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现在革命是世界革命整个连环当中最主要的一环。现在中国革命向前胜利底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实际上创造将来更进一步转变到实行

胜利地社会主义建设底前提。

或者是因为这样吧，就是我们许多同志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问题，还保存有那种错误的和不正确的观点，即是那种早已在一九二六年就被斯大林同志严厉指责过了的观点吧？他们或许还这样了解帝国主义干涉底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帝国主义干涉。现在且看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怎样指示的，他说：

“而对于干涉问题时常了解成这样情形，就是要有运送外国军队到中国领土内这件事实；要没有这件事实，那就也没有干涉。同志们，这是最蠢笨的错误。干涉并不限于运送军队，而运送军队并不能成为干涉底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底现在条件之下，直接运送军队时，可以引起许多的抗议和冲突，所以干涉有更巧妙的和更隐蔽的形式。在现在条件之下，帝国主义所打算的干涉，就是采用组织附属国的国内战争底方法，财政上帮助反革命去反对革命底方法，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们的中国走狗去反对革命底方法。台尼金和柯尔卡克，犹尖尼奇和乌兰格尔反对俄国革命底斗争，帝国主义者曾极力想把这个斗争解释成绝对是本国内的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在这些俄国反革命将军底背后，站着有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者底帮助，俄国严重的国内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现在也应当这样说。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反对中国革命底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反革命将军受不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点，如果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以金钱、军火、指挥和顾

问”(见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底中国问题委员会上底演讲)。

斯大林同志关于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底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个指示,对于目前蒋介石和刘湘,陈济棠和张群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底斗争,更是加倍地正确。我们大家都相信,而且我们的敌人也公开地说,如果没有日、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拿金钱、军火、指挥和顾问等底帮助,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早已被强有力的人民苏维埃革命从中国领土上推倒了。而对于干涉问题底这种意见,对于现在中国情形,尤其是绝对不正确,因为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实行公开武装干涉,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每天每时都大大地在中国领土内增加自己的海、陆、空军力量,此外,必须估计到一件有极大实际意义底事实,就是中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即在所谓“平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驻有相当的军力,因此,即在公开武装干涉底第一个时期,当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感觉到在华军力不够,当他们的干涉行动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以前,他们的确还不需
要运送新军队到中国去。

最后,是不是为的这样原因,就是有时我们同志对于本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底革命斗争,与拥护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底国际主义底斗争之间底相互关系,还了解得不够,以致把它们两者分割或对立起来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要严重地去研究俄国布尔塞维克在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在十月革命胜利中底经验。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正因为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争取和平底真正国际主义革命斗争,与工农为面包、为土地底革命斗争以及被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压迫下底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三者联贯起来,才使布尔

塞维克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得到胜利吗？因此，必须明白地了解，拥护中国苏维埃底事业就是拥护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为本国苏维埃政权胜利底战斗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向各国兄弟党要求执行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条章程中底一条，这一条是由列宁直接提议的，这一条上说：

“每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底党，应该誓死帮助每个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反对反革命势力底斗争。共产党应该进行坚决的宣传，使工人拒绝运输送给苏维埃共和国敌人底军用品，在送去镇压工人共和国底军队中，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向兄弟党要求执行这个起码的和光荣的任务，以使用各国劳动者底友谊联合去对抗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革命联合，以便在最近将来能够在实际上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在我们兄弟党面前所提出来的那些任务。这个宣言在结尾上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特郑重号召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英勇的群众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屠杀中国人民中准备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反对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者用毒气，飞机，坦克，大炮等屠杀苏维埃中国的劳苦民众！

反对运输一切军火到华！

要求立刻召回美国飞机师，军事技术专门家和德国

将军及参谋！

要求立刻撤退美，日，英，法，意等国驻华海陆空军！”

我们应当很快地完成这些任务。

如果当帝国主义干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在资本主义各国内，不过才开始形成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还很薄弱，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居然能在自己的队伍中涌现出象我们安得列·马尔其这类的英雄，还居然能在拥护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底斗争中，显示出那种惊人的英勇。那么，在现在条件之下，不仅在日、英、美、法、德、意各国海陆空军中埋伏有成千成万的“安得列·马尔其”，而且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迅速地增长着共产主义革命和强有力的共产主义部队。我们坚决相信，中共和一切兄弟党——首先就是日、美、英三国兄弟党，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利用苏联共产党经验帮助之下，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英勇的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胜利的苏维埃革命底领袖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及其突击队——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国际革命同情万岁！

(继续很久的鼓掌，欢呼口号，代表们起立唱国际歌)

载《共产国际》(中文)第5卷第1期

署名：王 明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同志们：

我今天要报告的，不是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底一般问题，而只是关于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与红军策略这一个问题。

现在，蒋介石六次“围剿”红军底军事行动，业已继续到一年以上，并且到现在还未遭受到决定意义的失败。在前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从来没有能将其军事行动继续至一年以上的。这次，这一反革命的进攻能够比较持久，其原因在那里？在反对这一较长的“围剿”底战争中，我们党和红军得了些什么教训？我们党和红军采用些什么策略？这一战争底进展和今后底形势是怎样？这些都是关心中国革命底人们盼望知道，也应该知道底问题。

为要了解 and 解答上述底问题，我将我的报告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二）反对六次“围剿”战争底四个主要阶段；（三）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为什么具有这样长期性；（四）中国现状及中国苏维埃革命底最近前途。

* 这是王明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最早刊载于1934年11月苏联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俄文）第22期、《共产国际》（俄文）第32—33期，题为《中国红军反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

（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

大家都记得：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便提出了“剿共”底新策略问题。他的新策略的主要之点，就是一方面要规定新的军事计划，另一方面，企图把军事行动和政治方法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还在五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便提出实行“曾国藩计划”的口号，同时，便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底主张。但是，直到六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在德国赛克特将军的帮助之下，才真能开始实行他所希望实行的新计划。这计划的中心内容，据国民党说是“曾国藩和赛克特计划底联合”。所谓曾国藩计划的特点，就是模仿以前曾国藩、胡林翼等为满清皇帝杀中国人（压迫太平天国革命）的办法一样，就是除去用正式军队以外，一方面办保甲团练，另一方面，请洋大人出马帮忙；曾国藩请的是英将戈登，蒋介石现在请的是德国赛克特顾问，美国、意国的飞机师，以及日本的军事参谋和海军顾问。而所谓赛克特计划的中心特点，就是用英帝国主义屠杀非洲和印度的反帝民众的办法来屠杀中国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民众，就是用四面包围，步步为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方法，企图将苏区红军和民众逼到很小地方去，然后用飞机大炮以及毒气完全屠杀死！

现在我们就比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蒋介石这个卖国杀民的计划吧。

蒋介石所说的“七分政治”的计划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计划内，他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是“政治剿共”。在“政治剿

共”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主要地进行了下列各事：（一）组织专门杀人、放火、绑票、暗杀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公开的名称叫作“蓝衣社”，秘密的自名为中国的法西斯蒂党。虽然这个组织是暗杀和绑劫一切反蒋派别的人物的，但是，它特别注意反对革命的工农兵学生及他们的唯一领袖——中国共产党；（二）进行武断的欺骗的宣传（如什么“复兴农村”，什么“经济建设”，什么“废除苛税杂捐”等等）；（三）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方面企图以此遮盖其卖国降日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实行镇压一切革命运动，以便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灭亡中国起清道夫的作用；（四）进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尊孔读经，反动复古，焚书坑儒，卖国殃民的运动……等等。在这个计划内，他提出的第二个口号是“经济剿共”。在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所干的勾当便是，第一，实行所谓“经济封锁苏区”，禁止苏区与非苏区商业来往，因此，一方面，使苏区与非苏区商业均受损失，另一方面枪杀许多商人和借端敲诈许多商人的竹杆；第二，用飞机大炮轰炸苏区和苏区附近人民的财产、田地、房屋、工厂、学校、商店等；第三，焚烧山林；第四，抢劫苏区及其周围人民的米麦牲畜等财产。在这个计划内，他提出的第三个口号是“交通剿共”，在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所做的是，（一）破坏和摧毁苏区人民的一切道路、桥梁和水陆交通工具；（二）在苏区附近地方建筑铁路和汽车路，一方面便利运兵运饷，另一方面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销售汽车、汽车油和机器材料，以及代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计划内，蒋介石提出的第四个口号是“文化剿共”。在这个口号之下，国民党实行的便是，第一，所谓“到学校剿匪去”的行动，因此，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的成百成千的大中学生，有的被蓝衣社匪徒暗杀了，有的在黑夜被绑走了，有的被

军警逮捕监禁了，有的被开除出校了，而学校会考的实行，更是公开的监视和考察学生的思想，以便蓝衣社匪徒屠杀和逮捕；第二，收买无聊政客文人，利用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反动分子，威吓利诱许多共产党已经开除出去的叛徒和奸细，大办各种反动报纸杂志来宣传卖国殃民的思想（如《社会新闻》，《汗血月刊》，《社会主义月刊》，《中国与苏俄》，《青年月刊》，《铲共半月刊》等等）；第三，学郑孝胥宣传王道一样，宣传孔教、道教、佛教、耶教等，以麻醉青年思想。

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的计划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不是说，蒋介石在六次“围剿”中少用一些军事力量呢？不，绝不是的。这只是说，蒋介石除了军力以外，在六次“围剿”中更多特别注意政治力量而已。实际上，第一，蒋介石在六次“围剿”所用的兵力比前此任何时候都大些多些。例如，只在中央苏区周围，蒋介石便集中了七十师以上的正式军队，如果把全国所谓正式军队九十九师的数目比较，则只反对中央苏区的便占其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时，这些军队差不多包括了一切蒋介石现有的和能调动的军队底全部。除此以外，蒋介石还组织了许多民团和所谓“剿共义勇队”来帮助作战。第二，蒋介石在德国法西斯蒂的二百多个军事顾问帮助之下，成立了新的军事计划。这个新军事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呢？新军事计划包括下列主要各点：

第一，蒋介石从原来轻进长追的战略，转变到四面包围和步步为营的战略。

第二，蒋介石从原来长驱直入和求胜心急的战略，转变到所谓“碉楼政策”、“炮垒政策”及“公路政策”、换句话说，即是行军迟缓，但每占领一地，便赶快建筑炮台、碉楼及交通线，一定要等到这些建筑完成，然后才再向前推进。因此，蒋介石底

军队底行动非常缓慢，平均每天至多不过五六里路光景。

第三，蒋介石从原来以军或师为单位作战的办法，转变到改用大的集团军或方面军为作战单位的办法；他的每个集团军或方面军包含自五师至十二师军队。

第四，蒋介石在各帝国主义底积极援助之下，更加多量地采用最新的军事技术反对红军。在作战时，总是把飞机在前面轰炸，接着是重炮轰击，然后才是步兵作战。

第五，蒋介石在这一年中，特别设法巩固其军队的战斗力——为达到这一点，第一，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好几所军官训练学校，一方面教军官山地战、夜战及堡垒战等军事，另一方面进行政治武断欺骗宣传；第二，极力把蓝衣社干部分子分布在各“剿共”主要部队中，用政治训练处名义，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另一方面起宪兵队作用，实行在战时及平时监督士兵和官佐，以保证“连坐法”底有效，即以残酷的屠杀来威胁兵士与官长。

蒋介石在六次“围剿”中整个计划底根本目的在于一点，即是把苏区领土四面包围，然后逐渐缩小，以便将红军主力逐步逼迫到很小地域以内去，然后采用飞机大炮及毒气将红军及苏区民众，完全消灭！

蒋介石的新军事计划，使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中发生许多困难：

以前红军用以战胜敌人底策略，主要是所谓“诱敌深入，击破一方”。而现在因为敌方采取集团军和方面军为作战单位，以及力戒轻进深入等办法的关系，这个旧日特别于红军有利及常用以取胜的策略，现在已经是比较少成效了；这是困难底第一点。

敌人应用了一切最新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轰炸（蒋介石

石在六次“围剿”时，共动用三百架以上的飞机，其中有一百五十架经常到苏区及战线上投弹；这些飞机不仅是美、德、意、英帝国主义帮助的，其中还有十几架战斗机是海内外同胞募捐买来抗日救国的，而蒋介石把这些飞机，不拿去抗日，而专拿来屠杀本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红军，蒋贼卖国殃民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和重炮轰击；红军军事技术较弱的原故，所以很难与敌人正面作战，因此，不能不发生难于很快消灭敌军主力的困难，以及暂时不得不退出某些苏区领土等；这是困难底第二点。

因为敌人底集团军作战，敌人的前方和后方联络密切，敌人的碉楼炮垒政策，以及敌人对军队实行用蓝衣社分子来监视和威胁利诱，所以红军在夺取敌人武器及粮饷方面，以及敌人军队投降红军方面，都比以前要困难些；这是困难底第三点。

由此可见，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中，遇到许多新困难。

如果要问：红军有没有可能战胜敌人的这个新策略呢？那我们就能明白回答说：这种可能是有的。一般地说来，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新计划，只是因为：第一，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依然存在，即是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底武装斗争还只限于中国广大领土的一部分，因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他的一切军事力量集中到中央苏区来实行这种包围计划。在这种情形之下，很明显地，如果苏维埃革命发展到更大的范围，特别是在中心城市或蒋介石军队主要后方发生了很大的革命战斗（例如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或大的武装行动等），那么，蒋介石这种包围中央苏区计划，很快就会完全破产的。第二，蒋介石之所以能实行这种计划，是由于

红军缺乏军事技术——飞机、重炮等，因此，如果红军一旦有了这种新的军事技术的话，蒋介石这种计划，也会很快受到失败的。

然而以上所说的两点，在今天只能作为一般问题的提法，而具体的问题是：在现在条件之下，即是在中心城市及蒋军主要后方暂时还没有大的革命战斗，以及红军还缺乏新的军事技术这些条件之下，红军有没有可能战胜蒋介石这种新计划呢？我们可以回答说，这种可能红军是有的。在目前根据已有的经验，红军至少有两种应有的和可能的策略办法来打破蒋介石的新计划。

第一种策略办法就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再加上蒋军内部的大规模的士兵武装发动或者是蒋与反蒋军阀之间发生军阀战争。这种策略办法当然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必须估量到，最后这个条件，即是敌人内部发生大的武装斗争（或者是军队武装发动，或者是军阀战争），并不是能全靠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的。这一方面需要我们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因此，我们除此以外，还须有第二种策略办法来战胜蒋介石的新计划。

第二种策略办法就是：一方面使中央苏区红军和游击队在内防卫的军事行动，尽量地和中央苏区周围的一切红军和游击队在敌军两翼及远近后方底游击战和运动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央苏区内外的防卫战争，与其他一切大的苏区和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互相配合起来。

这个第二种策略办法，当然并不与第一种策略办法冲突，

恰恰相反，我们总是认为第一种策略办法更有效些和更有力些。因此，当我们采用第二种策略办法时，我们经常注意创造那第一种策略办法之中底优越条件，即是敌人内部战斗的爆发，以便红军更易于和快些得到胜利。但是无论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策略办法，红军反对蒋介石新计划底最主要的策略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和更加发展红军底实力，因为红军实力——这是最主要的东西。它不仅是战胜蒋介石六次“围剿”底根本保障，它——红军实力是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彻底胜利底最主要的条件和武器。

(二) 红军反对六次“围剿” 斗争底四个阶段

现在我讲到报告的第二部分——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去年(一九三三年)九十月，蒋介石开始第六次“围剿”起，到去年十二月福建事变发生时止。在这一阶段上，六次“围剿”战争刚才开始，蒋介石底军事布置还未完全周密，而同时东路底红军，则在闽江上游一带得到了巨大的胜利。十九路军的六师主力中有四师被红军打败了，红军占领延平、邵武、黎川一带主要军事区域，并直接威胁福州，因此，停止了十九路军对红军底进攻。同时在赣北底蒋介石军队，也屡被红军击败。红军在这一阶段中占了胜利的优势，蒋介石被逼迫重新规定作战计划。因此，中共代表团在去年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上曾认为中国红军在那时已经获得了开始冲破六次“围剿”底巨大胜利，这种估计确是合乎这一阶

段底形势。

第二个阶段——从福建事变——即是十九路军公开宣布反日反蒋和成立所谓福建人民政府之日起，至十九路军失败时止。这一阶段底主要特点是，蒋介石不能不把主要部队从江西北部调到福建去进攻十九路军，因而江西前线底红军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暂时的军事休息，而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公开实行反蒋军事行动，事实上使十九路军由进攻红军的军队转变成成为随同红军一起反日反蒋的友军。这一阶段中底形势，较之第一阶段对于红军还更为有利。因为这个形势，恰好符合我们上面所说过的第一种策略办法，就是说，恰可以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战争，与中央苏区外部的红军和游击队底行动配合起来，还加上十九路军公开反蒋的军事行动。如果红军善于运用福建事变的一切结果，则当时的确有很大冲破六次“围剿”底可能。可惜的是，红军和十九路军两方面都做下了错误，以致未能在当时达到共同战胜蒋卖国贼底目的。因此，这一最有利形势底阶段，很快就结束了。

第三个阶段——从十九路军在福建失败起，至今年七月底止。这一阶段是苏区红军主力和蒋军主力之间进行最酷烈、最艰苦战争底阶段，同时也是红军斗争中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内，一方面蒋介石才能实行赛克特等所定底新策略和新战术，换句话说，即是由于十九路军底失败，福建全省落入了蒋贼底手中，因此，不仅使红军要在两条战线——北线和东线——上进行战斗，而且使红军暂时处在四面被围底形势。因为蒋贼在福建胜利以后，曾逼迫得原来比较不十分积极进攻红军底部队，也暂时底积极活动起来。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内，中区红军主要地是采取了从内防守底战略。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区红军在这一阶段内没有得部分的军事

胜利,实际上中区红军在这一阶段内得到过很多的胜利。

例如: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尤溪之战,红军击溃敌方第五十二师,直抵卢兴邦大本营,夺获步马枪二百支左右,炮四门,很多炮弹及银洋,并夺得兵工厂全部(有四十架机器)。一月二十五日沙县之战,红军击溃敌方第五师,夺获步马枪一千四百二十支,盒子枪三十四支,机关枪二十九架,炮八门,炸弹一千五百五十个,俘敌兵一千三百余人。一月十六日南丰宜介坳凤翔山之战,红军击溃敌军第六十七和七十九两师。三月十五日三溪圩五都之战,红军击败周罗两纵队。三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太宁之太阳嶂及新桥之战,红军击溃敌军汤纵队,缴得步马枪一百八十二支,盒子枪四支,机关枪十七架,炮四门,步枪弹十万余发,炸弹五千余枚。四月十八日永安之战,红军打退敌第五十二师,缴步马枪九百支以上,机关枪十余架,炮七尊,无线电三架,俘虏敌军在一千人以上。四月十八日广昌之战,红军击溃陆军第十一师,缴得步马枪数百支,机关枪七支,子弹约三万发。四月二十六至五月十九建宁战役,红军击溃周罗两纵队,缴得步马枪数百支,盒子枪十余支,机关枪八架,子弹两万余发。五月二十七日沙县梅引之役,红军打败敌第八十师二营,缴枪约四百支,机关枪四架,子弹约十万发,并三百人以上俘虏。五月二十九日胡源之役,红军打溃敌第八十师一旅,缴得约九百支步马枪,二十五架盒子枪,四十二架机关枪,三尊炮,并一千四百二十人俘虏。六月八日永丰龙岗之役,敌第九十一师被红军打败了,红军俘获敌四百人以上,夺得步马枪三百五十支,机关枪十一挺。在六七两月在广昌建宁一带,发生极剧烈的战争,红军曾给进攻蒋军以许多严重的打击。如果把最近一年来反六次“围剿”战争作个约略的总结,那就更加明显地可以看到蒋贼受到以下的损失:据不完全

的敌方统计,蒋贼在一年来与中区红军作战中,军队死亡在四万至四万五千人以上,受伤者约四万人,被俘虏者约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换句话说,损失在十万人以上。同时,如果我们要估计到,六次“围剿”严重战役只是在第三阶段才大规模进行,那就可以更加明白地看出红军得到不小的胜利。但是,虽然红军得到了这许多胜利,然而,第一,因为蒋贼能够很快从别省调兵来江西或新招队伍来补充;第二,因为红军方面没有新的军事技术,不能很快冲破敌人的防御工事,因此,直到现在红军不能冲破敌人包围的最主要的北方战线,去消灭敌人的主力,于是也就还不能得到冲破六次“围剿”底决定意义的胜利;此外,蒋介石利用其军事技术的优点,在这个第三阶段上,曾使红军不能不及时地和自动地退出一部分县城(如广昌,建宁,泰宁等)。

第四个阶段——从今年八月初,第七军北上抗日和第六军团西进长征之日起至现在。在今年七月底和八月初,红军开始实行了更合乎现时战争条件需要底新策略。这个新策略实现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红七军和红九军的东征。红七军和红九军迅速地冲破了敌人的东路包围线,如入无人之境地通过了福建西南部,一直逼近到福州城沿路一带,红七军得到许多胜利,它占领过沙县、尤溪、水口诸城市,它夺得很多武器和粮食等战利品,它曾经夺得二十三架运兵汽车,它用这些汽车把队伍很快地运到福州城周围实行攻击,然后又很快地折向东北,与福宁福鼎一带游击队联系起来,在占领福宁以后,迅速北上,经过寿宁、政和一带,达到了闽浙边境,并且占领了浙江的开化、庆元、常山、玉山等各县。红七军这种军事行动的结果,创造成了反对蒋军底新战线,即是,它与游击队一起创造起闽浙赣边一带的新苏维埃区和新游击区。此外,根据一切消

息看来，红七军已经与闽赣皖边红十军联系起来。红七军与红十军的联合，不仅造成威胁蒋军江西后方和震动蒋贼最重要老巢的浙江，而且在政治上大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威信。红七军的北上，不仅是为的讨蒋，而且是为的抗日。红七军在百战百胜的指挥员领导之下，在实际上证明了它不愧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英勇地完成着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所给予它的最伟大的和最光荣的任务——打通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以便红军主力能够在最短期间与全国民众一起直接实行抗日的神圣战争。同时，红七军在这次胜利长征中，又一次在实际上证明红军军事战略的灵巧和军事行动的神速。

红军新策略采用底第二个结果，就是红六军团底西征。红六军团在萧克同志领导之下，在八月中，冲破了敌军在湘赣边境的包围线，顺利无阻地通过了整个湖南省东南部，沿途占领过汝城、桂东、桂阳、新田、道县等城市。然后道出广西，占领全州，然后再走向贵州边境，与在当地一带行动底贺龙红二军团联合起来。根据十月八日《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在与红二军团汇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军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这种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苏区与游击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和孔道。这就使红军和游击队在各方面更加便于在蒋贼两翼及后方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由此可见，红军在第四阶段上采取的新策略完全是正确的。红七军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只还不过是实行新策略底一部分和开端。然而即就这部分行动的结果看来，红军反六次“围剿”战争已经逐渐地开展起一幅新局面。这新局面发展的特徵有下列各点：

一、将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更加配合起来；

二、将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与以前比较远隔着的大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逐渐联系起来和汇合起来，以便共同进行斗争去反对敌人；

三、在敌军远近后方及左右两翼建立起新阵势，以便利于中央苏区底防卫战，同时，使敌军军事行动感受困难；

四、逐渐地把军事主动地位从蒋介石手中夺取过来，使江西、福建、湖南各方面红军从纯粹防卫地位转向反攻或进攻的形势；

五、完全打破蒋介石以封锁和堡垒政策四面包围苏区，以便消灭红军主力底计划；

六、很快地使红军和游击队实力增加，使红军的军用品和粮食增加，并且创造新的苏区和游击区。

因为红军作战计划底改变，蒋介石也很快地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蒋介石以前是集中最大力量在江西北线，现在却从东线实行对红军猛力攻击。蒋介石以前是缓进行军，现在却企图很快达到占领汀州、石城和瑞金等城市的目的。因此，从九月二十六日起，蒋贼便实行下令全线猛烈总进攻。在进攻汀州、石城线上，蒋贼除用十四师兵力外，还采用重轰炸机去轰炸城市和乡村。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些新的军事行动，其原因是：第一，蒋贼相信，在红军新策略条件之下，他的封锁和包围苏区以便消灭红军主力这一计划，很快消失效力，所以企图用猛进力攻的方法，以便能够早日达到苏区根据地，使红军主力受到损害；第二，蒋贼害怕，红军其他部分又离开江西而北上浙江，而浙江是蒋贼的最主要的军事的和财政的根据地；第三，蒋介石企图在所谓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原来

拟定在十一月间开会)之前,用一切力量在进攻江西中央苏区方面得到某些足以吹牛的“胜利”,以便一方面多少维持下“面子”;另一方面拿武力来威胁反蒋派别(首先是广东派的陈济棠、李宗仁、胡汉民等)使之屈伏;同时,第三方面,使蒋贼得以在所谓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易于实行他的计划,就是将党政军各机关中反蒋分子完全排除,而代之以蒋系的最忠实的走狗,以便蒋贼一方面更加易于实行个人专政,另一方面用五中全会名义去反对一切反蒋的新旧敌人。

很明显地,在上述这各种情形之下,红军方面最聪明的和最恰当的策略,就是继续更坚决地实行自己的新策略,以便:第一,不使自己实力受敌人打击;第二,不受敌人挑衅和不中敌人奸计;第三,真正进行斗争去准备一切必要条件以便完全冲破六次“围剿”并争取苏维埃革命更大更新的胜利。

在敌我两方这些策略办法底情形之下,敌人再占领去苏区的几个城市——甚至最主要根据地内的城市,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很容易懂得这一点,就是这是红军军事战略上所必需采取的手段,这是真正准备争取新的伟大的胜利。

从破坏赛克特包围红军计划底观点看,从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底观点看,从使一切红军和游击队互相呼应和互相配合去反对敌人底观点看来,从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发展前途底观点看来,红军在目前第四个阶段上的情形,要比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第三阶段上的情形好得多。

根据下列事实:(一)红军与人数超过它数倍而且又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物质上(金钱、军火、专门家)和精神上帮助的反革命军队残酷地大规模地作战到一年以上,由于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灵巧的攻守进退的战略,中央苏区红

军实力——这个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不仅未曾被敌人消灭，不仅未曾减少，而且大大地加强和增多了；（二）甚至个别的部队和军团能够从中央苏区冲破敌人的包围线，而按时地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指定的地点；（三）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在蒸蒸日上地向前发展；（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红军和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增高，全国人民都公认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是能挽救中国危亡底唯一力量，因此，民众对苏维埃和红军底援助和同情空前增长。同时，对蒋介石卖国贼底仇恨与日俱增；最后，（五）全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向与红军和苏维埃有利底方向发展——根据这一切事实，我们深刻相信，虽然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在中央苏区有部分领土上的损失，一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完全冲破蒋介石的六次“围剿”。

（三）为什么红军反对六次“围剿”底斗争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

现在我讲到报告的第三部分——为什么红军反对六次“围剿”底斗争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这首先就是由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目前阶段上发展底特点产生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最近几年来大概时常都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已经几年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武装斗争也继续好几年了。但是，在这几年的长时间，为什么无论革命方面也好，无论反革命方面也好，都不能给与敌方以致命的打击？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已经在几省领土内取得了首先胜利，但是，它直到现在还依然不能取得决定意义底

胜利；而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底联合进攻，直到如今不仅不能给革命运动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不能停止革命的向前增长和发展。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底主要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这些原因就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从国内的条件看来，它有以下的各点：

一、中国革命有可靠的领导——群众性的和布尔塞维克化的共产党底领导。

二、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开始发展的阶段上，便创造出了自己底武装组织——工农红军。

三、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开始发展阶段上，便成立了人民底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四、中国革命已经有了一定领土的根据地。

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得着各苏区民众拥护，而且得到全国民众底赞助和同情。

六、中国是一个所谓地大物博的国家，因此，红军有充分富源可供使用，且在军事行动上能够进退自如。

七、很重要地，中国革命目前的直接敌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这些军阀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而且时常或者根据帝国主义主人命令，或者为的抢夺地盘而实行武装内哄，这些军阀在广大民众心中是最可恨的卖国贼和刽子手。

从国际环境的条件看来，中国革命有下列优点：

一、中国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底新阶段，发生在世界革命和战争底第二个新周期底前夜；

二、中国革命能够利用由共产国际集聚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联邦共产党的胜利经

验，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在国内战争时打败本国白党和帝国主义干涉底经验；

三、中国革命能够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首先是正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底苏联工农底同情和声援。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谁都懂得，今日的苏联，正是将来苏维埃中国的写照，而今日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切设施，正是使中国人民得到完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底开始。

但同时，中国革命有严重的弱点：

一、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是在不平衡状态中发展着，在中心城市及敌人军队方面，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及力量到现在还很薄弱；

二、革命首先胜利的都是经济比较落后底区域，而且这些区域还是分碎和零散；

三、最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革命底敌人，不仅是中国底地主资产阶级，而且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虽然因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但它还有力量干涉中国革命。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比其他任何国家革命要受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例如，第一，拿中国革命与印度、安南等革命比较，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印度、安南的革命运动（至少是在最初阶段）首先遇到的是某一个帝国主义强盗（英或法）底干涉；而中国革命，一开始就遇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妨碍和干涉（从美、日、英、法、德、意，直至荷、比、葡等）；第二，拿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外国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底公开武装干涉，只是在布尔塞维克已经在国内有决定意义的中心城市得到胜利以后才发生的，而中国则因为帝国主义在

平时早已用武装力量占领了一切中心城市和海江口岸，所以革命一发生的时候，就随时随地受到帝国主义力量的妨害和干涉；第三，中国虽然在地理上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距离较远，但是，中国的最近的邻国之一，便是那个贪婪无厌和公开掠夺的明治和荒木统治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在极短时间输送海陆空军到中国腹地镇压革命运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把镇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行动看作是：完全殖民地化全中国，准备反苏联战争和太平洋日美大战根据地和后方，以及防止日本本国工农苏维埃革命爆发底必要条件。

蒋介石反革命方面底力量在什么地方呢？

一、蒋介石的力量，首先就是在于，他能够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军事技术上，以至于精神上底大量的帮助。例如，据日本报纸消息，在最近三年来，蒋介石在各种名义借口之下，向欧美各国借到了五万万大洋的款项，而秘密军事借款，还不在此内。现在每个人都明白知道了：蒋介石对红军底历次“围剿”，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底隐蔽方式，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等军阀，作为统治中国民众底走狗；蒋介石等屠杀中国民众，为的拥护外国帝国主义主人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二、蒋介石等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就是能够得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帮助——特别是浙江财阀的帮助。浙江财阀是中国经济上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派别，同时，是蒋介石经济财政的主要来源。浙江财阀对外是专为蒋介石借外债的买办，对内是专为蒋介石承销公债和库券的经纪人。浙江财阀每年仅从这种代借内外债的回扣和利息当中，便要弄几千万甚至上万万的大洋到腰包里去，浙江财阀是吸吮中国人民

血汗的一群大寄生虫！

三、蒋介石的力量，就是他能够把国家机关向人民榨取的一切苛捐、杂税以及关税等用作“剿共”底军费。

四、蒋介石等的力量建筑在军阀制度和雇佣兵制上面——中国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有广大失业和饥饿的群众，蒋介石现在还能利用这些暂时受了他的欺骗和为着找碗饭吃而去当兵的群众来组织军队去反对红军。

五、蒋介石等的力量，还在于蒋介石等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善于散布欺骗宣传和玩弄政治手腕。因此，在中国一部份小资产阶级中，造成了对国民党的某种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能够造成的来源，主要地当然并不是由于群众对现在反革命的国民党底言行有什么真正的相信，而多半是由于有一部份人对过去国民党的作用——即是当国民党联共、联俄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时的革命作用，还有时起许多回忆和幻想。同时，蒋介石等之所以能在一部份人中散布对国民党幻想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许多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对于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抱着轻视的和不注意的态度。因此，就不能在群众面前按时地和澈底地揭穿蒋介石等这些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底真实意义。

但是，反革命方面也有它不能补救的弱点，就是它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党及中国革命方面所具有的那种特殊优点——即是百战百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全中国和全世界广大劳苦民众的同情、拥护和帮助！同时，全部世界史再三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底最后命运，不是由军事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广大的千百万的民众底意志和毅力决定的。

正是上述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这些力量和弱点，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带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

性，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发生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同时，也正是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这些力量和弱点，可以解释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长期性和延续性。如果要问：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底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还能够继续到好些时候呢？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答复这个问题，就是，肯定地和机械地来指出时期和决定时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设想，大概是不会错误的，即是中国革命目前还没有渡过这个长期性的阶段，但是从几年来长期革命斗争已经准备下了相当基础来更快地发展更大规模的阶级战斗这个观点看，从中国全国事变发展的趋势看，从国际事变——特别是远东事变发展的情形看，就作为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斗争不很快地走向突变式的发展，但至少有可能比前此这个时期发展的速度要快些。

六次“围剿”战争能够支持很久底第二种原因，就是蒋介石实行更公开的降日卖国政策底结果。

从去年〈塘沽协定〉签定以来，蒋介石便从暗中卖国走到公开降日底道路。大家都还记得，塘沽密约的内容是：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中国察绥两省境内，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须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经济的友好的提携，及内乱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之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日中满正式协定，于中国认为可能时始得协定。中满国界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之后，始会同确实划定

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成立之翌日实行之”。

《塘沽协定》规定的条件，蒋介石在各种形式之下已逐步实行着，滦东一带划为所谓“非军事区域”，实际上是交给了日帝管理；北平天津一带已成了日本军事根据地；实行通车通邮，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满洲国”；公开禁止一切反日反满洲国宣传，在蒋贼（最近对外记者谈话）御用的报纸杂志上（如《社会新闻》等）公开申明收复东北问题现在根本谈不到；汪精卫、戴季陶、何键等公开宣传“中日共存共荣”和中日亲善底主张；尽力镇压一切反日运动——首先用一切力量进攻共产党和在他领导之下的抗日救国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实行铁路和航路中日联运，颁布新关税税则减轻一切日货进口税，以便日货在中国各地倾销……所有这一切，都是南京政府实行《塘沽协定》的具体表示。蒋介石这种更公开降日的政策，当然在政治上更加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了他自己的卖国贼真面目。但同时，也正是这种公开降日卖国政策，使蒋介石能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更多更大的帮助，因而暂时地和部份地加强了他的军事势力。例如：第一，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之下，逼使一部份东北军南下，因此，蒋介石能够利用这部份东北军去反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而把原来在湖北、河南的许多部队调到江西和福建去进攻中央苏区；第二，北方反蒋派别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监督之下，暂时地不能实行公开反蒋行动，因此，使蒋贼对北方暂时能多少放心得下，并把原来用以监视北方反蒋势力底军力调到江西、福建方面来；第三，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日蒋双方武力夹攻之下，蒋介石很快地解决了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孙殿英等反日反蒋底行动，因此，使北方反蒋运

动暂时受到打击；第四，蒋介石在日本的军事上和精神上帮助之下，很快地战胜了反日反蒋的十九路军，因此，使广东派等反蒋行动都受到暂时的阻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在此次围剿当中，才能将全国正式军队的三分之二和差不多他的全部军队集中到江西、福建等省去反对中央苏区。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蒋介石在六次围剿中，除得到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帮助之外，还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大量的帮助（金钱、军火、专家和顾问——据各方面消息，蒋介石已辞退赛克特，而另请日本军官作军事顾问），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心思比任何人都急切，而帮助中国反革命也比任何人更便当。由此可见，蒋介石更公开降日卖国和日帝对蒋贼加紧了各方面的帮助，是六次“围剿”战争带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底第二种原因。

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之所以带有长期性和延续性底第三种原因，不仅是由于在六次“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空前未有过的军力和采用了赛克特的新计划，而且是由于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弱点。

论到我们的这些错误和弱点时，我首先就应当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军事计划底错误。直到现在，关于福建事变教训问题，在一部份人中间多少有些争论。讲到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大家现在都一致承认了：福建事变不简单地是反映国民党军阀内部冲突，而同时是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十九路军士兵和一部份官佐的反日反蒋底革命情绪底反映，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号召一切军队共同抗日讨蒋底第一次实际响应，并且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长底结果。讲到福建事变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即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帮助，以极大军力向十九路军猛攻，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讲到福建事变失败底主观原因时，事实上现在也不容争论，因为十九路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和缺点，现在事过境迁更看得非常明显的。现在谁都知道，即是站在最友谊和最爱护十九路军底观点上讲，也不能不指出，当福建事变时，十九路军领导方面确实犯了下列的错误：第一，十九路军领导在政治方面上了生产党、甚至个别托陈取消派分子这类无聊政客的当；这些政客们一方面想利用十九路军这支军力来达到他们幻想的中国的“第三条出路”（即是既不是国民党的反革命的殖民地化底出路，也不是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底出路），因此，他们故意在口头上提出许多他们自己认为“过左的”口号（如什么“耕者有其田”，“分配土地”，“国有矿山、森林、水利”……等等），而在实际上，他们不仅不能执行这些口号，而且甚至连一般民主自由权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身体、居住、罢工、示威等自由）都不能和不愿给与民众，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利用十九路军来作为升官发财和争权夺利底工具；结果，使十九路军和所谓福建人民政府陷入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就是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不合乎他们的革命词句，所以劳苦民众不能真正起来帮助他们；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高唱革命口号，于是使各种可能的以至原来多少有过成约的反蒋军阀方面的同盟军，暂时地对福建事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第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仅仅执行了它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方面签定的协定底一部份（例如，公开宣布反日反蒋，停止进攻苏区和立即进行讨蒋军事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和建立经常相互通商关系，释放政治犯等），但是未有执行协定中的另外一些部份（如武装民众抗日讨蒋，广大组织工农群众等等），以致不能得到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底援助；第三，十九路军对于闽赣东北边境这条战线底

严重意义估计得不够，以致把防守延平这个战略要地底责任交给了那些靠不住的和见利思迁的将领；尤其重要的，当那些叛将把延平一带出卖以后，十九路军领导方面未能接受红军总司令部及苏维埃政府底忠告和提议（即立刻武装民众，继续进行坚决反蒋武装斗争等等），未曾企图继续与红军共同对蒋作战，以便尽力造成新局面，而竟然几乎不战而退出福州。

但是讲到在福建事变时，我们红军指导在军事计划方面是否犯了错误这一点，却直到现在，还在个别分子中间，不免有时发生争论。我们的党和红军领导方面，早已了解到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在军事计划方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的领导方面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一样，对于闽赣东北战线底严重政治意义和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估计得不够；我们的领导方面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一样，以为十九路军和蒋贼军底主力战应在浙江方面；因此，不仅未曾特别加强力量去巩固这一道战线，而且将当时在延平、邵武一带驻防的一部红军主力调向抚州战线方面去，同时，甚至企图使红军渡过赣江从后方去给蒋贼军以严重的打击；而事实上因为我们军力在这条极严重战线上底减弱，所以蒋贼军在其走狗刘和鼎等帮助之下，能够比较顺利无阻地向这条战线方面推进。蒋介石军占领延平，就造成了一方面截断十九路军攻浙部队后方，而另一方面直接威胁福州底形势。因此，在十九路军方面形成了惊惶失措底情绪；而在那个时候，红军又来不及立刻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和有利的援助了。红军领导在军事计划方面这个错误，以及十九路军领导方面的各种错误，就形成了福建事变失败底重要原因。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失败，马上增加了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困难。如果我们红军领导方面及十九路军领导方面没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那么，福建事变或许会得到完全另

样的结局。因为在十九路军顺利攻入浙江和红军积极在闽赣东北线活动底情形之下，蒋介石的地位便感到非常困难。蒋介石无论在浙江战线上或闽赣东北战线上受到失败，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他的全线总溃退。而在福建事变继续向前发展的条件之下，全中国政局将会产生完全另外一种新局面。因为如果十九路军和红军能够在共同作战条件下给蒋介石以巨大的打击，那么，毫无疑问地，一方面要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日反蒋的革命巨潮，另一方面，要引起一切反蒋军阀派别以至蒋系内部动摇队伍起来实行武装反蒋。这种假定在实际上完全有实现的可能；例如，甚至在十九路军已经失败之后，北方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冯玉祥等部队还公开打起了抗日讨蒋底旗帜。如果福建事变能继续发展到北方武装反蒋发动之日，那么，北方反蒋势力和十九路军都或许会得到另样的结果。如果当时能形成象以上我们所说的这种政局，那么，不仅蒋介石对红军六次“围剿”早已完全破产了，而且全中国的政治情况，在今天有可能早已是另外一种局面，即是更加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底局面。

有个别的份子对我们党和红军领导机关对于福建事变时我们军事计划底这种估计，有些不同意，这些人以为福建事变时红军的军事计划是对的。这些人的第一种理由是，红军不应当代十九路军接受蒋介石的打击，因为当时蒋介石集中一切力量去打击的目标是十九路军。这种理由猛然从表面上看去，好象也言之成理，但实际上简直经不起任何批驳。因为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这些人的第二种理

由是，红军因为缺乏空军及重炮队，实际上不能够真正妨碍和阻止蒋介石从东北战线对福建底进攻。这种理由已经被事实粉碎了；事实证明了，中央苏区红军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在军事环境比较福建事变时困难得多底条件之下，仅仅靠自己的力量，还能在几个月期间内妨碍和阻止蒋介石从各方面战线底进攻，还能使蒋介石军队在几个月期内非常困难地和缓慢地侵入苏区某些领土，而在福建事变时，红军妨碍和阻止蒋介石对福建底进攻，要比现在妨碍和阻止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底进攻更容易做到些。同时，我已经说过了，红军在当时阻碍蒋介石从东北战线向福建进攻底每一天时光，不仅有非常大的军事作用，而且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此外，最坏的就是另一部份极少数人的观点，他们否认福建事变时我们的错误，是从企图抹煞这些错误和掩盖这些错误底观点出发的。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共产党的优点和力量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布尔塞维克党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就是我们不仅不抹煞和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且勇敢地揭发和公开地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在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教训当中来学习，使将来再不重复这些错误和缺点，并且懂得应该怎样去战胜敌人。

第二，在最近一年来，我们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于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我们北方党部对于吉、方、孙、冯等部队在本年春季发生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意义底忽视。这些军队反日反蒋行动受到失败底主要原因，一切站在抗日讨蒋的统一战线底友谊观点上的人，都不能不指出下列各点：（一）蒋介石公然派兵去打击这些军队的后方，因此，给所谓日满联军军事行动上以莫大的便利；换句话说，这些军队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与日满匪军底

公开的军事联合行动；(二)这些军队发动迟了一些，就是他们未能与南方福建事变同时发生，而是发生在福建事变失败以后；(三)这些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不真正允许民众自由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以便向全副武装的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进行严重的斗争，反而用尽方法去妨碍和限制民众组织和民众武装底行动；(四)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在军事行动当中，经常表示出动摇和不坚决。但是，同时，必须指出革命力量在这些军队行动中底错误和缺点。如果可以断定说，这些军队的武装反日反蒋行动，在一定程度内，是由于我们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和民众中英勇工作准备起来的，那么，同样应当指出，我们的北方党部在这些事变当中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首先就表现在，他们没有对于这些事变加以严重的注意，他们没有企图把这些军队争取到真正进行坚决反帝反蒋斗争方面来。关于这一点，举这样一事实，便可以证明。例如，虽然中央再三发下指令，虽然许多同志再四提出要求，要北方党部派遣大批党团员到这些军队中去形成坚强的革命骨干，并派得力的领导分子去形成有战斗力的坚强领导机关，但北方党部只派了很少的同志到军队中去，而且派了三个同志去组织领导机关，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还是不久才用写声明书这种简单方法混回党内来的反革命罗章龙派的分子(张金纫或名张慕陶)，另外两个人无论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也都是不能起独立领导作用的。结果就造成这样的现象，就是一方面，这个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分子，在军队中假借党的名义，进行奸细的和破坏的工作，在群众中和军队中破坏我党威信，并进行分裂反日反蒋队伍的工作；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在这些军队中还表示出非常薄弱，以致我们不能在紧急关头，将这些军队引导到继续坚决反日反蒋斗争道路上去。现在每个

参加过和晓得这些事变的人，都公开承认，如果当时我们的北方党部不犯了这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有可能使这些军队之中底很大一部份，走到真正坚决的反日反蒋的战斗道路上去，结果便可以在北方和西北形成反蒋的新阵容。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逼使蒋介石把许多部队不能不从江西福建战线上调到北方去反对这些反日反蒋的军队；另一方面，不可免地要引起北方和西北民众的广大反日反蒋新高潮，同时，还可引起其他反蒋势力起来行动。要是当时能形成这样的局面，那么，红军在江西福建战线上底斗争早已容易得多了。

第三，我们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于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是在非苏区的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底错误和弱点——特别是我们党部和党员对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抱着不可允许的忽视态度。而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在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底环境当中，在红军反对敌人六次“围剿”的情况之下，我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有第一等重要的和决定胜负的意义。

如果要问：我们在福建事变中底错误，在北方反日反蒋武装行动时底错误，以及我们一般地忽视在敌人军队中工作底错误，有没有共同的原因呢？在我个人看来，共同原因是有的。因为如果我们详细地和具体地分析一下，我们就可看出这些错误或多或少地都是从下列一个共同来源产生出来的，就是不了解在这些工作方面有了些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以及利用军阀派别内部冲突方面，目下应当特别注意那些新特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各点：

一、因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广大的民众反帝高潮，所以许多军阀的军队都不能不带有情愿为武装保护祖国而对日作战底情绪；

二、红军在最近两年来已经成为全中国内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红军自始至终地为“武装人民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个神圣口号而奋斗。红军在事实上证明了，在一切反蒋军事力量中，它是能够胜利地打退蒋介石的历次军事大进攻底唯一力量。因此，一切反日反蒋的军事和政治派别，不管他们是从真正爱国的和爱民族的观点出发也好，或者是根据帝国主义矛盾和军阀派别冲突的背景出发也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能不把红军看作是反日反蒋底一种巨大军事力量；

三、根据几年来的事实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在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地和必需地，不仅有工农红军和一切觉悟的广大民众参加，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虽然这些参加者之中有一部份只是暂时的、动摇的和不坚决的力量。

从这些新的特点看来，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及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都不能不按照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方面底新观点和新方法应该是：第一，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我们不仅能够夺取士兵群众，而且在武装保护祖国底战斗旗帜之下能够夺取很大一部份中下级军官成份；第二，在一定条件之下，甚至一部份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底革命情绪逼迫之下，不能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同时，就不能不允许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公开宣传和活动自由，结果时常形成很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我党不仅有可能夺取很大部份军队，而且

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第三，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

我们党在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方面底新观点和新方法应该是：第一，无论军阀派别之间存在和发生某种矛盾和冲突，我们党都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必须估计到这一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底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据此，红军领导方面，要比前此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特别注意利用军阀派别之间底冲突，首先尤其应当注意设法打碎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力量集团；据此，红军领导不仅不应当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底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当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底战争真正开始了的时候，不管反蒋派别与红军方面是否订立过共同反蒋的作战协定，红军领导都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第三，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早迟不免转变成为反蒋武装斗争（如十九路军行动）；同时，每一个大的反蒋武装行动，也有可能变成与日本帝国主义底公开战争（如吉、方、冯等在北方行动），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尽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底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份。

最后，第四种形成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长期性和延续性底原因，同样是形成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长期性和延续性底原因，便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对于中国红军所给的实际的和直接的帮助太弱了或甚至没有过。很显然地，既然世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和不断反苏维埃“围剿”底真正组织者，那末，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兄弟党对中国红军加以实力援助，在实际上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谁都相信，如果美、日、英、德、意、法等国的无产阶级，能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底旗帜之下，用真正群众斗争的方法（罢工，示威等等），逼迫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停止对中国军阀底经济帮助（停止一切军事的或名义上非军事的借款），逼迫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和军事专门家，并阻碍和停止运输军火（飞机，大炮，毒气，弹药等）到中国去供给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那么，蒋介石的六次“围剿”早已完全失败了。然而，直到现在，所有这一切，还只不过是一种好意的希望和假定，而都还未能成为事实。因此，蒋介石反对红军底最主要力量——帝国主义力量依然存在和加强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和红军才再三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号召，首先就是要求我们的兄弟党要向一切工人解释并使他们相信：在中共领导之下的红军底英勇斗争，是他们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资本家斗争底一部份；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想得到和保证自己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底胜利，那么，除了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的战斗统一之外，还需要建立工人阶级与其同盟军（本国的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者）之间底联合战线；以便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明白懂得和坚决相信，他们对中国红军斗争底直接的和实际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自己加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主

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底斗争。我们不仅希望,而且相信,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此后在实际上证明他们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英勇斗争底真正的国际革命同情。

(四) 中国一般的政治形势与 苏维埃革命最近前途

现在讲到报告的最后一部份——中国一般的政治形势与苏维埃革命最近前途。我在这里并不想详细地去讨论和分析,而只是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说明目前中国一般政治形势。

一、首先说到苏维埃区域情形——拿具体事实作为红军与蒋介石等军阀军队一年来斗争底总结,根据极不完备的材料,大约可得到下列情形:

(一)在军队实力方面——这是决定战争形势底最主要的因素,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一年来红军实力底增长:

(甲)在中央苏区方面——增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只在今年五月至七月三个月当中,红军便扩大了六万二千人;

(乙)在川陕苏区方面——增加到许多倍,四军团主力入川陕时不过一万五千人,现增加到十几万人以上;

(丙)在红二军团方面——增加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一百二十;

(丁)在红十军方面——增加百分之四十;

(戊)在红十六军方面——增加百分之五十;

(己)在鄂豫皖苏区方面——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增加

了百分之五十；

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一年敌军底损失：

(甲)在进攻中央苏区战争中——损失十万人以上；

(乙)在进攻川陕苏区战争中——敌军被红四军团击败三十师到三十五师，而仅在今年九、十两月，敌军便死伤七万人以上；

(丙)在进攻红二军团战争中——约有十师人被打败过；

(丁)在进攻红十军战争中——约有八师人被打退过；

(戊)在进攻红二十五和二十八军战争中——约八师人被打败过；

至于在苏区群众武装队伍方面，也同样有极大的增长。例如，在去年年底时，各苏区武装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一切地方武装队伍等，共计六十万至八十万，现在只在中央苏区方面，群众武装及游击队便差不多有这样大的数目了。

(二)在地域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统计，但根据已有的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我们红军和游击队一年来新占领的地域，差不多比我们损失的地域要大一倍以上。(例如：红四军团在川陕方面占领了约十五县至二十县地方，红二军团在湖北、湖南、贵州、四川方面占领了十县至十五县以上的地域；红六军团在湖南、贵州方面占领了许多县份；红七军新占领了浙江、福建方面好几县等等。而我们在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及湘赣苏区方面损失的约有十五县至二十县城市，同时，在我们红军退出县城后，很多的乡村依然在红军和游击队手里。)然而，虽然我们新占领的地域要比损失的多，但我们不能不认为这部份苏区领土损失，是我们反对六次“围剿”斗争中底一个损失，因为这些损失的区域之中，有很多是我们最近两三年来的根据地。那些地方有我们的苏维埃建设，那些地

方留下有我们的人民经济，那些地方有我们的劳苦父老兄弟和母姑姊妹，他们曾和我们党及红军手携着手地进行了几年的英勇斗争，去反对革命的死敌——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白匪占领这些区域以后，黑暗野蛮的中世纪制度又复活起来，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又复活起来，对人民群众底奴役制度又复辟起来，非人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又盛行起来。不过同时一定要特别指出，这种部份的领土损失，不仅不能成为红军反对敌军斗争底决定胜负的因素，而且不能成为决定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命运底主要因素。因为在红军实力保存和增长的条件之下，部份的旧领土损失，可以很快地由新占领的地域来补偿；而经过相当时间的政治准备与军事准备，新占领的地域可以很快地又变成红军和苏维埃的根据地。

在这里，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去反对有些个别份子对于红军方面部份领土损失底不正确意见和解释。首先必须反对那些根据部分领土损失这件事实，来作出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失败或部分失败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第一，它绝不合乎事实；第二，它完全曲解了我们党和红军在过去和现在以至在将来一定条件之下，还必须采用的正确的和灵巧的策略；第三，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它散布悲观和失望的情绪，使人们认不清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真实状况和最近前途。同时，也必须进行斗争去反对另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就是有些人完全否认我们在斗争中的困难，完全轻视我们苏维埃领土底损失，以及完全不了解和否认革命根据地底作用和意义。

(三)在民众对红军和白军底态度方面——在一切苏区里，民众对红军表示出极好的关系，对红军加以各方面的援助，从尽力实行优待红军条例（为红军家属耕种田地和收获麦谷

等)起,一直到动员青年和成年扩大红军及妇孺都参加作战止,无一不完全表示出苏区民众对自己的红军底爱护和赞助。为的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一个情形最困难的苏区作为例子。譬如在鄂豫皖苏区在红四军团主力退走以后,民众在这些区域受尽了国民党统治各种各样底压迫和愚弄。除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外,国民党用尽了各种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企图使民众脱离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现在为时已经一年,这些区域民众对红军和白匪关系,已经在事实上表示出自己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国民党已经在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在这些区域所施行的政策底破产,另一方面,原来很少数量的而且暂时被敌人打退了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民众多方同情和拥护之下,在最近五、六个月以来,又逐渐地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并且已经恢复了一部份原来已经失去的苏维埃领土,现在他们有时又威胁着平汉铁路和武汉区域了。不仅苏区民众,而且全中国民众,已经逐渐懂得和相信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和红军,才能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和饿死鬼。民众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和红军这种坚决信心,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取之无尽和用之不竭底力量的泉源。

从上述这些事实看来,可见中国红军在反对蒋介石空前的大“围剿”底一年斗争过程中,除中央苏区有部份领土损失外,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在保存、巩固和发展红军实力方面。最大的甚至空前未有过的胜利是属于川陕苏区方面的红四军团。从中国革命全部斗争底政治观点看,从军事和军事战略底优越观点看,在红军及苏区更加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条件之下,川陕苏区将逐渐走上为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底第一等地位上去。

红军反对蒋介石六次“围剿”斗争目前底一般状况是这

样：红军在中央苏区方面虽然还未能完全冲破蒋军主力的各方面包围线，但现在正在积极向这一方面准备着；红四军团在川陕苏区方面已经打败了最主要敌人——刘湘，一切四川军阀现在都公开地由进攻转向防守的地位；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已经汇合起来了，正在顺利地向着湖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军阀部队实行进攻；而红七军和红十军正汇合起来了去进攻蒋贼的主要老巢——浙江。所有这一切指明出，红军在中央区全部战线上完全冲破敌人“围剿”底计划，只是不远将来的事。

一、现在说到国民党统治区域情形——国民党统治区域情形，也证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着。反帝的首先是反日的斗争，日益包括更广大的民众。即就最近宋庆龄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以及发表反日宣言和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这件震惊世界的著名事件看来，也可证明反帝运动正带着更大的威力向前进展着。宋庆龄等在这个纲领中，公开指出中国人民幻想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日救国底无望，以及等待美国或国联出来替中国人民主持公道底蠢笨和有害，同时，坚决号召中国人民认清救国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便是以武装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宋庆龄等在这个纲领上提出了六大具体主张，为使大家都知道这些主张起见，我就把它们全部念给你们听：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在数量上比任何国家要多些，除警察、民团、商团不计外，我国人民平时要养活三百万人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还比较薄弱，但是人民为养活他们，化了很大的军费，特别在最近几年，海军和空军的开支比以前大得多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因此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

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然而大家都晓得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仅仅靠我们的军队是不够的，所以必须：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志愿军的办法，将来要逐渐的实行征兵制，要立刻成立广大的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工人反日义勇军，农民反日义勇军，学生反日义勇军，职员及各种自由职业者，——医生、教职员、新闻记者等等的反日义勇军，同样要组织商人的反日义勇军)，并且使他们到前方或后方对敌作战，此外，必须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如供给粮食队，交通队，救护队，破坏队，宣传队等等)。很明显的，要想这样作，那就必须：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为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立刻把全国兵工厂、军械处、火药局所有的正在制造和将来制造的各种武器(大炮、步枪、机关枪、手枪、炸弹、迫击炮、子弹、飞机、甚至土炮、土枪、长枪、大刀等等)完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武装训练，并直接对日作战。如果谁不愿意将武器自动的发出来，那么人民只有自动的去拿这些武器。如果这些武器还不够，那么就要想法筹款向外国购买。但大家都知道要对日作战，这还不够，所以我们还须要：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军费

在战争一开始时，我们提议采取下列办法，解决经费问题：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银行、

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大商店、日货等等，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军费，因为日本在华投资已经超过日洋二十万万，停付日债一切本息（这又是一笔大款）。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三、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四、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五、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如果这些办法都实行的话，至少可以保证第一个时期的对日作战经费，如果将来还感觉经费不够时，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保证对日作战的经费，以便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此外，在对日作战时，我们还须要强有力的集中的领导机关，因此必须：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这是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各个代表，是由各团体（各界反日会，反日义勇军等）在全体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在各省由各界反日团体，选出各省的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县、各城市、各乡镇、各区成立县、市、乡、区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轮船、乡村、兵营、学校、公司、商店等等组织反日会分会及反日义勇军及其他反日队伍。全中国武装自卫委员会，有权力解决和支配与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有关的一切事件。此外，为保证对日作战的胜利，我们必须：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首先要联合高丽、台湾、内蒙古及日本代管的各岛屿的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同样的要联合在日本国内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人、农民、兵士、智识界等等，以便共同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公开向全世界宣言：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朋友，同时对于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或者学日本强盗一样实行瓜分中国的国家，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伙伴，我们将他们视为中国人民之敌。”^①

这个公布的纲领，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同情和拥护，引起了一切爱国青年的无限兴奋，同时，引起了一切中外报纸的注意和反响。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和东北以及中日各地的报纸，对于这个事变表示出极度的恐慌和愤慨。在纲领未公布以前，只在上海一地，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时间内，便有三千人以上签名作为发起人和赞助人。在这三千多人当中，不仅有工、农、兵、商、学各界的爱国先进代表，不仅有许多诚意抗日救国的专家、学者、名流、教授、律师、新闻记者、医生等各种自由职业者，也不仅有著名的进步政治活动家（如宋庆龄氏本人及何香凝氏等），而且还有许多抗日爱国军人（如前义勇军领袖李杜，以及彭浩然、张奋武、冯巽占等），还有银行经理及著名学者（如章壬琢先生等），还有以老健著名的政论家马相伯氏，甚至还有老政客胡汉民先生。虽然蒋介石、汪精卫、杨永泰、黄郛、陈立夫、陈果夫等日本走狗，已经密议并且下令逮

^① 以上引文有误，已根据 1934 年 9 月 21 日《红色中华》刊登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订正。

捕一切在这个反日纲领上签名的人物，虽然为这个纲领而积极奋斗的一部份反日战士（如余其全、林子明、刘月英、王振生、陈在葛、李锦峰、张金标、刘志刚、郑玉龙、李文碧、张文清、王文彬、王秀英、宋玉美、宋美英等等二十余人），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被上海英租界巡捕会同华界探狗逮捕去了，并且已经引渡到南京，现在正在监狱中受各种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但是，拥护这个纲领的签名运动，正一日千里地风靡上海、香港、广州、北平、天津、武汉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在各国的侨胞当中，同样在这个纲领影响之下，正蓬勃发展着极大的抗日讨蒋运动。这个伟大事变，在事实上又一次地证明了，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中间，已经成熟了武装保护祖国底必要这种神圣思想。谁能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武装斗争日剧一日的情形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每日每时都有可能加上全中国人民头颈上来底情形之下，中国人民的这种正义的思想，在最近的将来，必然会变成神圣的行动！

工人群众在中心城市的革命斗争也正向前发展着。这不仅表现在工人斗争数量上的增长，而且特别表现在罢工工人与警察宪兵等武装流血冲突的加多，以及同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底时常爆发。在农民和灾民斗争中也发生着新现象，就是一方面农民骚动和暴动已经蔓延到中国平日所谓最富庶的省份——江苏、浙江等；而这些省份恰是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大本营；另一方面，中国西北部（四川、陕西等），西南部（贵州、云南等）的农民运动，因为红军的四军团、二军团、六军团以及四十二师等在这些省份及其周围底飞快发展，日益卷入到胜利发展的苏维埃革命巨潮中去。

而反革命营垒方面，则是日甚一日地发生分崩离析现象，

广东派与蒋介石的冲突,因为英、日、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长江流域和南部各省冲突底加紧,因为所谓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开幕,已经发展到很快可能以武力相见的地步,两方剑拔弩张的严重空气,已经逼迫得蒋介石不能不宣布所谓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召集。在蒋介石派本身方面,内哄暗潮也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第一方面,在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果夫以及政学系老政客杨永泰和安福系老政客黄郛等这般日本走狗,与亲美派宋子文、孙科、顾维钧、颜惠庆等之间,发生着极露骨的明争暗斗;第二方面,在杨永泰和黄郛为领导的政学系和安福系,与自命为蒋贼嫡系的黄埔系之间,同时,在杨永泰、黄郛系,与陈立夫陈果夫派之间;以及陈立夫陈果夫系与黄埔系之间,为着升官发财,为着争权夺利,经常打闹得象饿狗争食一样;第三方面,所谓黄埔系早已实际上分裂成为三派:一部份最反动、最腐化、最下流无耻和最鄙卑龌龊的份子,形成了蒋贼走狗和蓝衣社主要核心;另一部份不满意蒋介石降日卖国的分子,但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于是去拉笼和联络反蒋派别(如广东派等);第三部份是左倾的青年分子,他们很痛恨蒋介石卖国殃民的罪恶,他们愿意与人民携手来“救国救民”,因此,与各种革命团体和革命运动力求发生联系。蒋介石派内部这种大小派别之间冲突发展到如何剧烈的程度,只拿最近几件事实,便可以证明了。南昌五十八架战斗飞机被炸毁,杭州航空堆栈机械材料被焚烧,徐培根(蒋介石的航空军总队长、航空学校校长和蓝衣社主要首领之一)被枪杀,邓文仪(蒋贼的机要秘书)、贺衷寒(蒋贼的政训部主任和亲信)等七十余蓝衣社活动分子被逮捕,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及参谋长等八人被逮捕和监禁(首先是由于蒋鼎文与陈仪的冲突,陈仪之所以做福建省政

府主席，就是由于日本经过杨永泰向蒋提出的，但蒋鼎文以为转战闽赣有功，大不服气，于是时常与陈仪冲突，并且联络广东派；不久以前，日本报纸及《满洲报》上都公开登载蒋陈在福建不睦消息，并明白表示对蒋鼎文不满意，并“要求”二人之中必去其一，以便安定闽省政局，蒋介石逮捕蒋鼎文不仅为反对广东派，而且为实行日本指令），所有这一切事实，便是蒋派内哄底真凭实据。而蒋介石与北方军阀派别之间底冲突，无论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如何拉笼操纵，而有时恰正因为日本方面的拉笼操纵，也日益带着显明的和尖锐的性质。在蒋介石与广东派战争爆发的时候，一切蒋与反蒋派别以及蒋派内部各派之间底各种冲突矛盾，必不可免地要乘机爆发出来。反革命营垒之中相互间的争斗和战争，客观上不可免地要便于红军和苏维埃反蒋反帝底斗争。

三、至于讲到东北四省情形，需要一个专门的报告。今天我只简单地讲到几点最主要事情。首先我当指出的一件事，就是虽然在三年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军事方面多多少少地已经把东北四省变成军事根据地，以便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底战争，以便组织反苏联战争和准备太平洋日美大战；但是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还经常感觉到处在东北四省四千万人民的普遍仇视和愤恨底环境之中。其次我要指出的第二件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三年过程中，在十万以上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常备军，几万所谓“满洲国”军队，以及成千累万的武装移民这样大的武装力量帮助之下，经过不断的残酷的武装“讨伐”和“围剿”，不仅不能完全消灭，而且甚至不能阻止东北人民反日救国游击运动底增长，并且这些反日游击队直到今天，在政治领导上和组织方面，都还有极大的弱点，至于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薄弱，更用不着说了。这件事事实的确有非

常伟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件事实，在实际上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万分正确的，证明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有可能，而且真能得到胜利的。这件事实，在实际上完全证明了这样一种真理，就是如果中国四万万人完全丢开蒋介石那种对日战争不能胜利底可耻的降日卖国澜谈，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有工农红军作武装先锋队，一致起来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胜利一定是有保证的！再其次我们要讲到的第三件事，就是因为东北四省游击运动中国民党的破坏和捣乱影响底很快减弱，同时，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东北人民心目中威信和革命影响底极大增高，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我们党正确地和灵巧地实行建立广大民众反日统一战线这个策略之下，东北反日游击运动将要更加扩大和深入。

同志们！以上这些就是我要讲的一切具体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来估计中国现时的一般政治形势。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我们不能不作出结论说，现时中国一般政治形势是苏维埃革命力量向前增长的形势，这个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利于红军战胜蒋介石的。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与红军冲破六次“围剿”所得到的胜利底范围和程度有极大的关系。如果红军在冲破六次“围剿”胜利中，未能给蒋介石以真正致命的打击，那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有可能经过很短准备期间很快地再来一个新的军事“围剿”。而如果红军在冲破六次“围剿”胜利中，给蒋介石以严重的和致命的打击，使蒋介石永远地或至少很久时期内不能翻转身来、再去组织新的大规模的对红军底“围剿”，那么，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要冒险地来实行自己直接的公开的武装干涉，以反对中国人民

及其红军和苏维埃,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红军在其斗争中,当然要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然而在目前中国国内和国际一般的政治条件之下,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这种行动,不能不引起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愤怒,不能不引起全中国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伟大的和拚命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而这个战争不能不震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基础。我们的党应当而且能够向这方面去准备的。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坚决地相信,中国人民的这种正义的、进步的和神圣的反对帝国主义野兽底神圣战争,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尽力帮助下——首先是苏联工农群众声援之下,将能够战胜所有的和任何的外国武装干涉者及刽子手。

载《新条件与新策略》1935年苏联印行
署名:王 明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

作者附言

这本小册子,是我在共产国际七次世界大会上的发言。在发表时,曾略加删改和补充。

王 明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

* 这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题为《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最早刊载于1935年8月苏联《真理报》。同年10月,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由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次年三月,国内出版单行本,题为《论反帝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经作者修改后,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等文集。

在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法西斯主义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底任务这个问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作的报告，这个伟人的言论不仅能引起千百万共产主义工人的倾听，也能得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和无组织工人的欢迎，而且能得到全世界优秀的和进步的智识分子的赞同。这个伟人在莱比锡法庭上得到的光荣胜利，一方面表现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底威力，另一方面证明出希特勒统治制度底软弱不稳，作这个报告的人就是全世界闻名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提纲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底报告，我想来研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以及我们党底策略方针问题。

一 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与殖民地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

首先我要说明的，就是由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到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底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现象，或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决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底最基本的特点是些什么？

第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帝国主义在全线上加紧进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已使工业状况略形松动（这件事情的表现就是从一九三二年年年底起，经济危机由最下的低落点过渡到特种的反压状态），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不仅是由于它加紧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不仅是由于它实行军事性质的通货膨胀，而且是由于它掠夺殖民地和经济能力薄弱的国家底农民。

在过去这一时期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紧进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主要地表现在下列各点：

第一，帝国主义公开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来强夺半殖民地人民底领土和威胁他们的民族生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军阀在中国所进行的侵略和掠夺以及意大利法西斯蒂反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同时应当指出：在南美中美各国，在许多年内，时续时断的军事行动，例如玻里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军事行动，实质上，乃是英美帝国主义为重分这个大陆而引起的变相的战争。

第二，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日益加紧经

济的剥削,在这方面它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更加降低这些国家的生产品底价格,主要的是降低原料底价格,其次是降低粮食底价格;此外,还实行商品倾销政策以及用强迫手段来减低半殖民地国家底关税率。(例如,在中国,自一九三三年夏季起,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者底直接要求,对于日本的纺织品及其他商品,减低了关税率;最近根据美帝国主义者底要求,对于美国布匹等的关税率,在巴西减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在古巴减低了百分之三十至六十等等。)因此,帝国主义强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出口商业大获其利,而这些国家本来就是苟延残喘的所谓民族工业,却日益衰颓。

第三,帝国主义加紧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潮流,同时拥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最反动的和最卖国的势力,以便使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侵略易于实行和更加深入。帝国主义不仅进行剧烈的斗争去反对真正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例如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红军的间接的和直接的武装干涉,法帝国主义用大流血的手段镇压安南人民的武装起义等等),而且也设法推翻民族改良派的政府(例如,推翻了智利的格劳维政府,古巴的格老·山·马尔廷政府)并建立反人民的、反动的专政(在阿根廷建立过乌里蒲劳专政,后来又建立了胡斯套政府,在秘鲁建立卡诺维田斯专政,在古巴建立明廷脱和巴替斯脱的专政等等)。

帝国主义全线总进攻的加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产生了下列的恶果:(一)许多半殖民地人民底民族生存权,直接受到威胁;(二)农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底经济,根本动摇,千百万农民,因连年饥馑和所谓“天灾”(水灾,旱灾等等)流行,而频于死亡的境地,并且成千累万的饿死冻死,这些所谓“天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统治所造成

的结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三)在资本主义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前以及在危机的时候所形成的民族工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有好几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中,轻工业——首先是纺织工业,有了暂时的和局部的增长),正感受到极深刻的危机,而好些半殖民地国家中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简直完全破产了;(四)在业工人苟延残喘,过着乞丐式的生活,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成千成万地饿死,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底其他阶层大批破产和赤贫化。自杀的悲剧成了普遍的现象。(例如,根据中外资产阶级报界底正式统计,近一年来,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领土内,自杀的人数,达到了六百万人之多!)

同时,正因为帝国主义全线总进攻的加紧,客观上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发生下列的现象:(一)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发生的全民义愤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就形成最顺利的前提,以便建立极广大民众底反帝统一战线;(二)一方面,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间的矛盾,第三方面,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底各种派别和阶层中间的矛盾,都相当剧烈起来,这就有了可能,去利用这些矛盾,以便群众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三)民族改良主义在群众中间的影响趋于削弱,好些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发生分裂,并在它们中间形成民族革命的左派;(四)末了,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作用和威信日益增长(例如,在过去这一时期内,年轻的安南共产党已经参加了民众底武装起义,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东方好些国家中,如在菲律宾,暹罗,以及在中美和南美许多国家中,如秘鲁,巴拉圭,委内瑞纳,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拍托里科,海

地等等,都建立了共产党)。

由上述的种种事实中,就产生出决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一时期情况的第二个基本的特点,——就是殖民地革命力量的增长。

中国苏维埃革命底胜利的发展,阿比西尼亚武装抵抗意大利的进攻,安南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南美中美各国解放运动强有力的开展,首先就是古巴的革命斗争,智利舰队中的武装发动,巴西的日益发展的民族革命运动,荷兰舰队在南洋群岛的起义(七省军舰),印度工农运动底高涨,菲律宾群岛农民底武装斗争,高丽罢工运动底增长(如元山罢工),波斯煤油工人底群众罢工,阿刺伯各国人民武装斗争浪潮底增长,一万万黑种人中间革命斗争底开展以及其他等等,只略举近年来的这些革命事变,就足以显然证明:殖民地革命底战斗力正在增长着。

此外,必须着重地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力量底增长,不仅是帝国主义总进攻日益加强和这些国家中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结果,而且是由于受到十月大革命底影响,尤其是受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伟大历史胜利的影响。

社会主义在苏联得到了完全的和坚固的胜利——国家底工业化,农业底集体化,民众物质程度和文化程度底提高,苏联一切民族(以前受沙皇专制和俄国资产阶级所压迫的民族也在内)物质程度和文化程度底增长,苏联国防能力底加强,苏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比重底增加,一切劳动者都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建设者,苏维埃民主制底扩大,所有这一切,向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的一切人民,贡献出具体的历史榜样,即是向他们指出:应当怎样把自己的国家,由经济落后的

农业国，变为进步的工业国；应当怎样把自己的国家，由帝国主义强盗经常侵略的对象，变为有国防能力的、足以击退外敌任何侵略动作的国家；应当怎样把自己的民族，由被压迫的和文明的民族，转变为自由的和文明的民族。

根据上述一切，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它们的发展前途所下的估计，完全是正确的。同时社会民主党和叛徒（罗易等）关于“非殖民地化”的理论，如同他们所谰言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一样，已经完全破产了。

二、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以及共产国际这一次——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即认为：“革命危机正在成熟而且将来也继续成熟”，“在许多国家中，在世界帝国主义最松懈的环节内，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过渡到资本主义内外矛盾剧烈冲突底时期”；这种估计完全是与目前的国际形势，殖民地国家的形势也在内，相符合的。因此，很明显的，社会民主党和叛徒底估计是毫无根据的，他们认为目前形势是“法西斯主义新纪元”底开始，并且看见将来只是“黑暗反动底前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广大世界已变为不可扑灭的革命群众运动底发源地”，“在现在的时候，殖民地国家，对于世界帝国主义，是它的战线上最危险的一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些估计，在今天看来，无疑义地愈加令人信服和愈加有了根据。

二 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员 底最重要任务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全线进攻的加紧，正是由于被压迫民族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虽然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阶级力量底对比是不一样的，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在这些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是不同的，因此，反帝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些国家底每个国家中的应用，都是彼此不同的，然而反帝统一战线这种策略，对于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头等的意义。

中 国

有些人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既然在一部分领土内得到了胜利，同时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剧烈，所以反帝人民统一战线问题，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无疑义地，这是一种很大错误的观点。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事实已经证明而且正在证明：在目前的中国，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为什么？因为中国正遭逢着空前的民族危机。这种空前民族危机的来源，首先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断实行进攻和侵略，同时，由于南京政

府和国民党极无耻的空前的卖国行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不到四年工夫，差不多半壁河山，一部分已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一部分实际上已在日本军阀底铁蹄蹂躏之下。

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各要塞和山海关，由长城各要塞和山海关而所谓“滦东非战区”，由“滦东非战区”而实际上武力占领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田中奏折中所规定的灭亡全中国的计划，正在有系统地实行着。

近几年来，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了我国的广大领土；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宣传，接受了日寇的一切无理要求。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再说”的谬论，强迫着中国人民坐以待毙。同时，更以“攘外必先安内”这类公开卖国殃民的主张，来进行反对本国人民底流血战争，来镇压一切同胞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最近以来，这些汉奸卖国贼们，在“中日亲善”“中日满合作”等口号之下，实行着古今中外空前未有的卖国投降政策。

日寇要求由华北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新闻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在中国学校内实行奴化教育，所有的进步刊物便立刻被焚毁，而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有志气的男女青年便立刻被逮捕，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被枪毙了；日寇要求中国一切国家机关聘请日本顾问，南京政府底军政财政各机关

便立刻出现日本的侦探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如果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各省以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中华五千年文化古国将完全变成殖民地，世界上最伟大的四万万人民将完全变成亡国奴。

同志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能不能就这样忍受国亡族灭呢？不能，绝对不能！请看，一千二百万阿比西尼亚的人民尚能努力武装反抗意大利法西斯蒂的侵略，以保护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人民能不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为领土完整，为人权自由而战吗？当然，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为达到这一切目的而进行战斗的！

现在问题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要抵抗帝国主义底进攻，那么，我们国家和人民就能生存；如不抵抗外敌，那么，我们国家和人民就要死亡。因此，抗日救国早已成为我国每个国民、每个同胞底神圣天职。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

不错，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应用而且正在应用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例如：（一）中国共产党在红军底斗争中应用了这个策略。中国红军屡次向一切军队提议订立战斗协定，以便进行共同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红军再三宣言，只要任何军队实行下列最低限度的、极切实的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人民以民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示威、罢工等等自由), 红军便立刻与之亲密携手去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事业。(二)一九三二年初, 当上海实行英勇的抗日防御战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曾经应用了这个策略。那时候, 共产党员与十九路军战士以及上海居民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作战; 那时候, 共产党员组织了沪西一切日本纺织工厂中工人底总罢工来援助十九路军; 那时候, 我们的上海党部组织了工人和学生底武装义勇军去参加前线上战斗, 同时, 并组织了运输队, 交通队, 侦查队, 接济队, 救护队等等, 去帮助作战和保证后方; 那时候,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不顾自己财政状况底非常困难, 而汇了几万块钱来帮助上海工人底反日英勇罢工。(三) 在中国北部许多次英勇的反日战斗中(山海关之战, 察哈尔之战等等), 共产党也应用了这个策略。那时候, 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与吉鸿昌, 方振武, 孙殿英, 冯玉祥等军队, 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作战。(四) 在东三省和热河, 中国共产党曾经应用了而且正在应用着这个策略。近几年来, 在东三省和热河, 共产党员到处都出来作反帝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共产党员到处努力把一切游击队和民众力量统一起来去反对共同的死敌——日寇的军队。正是由于共产党这种策略底结果, 近几年来, 东三省热河各地, 许多涣散的游击队, 才与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游击队结成联盟, 建立了联合的军事领导机关(如反日联军总司令部等等)和政治领导机关(如联军政治部和各地人民政府等等)。正因为如此, 东三省和热河各地一切游击队底战斗力量在民族英雄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忠、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领导之下, 日益加强和扩大起来了。最后,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种反帝斗争中, 例如抵制日货, 反帝示威, 反帝罢工等等当中, 都应用这个策略。

然而, 应当严重地指出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共产党直到现

在，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还不能真正彻底，还不能不犯错误。

例如，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与一切拥护十九路军反日作战的人，结成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商、学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人民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建立一切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和一切工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反日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上海反日总罢工并达到武装工人抗日的目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怠工，并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以致总罢工的口号没有实行，武装工人上前线去参战，执行得异常不充分。

第二个例子。中国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三三年春曾向全国人民和一切军队，号召订立共同武装抗日底战斗协定（当时一切中外报纸曾不得不公布这种宣言）。在江西战线上国民党军队的北路前敌总指挥陈诚，曾率领所部向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蒋介石为应付这件事情起见，一方面公开宣布“谁再言抗日，严惩不贷”，并把陈诚撤职；另一方面，蒋介石不得不公布回答红军的宣言，在这篇宣言里，蒋介石用最无聊的话来污蔑红军（如说红军毫无人性等等），以便作为他拒绝与红军共同抗日的藉口。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向陈诚及其军队并向一切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提出更加具体的提议，以便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本来应当继续与蒋介石论战，以便在军队和民众面前，彻底揭破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彻底实行自己的政策，所以在蒋介石公开拒绝抗日宣言发表以后，便以为这样就揭

破了蒋介石，而没有进一步想出许多具体办法，以便收到使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实际结果。

第三个例子。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估计到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一切军队提议订立共同反日反蒋作战协定的直接结果，因此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应当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可是，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机械地了解“反对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发展底非苏维埃的和非国民党的道路）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福建事变底意义就不能给予确切和应有的估计；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当时在军事策略方面的错误；当时中国红军底领导机关，把自己的部队从最重要的江西和福建的东北战线上调到西南方面去袭击蒋军后方，以致当蒋贼实行对十九路军总攻击时，红军已经来不及给十九路军以真正有力的帮助。

最后一个例子。当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冯玉祥等部队，在北方起来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动员北方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力量来拥护他们底义举。可是由于我们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轻视和不瞭解这些事变的意义，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阵地。

现在谁都明白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上述各种事变中，能真正认真地彻底地和正确地执行反帝统一战线底策略的话，那末，毫无疑问地，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已形成了一副新局面，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到今天也应该有了更大的成绩。

如果要问：这些错误发生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可以答复说：这些错误之所以发生，首先是由于许多我们同志过去和现在都还没有瞭解近几年来中国所形成的新条件和新环境。因此，他们不瞭解，怎样用新的方法在中国提出反帝

人民统一战线的问题。

这些新条件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以下各点：

一、日寇的不断侵略，南京国民党的不断投降，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全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抱着满腔的义愤，因此广大民众的民族解放怒潮日益增长起来，因此，很多的中国军队，都抱有愿与人民一起去进行神圣的民族防御战争底情绪。

二、近几年来，中国红军已经发展成全中国的强大军事因素。同时，只有中国红军自始至终公开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在一切反蒋的军队中，只有红军能够不断地冲破蒋介石的“围剿”，只有红军能在几年的长期间内，领导中国人民去反对蒋介石这个卖国的罪魁。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反日反蒋的政治派别和军队，——不管他们是根据真正爱国的和民族解放的动机也好，或者简单地是由于军阀的和帝国主义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好，——当他们感觉到日寇蒋贼的威胁时，都不能不把红军看作是反日反蒋武装斗争中的极强大的军事因素。

三、要真正组织和顺利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那么不仅要有工农红军参加，也不仅要有一切革命的觉悟的劳动者参加，而且要有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军事力量的参加——那怕参加这个战争的有一部分力量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也不要紧；广大的和各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民族革命战争这件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和必需的。

我认为：在目前的时候，顾计到我们过去好和坏两方面的经验，顾计到目前中国的形势，顾计到我国人民底民族生

存权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策略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最短时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

中国共产党应当怎样向前发展这个策略呢？据我个人底意见，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底意见，我们现在实行抗日救国策略的具体步骤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地公开声明：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愿意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压迫的民族（蒙、回、韩、藏、苗、黎等等）的兄弟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您们与苏维埃政府一起参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地公开声明：一切愿意手拿武器去救国的军队，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战争的官兵和将领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你们与中国红军以及东三省、热河、北方各地反日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一块去参加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此外，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

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面前明显地提出国防政府底性质问题，即是指出这个政府底基本任务在于抗日救国。因此，国防政府的政纲，应当是能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

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反日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这一种提议，不过是一种宣传鼓动的东西，绝不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同志们，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

我们党底这种提议，有充分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作根据。中国的客观形势，明显地证明我们党这种提议有实现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事实来证明，这些事实可以明显表现出目前中国底整个实际情形。从这些实际情形当中，可以明白地表现出中国各阶级力量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从这些实际情形当中，可以证实必须抗日救国的思想，不仅已经普及于极广大的民众，而且也普及于很大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及其军官，以及中国许多政治家和名流学者。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下列具体事实来证明：

(一)一九三二年初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日战。——大家都知道，十九路军原来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在上海事变前，在两三年期间内，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命令之下，也曾再三地进攻过红军，并且被红军打败过好多次。然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发生以后，尤其是当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上海和民众反日运动空前高涨的时候，第十九路军在其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等领导之下，违反了南京政府底不抵抗的命令而实行武装抗日。结果，十九路军便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二)一九三三年底和一九三四年初的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的官兵和将领们,从自己的切身沉痛经验中,认识了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底极可耻的卖国面目(例如,上海战争时,蒋介石派遣军队去解除第十九路军底武装,但是这些军队自动地转变到十九路军方面去,共同抗日,蒋介石的计划才未能实现),同时,对于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把百万大军专用来反对本国人民及其红军,表示悲愤;因此,一九三三年末和一九三四年初,十九路军仍在蒋、蔡、翁等将领领导之下,与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同时它不仅公开宣布讨伐卖国贼——蒋介石,而且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并组织了独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此外,甚至陈铭枢,李济琛等这类上级将领,都参加了福建事变。

(三)一九三三年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冯玉祥等部队在北方举行的抗日的武装斗争。——这些军队及其一部分军官激进化底最好证明,就是吉鸿昌底行动。吉鸿昌是国民党军队的第三十三军军长,他遵照蒋介石底命令,在鄂豫皖战线上与红四军作战两年以上。吉鸿昌赞叹红军及赤色游击队在解放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同时,痛恨南京政府降日卖国所作的莫大罪恶,因此他开始觉悟到要与人民携手去抗日救国。蒋介石探知吉鸿昌情绪改变,立即将吉撤职并资送出洋。吉鸿昌在欧洲视察的结果,便是更坚决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中央接收了他入党。在入党以后,吉鸿昌便忠实执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任务,在党底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执行党底一切指示和指令。吉鸿昌为了革命和人民底事业而自动地花费了自己的金钱并自动地出卖了自己的财产。他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之下,努力团结军队和民众的力量,当他的抗日救国工作震动整个北方的时候,蒋介石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之

下，派人暗杀吉鸿昌。吉鸿昌被刺未死，蒋介石又串通帝国主义在天津法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同时，并将吉鸿昌解至北平处死。据中外一切报纸的记载，吉鸿昌同志及其同事任应歧将军，虽然在重伤的情形之下，但是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和临刑时，都表现了至死不屈忠心不二的民族英雄和人民战士的模范。他们在法庭上都慷慨激昂地列数国民党卖国殃民的滔天罪恶；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走狗！”等等口号。

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其他的卖国贼曾利用吉鸿昌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来做宣传，他们不仅利用这件事情来证明吉鸿昌同志是“赤匪”，企图以此证明他们残杀吉鸿昌同志的命令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利用这件事情来宣传说：看呵！中国共产党不是反对军阀吗？而在中国共产党底队伍内也有将领和军阀呵！

是的，按照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底性质说来，按照自己的政纲和目的说来，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底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以其队伍内有吉鸿昌等这类著名将领为可耻，相反的，它恰恰以此自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自豪，因为这更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的民族之望和民族之光，这更足以证明，只有在我们共产党内，才能够把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最勇敢的、最爱国爱民的分子团结起来。只有在我们共产党内，才能把一切不忍坐视中国同胞沦为亡国奴和变成饿死鬼的真正的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们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以此自豪，因为这可证明我党底威信和影响多么伟大，因此，甚至于国民党军队底将领和上级军

官，一旦觉悟到必须救国救民的时候，就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最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以此自豪，还因为这恰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底力量 and 影响，中国共产党教育感化党员的力量多么伟大，因此，甚至于旧将领和新党员吉鸿昌同志，都能表现出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革命家模范，都能够表现出他是不愧为党、为阶级和为全体人民所信任的真正共产党员。

(四)一九三三年宋庆龄等几千人签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①——这个纲领的目的在于组织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个纲领包含有下列具体的条款：

一、全体武力总动员——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去参加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采取下列办法解决抗日战费：

甲、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同时停付日债一切本息。

乙、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丙、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丁、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戊、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

^① 这个纲领由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提出，经宋庆龄等签名公布。

装自卫委员会,同时设立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高丽人,台湾人等等),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

在这个纲领上,签名发起的,有各界人士著名的代表,有许多名流学者,如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章任琢、胡汉民等;拥护这个纲领的有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领袖如杨靖宇、李延禄、赵尚志、王德泰、周保中等,有十九路军名将如翁照垣等,有著名政治活动家如叶夏声等,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有欧美各地的侨胞和团体,从这个纲领的性质和其发起人及赞助人的成份看来,显然表现出这个纲领是全民抗日救国热忱的具体表现。

由于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底继续加深,由于南京政府更加无耻地降日卖国,毫无疑问地,中国社会中所有优秀的和所有纯洁的分子,一定都要起来,为救国救民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同样,毫无疑问地,在国民党军队底士兵和军官中,以及在黄埔军事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以前和现在的军官学生中(有许多人把这些学生都看作是蒋介石的亲信,这当然是错误的),一定有不少的纯洁的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日益明瞭中国的正确出路,日益了解与人民合作救国的必要,日益瞭解与真正的人民政权——苏维埃和真正人民军队——红军合作去抗日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底提议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由于中国客观形势的需要,而且还由于革命主观力量底增长,首先就是红军与苏维埃力量底增长。

从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以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

内，中国红军又获得了新的大胜利。以前赣闽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仅顺利地冲破了蒋介石将近百万军队的战略上的包围网，而且早已击破了敌人在西南方面的战线，实行英勇的西征。中国红军主力经过了将近十省的地方，跨越了许多耸山峻岭，经过了许多羊肠鸟道，渡过了许多号称天险的河流（乌江，扬子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等），一方面应战，一方面行军，共计走了六七千里以上，这样，中国红军主力就表现了国内战争历史上空前的英勇精神和战斗艺术。西征红军主力，现在（七月十六日）已经与另一个基本部队（红四军）会师于成都附近（天全），并与红四军一起在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省底一部分领土内，建立了广大的和巩固的新苏区。

在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在近年来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红军底实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了许多。根据敌人的中外报纸的消息，现时全国红军底人数已将近五十万人。

此外，以前红军大的集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团以及其他军团）除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外，都分散在各地，彼此没有联系。现在它们或者已经在地域上联合起来，或者彼此之间已经有了游击队的和其他的联系。从前红军主力是在闽赣省底区域内，这个区域，由于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封锁及破坏底结果，在经济上形成空虚贫瘠，同时经常受敌人各方面的包围。现在红军主力已占领四川，西康，甘肃等省的广大领土，在这些地方，红军底给养和战士的补充来源，比以前要大得多，在这些地方，红军的攻守行动要便利得多，同时，在这些地方，敌人要实行其包围封锁的军事计划，要比以前困难得多。

还有下述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红军在最近时期内获得

了新的大胜利，这就是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口号：扩大正式红军到一百万人，扩大苏区到一万万人口，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成为实际行动的口号。

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这种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使得它们愈加成为中国全体人民在抗日救国武装斗争中的领袖和中心力量。

证明革命主观力量加强的事实，不仅是红军和苏维埃力量底增长，而且是共产党力量底增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数十万党员的政党，同时他在苏区内不仅夺取了工人底大多数，而且夺取了民众底大多数到自己方面来。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中，很好地领导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共产党在东三省、热河、北方和一切国民党区域，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积极起来组织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从斗争的原始的和消极的形式起（如请愿，怠工等等），直到斗争的最紧张的形式（如群众的政治罢工和总罢工，武装抗日反满和武装抗日讨蒋等），在革命斗争中去拥护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底列宁——斯大林底路线，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底战斗火焰里，锻炼出了成千成万的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培植出了许多忠勇善战和智勇双全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不怕困难，而且善于克服困难。在这些战士当中，有这样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如毛泽东同志，张国焘、项英、周恩来、张闻天、廖成云、赵容、任弼时、林祖涵、吴玉章、王稼祥、博古、邓发等同志。在这些战士中间，有这样著名的军事将材和英勇战士，如朱德同志、贺龙、彭德怀、徐向前、董振堂、陈昌浩、萧克、林彪、罗炳辉、刘伯承、周昆等同志。在这些战士中间，有这样的民族英雄和阶级战士，如彭湃、杨殷、蔡和森、罗登贤、瞿秋白（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中共

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国青年底领袖)、陈元道、何子述(党的最好中坚干部,反立三路线的著名的领导者)、莫凭兰(著名的女共产党员)等同志,这些同志在被捕后遭受敌人非刑拷打和非人待遇时所表现出的布尔塞维克坚定性和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这些同志的慷慨就义和英勇牺牲,不仅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模范,而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赞叹和同情。在这些战士中间,有这些大无畏的英勇战士,如黄公略(中共中央委员,红五军军长)、沈泽民(中共中央委员)、鲁易(红二军政治委员)、寻淮洲(红七军军长)、何叔衡(中共党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检查院院长)、贺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五军政治委员)等同志,这些同志为苏维埃和红军底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在这些干部中间,有这样著名的民族英雄,如孙小宝、傅维玉等同志,这些同志在上海抗日战争的时候,组织了工人义勇军,担任了义勇军的队长,他们在最重要的战斗关头牺牲了性命。在这些干部中间,有这样著名的抗日烈士,如童长荣、伯阳、何思美等同志,他们在东三省反日游击战争中,身经百战,在日寇屠刀下牺牲了头颅。在这些战士中间,有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方志敏同志在中计被俘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受尽了虐待和凌辱,受尽了严刑和勒询,表现出至死不屈的节操和为国尽忠的义气,方志敏同志的肉体虽被蒋贼摧残了,但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国的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互地而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增长的原因,就是由于它是受到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底领导,由于它能够利用共产国际一切支部底经验和赞助,首先就是利用共产国际底领导支部联共(布)底极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增长的原因，就是由于它忠实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底学说。斯大林同志在列宁逝世以后，一般地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底理论和策略，其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斯大林同志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国革命底战略和策略基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增长的原因，就是由于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去反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就是由于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去反对盲动冒险的李立三路线和反革命的罗章龙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正确的两条战线斗争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增长的原因，就是由于它积极参加和领导人民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英勇领导人民革命斗争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所以我们能够勇敢坚决地按照新的内容而提出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问题。

有些人以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提议，不过是一种通常的政治手腕，而不是实际的政策。这种见解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瞭解：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共产党再没有其他的利益。难道抗日救国这种事业不符合于中国人民底利益吗？自然是符合的。中国是我们全体同胞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共产党员、红军以及我们祖国底一切同胞们！救国的事业，就是拯救我国全体人民使之不当亡国奴和不当饿死鬼的事业。这种事业是全体人民的非常迫切的事业，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事业。这些人不瞭解：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共产党与国民党、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底一个主要不同点，就是共产党

经常是言行一致，而不象他们那样言行不符的。

巴 西(略)

印 度(略)

阿拉伯各国(略)

统一战线与职工运动统一

现在我要讲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底统一战线和职工运动统一的问题。

有些人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问题以及职工运动统一问题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至少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因为一般的讲来，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没有分裂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和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营垒。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

不错，殖民地和附属国底工人，由于这些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并没有象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共产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营垒。然而殖民地和附属国底工人阶级及其职工运动已大形分裂了：一方面分成革命的 and 民族改良派的营垒，另一方面，由于行会底和中世纪底各种传统而分成各种宗派(如同乡，帮口、宗教团体等等)。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中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日益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西班牙、奥国)工人阶级争取反法西斯蒂统一战线所进行

的剧烈斗争底影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底工人,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热烈的愿望,想建立自己阶级底统一战线和职工运动底统一。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由于工人群众要求建立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底情绪日益增长,改良派职工会、无政府工团派职工会以及其他职工会领袖底态度也改变了。例如,在智利,无政府工团派的劳动总联盟,过去曾经坚决表示反对与革命职工运动派建立统一战线,但是近来它不得不宣称:准备建立统一战线。今年四月间所举行的代表大会底议事日程上,曾列入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问题的一项。今年年初,智利改良派职工会联盟宣称:它深信必须统一职工运动并着手组织统一委员会。

在巴西,许多改良派职工会,甚至于许多隶属于劳动部的职工会联盟,在群众底逼迫之下,曾脱离劳动部而参加巴西革命的劳动总同盟所召集的统一代表大会。

在阿根廷,改良派的劳动总同盟底领袖,不敢出来公开反对贝诺斯——阿列斯地方三个木匠工会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工会。

在墨西哥,职工运动最为涣散,近来改良派职工会(克劳姆^①、套列大诺底职工会^②、劳动局^③和革命的劳动局)底领袖,也成为工运统一的“同情人”。

① 克劳姆是墨西哥改良主义的职工会,该职工会底领袖与墨西哥前总统康—斯底反动派有联系。

② 套列大诺底职工会乃是墨西哥最大的职工会之一,为龙巴尔多、套列大诺所领导,现时该职工会加入职工会统一战线的组织。

③ 劳动局乃是执政的民族革命党底工人部所领导的职工会。

(以上均作者注)

在印度(一九三五年),改良派职工会底全印度代表大会与赤色职工会底代表大会合并起来了。

在中国,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底会员以及赤色职工会底会员,在许多次罢工、示威以及其他的运动中,实现着斗争底统一战线。

然而应当指出: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中国也在内,也许巴西是个例外),共产党员轻视了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底策略,他们不会领导和组织工人群众要求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的情绪,因此,使主动的作用有时落在改良派底手中(例如在印度),有时甚至落在民族改良政府的手中(如在墨西哥)。

共产党应当建立工人阶级底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只有用这种方法,共产党才能真正保证反帝人民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骨干,才能多方保证在人民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顺利进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同时,在另一方面,根据目前巴西和从前(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的经验,反帝统一战线底建立,可以大大地促进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以及工运统一底形成。

不错,在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例如在中国国民党区域中),革命的职工运动处在极端秘密的环境之下,自然不能呆板应用职工运动公开国家中的经验,不能机械地采取他们的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的方法和形式。在工运秘密的国家中,共产党员和革命职工运动的同情者,应当找到适合当地当时具体环境的方法和形式,以便达到建立工人阶级底统一战线和职工运动统一的目的。我认为:在职工运动秘密的国家中,为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而斗争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之一,就是把工运方面的工作重心,由建立小的和

极小的秘密的赤色工会小组这种工作，转移到另外一种工作上面去，就是要在一切现有的、能够公开和半公开存在的工人和职员和群众组织内部去进行工作，以便夺取这些组织。

必须在党的工作各方面都起转变

此外，应当指出：要顺利地实现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员最近时期内的极重要任务——建立、扩大和巩固人民反帝战线，那末，除了应用工人阶级底统一战线和工运统一这个策略而外，同时还必须在其他重要的各方面工作中，都起真正的转变。

举例来说：（一）要使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扩大人民反帝战线这一方面，能够实现自己的新的、完全正确的政策，它就不仅应当用一切方法，去反对非苏维埃区党的组织中对于人民反帝战线和工会统一这些问题上所表现的很厉害的关门主义倾向和传统等等，而且它也应当重新审察苏区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例如，对富农的政策应当改正。对小的和最小的土地出租者的关系应当改变，因为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虽然自己不耕种土地，但是照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讲起来，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们算作地主（但是有些地方苏维埃却颁布了一种指令说，凡是自己不耕种而出租的土地，都应当没收，因此甚至时常没收了这些小业主底土地），对待这些小业主的政策，应当加以修正。税收政策，财政制度，工商业政策等等，都应当加以审查，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全民的和民族的性质，以便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更加容易动员和组织全中国极广大的民众，去进行民族革命斗争以反对强大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

二、共产党要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真正能够取得影响，并吸收他们来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就必须根本审查我们青年团底组织和工作。例如，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

(甲)我们的青年团，应当由所谓青年工人先锋队底狭隘组织，变为真正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青年以及一切反帝青年的广大群众组织；(乙)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应当再去模仿党的工作方法和形式，它应当真正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去教育青年，它教育青年的方法，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底宣传，建立文化教育的组织，建立体育的、娱乐的、职业的及其他种种形式的组织，同时，在一切现存的青年群众组织中去进行最积极的工作，以便夺取这些组织，不管这些组织是由什么人创办的和属于什么人的等等。

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 领导权和苏维埃政权问题

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苏维埃政权问题，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有些人以为：共产党参加反帝统一战线，就是减弱了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

在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底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

如果千百万群众和共产党对于革命斗争没有相当的准备,那末,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底程度和工农底力量,已经提高和扩大到一定的程度,苏维埃政权才能建立起来。

革命的实际很明显地证明这一点。例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并在中国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还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至终站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前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工农的革命斗争。同时,巴西共产党现在之所以逐渐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之所以能日益变成群众的政党,正因为巴西共产党发起并参加了建立民族解放同盟的事业——在巴西目前条件之下,民族解放同盟便是反帝人民战线底具体表现,正因为巴西共产党开始积极参加和组织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瓦尔加斯政府的革命斗争。

而在另一方面,直到现在,我们的印度共产党之所以还没有成为强有力的群众的政党,其原因正在于印度同志,在长时期内不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这些事实说明:如果共产党员不去积极参加全民的和整个的民族的反帝斗争,那末,共产主义的小集团或年青的人数稀少的共产党、就不能变为真正群众的政党,而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群众的共产党,那就根本谈不到在自己国家内取得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苏维埃政权问题。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帝国主义是殖民地国家整个民族底主要的和基本的敌人。因此,如果共产党员不会站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底最前哨,那末,人民从什么地方来承认共产党是他们的先锋队和领袖呢?

殖民地国家中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坚决相信:在中国

这样一部分领土内已经存在着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正确应用反帝人民战线底策略，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争取苏维埃革命继续胜利的斗争，恰恰相反，它加强共产党在这种革命斗争中的威信和阵地。在巴西这样已经建立了民族解放同盟的国家中，正确和灵巧地继续应用反帝人民战线底策略，使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开展，使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愈加顺利，同时，准备下革命发展到下一更高阶段的基础，换言之，准备下将来在巴西发展苏维埃革命的基础。末了，在印度这一类国家中，一方面有开展群众反帝革命斗争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能正确应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底策略，可以迅速提高共产党底威信，扩大人民反帝的斗争。

然而不能由此便做出结论，以为不正确应用这个策略，对于共产党和革命运动，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危险。由中国共产党斗争底历史中，我们知道：当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运动底紧急关头，中共领导机关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一部分机会主义者，把民族统一战线底策略与阶级斗争底任务，彼此对立起来；他们为了与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民族统一战线起见，就放弃了工人阶级为保护切身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放弃了农民底土地革命，放弃了争取国民革命军的工作，不实行武装工农；同时并放弃了党对于暂时的同盟者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起初不去批评国民党右派底动摇和叛卖，后来又不批评国民党左派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使一九二七年底革命遭受失败。但是，根据这些情形，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并不是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本身底罪过，而是曲解这种革命策略的机会主义者底罪过。

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共产党员，应当认真去

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以便完成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我们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三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的 法西主义问题

法西主义——这是财政资本中最反动的、最主张民族侵略主义的、最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份子所建立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法西主义是在破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废墟上发育起来的；社会民主党替法西主义扫清了上台执政的道路（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由上面这三个观点来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自然谈不到这种法西主义。

然而不能否认：近几年来，尤其是德国法西主义上台执政以后，在好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所谓法西主义的运动却日益增长起来。

例如，在中国，近几年来，蒋介石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组织蓝衣社。蓝衣社社员在报纸上非正式地（而且有时候正式地）把自己叫做民族社会党人。蓝衣社中有一部分人是专门干杀人放火和绑票勒索的匪徒，他们充当屠杀人民、屠杀青年、屠杀共产党员以及一切反蒋份子的刽子手；他们采用最野蛮的手段和方法来反对民众（例如，焚烧书籍，活埋革命的文学家等等），他们在战线上和军营里用各种毒辣方法监视和陷害愿意保国卫民的官兵。同时，蓝衣社社员也企图在群众中散布自己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倡“新生活”运动，提倡复古和尊孔，并招摇撞骗地说他们要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等等^①。

在巴西，存在着法西斯蒂的组织，即所谓因特格拉里斯

党,它在省、区、学校、工厂和乡村中有自己的分部。它设立宣传部、文化部、军事部、社会经济部等等。在阿根廷也存在着这一类的组织,即所谓“公民军”,在墨西哥有所谓“金衣社”,在智利有所谓“民族社会主义”的组织等等。

不错,所有这些所谓法西斯蒂的组织,相对地除了巴西的因特格拉里斯党而外,直到今天,还不是什么真正包括广大群众的组织。所有这些所谓法西斯主义的组织都与某个或某些帝国主义强盗发生联系(首先是与法西斯蒂的德国发生联系),它们都是卖国的组织,都是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的工具。所有它们都是各国内最反动的、最反革命的、最黑暗的势力。此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底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与德、意、奥及其他国家不同。因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法西斯蒂运动发展的道路和形式,当然与德意等国不相同,同时,也不能发展到如德、意等国那样的力量。

然而,我们丝毫不应轻视法西斯蒂运动和法西斯蒂组织底作用和意义。为什么?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份子可以利用这种反动底“时髦”旗帜,来组织反革命底力量,来反对人民革命,来加强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奴役。法西斯蒂的运动和法西斯蒂的组织,对于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特别危险,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法西斯蒂随时随地首先就采用民族主义的撞骗宣传,而这种宣传有时候恰容易得到群众的响应。此

① 抗日战争初期本文重新发表时,王明在这里加了如下一段话:“这些人还企图在一部分国民党员中去进行所谓法西斯化的运动,不过,很难使人相信一个真正忠实的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会蜕化而成为反动的反社会进化的和实行民族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走卒。”(《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版)

外，法西斯蒂也广泛传播关于社会问题的撞骗宣传。他们用这些招摇撞骗的宣传方法，有时候能够诱惑失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这些群众，在我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在反帝斗争中，却应当起充分巨大的作用。最后，法西斯蒂对于我们之所以很危险，就是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许多共产党，直到现在还不会把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情绪，引导上革命斗争底轨道，还不会在群众中取得自己的影响。因此，很明显的，反对法西斯蒂运动和反对法西斯蒂组织的斗争，乃是我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底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之一。

经验告诉我们：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反法西斯主义的问题，现在应当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应当反对有些同志轻视和忽视所谓法西斯蒂运动危害（例如中国共产党底许多错误等等），另一方面，应当反对有些同志把自己国内的法西斯蒂运动过于夸张。例如中美和南美各国，许多我们的同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当作是法西斯蒂的政党或法西斯蒂化的政党，因此，就妨碍了反帝和反法西斯蒂的人民战线之建立。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去反对法西斯蒂运动和反对法西斯蒂的组织呢？

我以为：在许多策略方法之中，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组织真正革命的群众的反帝斗争，建立反帝和反法西斯蒂的人民战线，以便揭破法西斯蒂底基本的撞骗宣传——关于民族问题的撞骗宣传，以便向群众指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束缚的真正出路。这种方法能收到很好的结果。例如在巴西，因为近来民族解放同盟底运动大大高涨，不仅削弱了

因特格拉里斯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引起因特格拉里斯党一部分下层群众与上层份子之间的分歧（在赞成或反对人民运动和民族解放同盟的问题上），而且也引起因特格拉里斯党上层份子中间的分裂，甚至使得许多个别的有名人物（连圣巴罗地方的国会候补议员也在内）都转到民族解放同盟方面来。

二、共产党员用灵巧的方法去揭破法西斯蒂底撞骗宣传，以便在群众本身底经验上，去使群众相信：法西斯蒂的甜言蜜语是不兑现的支票。关于这一层，我可以引出几个例子。例如蒋介石的蓝衣社提倡“新生活”运动，宣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等，我们党的江浙两省的个别农村组织，在旧历年关，组织了几千农民向国民党市党部和县政府或乡公所请愿，要求发粮食和发冬衣，以便农民能在新年大节的时候，真正按照“新生活”底条例，来“守礼义”和“孝父母”，而当地国民党当局，不仅拒绝了农民这些要求，而且向群众开枪轰击，当这个时候，共产党员就领导农民群众把请愿变成了示威，使农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国民党蓝衣社骗子的真面目。再譬如蓝衣社社员在宣传“新生活”运动底口号时，大大宣传生活要卫生清洁等等。因此，上海个别工厂中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就实行组织“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并要求厂主遵照“新生活”底条例来改善劳动条件，以便适合于清洁卫生。这样一来，逼得有些蓝衣社社员暂时在工人中停止了“新生活”运动的宣传。

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完全正确地指出了：必须加强思想上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例如在中国，蒋介石和蓝衣社社员利用最落后的、古代的孔孟学说、道教、佛教等等来愚弄群众。同时，他们把孙中山底学说曲解成为他们卖国殃民的理论根据。但是，许多共产党员却轻视反国民党和反

蓝衣社的思想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认为这些都是落后思想和陈腐的学说，因此，他们以为这些思想和学说现在都已经不能影响群众。事实上，这种观点完全是不正确的。对的，孔孟学说及道教佛教等等，都是落后的思想和陈腐的学说，但是，要知道，除了落后、陈腐、野蛮和退化的思想和学说之外，这些腐化和垂亡阶级底代表还能够说出和想出什么东西呢？！然而问题的中心并不在这里。问题的中心在于：这些旧思想和旧学说在中国群众底传统中有很深的基础，在民众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些陈旧学说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应当在极广大的民众中进行细心耐烦的解释工作。我们应当解释这些思想底来源和真正的用意，同时，应当解释共产党员对于道德等问题的态度，以便使群众瞭解：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对于孙中山主义，除了解释它的不彻底，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而外，还应当向群众解释说：孙中山本人是一个民族革命家，在他的思想中，尤其是在他的行动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和值得钦佩的地方。因为孙中山生平最主要的劳绩，就是他在遗嘱中所说的：“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同时应当向群众证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因为只有我们共产党员，才真正不断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而牺牲奋斗。而那些恬不知耻自命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的人，如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一流的人物，不仅是卖国殃民的罪魁，不仅是人民和国家的公敌，而且是三民主义和中山遗嘱底叛徒。如果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蓝衣社斗争中，不进行有

系统的、耐烦的、灵巧的和有理智的思想斗争，那末，共产党就不能把那些因落后、幼稚以及历史的条件和传统等关系，还在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影响之下的群众，夺取到革命旗帜之下来。

四 殖民地革命在革命与战争 新周期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甚至于在大战的过程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要的，只是做了帝国主义瓜分和争夺的对象，而且真正充当了宗主国的后方，接济了原料、粮食和工人，并补充了军队。但是，在革命与战争新周期的前夜和新周期的过程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十月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底影响之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底影响之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底改变以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底增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在全人类为推翻帝国主义、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底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将要起很大的历史作用，而且现在已经起这种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拿全世界工人阶级底罢工斗争来证明。根据确实的统计，近年来，亚洲、南美、中美各国工人的罢工人数，差不多占全世界罢工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拿农民斗争来证明。在许多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是近几年来，农民才开始局部的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的垄断，去反对银行的盘剥，去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农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者、地主和资本家方面的三重剥削和压迫，不断地起来进行

群众斗争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成为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直接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中国苏维埃革命来证明。中国苏维埃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运动中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它继续发展下去，就不能不震撼全世界帝国主义底基础。关于这一点，也可以用印度革命的作用来证明。印度革命的胜利，不能不是英帝国主义的崩溃。

然而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真正瞭解殖民地革命底作用和意义的。关于这一件事，首先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的兄弟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来证明。事实告诉我们：直到现在，只有我们的日本兄弟党竭尽自己的力量，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去保护中国人民；此外，只有美国的兄弟党已经开始（虽然仅仅开始，但是总是开始了）募捐，去帮助中国红军。而除了日本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之外，其他各国的兄弟党，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帮助，还仅仅限于宣传鼓动工作。然而中国革命却真正需要帮助，首先就是需要一切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方面的帮助。因此，我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致谢季米特洛夫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曾正式切实声明：共产国际下了极大的决心，拥护中国人民底斗争，以便使中国人民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底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代表，他们对于季米特洛夫同志底这种声明，表示了热烈的拥护和完全赞同，中国人民正迫切期待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

讲到这里，我应当通知你们一件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实，这件事表现日本同志的真正革命的国际同情精神。事情是发生在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地点是在吉林省的宁安县，日本军

队中的一个汽车夫开着一辆载重汽车，汽车上装载了六万粒步枪和机关枪子弹，还有许多手榴弹和炸弹。他把这辆汽车开到反日游击队时常出没的山林偏僻的地方去。他虽然寻找了好久，终于找不到游击队；但是附近地方，进攻的日本军队底枪声已经响起来了。那时这个汽车夫就不得已自杀了。

中国游击队击退了日本军队底攻击，六月二十四日清早，他们在山路上发现一辆载重汽车和汽车夫的尸首。在汽车夫的口袋中，找到写给他们的一封告别的信，在这封信里，这个不知姓名的日本汽车夫写道：

“反日义勇军和一切反日游击队的亲爱同志们！我赠送你们一点小小的礼物——六万粒子弹、许多手榴弹和炸弹。我本来要想与你们见面，当面谈谈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你们这些民族英雄，对于可爱的中国人民，对于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与我们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人们，抱着怎样的敬爱和同情。我等待你们很久，但是找你们不到。但是，日本军队底枪声已经逼近了。在这种场合之下，我怎么办呢？回到日本军队中去罢，这是我不愿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有自杀了，把这一点礼物留给你们。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得到它。我希望你们收到它。此致
同志的敬礼。

你们的一个日本同志共产党员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这件事·实·表·现·远·东·两·大·民·族·底·互·相·敬·爱·和·同·情。是的，我们中国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爱·日·本·的·人·民。我们之所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因为它压迫、剥削和屠杀中国人民。我们之所以爱日本人民，是因为日本人民，对于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和文化上讲起来，是最亲近的民族，在互相瞭解和互相尊敬的关系上讲起来，是最友爱的民族。我们之所以爱日本人民，还因为他与我们中国人民一样，是勤劳的、高尚的和有理智的人民。末了，我们之所以爱日本人民，尤其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一起进行斗争去反对共同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相信，这只是我们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员同志中的一份子。这种革命国际主义底英雄，在日本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应当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每一个这样的英雄，都值得全世界革命家和优秀份子底赞美和尊敬的。因此，毫不足奇的，当我在大会正讲到这件历史事实时，曾引起全体到会代表静立来纪念这个永世不忘的、可敬可爱的、永远不死的英雄——一个不知名的日本同志。

这是我们这位精神不死的英雄永垂不朽的光荣！

这是我们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底光荣，因为日本共产党在自己的队伍内培养出这样伟大的革命国际主义底英勇战士！

这是英勇的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劳动人民底光荣，因为他们能产生出这种震动全世界的伟大子弟！

这是我们的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底光荣。只有在共产国际底队伍内，才能锻炼出这种为世界革命底伟大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真正伟大的英雄。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真正瞭解和估计到殖民地革命底作用和意义的。关于这一点，下述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作的有些共产党员，把

殖民地革命看作是无关痛痒的事情，或者至多把它看作是世界革命中无关重要的辅助的力量。其实，这是一种完全不正确的瞭解。他们不瞭解新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所有的意义；他们不了解：据列宁和斯大林底估计，殖民地革命，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必须了解：殖民地革命事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底人民，占全地球人类底绝大多数；殖民地革命事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殖民地民族中底大多数是真正的劳动者；殖民地革命事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有一部分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存在着和斗争着，而且因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站实际统治地位的，正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广大人民反对的公敌。轻视殖民地革命的意义和作用，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中间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残余，这种残余应当毅然决然地消灭下去！

在目前国际阶级斗争底严重形势之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真正战斗的、全世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便对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建立的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我们有一切基本前提来办到这件事情，我们有共同的仇敌——帝国主义，我们有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共同政纲和目的，我们有世界革命底战略和策略，我们有革命斗争底共同堡垒——苏联，我们有统一的世界政党——共产国际，我们有共同的导师和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同志们！应当永远记住列宁最后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列宁对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底前途，对于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之间斗争底前途,给了很明显的一种估计,同时对于殖民地革命在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决战中的作用和意义,给了一种估计。列宁在这篇论文底末段写道:

“斗争底结局,归根到底,要靠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家占人民底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民底大多数,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转入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因此,在这一点上讲起来,不容丝毫怀疑到:世界斗争底最后结局将是怎样的。在这一点上讲起来,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有了保证”(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六至四一七页,俄文第二版)。

是的,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有了保障,尤其是在现在,现在无论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底工人阶级,无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底被压迫民族,都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都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去争取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

同志们!我们前进,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底旗帜,高举共产国际底旗帜,前去迎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底新胜利!

单行本,巴黎亚洲出版社 1935年10月印行

署名:王 明

新形势与新政策*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小 引

(论两种统一战线)

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我去年十一月上旬,为解释中共新政策,写给《布尔塞维克》杂志(苏联共产党中央杂志)和《共产国际》杂志(共产国际执委杂志)的两篇论文合组而成的。当本小册子现在用中文发表时,虽距原来写文章的时期不过将近两月,但中国的事变已经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

两月来的中国事变,完全证明了我们党对时局估计的正确。日寇对我国的新进攻,变相的“满洲国”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公开傀儡戏式的“冀东防共自治会”和“冀南防共自治会”的出现,日满匪军对察哈尔领土底强占,日寇公开进行占领山东和福建底准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大好中华河山有完全变色的危险,伟大中华民族有完全奴化的可能!同时,所有这一切,更进一步证明我全国

* 本文最初以《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为题,分别刊载于1935年《布尔什维克》(俄文)第20期、1936年《共产国际》(俄文)第1—2期。1936年初在苏联出版中文单行本。抗日战争初期改名《抗日救国政策》,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等文集。

同胞和全国军队有迅速一致团结救国的必要。北平爱国青年去年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的两次英勇壮烈的示威，全国各地热血学友的抗日救国言论和行动，各地工友对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参加（如上海总工会的抗日讨逆宣言，沪宁、沪杭甬铁路工友的讨逆通电，无锡印刷工友反抗不载抗日新闻底罢工，镇江黄包车夫同情学生抗日的罢工，武汉工友参加学生抗日运动等等），全国厂商各界对“华北自治运动”的反抗和对学救国运动的响应（例如上海九十三个同业公会的通电，各区市民联合会通电），上海北方等许多新闻界和教育界同胞对救国运动的同情和赞助，军界中抗日救国怒潮的酝酿（如南京紫金山上中山灵前，第一军参谋长因愤日寇进攻而遗书自杀事件，方振武在美国公开号召组织国防政府，三十二军一部份官兵反抗保安队占领塘沽的武装冲突，北平朝阳门二十九军兵士对日寇官兵的开枪射击等等），妇女（如上海妇女救国会之活动等），儿童（如江苏二万五千小学生的救国宣言，北平、武汉儿童慰劳示威学生等）奋起救国的积极，各国侨胞纷纷提出速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名流学者抗日讨逆之号召（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郑振铎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名救国讨逆宣言，胡适等对救国运动的同情声援等），特别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民武装抗日”，“打倒卖国贼”，“讨伐叛逆”，“打倒防共自治委员会”，“反对对日投降政策”等等的呼声，遍于全国。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全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日益高涨，证明我各界同胞要求全民一致救国情绪的日益迫切；同时，更进一步证明我们党提出建立广大人民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千真万确！

全中国各界同胞逐渐从痛苦经验中认清了：我中华民族到现在之所以不能武装抗拒日寇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汉

奸国贼的不抵抗或认贼作父的政策，而且是由于我各界同胞没有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和统一军政领导机关的原故！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便逐渐成为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同胞所公认和欢迎的政策！

为的对抗我们党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日寇和汉奸殷汝耕等提出了组织“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于是现在在中国正在形成着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共产党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另一种是日寇汉奸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反日是中国人民要做的事，反共是日寇汉奸要做的事。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无疑会地会走进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国红军通电号召全国军队抗日大联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风起云涌，全国工农军政商学许多团体和领袖最近对抗日讨贼的一致呼声，国外侨胞抗日救国的热烈活动，东北抗日武装战士最近对全国各界号召一致救国的呼吁，——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同胞反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的具体象征。同时殷贼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会”的成立，何贼海鸣的“冀南防共自治会”的发起，阎锡山大吹大擂地组织“防共自卫团”和提出“防共”“消共”的计划，日寇在中国和在国际上制造“共同反共”的空气，都是反共统一战线的具体表演。站在反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是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站在“反共统一战线”方面的，是日寇及其汉奸走狗；营垒是越过越鲜明，旗帜是越过越明显，或者参加抗日救国的事业，那你就要参加反日统一战线，或者实行降日卖国的勾当，那你就要参加“反共统一战线”，对于每个中国人，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

反日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反共是反对中国人民的代表名词，这一真理，在现在比前此任何时候，都在事实上证实

得无可争议。在这种新的局面之下，铁一般的事实，要求每个中国人，要求每一个中国党派，要求每一个中国政权，要求每一个中国军队，要求每一个中国社会团体，要求每一个中国名流学者，迅速表现自己的真面目，赶快选择自己的营垒；谁还想作中国人，谁不愿作汉奸亡国奴，谁就不能不表示对日寇汉奸“反共统一战线”的反对态度。正因为在这种全民要求抗日讨贼的严重空气逼迫之下，连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也不能不开始在有些问题方面，表示出与日寇和汉奸异趣，国民党五中全会宣言的十大政纲中没有“剿共”或“反共”的要求列入，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已经再没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南京政府讨伐“冀东防共自治会”罪魁殷汝耕等明令的颁布，《汗血月刊》、《社会新闻》等反共刊物上最近罕见公开反共的文字，所有这一切，不能不是南京政府为自身生存计而多少畏惧民意的表示。南京政府这种言论上的变更，到底只是为的蒙蔽民意于一时？到底只是为的目下不便高呼反共？或是真正不愿与日寇和殷贼等站在同一战线？需要它在最近将来的实际行动作答覆。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即不管南京政府的政策如何，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一致抗日的愿望和行动，一定与日俱增的；同时，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威力愈大，则南京政府愈难于和愈不敢走上日寇殷贼等“反共统一战线”方面去。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必需为抗日救国而统一。现在各地青年同学已努力于各校、各地和全国学生救国会的统一组织的创立，这是非常值得注意和赞同的现象。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们必需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我们必需达到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的统一行动，我们必需做到使全国各种军队达到抗日救国的战斗统一。

我们要组织各界的统一救国会，我们要召集全中国各界同胞的统一的救国大会。我们要达到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目的！

全中国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和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国的大团结，是中华整个民族和各界同胞今天的唯一无二的出路。

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抗日救国的全民统一战线来对抗日寇汉奸使我亡国灭种的“反共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

一九三六年正月

新形势与新政策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其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因为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底变更，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季米特洛夫同志讲到中国的时候，他曾经说：“在中国，因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很大一部分领土上，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以及南京政府实行无耻的卖国，中国伟大民族底生存，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团结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力，来进行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斗争。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底这种

提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同志底报告所通过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底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曾规定中共底任务如下：“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及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的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地提出了什么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呢？季米特洛夫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所赞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新政策呢？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曾具体规定了什么新政策，以便实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呢？

一、中共底新政策——建立 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七年来的工作和斗争底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

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在这篇告全体同胞书里正式宣言：

“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相互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 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 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 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宣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底具体提议。

同时, 应当明白指出: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在这篇宣言里所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底内容和形式, 即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 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新政策底基本方针和基本方向。因此, 绝对不能从此得出结论, 以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时, 主张只由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种高级斗争形式开始, 因而以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就忽视或轻视各种各样的初步反帝要求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各种较低级形式。事实上绝不如此, 相反的,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提出反帝统一战线底基本内容和高级形式, 不仅不忽视或轻视反帝统一战线的部份要求和较低形式, 而且是责成全党和一切苏维埃要愈加十倍地认真注意, 在各种各样的反帝部份要求口号之下, 组织各种各样形式的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 那怕是最初步的要求和最原始的形式, 都要加以应有的注意。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看来, 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这个事业, 乃是一切党的和非党的英勇战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即他们共同为建立、巩固和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而进行的

有系统的、不屈不挠的和灵活的艰苦斗争之结果。

二、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根据些什么基本条件和前提决定了自己的新政策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规定新政策所根据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就是中国全体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的日益开展和必须把这个斗争组织起来。目前在中国，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观点看，有了很大的变动：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更加日益觉悟到必须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失业的痛苦，反对饥寒交迫的境况；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日益迫切感觉到，必须采取坚决办法，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贪欲无厌的侵略，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不断的崩溃。从各党派的政治立场看，也有了显然的进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有历史意义的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现在已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口号了，这个口号，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党派和广大民众所拥护的口号了。从各派军队对于保国卫民事业所表现的态度看，也看得出显著的转变：现在在国民党及其他派别的军队中，不仅有很多的士兵，不仅有不少的中下级军官，而且甚至于有一部份上级军官，都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有时整师整军的国民党军队，掉转枪头去反对人民的公敌。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党派中间对抗日救国问题方面

所起的变化，关于各派军队中间对抗日救国问题方面所表现的进步，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事实来证明。

例如：（一）一九三一年底，全国各地学生代表风起云涌地集中到南京，组织了十万学生的空前盛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二）有好些国民党的军队转到红军方面去共同抗日讨蒋，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底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整军人转变到红军方面去，成为红军第五军的基本部队。（三）一九三二年春（一月至三月），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楷、区寿年、翁照垣等统率之下，与上海的工人和全体市民联合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民族防御战，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淞沪的毒计。（四）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国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宣布民族防卫战争。（五）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国红军向全国军队发表宣言号召在简单三个条件之下（即（1）立即停止进攻红军；（2）立即给民众以民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等自由；（3）允许民众有组织抗日义勇军和武装的自由），与全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根据各方面消息，当时江西战线上的国民党北路军，在总指挥陈诚将军统率之下，曾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六）一九三三年末和一九三四年初，十九路军仍在蒋光鼐、蔡廷楷、区寿年、翁照垣等将领领导之下，与红军订立了共同抗日反蒋的战斗协定，并组织了福建的人民政府。同时，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领袖，并公开地宣布了退出国民党，组织了自己的生产党。此外，参加福建事变的，还有陈铭枢、李济琛等这类前国民党的高级军事首领，以及陈友仁、徐谦等这类前国民党的党国要人。（七）一九三四年春，反日烈士潘洪生出殡（潘洪生是被国民党逮捕后严刑打死的），变成了三十万人的反日反国民

党的大示威。参加这次示威的，不仅有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及中小商人，而且有大商人和大工业家。上海总商会正式宣布全市商店下半旗志哀，上海所有的学校和商店，在这一天都下半旗。（八）一九三三年夏季，在北方各省，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抗日的义举，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军队在察哈尔底发动。此外，一九三四年春季有孙殿英军队的抗日发动。一九三四年秋季，中国苏维埃政府任命方志敏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率师北上抗日。（九）东北军之中，有好些部队屡次表示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十）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有三千多人共同签名公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在发起人当中，有各界的著名人物和名流学者，例如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章任琢等。这个纲领在国内民众和国外侨胞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国内外公开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已有几十万人之多。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中，甚至在许多穷乡僻壤里，在军队中，以及在侨胞荟萃的地方，赞成这个纲领的人，都组织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分会。（十一）中国国家主义派，原来本是最反动的党派，但现在该党底有些进步份子，已经再三声明说，该党底两个基本口号的内容，业已根本改变了：从前，“内除国贼”的口号，实际上是说“内除共党”，而现在这个口号则是说“铲除蒋介石等卖国贼”；从前，“外御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说“外御苏俄”，而现在这个口号则是说“外抗日寇”。（十二）十九路军派底著名领袖陈铭枢发表了《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的感言》，在这篇感言当中，他不仅公开批评过去他做军阀官僚的时候，在国家与人民面前所犯的罪过，他也不仅公开具体地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殃民的各种罪恶，而且很明显地指出了，中国人民近几年来之所以遭受外侮内忧交相逼迫的不幸，首先就是

由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卖了**中国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破坏了“**国共合作**”，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在“**清共**”的口实之下，屠杀了几十万优秀的、进步的、勇敢有为的**中国青年**。（十三）最近因为国民党中央不仅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一切**祸国殃民**的要求，而且公开接受日寇解散天津、厦门等各处国民党组织的指令；因此，不仅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公开发表宣言，号召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且有许多被蒋介石欺骗的**蓝衣社社员**和**黄埔同学会会员**，也积极起来主张抗日救国了。最后，至于东北四省的情形，我觉得用不着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东北四省，除了最少数的被收买的**汉奸走狗**以外，一切真正的中国人——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不仅直到**民族资产阶级**，而且直到一部份地主，都是仇恨日寇和伪满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武装不好和人数比较不多的**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在四年之内，在广大民众拥护和同情之下，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的武装抗日行动，他们不仅没有被日寇和“**满洲国**”消灭，而且日益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条件已经成熟到什么程度，也可以由下述的最近事实来证明。例如，还在本年六月，东三省反日游击队底一切将领曾发表了为华北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他们在这个告民众书中，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反满反蒋的人民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在本年七月间，广州大学教授**吴康**发表了《征集**义士抗日救国书**》，在这个抗日救国书中，他提出了“**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不分党派**”，联合我国一切力量，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军等。其次，最重要的，根据最近消息，据说**十九路军底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福建人民政府底领袖**（**陈铭枢、李济琛**等）及其他著名的军政要人，现在又组织了新的政治组织，名为**中华民族革命**

同盟。这个同盟的基本纲领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目前的主要行动纲领是：抗日讨蒋。

抗日救国运动为什么能带着这种全民的性质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全中国的不断侵略，以及日寇在东北四省实行的公开的强盗政策和殖民地政策。近四年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山海关一带要塞，由山海关而滦东“非战区”，由滦东“非战区”而实际上用军力监督我国北部。现在差不多半壁河山或者已被日寇直接侵占，或者事实上已完全处在日寇军力底监视之下。而其余一半领土，照田中预定的计划看起来，以及照关东寇军目前的实际动作看起来，一天比一天地有被日寇侵占的危险。中国的内政外交，步步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欧洲复杂的环境，利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公开宣布组织“华北国”，并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实行这些新要求，就可以把全中国变成日寇的附属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它所侵占的领土（即所谓“满洲国”）内进行公开的掠夺奴役政策，使中国人民一切阶层底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使全国人民都关心着自己最近将来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几年来，日寇在东北四省作了些什么“成绩”呢？大批屠杀居民，大批焚毁中国人民底村庄和城市，强奸中国妇女，侮辱中国人底人格，消灭和解散中国的各种军队，没收居民底各种枪械，捣毁、解散以及所谓“改组”一切行政机关，减低工资，增加失业人数，增加苛捐杂税，掠夺农民底牛马和牲畜，在铁路沿线四十里周围禁止农民种高粱，强迫大批居民去从事军事建筑，抢夺一切富源（矿山和森林等等）及运输业（铁路、轮船公司、汽车公司），抢夺或用贱价强迫收买中国人的工厂作坊，排挤中国人所经营的商业和银行业，强夺

中国农民和地主底肥沃土地，交给日本和高丽的移民，霸占大批的土地用作军事的建筑，不仅焚烧进步的中文书籍，而且焚烧所有与中国文化历史有关的书籍，如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等，在学校里禁止讲授中国历史和地理，强迫学生学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大批贩卖鸦片、玛啡及其他毒品，奖励大批日本和高丽女子当娼，提倡赌博等等——所有这一切，就是日寇和关东贼军在“满洲国”领土内所作的“文明”事业。凡此种种，使中国全体人民深切相信：凡被日寇占领的地方，不仅中国劳动群众受到空前未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中国有产阶级的生命财产，也要被日寇任意处置了。凡此种种，使中国人民相信：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四省内，不仅实行公开的殖民地的奴役政策，而且还实行屠杀中国人民麻醉中国人民毒害中国人民的政策，即是不仅使中国亡国、而且使中国人灭种的政策。

日寇积极侵占全中国的毒计，以及它在“满洲国”的领土内所进行的强盗政策，唤醒了一切中国人，使一切中国人觉悟到：如果我们中国同胞不同心协力地去坚决抗日的話，那末，今天在东北四省四千万同胞所遭遇的亡国奴底命运，明天可以成为北方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九千万同胞的命运，后天也可以成为我们四万万人的伟大民族的命运！

其次，抗日救国运动之所以日益具备全民族的性质，还因为近几年来，中国遭遇着极厉害的愈趋愈烈的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空前退化，农民群众贫困不堪，大批失业，千百万人饿死，中国企业非民族化，即转入帝国主义者手中去，首先就是转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去，中国许多银行钱庄底破产和歇业，中国商业的缩小，许多中国商店底破产，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中国近几年来常见的现象。此外，连年不断的所谓“天

灾”，如水灾、旱灾、虫灾等等，不仅使城乡劳动者流离失所和饥寒而死，而且使一大批中小资产阶级份子破产和贫穷起来。中国人民受经济危机和所谓“天灾”无限的痛苦，当然要归罪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但是，首先不能不归罪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汪等领导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因此，凡是不愿我同胞遭受饥寒交迫痛苦的人，凡是不愿我同胞成千累万成为饿死鬼的人，都不能不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末了，抗日救国运动之所以带着日益明显的全民性质，还因为国民党底内政外交完全破产，而同时，在中国却出现了并且日益发育着一种新政权——真正人民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执行的政策，完全是一种新的与国民党相反的政策，即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策。以前，不仅一大部份民族资产阶级，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都抱着极大的幻想，他们曾经指望国民党实行一些民族改良和社会改良的政策，使他们能够得到利益。现在由于国民党对日节节退让和步步投降，由于国民党统治，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都没有出路，因此，不仅小资产阶级，而且有相当部份的民族资产阶级份子，日益对于国民党感觉失望，日益感觉到必须真正向抗日救国方面去另找出路。苏维埃革命底顺利发展和苏维埃政策底实际设施，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自信心，使他们相信：如果民众自己拿到政权，如果人民自己起来管理国家大事，虽然不免要遭受牺牲，虽然不免有许多困难，虽然不免要犯好些错误，但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无论如何，比在国民党或其他军阀派别统治下，情形总要好得多。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很直截了当的：或者起来抗日救国，那就还能够救亡图存；或者不去进行民族解放斗争，那就只有亡国灭种！伟大的中国民族，是不甘愿被人

征服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愿当亡国牛马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抗日救国运动，才日益带着明显的全民性质。但是，要保证抗日救国的全民斗争得到胜利，就必须真正去组织这种斗争。正是为的组织日益开展的全民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国共产党才决定了建立最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这个新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规定新政策所根据的第二种条件和前提，就是中国革命发展底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就是现在阶段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基本上还是由革命运动底两大巨流——反封建残余的运动和反帝运动——汇合而成的。

还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底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同志，讲到中国革命底各阶段以及中国革命在各阶段上的基本任务的时候，便指出：

“如果第一个阶段底特点，在于革命底锋芒，主要的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那末，第二个阶段底特点，却是这么一个事实，就是革命用自己的锋芒，主要的去反对国内敌人，首先就是反对封建主，反对封建制度。第一个阶段是否解决了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任务呢？没有，没有解决。它把这个任务移交于中国革命底第二个阶段去实行。它对于革命群众只给了第一次推动力，推动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以便结束自己的运动，并把这件事业移交于将来。应当设想：就是革命底第二个阶段，也不能完全解决驱逐帝国主义者出中国的任务；它对于中国工农广大群众，给予更进一步的推动力，推动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它进行这件事业，为的是要把这件事业底完成移交于中国革命以下的一个阶段，移交于苏维埃的阶段。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难道大家不知道，在我们的革命

历史上,虽然在另一种环境里,在另一些条件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实吗?难道大家不知道,我们革命底第一阶段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而把这个任务移交于革命底下一个阶段,移交于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就完完全全地解决了铲除封建残余的任务。因此,如果在中国革命底第二个阶段上不能完完全全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底第二个阶段,推动千百万农民群众,唤起他们去反对封建残余,而终于把这件事业的完成移交于革命底下一阶段,移交于苏维埃的阶段,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对于将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只有好处”。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现在阶段的基本内容,不仅是反对封建残余的革命运动,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确这对于中国革命只有好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有真正最伟大的力量和最广泛的范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仅在于正确了解和估计这两个革命巨流中间的互相关系,而且在于用正确的政策,把这两个革命巨流底任务之解决配合起来,以便使革命斗争底发展具有更巨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范围。

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有一部份人,对于反帝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时常有不正确的了解。有些人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看成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有些人把这两种运动完全混为一谈。

其实,对这两种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下列正确的了解:革命底这两大巨流彼此间有极密切的联系,但是,无论从任务方面看,无论从动力方面看,都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反帝革命推动千百万农民去进行解放斗争,同时,农民是反帝革命底基本动力之一,如果没有农民的积极参加,那末,

任何反帝革命都不能得到真正胜利的结局；然而，反帝革命运动本身并不能解决土地革命运动底任务。同样，虽然土地革命运动归根到底要唤起农民去实行反帝斗争，而且土地革命运动破坏帝国主义统治底经济基础，然而土地革命运动本身，也并不能直接解决反帝革命运动底任务。因为反帝革命运动底基本任务，在于驱逐外国帝国主义者出中国，使中国全体人民得到民族解放；而土地革命运动底基本任务，却在于铲除封建残余，首先就是要取消中国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军阀官僚的统治。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底这两个任务，虽然客观上都带着全民族和全民的性质，然而经验证明，反帝革命运动底动力，要比土地革命运动底动力还广泛些。

在今天，在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已经广大地开展着，同时，在全中国范围内，即在苏区和非苏区里，反帝革命运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也日益大大高涨着。在这种局势之下，布尔塞维克党的任务，正在于运用自己勇敢的灵活的和正确的政策，去把苏维埃革命这两大巨流配合起来，以便不仅吸收最广大的、真正革命的、真正觉悟的和真正纯洁的份子，而且吸收中国社会上各阶级和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那怕是暂时的和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来参加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使中国革命尽可能地得到更多的力量和发展到更广大的范围。我们党的新政策的实质恰是为的把革命的这两大巨流配合起来，以便建立最广大的人民反日统一战线。

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中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列强。无疑义地，这一点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中底基本困难。但是，同时，这一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部分的好处。因为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者及其

走狗中间的矛盾加剧和相互火并，不能不削弱他们的阵地和战线；因此，不能不在客观上形成一种使革命有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矛盾底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布尔塞维克党底正确的、恰当的政策，便是在于对中国革命这些间接后备军底作用和意义，给以适当的和应有的估计，灵活地、正确地及时地善于利用他们去便利于革命的事业，随时随地注意集中革命底力量，去打击当时当地最危险的、最受全体人民痛恨的、最少内助和外援的敌人。

在今天，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的继续进攻，不仅使日美在整个远东的关系日益紧张，而且使英日在整个远东的矛盾日趋剧烈；另一方面，欧洲政局的紧张，特别是意阿战争的事变，使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愈加复杂和尖锐；在今天这种形势之下，关于革命间接后备军底作用和意义问题，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党的新政策底实质，恰就是为的要利用革命底一切可能的间接后备军。

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中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武装斗争，带着比较长期的性质。在我们党内，有一部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这个特点不了解；因此，在近年来，这些同志时常空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已经在实行最后决战”，甚至把红军反对蒋介石六次“围剿”底斗争，看成是“中国发展的两条道路——苏维埃道路或殖民地道路——底最后决战”，于是以为红军与蒋介石的六次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中国是苏维埃中国或是殖民地中国的命运”。其实，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比较长期性，——虽然这种长期性的过程，可以由中国国内或国际事变突变发展而变更和缩短的，——根据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之下，布尔塞维克党底任务，就是在于不仅正确地

认识革命发展的这种特点，而且能聪明地和灵活地去动员一切可能的、无穷的、最广泛的民众力量，并采用革命斗争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方法，以便一方面使革命能有持久和耐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缩短长期性的过程，以保证革命能战胜敌人，终于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新政策的实质，恰也就是为的实现这种任务。

末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中第四个基本特点，在于中国革命直到现在，在地域上发展得不平衡；因此，许多年斗争的结果，革命还只是在一部分领土上取得了首先胜利，而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中共六次大会的这一种天才的先见，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苏维埃革命已经在数省的领土内取得了首先胜利；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许多特点，首先就是由于革命运动底弱点，苏维埃直到现在还没有能统治这些省份的任何一个省城，这当然是革命发展底一种缺点和弱点。然而，同时，在事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一点对于革命也有相当的好处，因为这种环境使革命得到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时间来训练集聚自己的力量，首先就是训练和集聚革命的武装力量，此外，这种环境使革命得到更大的可能，来避免与强大的敌人的力量，发生过早的、没有准备的和对于革命不利的武装冲突。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过程的这个特点，具有不正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把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与夺取一个或几个省区的中心城市底问题，混淆起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否认了苏维埃革命已经在数省领土内获得首先胜利的事实；于是，直到现

在，当他们每次反对蒋介石“围剿”的时候，都把“实现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冲破“围剿”的主要任务——实际上，他们所谓“实现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就是要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的中心城市，这些同志的这种观点，使我们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受到不少的害处。另一方面，这些同志不充分瞭解苏维埃革命在部分领土上首先胜利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他们不能充分地利用革命这种首先胜利，来作为准备和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完全胜利的基础和起点；因此，当这些同志决定和执行苏区政策的时候，有时把苏区看作是与中国广大非苏区领土互不相关的领域，于是时常不能顾及到，怎样使苏维埃成为影响全中国政治生活的支柱和核心。我们新政策的任务和实质，正在于正确地估计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意义和作用，正在于正确地利用革命在一部分领土上的首先胜利，作为准备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基础和起点，同时，正在于使苏维埃成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统一中心。

第三，我们党规定新政策所依据的第三种条件和前提，不仅是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势力底增长，而且也是它们的弱点。中国苏维埃执行了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政策，特别是进行了艰苦英勇斗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和南京政府底卖国殃民的罪恶，因此，苏维埃在民众中取得了极大的同情和威信。同时，中国红军底一切部队，进行了长期的艰难困苦的胜利的斗争，红军屡次冲破了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蒋介石的所谓“围剿”，红军在这种长期艰苦斗争中巩固和扩大起来了；尤其是中国闽赣红军主力的英勇西征，突破了敌人百万军队底战略包围，行军万余里，跨过许多人迹罕见的丛山峻岭，渡过许多号称天险的长江大河，终于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

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所预定的计划，与红军另一个基本队伍红四军团会师于川西，并与红四军一起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中国红军几年来的英勇战绩，特别是最近红军主力的胜利的西征，不仅在事实上证明中国民众对于苏维埃事业，表示出无限的同情和无穷的赞助；而且证明了中国红军有惊天动地的战斗精神和神出鬼没的军事艺术；红军的胜利，使革命的一切朋友欢欣鼓舞，同时，使一切敌人胆战心寒。红军主力西征的胜利，红军主力长途西征所表现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红军主力长途西征所表现的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意志，不仅是红军和其领导者——共产党奋斗历史上的永远光荣，而且是中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深刻反映；因此，红军西征的胜利，不仅提高了红军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们面前的威信，而且增加了全中国人民对抗日救国事业的信心。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反日的势力，不管他是真正为的爱国救民也好，或者只是为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加紧也好，都不能不把红军和苏维埃看作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仅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红军和苏维埃力量的增长，无疑义地使它们愈加有更大的可能，去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统一中心。

然而，同时，应当公开指出：建立广大反日统一战线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红军和苏维埃力量底增长，而且也由于红军和苏维埃弱点底存在。换句话说：从军事实力的观点看来，仅仅靠今天红军底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政治趋向底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为种种关系，在今天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但是，中国人民底民族危机，已经严重到千

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如果再不能迅速找到办法，以便把全国一切党派、各种阶层和各种军队团结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的、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华祖国，将很快地完全变成异族底殖民地，而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有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将完全变成日寇的亡国奴。我们党的新政策，恰就是能把全中国人民和全中国军队团结起来去共同抗日救国的唯一办法。

最后，我们党规定新政策所依据的第四种条件和前提，就是在苏区和非苏区，在我们的理论上和实际中所表现的错误和弱点，有加以纠正的必要。在我们工作中，错误和缺点是不少的，但是，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之中最重要的，都带着“左的”关门主义的性质。这些错误和缺点，妨碍着我们的党，使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公认的领袖和整个民族的团结的核心，而使我们党成为这种领袖和核心，恰是中国目前新环境内所绝对必要的事情。如果不克服这些错误和缺点，就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更向前推进。我们党的新政策，就是对于这些错误的纠正和对于这些缺点的克服。

三、驳覆反日统一战线底反对者

当中国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今天，照理，凡是有国家意识和民族天良的中国人，都无疑义的要一天多似一天的来参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然而，可惜得很，竟还有人用各种各色的理由来拒绝并反对这种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反日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怎样来驳覆他们的各种借口呢？

有些人说：“共产党员提出反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过是

玩弄手腕，并不是他们底真正政策”。我们回答说：不是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底政党，而且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全体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而不可分离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底先锋队，因此，他们对全体人民底命运最关切和最负责。除了中国人民利益之外，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的利益。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底事业，既是中国全体人民底事业，同时，也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切身的事业。对于救国自救的事业，难道可以玩弄什么手腕吗？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志，在其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总结的报告中，论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的时候，说得非常对，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底纲领，并不是什么玩弄手腕。对于保护中国人民去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事业玩弄手腕，便是罪恶。对敌人可以玩弄手腕，但是，对于人民，却不能玩弄手腕，人民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共产党是不顾一切牺牲去保护的”。除此以外，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政策，是一种假的骗人手腕，那末，就请你们拿出诚恳的态度来参加反日统一战线，来试试揭破我们的手腕罢。

有些人说：“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是很好的，但是，可惜太晚了”。我们回答说：怎么会太晚呢？难道中国人民底民族危机已经过去了或是减弱了，因此已经用不着组织这种统一战线来抗日救国吗？难道一切事实不都证明：当目前日寇要占领全中国的时候，全国人民底反日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和更必要吗？而且，即令中共这个政策真正稍为晚了一点的话，那么，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你们为什么还徘徊踌躇，不

来参加统一战线，以致更加空过时光呢？

又如《密勒氏评论》报在社会上，半正式的代表蒋介石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那里还用得着与他建立什么统一战线”。我们回答说：如果真正象你们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社论上所说的一样，各处红军都被打破了，现在剩下的只是最后的残余，已没有大的力量了；那末，试问，江西和福建两省蒋介石底四十万军队，四川、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省的五十万以上的军队，究竟在那里反对什么人呢？他们在那里打什么人呢？蒋介石及其辩护士们！请回忆一下自己的话罢；以前，你们不是说红军如何强大，如何威胁你们的后方，因此你们不能抗日吗？但是，现在红军和苏维埃提议建立广大的反日人民统一战线，凡是一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不能反对这种统一战线，而你们却又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什么势力，因此你们不愿同它建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好罢，不要多说空话了，事实胜过任何雄辩，与我们不与我们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你们必须在事实上表示：你们现时还是愿意反日呢？或者还是依然继续降日卖国呢？

再如蒋介石及其谋士们说：“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准备和任何人及任何军队建立统一战线，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与我和我们的军队发生关系，而且总是要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不得不与红军作战”。我们回答说：这是谎话。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

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再如有些南京军队的军官这样说：“我是愿意抗日的，可是蒋介石禁止我们抗日，而我是受他指挥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回答说：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说这样话的，只能是两种人：一种是纯粹托辞卸责，欺人自欺之流；另一种人，是简单的军人，他们只知道下级服从上级指挥的所谓军事纪律的机械原则。我们对后面一种人说：无论那一个军人，都没有权利把服从蒋介石或服从其他卖国贼的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更高些。他们应当懂得：他们是军人，而保国卫民，便是军人的神圣天职和起码的义务；同时，他们是中国人在目前中国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每个中国人都有救国自救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不管卖国贼的意志如何，要用自己的武器，来实行抗日救国的事业。

又一部分军官这样说：“不要与共产党和红军发生关系，否则，日本与蒋介石马上就要撤消我们的职务，并解散我们的部队”。我们回答说：最好请他们看看铁的事实吧：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及其军队，既没有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过反日统一战线，而且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可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所统率的军队，一部分被赶进了关内，另一部分被消灭了，其他一部分被缴械了，或者所谓被改编了。直到现在，关内的东北军残部，逐日受到日本人的压迫，日本人始终要求解散他们。东北军的于学忠及其军队，既执行了日本在北方的一切要求，也没有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要求撤消他的职务，并要求把他的军队撤出河北。此外，最好的例子，是蒋介石本人，在最

近几年来，蒋介石完全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要求，同时进行了不断的内战来反对苏维埃与红军，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要求撤消他的职务，并在报纸上公开宣言，日本军队的任务，首先是消灭中国红军，然后消灭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军队以及其他的中国军队。例如《哈尔滨新闻》在十月二十二日的论文中说：“现在我军进攻的目的地，既不是赤塔，也不是库伦，而是成都。首先打中国红军，然后打张学良军队，然后再打蒋介石等的军队”。

但在另一方面，那些留在关外进行反日的个别部队，如吴义成、孔宪荣、柴世荣、李延禄等小部队，他们都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义勇军建立了统一战线，并且公开宣称，愿意和中国红军建立共同反日反“满”的统一战线，他们已经血战了四年，可是，他们不仅未曾被日本军队所消灭，恰恰相反的，因为他们与共产党联合并得到广大人民的帮助，他们曾多次打败日“满”军，并且增加了武装和扩大了部队。

至于讲到蒋介石怎样对付所谓非嫡系军队，只要一看已往和现在的事实就很清楚了。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叛变革命以来，逞其军阀的野心与贪欲，不断的任意削除所谓异己的军队。拿已往的事实来说，蒋介石打倒唐生智、张发奎、冯玉祥等将领，并且消灭了他们的军队，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军队的失败，恰恰不是在他们联共的时候，而是在他们实行分共以后，即在他们失去共产党和人民帮助的时候。就拿现在的事实来说，蒋介石撤消过王家烈、刘文辉、田颂尧等的军职，并解决了他们的部队，占领了他们的地盘，抢夺了他们的政权；不仅不是由于他们联共，而且恰是在他们受蒋利用去打红军，以致打得筋疲力倦的时候。此外，蒋介石和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李宗仁、陈济棠等也都发生过战争，可是大家都知

道，所有这些人，都与共产党和红军毫无关系。

现在每个中国同胞和每部中国军队必须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中国军队的死敌。它的目的是要奴役全中国人民和消灭全中国的军队！

在目前中国情形之下，一切中国的军队，除了与公开抗日救国并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红军和苏维埃联合抗日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救国自救的出路！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反对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值一驳的。无疑的，用这些借口来反对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人们当中，有好些人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至少是对我四万万同胞底命运，漠不关心和毫不负责的空谈家。

然而，无论抗日统一战线底反对者用什么借口和遁词，都不能阻止全中国人民与全中国军队要求一致抗日救国的意志与愿望。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政治上军事上分裂、不一致和无组织的恶果。中国人民已经日益相信：如果我国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真能在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的圣神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列宁说得对，中国人民是“真正的伟大人民，中国人民不只会痛愤自己的长期奴隶地位，不只会幻想自由与平等，而且能够进行斗争去反对千百年来的压迫者”。

四、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 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互相关系

首先应当说的，就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实质上也是国防政府。为什么？因为苏维埃政府始终一贯地为组织抗日救国

的民族防卫战争而奋斗，因为苏维埃政府尽力为保护中国底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而斗争，因为苏维埃政府为中国全体同胞底完全彻底的民族解放而战斗。但是，苏维埃政府目前还不是统治全中国的政府，苏维埃政府目前还只是统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全中国，由于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去抗日救国，国家统一的问题已经具有非常紧迫和重大的意义了。目前中国人民对于国家不统一所产生的恶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感觉深切些。而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才发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参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不仅要有苏维埃政府以及东北各地反日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要有一切真正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军政机关、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

将来到底怎样具体地来组织这种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目前尚难预测。不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极诚恳地愿意组织这种政府，而且希望这种政府愈快组成愈好。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在自己的告全国民众书里，已经公开地说过：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此外，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并且声说：

“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

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这个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将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府呢?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告民众书里回答说: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 (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对一切对中国

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从这个政纲中，可以显然看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是反日统一战线底政府。同时，它的政纲不仅不与苏维埃政府底利益相抵触，恰恰相反，苏维埃政府要为彻底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因此，中国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自己政权所及的地方，实行这个纲领，以便作为一切参加国防政府的党派底模范。

然而，同时却应当明显地指出下述一点，就是苏维埃政府底根本目的，是全国人民得到完全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因此，苏维埃政府的行动，不能完全限于国防政府纲领底范围。例如，在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上，苏维埃政府当然实行国防政府纲领上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并把这种办法看作是土地革命底组成部分和出发点；但同时，苏维埃政府不仅不能放弃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底原则立场，而且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根据客观和主观的斗争条件，来为实现这种原则而斗争。为什么苏维埃政府不能放弃土地革命的原则立场呢？因为，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观点看来，土地革命是中国全体同胞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必需办法之一。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吧：第一，中国今天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是要实行抗日救国吗？然而怎样才能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这部分同胞——饥寒交迫的几万万农民，积极起来坚决参加抗日战斗呢？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换句话说，只有把寄生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来交给终年劳苦的农民，使农民衣食问题有了着落，然后这几万万人的伟大力量，才能成为抗日救国的巨大生力军。第二，中国今天的第二个

重要问题，不是感觉到要迅速安定民生吗？如果几万万农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和食不充饥的生活，如果几万万农民依然过着成千累万饿死冻死的境遇，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安定民生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几万万农民同胞能得到初步饱暖生活呢？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换句话说，只有把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生产资料——土地，从少数寄生虫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农民，才能使我国最大多数的同胞不成千累万的饿死冻死；而只有如此，才能谈得到真正实行安定民生的其他一切步骤和办法（如治水等等）。第三，中国今天的第三个重要问题，不是发展国民经济吗？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几万万农民经常处在饥寒交迫的厄境，如果这几万万人民缺乏最低限度的购买力，如果国内市场日形枯竭和经济不断衰颓，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发展国民经济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有相当购买力？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中国现时经济的主要基础——农业，能够脱离不断恐慌和日益衰颓的境况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发展国民经济有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呢？首先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换句话说，只有把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切封建残余——首先就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打破，才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第四，中国今天的第四个重要问题，不是要消灭军阀制度吗？如果不消灭军阀制度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封建残余，如果不消灭雇佣兵制产生的来源——广大的破产失业现象，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消灭军阀制度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军阀制度消灭呢？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换句话说，只有给农民以衣食资源，使农民不致流离失所，然后才能使军阀制度的基础——雇佣兵制逐渐消灭。第五，中国今天第五个重要问题，不是怎样使中国变成现代文明国家吗？根据历史的经验，无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所谓现代文明

国家也罢(如法英等等),或社会主义式的真正现代文明国家也罢(如苏联),都必须经过消灭封建残余——即实行土地革命的阶段;中国现在要想走上现代文明国家发展的道路,就必须铲除一切中世纪黑暗落后经济政治制度的残余——首先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广大劳动者的非人生活状况。正因为土地革命对于中国国计民生有这样严重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才始终坚持必须消灭封建残余的立场。也正因土地问题有这样严重的意义,所以在许多年来,虽然有些人在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提案,但中国土地问题必须重新解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上一切比较明达和进步之士的公认观点了。大家都知道:不仅孙中山先生曾经主张“耕者有其田”,在最近,就连蒋廷黻等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即干脆地将土地交给农民的办法,才能使农民感觉到有保卫国家的必要;此外,连反动军阀阎锡山也不得不大谈土地问题的重要,不得不承认中国土地制度有变更的必要了。

然而这是不是说,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现在还照以前一样做法而没有任何变更呢?不是的。苏维埃政府为的便利于建立广大人民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为的改正自己工作中的一部分错误和缺点,对于土地政策将实行几部分重要的和必须的变更。(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经济政策中特别讲)。

关于抗日联军与红军中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告民众书里说: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

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将来怎样在国防政府之下，具体地去组织抗日联军及其总司令部，现在还很难确定。然而有一点是无疑义的，这就是红军既然是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军队，它一定要首先加入统一的抗日联军，成为联军的组成部分之一。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具体编制问题，以及怎样使这种联军有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指挥等问题，将是最重要、最复杂和最困难解决的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当然要采取一切方法，使抗日联军能够组成而且具备充分的战斗力；同时，红军在加入抗日联军以后，不仅不应当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而且应当尽量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以便保证真正能尽其应尽的作用——使红军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成为抗日联军中最坚强的、最富于战斗能力的、最带有机动性的和最有突击精神的队伍。

五、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转变

自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以来，中国共产党底总政治路线，毫无疑问地是正确的。几年来，苏维埃和红军胜利发展的事实，便是我们党的总政治路线正确底具体证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马上便提出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反映这个政策的具体口号，就是“武装人民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个口号毫无疑问地是完全正确的。“武装抗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全中国绝大多数同胞的迫切呼声，便是我们党的抗日救国总政策正确底实际

证明。

然而这绝不是说，我们党在政策方面没有错误和弱点；前此我们党的基本弱点和错误就在于：

第一，我们虽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总政治方针，但是我们没有把反日统一战线底政策，看作是实现民族革命战争口号底基本政策和具体办法；

第二，我们虽然有时也提出并且还部分地实际运用这个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我们未曾系统地运用这个政策，尤其未曾把这政策与我们工作和斗争的各方面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党的新政策之所以成为新政策，我们党的新政策与前此政策的主要差别，我们党的新政策的真实价值和具体功用，即在于：

（一）把抗日救国的总政治方针和反日统一战线的具体策略联系起来，或者更确切点说，把反日统一战线作为实现抗日救国政策底具体策略；

（二）把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我们的全盘政策联系起来，或者更确切点说，使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和各部份斗争，都适合于便利于建立抗日救国的广大人民的统一战线。

在新形势之下运用新政策，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而且应当出来成为全国人民的公认领袖，同时，苏维埃真正能够而且应当出来成为全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统一中心，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才能把巩固红军战斗力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任务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底口号。

必须用十分坚决的态度，去消灭任何在国民党区域的群

众政策和群众工作中所犯的“左的”——关门主义的严重错误和传统。同时，在苏维埃区域中，也必须在我们的政策各方面起一个转变，首先是要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必须注意：我们在苏区的政策，是我们工作底实际榜样，我们在苏区施行政策的实际，是全中国和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观察和认识的焦点，正是从对苏区政策的认识，决定全中国和全世界各阶层对我们的态度。因此，建立广大反日统一战线事业底能否成功，与我们在苏区所实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小册子篇幅限制的关系，我不能详细讲到我们党在全部政策各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日寇占据区域实行转变的各种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底领导者，正在讨论和拟定在苏区和非苏区实行全部政策转变的问题，我现在只举出我们拟在苏维埃区中，最近实行改革的几部份问题，作为大家了解我们在苏区实行新政策的例证。

（甲）在经济政策方面

一、土地政策

我们实行消灭封建残余的路线，但同时，为的尽可能地建立最广大的人民反日统一战线，为的纠正个别错误，我们拟定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以下的几点转变：

第一，过去，因为有些苏维埃曾经颁布了法令，主张没收“一切不用自己劳力耕种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于是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劳动者的土地也被没收了。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自己不耕种而将其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如自由职业

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绝不没收他们所有的土地；对于他们所有的土地，或者允许他们继续出租（当然不是在残酷奴役的条件下出租），或者因农民群众要求而将他们土地拿出来平时分时，国家应当给他们相当的代价报酬。

第二，过去，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在没收之列，而且在土地和多余生产工具被没收之后，富农在一定条件之下，只能得到质量最坏的劳动分地。现在，我们拟定：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如果在基本农民群众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应当也拿出一共平分，但富农在平时分时，应照一般平分条件来得到土地（即不一定给以质量坏的土地）；如动用或租借富农的生产工具时，应当给以相当的报酬。

第三，过去，对于抗日军人同时是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问题，没有明显的规定；现在，我们拟定：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

第四，过去对于商人兼土地所有者土地问题，时常引起许多纠纷；现在，我们拟定：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的土地，不侵犯他的商业机关。

第五，过去，我们对于一切规定应没收的土地，均是无代价的没收；现在，我们拟定：在某些特别情形之下，或者在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而没收了某部份人的不应没收的土地时，苏维埃政府均给予被没收者以相当代价作补偿。

二、工商业政策

为利用一切可能富源来发展国民经济，为保证红军给养和改善民众生活，我们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必须实行许多重要

变更办法。例如：第一，过去，地方苏维埃多半只注意发展国家的合作社的企业，对于工商业方面的私人投资问题，或者完全不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充分；现在，我们拟定：苏维埃不仅要尽量发展群众的合作事业和国家的企业，而且也要用各种办法去奖励私人资本投到工商业方面来，并设法帮助和奖励私人工商业底发展；第二，过去，有好些地方的苏维埃颁布了好些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法令，尤其是有的对于工商业的行动，其中有许多在实际上或者客观上有妨碍苏区工商业的发展（甚至中央政府有时有个别法令，也在客观上有妨碍苏区工商业发展的）；现在，各级苏维埃必须重新审查自己过去在这方面颁布的法令和条例，不适于工商业发展的应当宣布废除，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应当修改；同时，严格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人员和苏维埃公民的行动，使不得有妨碍工商业发展的行为；第三，过去，红军所到之地，时常宣布解散商会；现在，我们以为对于商会要改变态度，换言之，就是不要解散商会，而要经过商会去部分地发展苏区的工商业，以及发展苏区与非苏区之间的商业关系；第四，过去，有些苏维埃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妨害了工商业的发展；现在，我们认为：要修改我们的税收政策，使私人的工商业有发展更大的自由等等。总之，我们的工商业政策，要不仅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尽量动员我们苏区内所有的一切富源和资本来发展工商业，而且要能够吸引非苏区的一部分资本和资源，投到我们苏区工商业方面来；在非苏区工商业各方面空前危机和不断破产条件之下，这种企图并非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我们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实行些大胆的、灵活的和远见的办法，才能减弱敌人对苏区经济封锁的功效，才能使苏区经济生活更加逐渐改善，同时，才能使抗日战争的军队能得到充分的给养。

(乙) 在劳动问题方面

在尽可能地提高工人和雇农底物质生活、法权地位和文化程度方针之下，我们在劳动政策方面，也必须实行许多必要的变更，例如：

第一，过去，在苏区里，有些工会工作人员，有时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在目前苏区的条件之下，那些要求，或者实际上不能执行，或者要加强经济的破坏和增加失业的人数。现在，我们提议：设法避免提出这类要求。

第二，过去，在有些苏区里，在许多小工商业企业里，有时甚至在农业上，实行所谓“工人监督生产”；现在，我们认为：在目前苏区里，还没有具备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底条件，因此，不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

(丙) 在政治制度方面

根据目前反日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底变动，根据实行新政策的需要，根据争取广大民众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观点，必须将苏维埃的根本法——宪法，加以相当的修改和补充，实行扩大人民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其主要应行修改之处，大概有下列各点，例如：

第一，过去，照宪法规定，只有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及一切劳动者及其家属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其他公民自由权；现在，我们认为：不仅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一切劳动者及其家属有一切公民权利，而且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人，都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当然，同时，在选举法中，应当和以前一样，设法保证工人阶级的相当特权；

第二,过去,照宪法规定,除各种专门人材外,在苏维埃各种机关内,不得容纳非劳动分子;现在,我们以为:应当吸引非劳动分子(不仅资产阶级出身的专门家,而且其他的非劳动分子)到苏维埃的相当机关(首先例如各级苏维埃的工商部等等)中去做工作,以便采用他们的经验,采用他们对各相当方面的联系,采用他们在相当工作方面的方法,使之有益于革命事业;

第三,过去,虽然宪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苏区内,实际上,只有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有合法的权利;现在,我们提议:在宪法上可以明白规定,在苏区内,凡是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非共产主义的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现在都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第四,过去,虽然在宪法上没有规定不允许共产党以外的党派参加苏维埃政权,虽然在苏维埃各级政权中,选举有许多非共产党员的代表,但的确没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公开参加苏维埃政权过;现在,我们以为:应当在宪法上补充说明,凡是与苏维埃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党派,可以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

第五,过去,照宪法规定,只有工农及一切劳动者,有手执武器和加入红军的权利;现在,我们认为:虽然,红军在基本上还要保障是工农的成份,而且要保证我们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红军的领导;但是,可以修改宪法明文,使一切真正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分子,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首先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教职员、自由职业者等),有可能来加入红军的队伍,以便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武装斗争等等。

(丁) 在对外政策方面

在对外政策方面，现在苏维埃政府不仅坚决实行其宪法条文的规定，即“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而且执行国防政府政纲中对此问题的规定，即“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动群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对一切对反日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以为对于苏维埃外交政策问题，应有下列的确定：

第一，过去，有些地方苏维埃机关，时常用同样态度和同样方法去对付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不应该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一律看待，苏维埃外交政策反对的主要对象，应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苏维埃不仅应当设法去与他们建立经常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还可以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二，过去，许多苏维埃机关，对于有些外国教师和商业人员等，时常加以逮捕拘留以至于要求取赎；现在，苏维埃政权应当克服这种游击队时代的传统，如无特别必要时，对于苏维埃政权所及之地的外籍人员（外交、商业、文化、宗教各方面的人员），不加以逮捕或拘留；对于他们所进行的业务，不加以妨害。苏维埃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订立新的平等条约，根据新条约规定，准许他们继续进行业务（当然，如果外籍人员有违反苏维埃法律，或实行反革命的反苏维埃活动时，则当又作别论）；此外，此处必须附带讲到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国内与各种政权和派别底关系；过去，苏维埃虽然也曾在某个时期与某

个派别实行过联合政策(如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但一般地讲来,在联合一切可能友军这个问题方面,苏维埃做得非常不够;现在,我们对各派各系各军队,应当认真实行各种不同的政策。苏维埃反对的主要对象,应当是红军和民众在当时当地的最主要的敌人,首先就是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亲日的汉奸和卖国贼,苏维埃不仅应当与那些真正愿意抗日讨贼的党派、政权和军队,建立友谊关系;而且应当与那些由于某种原因在目前有可能不与红军作战的派系,建立通常的和平关系。

当然,很明显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全部政策(苏区的政策也在内)的中心,首先应当是服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民族革命战争底利益,尤其是保证这个战争的胜利。

六、中国共产党底新政策能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底“新”政策

不久以前,在阿意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是它大举侵华的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于是公开宣布它的对华“新”政策。日寇“新”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迅速侵占我国北方各省,并积极准备吞并全中国!公开在我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范围内阴谋组织所谓“华北国”,增派大批海陆军到我国各地,陆战队在汕头、厦门、福州和汉口等地登陆捣乱,向南京政府不断提出新要求,企图把中国完全变成日寇的保护国,所有这一切,就是近几月来,日寇在我国实行其所谓“新”政策的具体表演。由此可见,日寇的所谓对华“新”政策,实际上是田中奏摺上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旧政策的

直接继续。

北方军阀如宋哲元之流，在日寇这种新的大规模对我进攻的情形之下，公开地投降了。他们在投降卖国时，提出最下流无耻的口号，例如，他们说：“与其让南京政府全权卖国，倒不如大家都各做一笔生意”等等。

在所谓国民党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前后，虽然在所谓中日关系问题上，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内部有很严重的意见分歧，但直到现在，在实际上还依然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

环顾全国，只有我们的党自始至终高举着鲜明的抗日救国的旗帜。环顾全国，只有我们的党，首先坚决提出“不分信仰，不分派别，团结抗日，一致救国”的唯一的真能救亡图存的政策！

这一点也不足怪！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中最优秀分子的团结，中国共产党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先进理论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领导着蒸蒸日上的苏维埃政权和身经百战的英勇红军，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已经得到千百万民众的直接帮助，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等这类伟大天才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有方志敏、瞿秋白等这类流芳百世的英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的共产国际底支部，中国共产党有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布尔塞维克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与日本和整个东方以及全世界底无产阶级和民众底革命斗争有骨肉相连的联系，因此，能得到他们的恳切拥护和热烈同情；——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才能有远大的眼光和坚强的意志，才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只有眼光远大、意志坚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共产党，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过程，毅然担负起团结我四万万人的伟大民族来实行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底新政策，就是使全国人民总动员，使全国军队总动员，使全国财富总动员，使全国人民总武装，使全国各党派大团结，以便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是对全世界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宪兵——日本帝国主义底致命打击，它不仅能保障中国人民底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人权自由，而且能将日本底和全世界底劳动者的解放事业的历史车轮迅速推进。实行我们党的新政策，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而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和非常严重的事情。要真正实行这个政策，不仅需要我们整个党和党的所有干部的努力，不仅需要一切热血爱国青年的努力，而且需要我们四万万全体同胞的共同努力。

一切真正了解中日国情的人，一切真正了解世界现势的人，一切留心意阿战争教训的人，一切熟知淞沪、长城和东北抗日战争经过的人，都深切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组织全国民众和全国军队去抗日救国的政策，归根到底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新”政策——掠夺中国和灭亡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上所作的结论，的确有十足的根据。我特引用来作为本文的结论：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载《共产国际》（中文）第7卷第1、2期合刊
署名：陈绍禹（王明）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三月)

几年来空前民族危机沉痛的经验，使中国人民一天一天地认清了：日寇不断对中国侵略的根源，与其说是由于日寇力量之强，还不如说是由于中国本身之弱。而中国之弱首先便表现在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分裂和内争。由此应当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

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成为强有力的中国，而只有统一的和强有力的中国，才能真正做到驱逐日寇出境和取得民族独立。同时，也只有在对外御侮和对内民主的政策基础上，才能达到国内的完全和平与统一。

只有达到和平统一，才能实行抗日救国；同时，也只有为的抗日救国，才能达到和平统一。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每个真诚的中国人都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一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不仅能最先发现这个真理，而且能根据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去重新审查其过去的

* 本文最早刊载于1937年《共产国际》(俄文)第3期，题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以后重新发表时，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本书采用巴黎《救国时报》版，同时参照其他版本作了校勘。

政策，同时并规定出了自己的新政策——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各种力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但是，很可惜的，由于亲日派分子的妨碍和逼迫，国民党——从整个党的方面说——还未确定走上这个唯一正确的道路。

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提议底答复，再明显没有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本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开会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专为解决由全国民意及西安事变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召集的。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和三中全会的立场，完全是根据其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各种力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政策出发的。大家都晓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立场，不仅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赞许和称扬，而且引起许多国民党员的同情和称赞。

在某种程度内，西安事变是由于南京政府企图进行进攻红军的新的内战，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愿意与抗日人民红军作战而愿意对日抗战所引起的。然而，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未曾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满足其部份的暂时的利益，相反的，中国共产党本其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认为全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决地出来反对一切内战，要求团结全民族力量去实行抗日救国。

中国共产党用尽一切力量去帮助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符合民意的决议，希望三中全会能够解决抗日救国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国内和平及国内统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给三中全会的电报，便是提议两党合作的具体纲领。据二月十七日《字林西报》载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议采

取下列五项主张作为国策,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力共御外侮;(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三)召集由各党各派各军参加之救国会议;(四)迅速完成武装抗日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民众生活”。同时,中国共产党宣称:“如果贵党三中全会能将上列各项定作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其一致御侮的诚意起见,自愿地对三中全会提出下列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二)改苏维埃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并愿意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三)在中华民国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五)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由此可见,中共在其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不仅提出了唯一能达到国内和平统一以便共御外侮的正确纲领,而且在本身方面作了许多最重要的政治让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的便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业,同时也就给了汪精卫等亲日分子所高唱的“有两种不同的政府和军队,国共绝无合作的可能”的澜言以致命的打击。

在电报末尾上,中国共产党以极大诚意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宣称:“当此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绝无犹豫的余地。本党为国忠诚,可昭天日。诸公公忠体国,当能采纳刍蕘,以便御侮救国。吾等均为中华民族之儿女,当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均应抛弃过去一切成见,以便亲密团结,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本文所引中共电报文句,均系根据《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所载文句译出。)^①

^① 以上引自《字林西报》之《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译文不准

中国共产党这一电文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而且在世界舆论中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不仅得到国内一切爱国分子的热烈拥护，而且受到国民党党员及其一部分最有威信的领袖的诚意欢迎。

中国人民及世界人士严重地注意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工作。大家都热忱地希望国民党能转向执行抗日救国的正确政策。

* * *

然而国民党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究竟如何呢？根据中国报纸发表的消息，三中全会公布了两个最重要的文件，即三中全会的宣言和所谓《根绝赤祸决议案》。

由于亲日与反日两种倾向的剧烈斗争的结果而通过的三中全会宣言，主要地包括两部分问题：第一部分讲的是对外政策，第二部分讲的是对内政策。

在第一部分对外政策中主要地包括有下列四点：

第一点的主要意思是：自去年国民党二中全会以来，南京

确，根据 1937 年 2 月 13 日《新中华报》刊载的原电订正如下：“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施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

政府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方针是：“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定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

什么地方可以表现出南京政府已经实行“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的外交方针呢？从国民党二中全会到现在这一时期内，难道在我们的东北四省领土内已经没有了所谓“满洲国”么？难道在我们的河北东部领土内已经没有了所谓殷汝耕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么？难道在我们的冀察两省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么？难道在这一时期内，日寇已经放弃了侵略我内蒙领土和组织所谓“蒙古国”（或“大元帝国”）的企图和行动么？难道在这一时期内，日寇已经停止走私活动和放弃干涉我国外交内政的一切企图么？如果这些“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依然成为事实，那么，试问：什么东西可以表现南京政府“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呢？

至于讲到“不签定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的问题，可惜得很，由于亲日派活动的结果，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足以自豪的。退一步说，即作为南京政府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没有签定任何侵害我国领土主权之协定，但这又有什么真实意义呢——谁不晓得，我们的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已经被日寇占领了五年以上，虽然南京政府到现在也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签定正式协定呵！现在已经是国民党应当懂得这样一种浅显真理的时候了，即是当空前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空谈不签定公开承认和“合法”保障日寇在中国的抢得赃物的协定，绝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

第二点的主要意思是：“此次全会对外方针，仍当继承不变，且努力以策其进行。”

南京政府在亲日派影响之下所采取的已定外交方针是什

么呢？就是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实质上就是等于帮助日寇侵略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经给了中国人民以何等危害，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然而国民党三中全会在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分子逼迫之下，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士面前公然宣布对这种亡国灭族的“外交方针，仍当继承不变！”

第三点专门说到中日关系时，更特别使人感觉到亲日派的影响。在讲到现在对日交涉问题时，三中全会宣言竟说：“假使和平之期望犹未完全断绝，吾人固愿确守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原则之下，求其初步之解决……”

当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国五分之一的领土，而且疯狂地准备完全灭亡我国的时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在亲日派逼迫之下，竟发表这类对中日关系的宣言！在中日关系的现在情况之下，所谓“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之原则下，求其初步之解决”，这或者是亲日派的自欺欺人的说法，或者是亲日派承认已被日寇占领的疆域已非中国领土，在这两者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

第四点主要地说到中国对其他各国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三中全会宣言说：“至于其他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

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不仅热烈地拥护国际和平，而且欢迎与一切对中国人民表示好感的国家增进友谊。中国人民在其反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底艰苦历史斗争中，非常需要和宝贵其他人民和国家对我们的同情和赞助。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地努力揭穿亲日派分子使我国孤立的阴谋。许多亲日派分子在“自力更生”、“绝不依靠外力”等等“漂亮”口号之下，实行“中国人民在反日斗争中不需要任何外国人民和国家帮助”的“巧妙”宣传，实际上这些亲日分子所实行的，正是他们的日

本主人所需要的政策，因为日寇恰恰是努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便日寇得以垄断地对中国为所欲为。当然，谁都晓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当由中国人民本身的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力量来实行和完成；但是，既然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和西方（德意法西斯蒂）的世界大战的主要祸首，在其侵略和抢夺别国的罪恶行动中，还相互在外国去找取帮手并且签定了军事联盟，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在其反对主要敌人——日寇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斗争中，不能在那些在这个问题方面今天与中国有共同利益，因而愿意在这种或那种形式和程度内参加这个反对共同仇敌的共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中，去寻求自己的同盟者呢？

由此可以显然看出，亲日派分子所喊的实际上使中国孤立的口号，是根据日寇的所谓“特务机关”的指令而提出的。

此外，在说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时，必须还要指明下列两点：（一）国民党必须明白懂得，即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真正愿意实行对其他国家增进友谊和维持国际和平的政策，但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和南京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是与中国对其他各国增进友谊和维持国际和平的政策不能并容的。（二）只有当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本身真正开始严重的反对外国侵略和保卫本国权利的时候，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友谊和同情才能成为强大的力量。

* * *

三中全会宣言的第二部分所说的是对内政策问题。这一部分实际上说到下列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最重要而且最紧急的问题，即是关于国内和平与国内统一的问题，其中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第三个表面上是说的

所谓“经济建设”问题，实际上除了一些对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无聊攻击和对工农劳苦民众及共产党的造谣诬蔑的词句而外，没有提出任何真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的方法。关于后两个问题，因为篇幅关系，在本文内我不愿多讲；对于这类重要问题，需要专门论文去讨论。不过对于召集国民大会问题，我愿意在此地指出一点，即是：如果国民党不根据民意去根本改变对内对外政策，如果国民党不根据中山先生在宪政时期须“还政于民”的遗教去根本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及宪法草案，使之真适合于民主的精神，那么，今年十一月要开的国民大会，一定象一九三一年已开的所谓国民会议一样，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和国家解决任何根本问题。

关于国内和平与统一问题，具体些说，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关系问题，虽然三中全会宣言开始说：“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但以后不仅将“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两个机体关联的问题，强为分割，而且在说到对“共产党分子”的关系时，更公开说：“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三中全会责成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所谓“先安内”的口号之下继续进行反对抗日人民红军的内战吗？抗日人民红军的战斗力、纪律性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不是已经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公认，而且已经为许多外国政府的机关报所承认吗？！难道三中全会责成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继续摧残中国共产党吗？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事迹，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铁一样的事实吗？共产党的战士，甚至于一部份国民党的最有威信的领袖也不能不认为是“中国青年的精华”吗？！共产党不恰恰是受我们中国人民死敌——日寇所疯狂地痛恨和打击的政党

吗?! 国民党的这种政策不仅为中国整个历史和现实所否决, 而且为全中国一切爱国志士和全世界所有优秀分子所抨击。仅就几十万军队发动的西安事变看来, 难道不已经充分足够地证明南京内亲日派分子继续进行所谓“剿共”内战的企图, 是如何不合实际和如何含有危险吗? 现在谁还不明白, 煽动国民党军队反对红军的内战, 实际上就是等于实行日寇的“以华制华”和“不战而胜”的政策呢? 日本侵略者的这种犯罪性的强盗政策的实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政策绝不象日寇及其走狗所说的一样, 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 日寇这种政策是反对中国全体人民的政策——首先尤其是反对中国人民中的一切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政策, 而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 毫无疑问地国民党恰是中国各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中的最大力量。日寇这种政策的具体运用主要地有下列各点:

(一) 尽力挑动国民党军队反对抗日人民红军的内战, 以便不仅利用国民党及其军队作为摧残中国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和最有战斗力的军队(红军)底工具, 而且同时使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力量消耗和减弱;

(二) 尽力挑拨国民党内各派别以及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各派别之间的冲突, 如果有可能时, 挑动他们相互之间军事行动;

(三) 用威吓利诱的方法取得国民党的一部份政治和军事的人员及军队, 把他们变成在国民党内实行亲日政策的工具, 以便他们不仅能用国民党的名义来实行有利于日寇侵略的政策, 而且这样能使国民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丧失威信;

(四) 设法将老亲日派别中的分子(首先是安福系和政学系中的一部份分子), 安插到国民党的各种行政的军事的以及党的重要机关中去, 以便逐渐用其他派别的亲日分子代替真

正的国民党人物，然后企图达到以这些份子来篡夺国民党的目的。

难道国民党员能够容忍亲日派分子把国民党拖上这种亡国灭党的道路上去吗？

除亲日派分子以外，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和领导者，恐怕未必会同意在实际上实行日寇这种“以华制华”的政策吧！

然而从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专门回答共产党中央提议的决议看来，亲日派分子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确有极大的影响。

三中全会本应当写明对共产党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提议底回答，但他却写成为“根绝赤祸决议案”；三中全会本应当表示同意在抗日救国共同斗争基础上与共产党合作，但他却写成为“共党输诚”。三中全会本应当回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国共合作所产生的中国的民族的光荣，本应当对国民党过去所实行的引起现在中国空前民族危机的分裂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惋惜和实行自我批评，但它却不仅曲解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一切尽人皆知的事实，不仅一笔抹煞了共产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的为国为民的伟大勋劳（最显著的如：五卅运动，省港罢工，成立黄埔军校和培养军官，平定刘杨，收复东江，北伐，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响应北伐军等等事变中的共产党的伟大作用），不仅丝毫不批评国民党过去分裂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和恶果，而且对英勇的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尽量谩骂和造谣诬蔑。三中全会本应当诚恳地承认国民党最近十年来内外政策的错误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但全会却重复了著名亲日政客汪精卫所常说的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耻造谣。当中国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本应当效法共产党的光荣先例，对建立

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表示赞成态度，以证明中国人民都有对内和平统一以便共御外侮的准备，但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却又一次地表明一部份国民党领导者为日寇利益居然反对本国人民力量的团结。

试把这两种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共产党中央提议的答复——比较一下，便立刻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一个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对中国的严重情形表示出正确的了解，对自己的政策充满着高度的原则性，对自己的人民和祖国流露着真诚的热爱，对自己民族的命运感觉到严重的责任，对自己的同盟者——国民党——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和信心，对团结全中国力量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表现着极度的真诚。另一个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共产党提议的答复，这个文件表示出政治的近视，表示出把一小群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私利看成高于一切，而同时却不顾和牺牲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示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感觉到责任，表示出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抱着盲目的仇视，表示出不使中国达到内部和平统一以便实行民族自卫的企图。

然而可以完全坚信的说，无论中国人民，无论中国人民的朋友，无论历史，都不会赞成那种人，那些人惯于对敌寇委曲求全而同时对自己人民的切身利益却漠不关心；而一切好感都将属于这种人，这些人不顾政见不同而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尽力团结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反对外国的敌寇。

国民党三中全会在亲日派份子逼迫之下所通过的文件，不仅使对三中全会抱无限希望的中国人民表示失望，而且在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有极大意义的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不

良的印象。此外，这些文件不仅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紊乱，它们同时甚至引起反对日本军阀侵略冒险政策和同情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日本广大群众的无限的警异！这是非常使人惋惜的事。

有些人说，三中全会文件之所以带有这种性质，只不过是“为的‘对某国外交上的敷衍’”。对的，在中国现在非常复杂环境之下，对于暴敌应当采取灵活的政策。然而第一，绝不能把国家根本政策方针去服从暂时性的外交手腕。第二，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方面说，在国家内部统一方面作下每一个正确的和严重的步骤，要比对侵略者让步和屈服，能发生千百倍的好影响。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莫若日本外交人员最近对我国之言论，由于我国国共及其他团体合作抗日救国之趋向日益开展，于是连日本外相佐藤也不能不开始说出“必须改变广田对华外交政策和承认华方要求在双方平等地位上进行中日谈判为正当”等一套话了。

* * *

然而，虽然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令人感觉到极大的缺陷，但同时必须指出，三中全会在有些方面与国共分裂后所开的国民党的一切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均不相同。在三中全会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面。三中全会工作之好的方面，不仅表现在，不顾亲日派分子的一切阴谋和威胁，上海、北平、东北等各地社会团体所提的对外抗日和对内民主的建议，能达到三中全会的议席；也不仅表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他等军队公开向三中全会建议建立国共及各党各派合作以便共御外侮；同样，三中全会工作之好的方面，也不仅表现在国民党分共后第一次的现象——一部份中山先生的最好信徒和国民党的著名领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鹿

钟麟、石瑛、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经亨颐诸先生公开向全会提议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拥护工农运动的三大政策，而三中全会竟通过了实际上赞成国共合作可能的意见，虽然是说这种合作须有下列四个条件：（一）取消红军；（二）取消苏维埃政府；（三）停止赤化宣传和相信三民主义；（四）停止阶级斗争。

这四个条件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忠诚爱国志士的意见，另一方面有亲日派分子的及中山主义叛徒的意见。在这两种意见之中，显然存在着原则的分别：亲日派分子把前两个条件解释成“肉体上消灭红军”（或至少是所谓“用撤消红军中一切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办法来改组红军”）以及强力摧毁或解散苏维埃一切组织；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志士对这两个条件的了解，却与此完全不同。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仍保存红军原有的军官成份和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加进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即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份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由此可见，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共产党和优秀的国民党党员对这两个条件的了解是唯一正确的了解，是唯一在实际上能做得到的办法。共产党员在政策中的让

步,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超过这一限度,便只是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害。因此,不仅共产党员没有权利作超过这个限度的让步,而且国民党的真正爱国志士也无权向共产党提出超过这种限度的要求。如果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合作四条件中的前两条件的具体内容,象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了解的一样,那么,在基本上,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文件上已经再三地表示过这类意见,而在其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更将这类意见完全明白和清楚地提出了。

关于第三个条件,很明显地,亲日派和中山主义叛徒分子们,一定又要将戴季陶在一九二五年革命时杜撰的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旧“理论”搬出来。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论”早已被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实际生活和历史事实所推翻。这个“理论”根本与中山先生的学说和行动的精神不相容。亲日派分子利用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企图将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第三个条件解释成共产党员须负责放弃其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共产党员和真正中山信徒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却完全与此不同。他们知道,在所谓“赤化宣传”这种笼统词句之下,喜欢造谣生事之徒,可以信口雌黄。谁不知道: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期,帝国主义者和北洋系及安福系军阀,不仅把共产党员,而且把国民党员也都叫作“赤匪”吗?不仅把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把国民党的宣传,也都叫作“赤化宣传”吗?而现在,谁不知道:日本军阀及其走狗们,不仅把共产党员,而且把一切爱国志士都叫作“赤匪”或“赤化分子”呢?不仅把苏维埃运动,而且把东北和全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都叫作“赤化运动”呢?然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员和忠诚的国民党员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清楚明白地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虽然,在共

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共产党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学说的信徒，既是本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一切伟大过去遗产的接受者和继承者，因此，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从未把三民主义看作是国共在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建立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尤其是现在，当民族危机紧迫和大敌当前的千钧一发的关头，相反的，共产党员认为：中山先生的三个主要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今天恰恰便利于国共合作的事业；因为共产党员和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都应当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奋斗。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坚决记得自己伟大领袖的指示：“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和民生主义相冲突，相反的，共产主义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他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坚决记得他们的伟大领袖在其为中国自由平等而致力国民革命的四十年中，经常地与各党各派联合去进行反对共同仇敌的斗争，尤其特别重视和宝贵与共产党的合作。

最后，至于讲到阶级斗争问题，大家都晓得，并不是共产党“产生出”阶级斗争，相反的，而是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产生出”共产党。但是，三中全会提出这个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条件，以及在宣言上尽量反对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地有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企图诬指共产党人“于民族之间煽动阶级斗争，对外则适足以冲消民族整个之力量，而陷国家于灭亡，对内则适足以引起各生产分子间之混战，阻止生产建设之进展”（见三中全会宣言），或者“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见所谓《根绝赤祸决议案》）。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的如此说法，其目的就是企图将中国内部不能和平与统一以致不能团

结全力共御外侮的罪过，诿之于共产党身上；然而，这种企图未必能得到什么效果吧！谁不知道，恰是共产党员在空前民族危机关头最先高举起号召全民团结共御外侮的旗帜呢？谁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恰就是团结中国社会中一切阶层的力量去反对共同的外敌呢？谁不知道，当九一八事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以武装人民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呢？谁不知道，当一二八上海防卫战争时，中国共产党曾尽力赞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呢？谁不知道，还在一九三三年春季，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便提议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以便一致抗日呢？谁不知道，最近几年来，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不仅再三宣布，而且实际上实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而只有在被攻击时才实行自卫行动呢？谁不知道，在东北，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等的努力之下，才成立了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抗日联军的各军队伍呢？最后，谁不知道，正是为的团结和加强中国民族力量起见，中国共产党才最先和最坚决地起来要求停止一切内争，才公开地宣布停止反对国民党政权底武装斗争呢？谁不知道，正是为的便利于今天团结一切力量实行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才自动地宣布了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呢？

说中国共产党员故意把中国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以致“对外……冲消民族整个之力量”，“对内……引起各生产分子间之混战”，或者说共产党员对中国内部不能和平统一，以致不能团结国力共御外侮一层应负责任等等，这都是完全不正确和无根据的。

因此，三中全会所提的四个条件——如果正确地了解它们的话——并不能成为国共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

各外国报纸传来的消息说，国共两党在三中全会所提条件及共产党中央所提建议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大概是合乎事实的。然而无论如何，国共及各党派在对外抵御日寇侵略和对内实行民主改革及改善人民生活共同纲领上建立合作的事业，必能不顾一切障碍而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日益向前推进。中国正处在历史转变的关头！

南京政府恢复反对抗日人民红军的军事行动的危险，是否完全已经过去了呢？中国的情形是否已经完全确定有利于很快地建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可惜得很，暂时还没有！亲日派分子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内的影响还很强，国民党内的情形，由于亲日与抗日倾向严重斗争，也还极矛盾。这不仅可以从三中全会的文件中看出来，而且可以从三中全会后南京政府的实际行动中看出来。撤销张群等外交部的职位而代之以王宠惠，严重抗议意大利法西斯匪徒对上海中国的大戏院的强盗行为，特别是实际上停止了南京军队在陕北和甘东反对红军主力的军事行动，继续与共产党代表进行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所有这一切事实，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足以说明国民党政策向好的方面的转向。但是，同时，不仅不执行原来从甘陕撤退中央军的成议，而且将四十师以上的南京军在西北一切战略要地集中；马步芳军队继续对甘陕红军部队实行凶残的进攻和南京政府不采取严重有效办法去制止马步芳的军事行动；不仅不执行允许东北军仍驻陕甘原防的成议，而且将他们调赴豫皖一带去实行所谓“改编”或“训练”；直到现在还不仅未恢复张学良的军政要职，而且未恢复张学良的真正身体自由；反日民族英雄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烈拥护者和倡导者——王以哲将军及其同事等，在西安被奸细挑拨阴谋所杀害；直到现在，全国救国联合会七领袖仍

羈押狱中，全国政治犯仍不愿释放；最后，特别重要的是，有意拖延与共产党谈判的时间，并且向红军和共产党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条件——所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亲日派分子仍顽强地推动国民党实行违反民意的政策。

在今天，用一切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反日政治军事力量反对亲日派分子的阴谋和挑衅底斗争，是每个中国人的光荣义务和天然责任。

为的完全解除亲日派分子的武装和使之不能为害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必须揭穿这些分子从日寇的“思想武库”中所搬运来的反对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谬说。

亲日派分子装腔作势地说：“我们赞成的是民族阵线，我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提出的人民阵线的口号。”大家都晓得，亲日派分子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清楚明白提出的，正是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与人民战线有分别：人民战线主要地是劳动者的阵线，它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不仅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分要广泛得多，而且它的锋芒是用去反对外国的敌寇及其走狗。亲日派分子用一般的民族阵线的空谈，来代替在实际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关于这一点，最明显莫过于他们到处空谈民族阵线的词句，而实际上却从不说为什么和反对什么人要建立民族阵线。

亲日派份子武断地说：“共产党的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只是推翻国民党和政府的烟幕弹。”很明显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捏造的。谁不知道，共产党不仅在其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公开宣布“停止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很久以前，在许多文件和行动中，中国共产党均说明和证实其这种思想了。举两个最重要的文件为例来说：在一九三五

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中国共产党便明白地表示出各党派应该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主要思想。此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体党员信上，中国共产党更加清楚明白地证实和向前发挥了国共应该抛弃前嫌以便合作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共同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在八月二十五日信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具体地说明了各党派各军队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口号的内容和意义，不仅诚恳地要求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仅公开地宣布赞成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以及赞成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中国的国会，而且宣布了准备使中国苏维埃区域成为民主共和国的组成部份，从苏区选派代表参加全中国国会的工作，并在苏区内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等等。从中国政治情形的观点看来，中共八一宣言和八月二十五日的信所说问题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其主要意义是：

第一，如果以前问题是这样：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但现在这个问题却应当另外提法：不是国共两党斗争，而是国共及其他组织合作去进行反对日寇的共同斗争；

第二，如果以前问题是这样：或者红军，或者南京军；现在这个问题却应当另外提法：不是红军与其他中国军队之间的内战，而是组织包括红军及中国一切军队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去进行反对日寇的武装斗争；

第三，如果以前问题是这样：或者国民党政权，或者苏维埃政权；现在这个问题却应当另外提法：不是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战斗，而是在民主共和国基础上将中国各种

形式的现存政权合拼起来成立全中国的统一政府，以便统一国力和加强国防。

中国的工人、农民及一切进步的革命分子们，既由其先锋队——共产党作代表，已经公开宣布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在现在阶段上准备放弃为中国苏维埃化的斗争，那么中国的有产阶级现在也就应当将其个别的利益服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应当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做出相当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西安事变的立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都不过是中共对其新政策的逐步具体化和彻底实行而已。中共新政策便是在国共及其他组织的政治军事合作基础上建立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同意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改苏维埃为一般的民主机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对中国的实际情形估计而作的，即是中国共产党看清了日本军阀及其走狗在中国的活动日益积极化和中国有完全被日寇殖民地化的这种事实，因而坚决适当地改变自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清楚知道，如果它也象国民党一样，坚持着不肯先对自己的同盟者做必要的事实上的让步，那么，国共为中国民族独立而建立合作是终于不可能的。不管亲日派分子任何阴谋诡计，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具体办法，以便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加速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军队。中共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具体办法，同时必不可免地也要影响到国民党逐渐转向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

由此可见，亲日派分子所谓共产党利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作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烟幕的胡说，简直与国民党中有些人把共产党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说成“共产党向

国民党输诚”或者“根绝赤化”等一样的无稽。

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实质，是国共及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协定而同时保存一切参加党派和组织的完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国民党中的这部份人是否已经到应该懂得的时候了？国共在反日共同斗争中的合作，不仅不应当有一个党压迫另一个党或者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投降的事实，而且应当有双方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国民党中的这部份人是否已经到应该明白的时候了？现在是否已经到国民党的正式刊物和通信社等应当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诬蔑谩骂的时候了？这种时候，老早已经到了！

亲日派分子武断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不过是共产党一时的手腕，在这种合作建立以后，或者更具体些说，在反日斗争的终结甚至过程中，共产党员一定很快掉转枪头去反对国民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员对于这种说法的回答是：第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般地讲来，绝不是一件很容易和短时间的东西；第二，中国共产党员不仅希望与国民党在反日斗争的期间合作，而且准备着与一切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起，为伟大中国人民的完全独立的、自由的和幸福的将来而奋斗。

有些人无耻造谣说：“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是为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为的苏联的利益。”这简直是胡说！日寇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四省，侵入了我们的冀察和绥远，准备着并吞全中国，时常都是放的一种烟幕弹，即将他们的所谓对华行动都说成是“为的准备进攻苏联”，而“不是对华侵略”。而卖国贼和民族叛徒们却恰巧无耻地在“不为苏联利益”的借口之下来反对建立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讲这种话的人，外表上虽然是中国人的面孔，而骨子里是日寇的忠

实走狗。说这种话的人，正如已故的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先生所说的最下作无耻的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样，其行为“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中国共产党员执行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为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的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国人民幸福的利益。至于讲到苏联，大家都晓得，它有足够的自卫力量，它能打退任何外国的任何进攻，它能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进犯。然而退一步讲，即作为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同时也合于苏联的利益，这又有甚么坏处呢？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又有什么本可赔呢？如果说这一点只是与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解放的斗争有利，岂不更正确些吗？应当懂得，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即是反对世界大战的祸首，反对意德法西斯的同盟军，反对殖民地民众的刽子手和反对日本人民的死敌底斗争；因此，它不仅同时合乎日本、高丽、台湾等人民的利益，也不仅同时合乎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同时是一切中国人民之友的事业，是全体先进人类的事业。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亲日派政客们用尽任何“思想上”的和实际上的武器都无济于事的。不仅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而且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一定日益积极地起来赞成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局势应当推动国民党中一切有远见的和有威望的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活动家们——连蒋介石先生在内，快些与那些使中国走上自杀道路的亲日派分子绝缘。

中国的前途应当如此。因为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人民的唯一办法和关键。

载巴黎《救国时报》第94期
署名：陈绍禹（王明）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 争取抗战胜利呢？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

I 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

(1) 中国人民力量的团结和统一。

(2) 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点和弱点。

(3) 国际无产阶级及主要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一) 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战后中国形势中的三个新优点：

A. 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的开始：

一、国民政府转到抗日的政策，因此，它已在开始执行中国国防政府的任务。

二、国民政府的法令已开始在全国各地有效，因此，它已开始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政府。

三、国民政府还未能成为能担当胜利抗战任务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因为：

甲、它的成分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亲日派分子；

乙、它还只是国民党一党的政权，而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

丙、它还未能实行保障抗战胜利的对内政策。

但是，自从苏区改为民主区而公开宣布服从南京后，地方政权开始取消与中央对立现象，而形成统一国家政权的规模，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这件事实，对于开始抗战，和继续抗战，以及争取抗战胜利，有极重大的关系。

B.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的开始建立：

- 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二、各省地方军队对南京中央军态度的转变。
- 三、国防会议的召集及各省出兵抗战的事变。
- 四、统一指挥部的开始建立。

虽然还没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严重的意义。

C.政治制度的开始民主化和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的日益增长：

- 一、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公开和半公开地位之取得。
- 二、政治犯的开始释放。
- 三、救国言论机关及救国团体之逐渐合法化。
- 四、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之日益增长。
- 五、边区在推进全国民主化运动中之作用。

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充分民主自由及救国运动日益增长，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

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战争中的强点和弱点:

A. 强点:

- 一、军事技术较我优越;
- 二、海陆空的直接邻近;
- 三、海陆空根据地的事先准备;
- 四、汉奸及亲日派的长期培养。

B. 弱点:

- 一、财政的困难;
- 二、原料的缺乏;
- 三、国内矛盾之增长:

甲、民众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之增长。

乙、法西斯军阀与和缓资产阶级间的冲突。

- 四、后方的不巩固——日本、满洲、台湾、高丽等;
- 五、战线延长与兵力分散和消耗之危险。

但是,强点在战争长期性条件下将逐渐减少其效能,而弱点却随着战争之延长而逐渐增强。

(三)国际无产阶级和主要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A. 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同情运动之迅速增长:

- 一、共产党及民主制度下之群众——对西班牙及对中国;
- 二、英工党及其工会;
- 三、法工会;
- 四、美工会;
- 五、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之态度;

} 对中、对西同情程度之比较。

B. 主要国家对中日战争之态度：

- 一、苏联；
- 二、法国；
- 三、英国；
- 四、美国；
- 五、德国；
- 六、意大利。

三个因素中之最重要者为第一个因素，而三个因素基本上均有利于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II 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一)四个月抗战的事实证明了日寇“以华制华，不战而胜”的政策是失败了，中国无力抗日的不抵抗主义者的理论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及其各党派能够为抗日救国而团结，中国军队能够为民族生存而英勇牺牲奋斗，而八路军的胜利，尤其证明中国军队能够战胜武装优越的敌人；但同时

(二)四个月抗战的过程也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这些弱点说明了依靠现有政治机构，现有武装力量和继续实行国民政府现有对内政策，是不能战胜日寇的。

(三)北方及上海战线上部分军事失利和领土损失的重要原因是：

- A. 军事技术的薄弱；
- B. 一部分将领的叛变与动摇(芦沟桥后的议和与坐失戎机，平津、南口、张家口、大同等例子)；
- C. 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北方战线的疏忽，上海战线的

偏重，正规战的过大损失；

D. 武力未与人民结合和人民力量的动员不够；

E. 统一战线刚才开始建立(国共两方及地方与中央相互态度的批评)，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还未真正形成。

(四)目前之危机——一部分军事失利，主和、即主降派势力抬头，日寇以华制华的政策之加紧，德意日争华加入反共同盟企图之加紧，英国之动摇及其主和企图等。

Ⅲ 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决定一切的条件

A. 怎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

一、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如何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呢？

甲、在党内外正确说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因、意义、内容和前途：

(1)原因——反对共同敌人，争取民族生存。

(2)意义——国共为中国两大政党，不合作便无以救亡。

(3)内容——(a)两党的合作，(b)建立统一抗日民主的政权，(c)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d)保证全体人民总动员，争取抗战胜利。

(4)胜利共同建立新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但还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

乙、在党内外正确说明统一战线之实质和内容：

(1)一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政治团体。

(2)划分友敌之主要标准(抗日与不抗日),为共同纲领和共同目的而奋斗。

(3)共同纲领外,各有不同的主张,各有不同的组织,因此摩擦可能在总目标下减弱而不会消灭,可以因力量的不同而在民主原则下解决谁占优势的问题,但不应有谁投降谁或谁推翻谁的企图。

(4)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5)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西班牙、德国经验,满洲经验)。

丙、在党内外正确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间之相互关系:

(1)三民主义主要口号之正确解释;

(2)首先为民族独立而共同奋斗;

(3)共产主义者与真正三民主义者之向前合作;

(4)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

丁、对国民党中派别的正确认识及我们对蒋及其黄埔系之关系:

(1)分成左中右三派,这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西班牙例与中国实例);

(2)黄埔系及国民党中之进步青年应为主要合作之对象;

(3)对复兴社与CC“关系问题”;

(4)对阎及其军队之正确关系。

戊、使党内外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问题,有清楚的认识:

(1)共同建立新中国;

(2)握紧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

(3)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关系。

二、如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甲、巩固地方政府与军队对国民党及共产党之合作。

乙、设法吸收各种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的组织。

丙、组织广大尚无组织的群众——在原则上应该是以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口号和组织方式。例如：

在工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有组织的地方赤色会员加入，无组织的地方采取合法方式组织，一切组织采取合法方式工作；

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合作社、农协、农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均可）；

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少共、民先、学生会、青年会、体育团体等）。

(二)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具体办法：

A. 逐渐从政府中淘汰亲日派分子。

B. 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

C. 陕甘宁边区正确作用之了解（（1）中华民国的组织部分和地方政府，（2）民主化的发动机和模范，（3）八路军和全国军队抗日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及边区问题之必须迅速解决。

D. 八路军新占领区域的正确处置（行政制度及政策均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发点）。

E. 议会式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正确了解：

一、为什么现阶段上取消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目的及原因；

二、民主共和国的国内和国际意义；

三、民主共和国的实质和形式；

四、边区之选举问题及制度的问题；

五、民主共和国口号主要为求同而非立异。

(三)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
具体办法：

A. 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改造现有的各种军队。

B. 逐渐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

C. 公开说明军阀与军人问题之相互关系。

D. 扩大国防军的数量。

E. 扩大和改变军队的武装。

F. 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
统一作战计划。

G. 八路军问题：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组织部分。
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甲、八路军内共产党员骨干及
政治工作制度和革命传统之坚持；乙、如何扩大八路军；丙、如
何巩固八路军；丁、八路军对中央及地方军之关系；戊、八路军
之模范作用。

(四)动员和武装人民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

A. 利用一切合法可能及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群众。

B. 如何达到军民一致？一方面靠军队；另一方面也靠人
民；共产党是先锋和桥梁。

C. 如何达到武装人民？甲、夺取敌人武器；乙、利用合法
方式；丙、要求和取得方式。

D. 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甲、可能改善的必要；乙、服从抗
战的必需；丙、共产党的领导者的作用。

(五)建立军事工业

A. 设立军事工业部问题。

- B. 将现有军事工业集中与分散问题。
- C. 建立飞机与坦克厂问题。
- D. 整理和增加兵工厂生产问题(枪炮子弹生产问题)。
- E. 建立八路军军事工业问题。
- F. 培养军事工业干部问题。

(六)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强国际援助

A. 国际同情之增长与国际宣传之薄弱。

B. 加强国际宣传之具体办法：

- 一、与国民党共同议定计划；
- 二、各党派及各界团体共同派代表团赴欧美宣传；
- 三、摄制抗战电影；
- 四、摄制照片及画册；
- 五、出版外国文小册杂志及书籍等。

C. 国际宣传之内容和目的：

内容：一、日寇之侵战和兽行；二、中国人民之自卫与正义战；三、中国斗争与世界和平的关系。

目的：一、取得无产阶级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同情；二、达到不卖给日本军火原料和抵制日货的目的；三、达到中国政府有购买军火原料及运输军火原料入口自由的目的；四、取得其他物质的援助。

D. 苏联之对外政策及援助问题：

- 一、苏联和平政策之实质及其对战争问题之根本态度。
- 二、苏联与援助其他国家革命问题。
- 三、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四、资本主义包围与苏联外交政策。
- 五、国内外“谁战胜谁”问题的意义和现势。

六、目前国际形势与所谓“出兵”问题。

七、现势中苏联对外政策之特点。

E. 对内政策及对外政策之相互关系：

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对外(英、美、法)问题中之作用；

二、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相互联系(西班牙的例子)；

三、如何能达到对内动员人民和对外使日孤立的目的？

——苏维埃与民主，民运与抗战，国共合作与政策问题等。

最后，中国国内团结与坚决抗战，是取得外援的最重要的和决定意义的条件。

(七)如何使共产党成为全中国范围内的政党？

A. 巩固和增强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导机关和人物的威信。

B. 建立各区域的独立工作的领导机关和党的组织，建立全国交通网。

C. 发行日报及统一宣传。

D. 征收党员和增强工人成份，改变工作方法 with 组织方式。

E. 加强党内马列教育。

F. 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培养大批新干部，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及专门干部，实行建立全中国青年救国联合的工作，加强党在青年工作中的责任，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

G. 加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准备召集六中全会和七代大会。

(八)提高革命警觉性和加紧反奸细反托派的工作。

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署名：王 明

挽救时局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十二月二十五日对时局宣言)郑重地向全国同胞指出：“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国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及初期战线上的部份军事的胜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目前最大难关，既不在于兵力不济、武装不足和财政困难，亦不在于日寇的前进深入，而在于敌寇于暴力之外，又加紧‘以华制华’的企图，在于汉奸敌探托匪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底阴谋，尤其在于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也说：“外敌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由此可见，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同时，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策，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怎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首先须更加巩固和扩大我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大家都晓得：国民党已经实行了联共抗日的政策，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苏区已改为中华民国的边区，因此，国共合作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但同时，大家也晓得：由于历史的和其它的

种种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直到现在，还未达到中国现时环境和两党主观愿望所要求的应有程度。因此，当目前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困难关头，怎样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团结，已经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同志所日夕关切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每个关心国事同胞和每个中国友人所深切系念的问题。

怎样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呢？一方面，须要将有关两党合作的各种基本问题解释得清楚明白；另一方面，须要采取许多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具体办法。应当毫不隐讳地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虽然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和大多数党员都有了两党合作必要的组织和决心，虽然国共两党合作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但是，在两党方面的确都还有少数人不清楚了解两党合作的许多基本问题。

这些人不清楚了解的有哪些主要问题呢？

第一，他们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目的——他们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不仅由于十年来的沉痛经验和教训证明，国共两党的合作，能使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境地，国共两党的分裂，造成十年来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而且首先由于在国共两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扑来了穷凶极恶的公敌——日本法西斯军阀；因此，他们有时忽略了甚至忘记了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共同战胜民族公敌的日寇，以争取和保障中华民族之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们有时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于是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于是忽略了“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的简单真理，于是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因为有时把其它问题与抗日问题并列或对立，以致模糊了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把抗日问题看得比其它问

题为次要，以致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或裂痕。

第二，他们不清楚了解对统一战线中的友党应有的态度和方针——他们不清楚了解，统一战线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政治团体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为反对共同敌人和达到共同目的而共同自愿的团结，他们不清楚了解，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友党友军力量的削弱，即等于自身力量的削弱，即等于敌寇力量的助长，即是“仇者快”和“亲者痛”的事情；他们不清楚了解，在统一战线营垒中有时某些磨擦虽难于完全避免，但双方应设法减弱磨擦以增进共同抗敌的效能，而不应该去挑动和扩大不必要的磨擦；因此，他们不清楚了解，对同盟者应有的态度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或者一方面投降另一方面，而是双方面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因此，他们不清楚了解，对同盟者应有的方针不是互争雄长、互相倾轧和互相捣乱，而是双方面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和共同胜利；因此，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拿来对付自己的朋友，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下了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利于敌寇的事情。

第三，他们不清楚了解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他们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具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认识不清楚，他们对于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还模糊，因此他们看不清楚中国最近历史时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们时常容易听信日寇和汉奸有意散布的各种谣言，因此，甚至那种最无根据的所谓“抗战失败了是日本人天下，抗战胜利了是共产党组织苏维埃的天下”这类挑拨离间之词，对他们还能发生若干的影响。我记得，还在今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便有过这种类似的谣言，那时便有人

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不过是一时的手腕；在这种合作建立以后，或者更具体些说，在反日斗争的终结甚至过程中，共产党员一定很快掉转枪头去反对国民党。”当时我们对这种说法便曾公开地回答说：“第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为中国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般地讲来，绝不是一件很容易和短时间的东西；第二，中国共产党员不仅希望与国民党在反日斗争的期间合作，而且准备着与一切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起，为伟大中国人民的完全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将来而奋斗。”（见拙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现在，为的使这个问题有更清楚明白的了解起见，我认为必须更明白地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现在阶段上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阶段上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并将苏区改为中华民国的边区这件事，既不是仅仅将苏维埃改变一下名称，也不是玩弄一下什么暂时的手腕，而是真正地有一定革命斗争阶段上改变了自己的革命战略方针，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更，根据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团结全中国一切民族力量去实现抗日救国的任务，自动地由原来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转变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所提的这一民主共和国的性质，虽不能不有别于过去历史时期中由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所形成的欧美某些国家的旧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它还绝不是苏维埃式的或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它将是而且一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过程中产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切参加对日抗战到底的各种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

的人，至少是对于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的政策的实质不曾真正了解。第二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实际情形。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当然，同样，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将是更加为中国人民所爱戴和拥护的重要政党之一，谁也不能违反民意而进行打倒共产党的行动。那时候，很明显地，国共两党将因患难相共、艰苦共尝而更加亲密携手地进行共同建国的工作。如果不幸而抗战失败，国共两党将为反对共同死敌而更加互助之不暇，更那里谈得上谁打倒谁呢？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这显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

由此可见，明白地解释有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各种基本问题，首先是使大家明白了解：今天合作的主要原因，为民族大敌当前，今天合作的主要目的，为共同抗日；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前途，应当是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都是现在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为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现在须要采取那些主要具体办法呢？

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织的经常协商和计

议各种问题的组织；

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和民运问题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加强和充实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对日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只有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才能真正更加巩固和扩大团结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同时必须清楚明白地承认：国共合作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中心，但决还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在国共两党之外，一方面，中国还存在有若干已经有组织的党派和团体；另一方面，还有极广大的尚无组织但必须组织的各阶层的民众。因此，国共两党必须共同努力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即是将国共两党以外的一切抗日党派团体和广大民众吸收和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怎样才能为国共合作基础上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呢？同样是，一方面，必须清楚明白地说明与此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必须采取许多有效的具体办法。

有哪几个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主要问题必须说明呢？

第一，必须承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还有其它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存在——不错，国共两党是中国力量最大和群众最多的政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同时，从严格意义上说，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的确没有其它的群众性的政党；但是，必须承认：国共两党今天还未能包括中国社会中的一切抗日力量，在国共两党之外，因中国社会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存在有相当数量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都还未形成

群众性的政党组织，但他们当中有许多已经形成为相当的政治派别，为着团结全民族力量去进行抗日救国的事业，国共两党应该共同设法吸收他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

第二，必须打破三人称派五人结党，甚至把汉奸敌探（例如日寇特务机关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等）也当作党派看待的错误倾向——必须明白认识：团结各党各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的最首先最主要的意义和内容，一定是团结真正抗日的各党各派，汉奸敌探如托匪之流，不仅不在统一战线对象之列，而且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和必须反对的对象；此外，能以某个党派名义和资格去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或会员，以及相当可观的群众政治影响，否则五个人也有自命为一个党，三个人也造成一个派，结果不仅不能真正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团结，而且恰恰足以增加抗日力量团结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必须除党派之外，努力将各界群众团体算入抗日统一战线力量之内——指明工农军学商各界群众团体，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参加者和组成员；只有将各种群众团体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一方面，才能真正扩大和强固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政党、军队和政府与广大民众的亲密关系。

第四，必须解除抗日力量内部的各种不恰当的有害的误会——首先必须解除一部分人士对于救国会或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们的误会；例如，有一部分人硬要把救国会的抗日爱国志士们叫作“人民战线派，”另一部分人硬要把国民党中某部分参加抗战的朋友们叫作“法西斯蒂派”，大家应该说句公道话：中国既没有什么人民战线派，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我所以说中国没有人民阵线派，这不仅由于救国会的朋友们再三恳

切申明过,他们的主张绝不是什么人民阵线,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抗日救国阵线;而且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证明了: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绝没有反对内部敌人的人民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地与人民战线有分别:人民战线主要地是劳动者的阵线,它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不仅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份要广泛得多,而且它的锋芒是用去反对外国的敌寇及其走狗的。我所以说国民党内部某部分朋友们不是法西斯蒂派,也不仅是由于这些朋友们再三坦白说明过,他们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他们相信的依然是中国国民党;而且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证明说: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法西斯民族侵略的理论和组织,绝不应有赞助法西斯民族压迫的言论和团体;中国优秀青年今天只能追求和信仰推动社会进化的思想和组织,绝不应堕入和误信反社会进化的主义和团体;国民党员应当是忠实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学生,绝不能成为背叛总理背叛三民主义的反动的希特勒幕梭里尼的信徒。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三民主义的根本主张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实质恰为民族侵略、摧残民权和戕杀民生。因此,谁也不能相信:任何优秀的国民党员愿从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走卒。我们相信,救国会的朋友们和国民党内的某部分青年们,都是中国社会中的抗日救国一部分力量;因此,我们诚恳希望他们相互打击奸人的各种挑拨离间,手携手地共同奔赴抗日救国的战线。

由此可见,明白地说明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各种主要问题,首先是承认国共以外有其它抗日党派的存在和有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必要;其次,认清

汉奸敌探不但不在联合团结之列，而且为统一战线反对之对象；承认吸收已有组织之群众和组织还无组织之群众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解除一部分人误认救国会为“人民阵线派”或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为“法西斯蒂派”的误解：这都是现在在国共合作基础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

为的在国共两党基础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须要采取那些主要办法呢？

第一，须将国共两党以外其它一切真正抗日救国的党派，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

第二，须使现存的各种工农军学商群众组织，有权利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增大抗日救国的力量；

第三，须将还无组织的广大各界民众，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组织起来，使他们能成为有组织的抗战生力军。

只有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全中国民族力量的精诚团结；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有组织的力量，才是世界上任何势力不能征服的力量，才是能够最终战胜日寇、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保障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必须记住和认清：中国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坚强团结，不仅是克服我国目前抗战内部严重困难的唯一基础，而且是增强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给予深刻同情和有效援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不仅是挽救目前危难时局的中心关键，而且是实现“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主张的基本保证。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四时半汉口

载《群众》第1卷第4期

署名：陈绍禹（王明）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武汉大学讲演

(一九三八年一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恶意的人，就是善意的也都怀疑。不了解的人以为用不着，怀疑的人以为各种政治力量难得彻底联合，怕不能统一起来。统一战线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功，然而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的人在耽心着它的破裂，怀疑着它是否就是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好的武器，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它的客观现实性在那里？

一、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客观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威胁到中国整个民族的生存。拿已亡省六年的东北同胞来说，在那里的工人，已经大部分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牛马，过的生活已经不是人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减低到不能再低，而且受到种种的压迫。那里的农民不能在自己

* 本文最早以《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题，刊载于武汉《战时青年》第2期。

的土地上自由地耕种,什么都受限制,粮食储藏只准够自己一家大小吃,多了恐怕他们给义勇军吃,农民子弟有去当义勇军的,全家就被屠杀。兵士呢,军官都是日本人,日本兵可以叫一个中国连长替他背包袱,所以中国士兵常常把日本小兵看作比自己高三级,他们的生杀之权全操在日本兵手里,稍有一点不满就要被枪杀。学生更不必说,他已经在受着奴隶的教育,再看不见中国自己的课本,他们要是翻看中国地图被发现了,便认为有反日罪,遭拘捕以至秘密枪杀。在哈尔滨和大连等地,商人所受的痛苦也不下于其他阶级的人,商店的职员领不到薪金,商店要被强迫向指定的日本商店买货,得不到现金,却不能不替日本商店推销物资。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失去的土地上,不论是工农兵学商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不只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也同样地遭受屠杀,因此不论党派,不论阶级,都感到一个共同利害,遇到一个共同敌人,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们就不能不联合起来共同地行动。

其次中国的国力一向是分散的。首先政权就不统一,有中央政府,又有所谓地方政府,还有苏维埃政府。军队也是不统一的。接连不断的内战,使得财政非常之贫弱,而且财政税收也是不统一的。以这样一个分散的力量当然无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不统一的,统一起来,把分散的,集中起来。

第三,有组织才有力量,有组织,力量才伟大。一般人以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决不怕侵略,决不能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看法只有一半的真理。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抵抗外力侵略重要的条件,但如果没有组织没有团结,还是不能发挥伟大的力量。印度的人口有一万万多,比英帝国本部的人口多几倍,然而仍做了英帝国的奴隶,为什么,就因为印度人

彼此之间没有团结。目前我们怎样才能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运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里就号召全国人民参加统一战线，要求全国各党派捐弃成见建立共同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军队。当时有不少的人怀疑，以为不可能。有的人以为共产党不会有诚意来和其它党派合作，有的人以为国民党不会抗日，所谓以国共合作为基干的统一联合战线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党却看出了这种可能，我们相信，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以及他所领导的青年干部是能抗日的，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和军队是能抗日的，我们更相信在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进攻之下，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携手的可能。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这种看法是对的，只是还有一部分人不了解，他们说：“民族统一战线是好的，不过你们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怕不会同时是民族主义者吧？”在他们看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好象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其实不然。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他决然反对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所以日本的共产党反对日本民族压迫中国，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民族反抗日本的压迫，道理是很明白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各个民族有独立自由的发展，而不侵犯别个民族的发展。又有人说你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是不能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所以尽管你们在口头上谈合作，在行动上怕不能，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就曾经指出过，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可以和该国内的无产者合作的。目前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下，不但有合作的可能，而且有合作的必要。

二、怎样建立？

第一，我们所要求的统一战线必须要有两个不同政党以上的合作。现时中国最大的政党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都有革命的传统，有历史，有主义，有政权，有武力。因此我们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要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的经济力量最雄厚，军事力量也最强大，然而单是靠国民党一党来抗日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单靠共产党也同样的不能。所以两党必须合作起来，有了两个最大政党的合作，其它党派的参加就不成问题了。今天的合作是为了抗日，为了抗日的胜利，要抗日胜利必须有共同的抗日军队，统一的国防政府。有些人说共产党现时对蒋先生很好，这是真的。我们拥护蒋先生，不是为他个人，而是因为他代表了国民党最大的力量，他坚决抗日，他领导站在抗日前线的青年军事干部。

第二，必须有一个各党各派一致为其实现而奋斗的抗日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必须以抗日第一为最高原则，必须是全国人民努力的信条。目前我们把民族问题提高，对外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对内民权和民生不是主要问题，而是附属于抗日的问题的。托派匪党是反对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纲领的，在今天对外的民族问题上，都尽了汉奸的作用。他们不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因此，今天同情援助我们的英美等国家也就在被打倒之列。我们必须严重地指出这种理论孤立了中国的抗日，实际是替敌人说话。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

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最初联军拿统一战线来号召各种不同的抗日部队，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抗日救国，二是民主自由，三是武装民众。三个条件好是好的，可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山林队和其它部队不能执行，结果统一战线不但不能建立，反而互相残杀，我说你不抗日，你说我假抗日，弄得自己之间的仇恨更深，纠纷愈多，只是便利了敌人。经过许多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后来他们只提出抗日为唯一的条件，这么一来，义勇军也好，山林队也好，都联合起来了。然而在起初，山林队的参加联合还是暂时的，他们提出“合一不合二”的条件，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可以大家合力打日本鬼子，下次合不合，却不一定；再一个是“合伙不合财”，意思是合力打日本鬼子，可是打了以后，所得的财物却要归山林队独享。我们能不能因为山林队这样，就把他们撇开不和他们联合抗日呢？不能的。如果他们愿意“合”一次，“合”了再说，第一次“合”得好，决不愁第二次，这样三次四次，山林队在行动中了解了联合的必要，于是继续“合”下去，而且连“财”也“合”起来了。联军和老百姓的关系是很好的，山林队参加联军之后，也慢慢把过去对老百姓的坏处改正过来。结果“民主自由”有了，“武装民众”也有了。这个事实给我们说明了统一战线的唯一条件只是抗日。抗日的就是友，不抗日的就是敌，其它问题在抗日中慢慢解决，民生民权问题不是不谈，而是在抗日的总题目下谈，不能妨碍统一战线。中共对国民党应当这样，国民党对中共也应当这样。在这个原则下建立我们抗日的共同纲领，才能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里面来。

三、用什么方法？

第一，停止内战。过去国共两党十年的内争主要为的是土地革命。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地主土豪的土地，平均分配，国民党反对这个政策。要和平统一停止内战，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政策，改变与国民党的敌对行为，必待改变了之后，才能进一步地谈合作。

第二，必须建立统一的政府。过去的中国，谁都知道有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又有苏维埃政府，建立统一的政府，就必须取消两个当中的一个。取消那一个呢，如果国民党要我们取消苏维埃政府，我们能不能回答说：“我们现在要建立统一的政府，把你们的中央政府取消了吧”？不能这样的。如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政府永远也建立不起来。必须了解抗日的政治经济中心力量在国民党，假使我们要求取消中央政府，便无异是否认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抗日力量。因此，还是取消我们的苏维埃，一方面为了建立统一的政府，一方面也因为苏维埃这种政权形式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民所了解，所习惯。由我们取消苏维埃开始，其它的地方政府也就自动地改变了过去对中央政府的对立态度，统一的政府才有可能走到实现。

第三，必须建立统一的军队。为实现这一点，同样地我们愿意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为其它军队的模范。我们既然改编，其它军队也就都没有问题。现在各方面的军队都在抗日之下统一了起来。

第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族组织。我们早就提出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以及抽派壮丁等办法，

到现在，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做出了相反的结果。从各地方看到的，有力的往往没有真正出力，有钱的往往反而赚了钱。抽的壮丁因为方式的不合理，是拉夫子拉得来的，还没有上前线就要开小差。为甚么会这样的呢？就是因为群众没有被组织起来，没有通过广大的群众运动来作。动员民众不是一句空话，把统一战线运用到民众运动中去，更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我们要建立广泛的统一的民族组织，必须开展不分党派的，只问抗日不抗日不问思想信仰的群众工作。

在这里附带的要提到两个问题。有些朋友常常问我们：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年，现在谈合作是不是投降呢？有些不了解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党员的确是这种看法。而在我们党里面，也有一些党员认为是国民党投降了我们。这都是不对的。今天决不是谁投降谁，而是为了消灭一个共同的敌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两党不能不由敌对变为友好，固然磨擦是免不了的，但必须减到最小。今天凡参加统一战线的，都必须互相尊重，彼此扶助，共同发展，不应相互谩骂，相互磨擦，否则，在客观上便是帮助了敌人。今天国民党的军队有了损失，不只是国民党的损失，也是共产党的损失，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因为那是抗日力量的损失。平型关的胜利不只是八路军的光荣，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佟麟阁、郝梦麟诸抗日英雄的伟大牺牲，不单是国民党的悲痛，而也是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悲痛。我们在这个抗战最紧急的时期决不能存我希望你牺牲，你希望我损失的恶劣心理，因为那于抗日力量有害。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这种态度。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被问到的就是抗日之后又怎样？我们曾经听到这样的话：“打什么？打胜了是共产党的天下，败了是日本人的天下。”这种话完全是汉奸放出来的。我们今天

敢代表中共答复这个问题：打胜了我们大家共同建国，败了，共同做亡国奴打游击战。败是决不会的，胜了呢？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谁也不能打倒，因为中国人民不允许，那就说不上是谁家的天下，而是大家的天下。刚才说过，我们不但愿意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而且愿意在抗日胜利之后共同建国。合作，决不如某些人说是一时的，而是永远的。

四、为什么统一战线能救国？

如我们刚才所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唯一的武器。现在统一战线已经初步的实现，政治上，过去救国会负责人能参加意见，共产党能公开，各方面各党派的人都集中在政府的周围。这个初步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首先，今天的政府已经和抗战前的政府有根本上的不同，对外它是武装抗日的，对内是统一的，联合各党派及人民。虽然在成份上还不够强，还存在着若干弱点，还不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是一党的，还不是容纳各党派的，但它已经起了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

其次，我们已经有了统一的国防军队，现在各方面军队都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在一个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不过还没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武装，统一的待遇，统一作战的计划，虽然已经开始有了。过去呢，名称不统一，各自为战，连形式的统一都没有的。有人问起，你们主张军队的统一，红军愿意这样做吗？我们的答复是愿意的。过去红军的待遇、给养、武装没有一样赶得上中央军，现在既然要统一待遇，统

一武装，只有欢迎没有不愿意的。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队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甚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西班牙的政府军现在所以节节打败德意法西斯联军，就因为他们从游击队锻炼出强大的国防正规军，这可以作我们的借镜。

最后，民主自由已经开始有了。你们一定要说：“你说有只是你们上层有，下层是没有的”。其实不然，初步的民主开放是一个事实，现在各党派可以公开活动，群众团体可以公开活动，言论出版的相当自由，政治犯的释放，不都是事实吗？这一点点的民主自由是从那里来的呢？不成问题是从抗战中得来的。抗战愈向前发展，民主自由更多。因此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民主的够不够，而在于怎样把抗战支持下去，发展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关于坚持抗战到底这一点，蒋先生的告国民书以及中共对时局宣言都是同一个意见。目前的困难在军队的补充，武装缺乏，民众没有组织，人与工作脱节，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要如何从这许多困难当中支持抗战。

我们未来到武汉以前，听说这里的青年朋友为纪念“一二九”还有受伤的事情发生。当时正是和平空气最浓的时候。我们要支持抗战，有人却主张和平，究竟和平可能不可能呢？敢说是是不可能的。敌人提出的和平条件是：第一加入防共协定，第二中日满经济合作，第三指定城市驻日本军队，第四承认伪组织，第五赔款，而且附带的声明，在和平谈判未成以前，继续打，而且说明必须直接谈判，德国不过是介绍人而已。这个和平条件就是亡国条件，只有愿意作亡国奴愿意投降的亲日汉奸，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才能接受。但是主张和平的人是不是已经停

止了活动、改变了态度和主张呢？没有，他们仍然在活动。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这许许多多的困难条件之下克服这种危机，支持抗战下去？是不是有办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有的。

首先我们要保卫武汉，挡住日本帝国主义更向前深入的进攻，能不能够呢？能够的。日本军力现时已不够分配，他侵华的武力原定十五个师团，现在已增加到十八个师团。我们要挡住它的进攻，把战局稳定下来，实行真正的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策略，是可以做到的。同时应该把军队以及一切地方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集中起来，作庞大的运动战。这些人民的武力如不赶快积极发动可能被敌人收买，也只有积极发动和加强人民的武力和军队，才能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路，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人口多，地方大，有余地余时来训练新兵，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队，在西南西北我们还有广多的富源可以利用，武器的配备只要西南西北交通线建设成功，敌人封锁不了。敌人呢，可决不能持久，他的武器也并不十分现代化，原料不够，煤油钢铁等都要依靠美国、加拿大、南澳等地，财政即照现在每天消耗两千万到三千万这个数目，也难支持下去，国内的矛盾跟着战争的发展日益加深，劳苦阶级的反战运动日益高涨，他的军队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多，愈容易各个击破。

国际形势也是于我们有利的。德国在不希望日本进攻中国，而消耗了他们将来在反苏战争上的实力，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日本如果独占中国，德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旧殖民地如青岛就不能收回；第三，如日本独占中国，德国在华的商业将蒙受极大的影响。德国是个穷朋友，给日本财政上的援助不可能，所以希特勒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就亲笔根据法西党最高会议的决定写了一封信给日本军

部，表明德国不愿意日本打中国。现在德国的态度已是脚踏两边船，在言论上帮助日本，在物质上帮助中国。意大利目前为要维系东欧的利益，也只能在精神上帮助日本，如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扰乱地中海，使英法等国不能专心对付远东。英国的态度一向是表现着矛盾的两方面，既不希望日本灭亡中国，也不希望中国打败日本。日本如果打胜了，它在远东的利益就会没有，中国如果打胜了，远东的殖民地会跟着起来谋解放，但在目前，它对于中国是同情和援助的。如通过香港运输军火，帮助技术人才。美国态度最近也改变了，他对于太平洋问题不能不注意，借款中国，帮助军火。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更不用说。最后说到苏联，不但供给军火，而且供给专门人才。这里谈到苏联出兵问题，有些人问苏联为什么还不出兵呢，假如它援助中国最积极的话。实际上苏联一旦出兵，一则不能取得英美的谅解，二则可能变动德法关系，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于中国反而不利，于世界革命更是不利。

这个有利的国际形势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运用。我们相信有了国际物质的帮助，再加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团结，我们不但能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且可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去。

因此，目前的问题在于打击亲日汉奸，肃清恐日恐民病患者，加紧团结，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相信只有国内团结的力量才能更有利的转移国际形势，争取主动的地位。我们共产党诚恳地愿意为加强统一战线而努力，而且愿意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载《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

民族解放社1938年2月版

署名：陈绍禹。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 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三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三天会议,议事日程是:(一)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二)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在报告和讨论中,充分地表现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

一 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报告和讨论中,大家都一致认为:从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到现在的三个月过程当中,我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一些新的进步,军事方面的进步,主要地表现在:(一)南京失陷后一部分军队的溃退现象已经克服了;(二)我国军队在第一期抗战中所受的相当严重的损失,在基本上已经补充起来了;(三)我军作战的战略逐渐转向到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的战术也较前更广泛地运用,并且开始收到这一战略转变的成效;(四)军纪和士气的提高,军队一般的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和牺牲决心。如在第一期作战时,战斗力较

强者为中央军、两广军、八路军等，而第二期作战中，其他各部队均有显著的进步，即有些原来抗战不力的部队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而英勇地走上抗敌的前线为国效命；（五）大部分部队能够留在敌人占领区的后方和两翼坚持抗战；（六）大批新的军事的、军事政治的和军事技术的青年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开始具体准备建立有新式武装技术的部队；（七）空军力量的增长和空军战斗的屡建奇功；（八）政治部组织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始。政治方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一）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有进一步的巩固；（二）政府中骈体和重叠机关的裁撤，军事委员会效能和威信的提高；（三）对抗战将士奖惩条例的颁布和执行；（四）惩治贪污明令的颁布和在有些地方开始反贪污的斗争；（五）许多省份庶政开始有部分的改革（如山西省明令废除苛捐杂税，广西、广东方面民众运动和民众武装工作的更加开展，安徽、山东、湖南各省的政务开始改进等），各省开始大批培养青年政治工作干部；（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式的民众运动有初步的开展。

同时，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第二期抗战中的这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进步，远赶不上日寇继续侵略和民族危机继续加深的速度和程度；我国这些进步，不仅还未能造成全线反攻驱逐倭寇收复失地的一切必要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而且还不足以打破敌人第二期进攻的主要危险。敌人的第二期作战计划的中心内容是：打通津浦平汉，联贯自己的南北交通；截断陇海粤汉，断绝我国的国际联络；完全占领山西、河南，部分地占领陕西（特别是潼关、西安一带及陕北边区），以便达到肃清黄河北岸我国军力和包围武汉以至占领武汉的阴谋。敌人企图实现这一计划，以便达到巩固其第一期作战收获和准备其第二期进攻基础的目的。两个月来虽然我军在山西、山

东、河南各个战线上给了敌人以多次的打击，消耗了敌人的部分军力，挫折了敌人的战略计划，但是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危急情形依然继续，武汉被包围被威胁的危险形势依然存在。而如果为北方锁钥，西北门户和武汉屏障的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不能免于被敌盘据，如果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不幸终于被敌占领，则我国的抗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处于比今天更严重更困难的局面；因此，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

二 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有许多人问：“现在我们固然要用一切力量去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但是，设若万不幸而武汉不保，中国是否能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着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有更深远的认识和更长期的准备，即我们应当假定和确定：在武汉不失的条件之下，我国固然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即在武汉不守的情势之下，我们抗战虽然要遭遇更大更多的困难，但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的。

有哪些基本条件决定我国能够继续长期抗战和能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

第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是我中华民族和中华

民国本身具有伟大的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许多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就是：（一）全民族力量的坚强团结——首先是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二）全国统一的政府，数百万统一的军队和民众武装的存在和发展；（三）最众多的人口；（四）广大的领土；（五）丰富的物产。正因为我国具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敌人虽然能挟其较我优势的兵力，六年之内占领了我东北辽、吉、黑、热四省领土，八个月之中，又占领了我冀、察、晋、绥、鲁、江、浙七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最近又将其兽蹄践踏到皖、豫两省一部分疆土，但敌人“以华制华”和“速战速决”的企图均宣告破产；而我国的抗战力量却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愈战愈强；也正因为我国具备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不仅使我们对保卫武汉和第二期作战抱着极大的信心，而且使我们敢于假定和相信，即在武汉不保的情形之下，我们依靠着湘、赣、闽、粤、桂、川、滇、康、藏、陕、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区两万万以上的人口、广大领土和富源作根据地，配合以我国广大军民在敌人占领区域中的广泛运动战和游击战，定能坚持长期抗战并在长期抗战过程中达到消耗敌人以至最后驱逐和歼灭敌人的目的。

第二个条件是敌人具有的许多重大困难和弱点。这些困难和弱点是：（一）财政的困难和枯竭——敌国内公债已达一百七十万万的巨额，对外借款发生空前的困难，人民的捐税负担已非常繁重，战争的消耗是与日俱增（在战争开始时，敌人每日军费消耗，即在五百万日元以上，现在当已数倍于这个数目了），对外商业是与日俱减。（二）军事工业原料的缺乏——钢、铁、汽油、棉花、橡皮等重要军事工业原料敌国内均极感缺乏，平时即主要地仰给于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印度、荷兰和中国，战时更极端感觉到这些原料品的缺乏；如果国际工人

团体——首先是运输工人国际反日援华运动能有更大的开展，真正做到不运军事原料和军火到日本去，则敌人便很难支持较长期的对华大规模作战。（三）国内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众运动，日益增长——敌国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在平时已感受到极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痛苦；几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民众的生活更加处于水深火热的状况之中；大批壮丁被征调入伍和被迫送来中国作战，使农村经济遭受打击，使许多家庭失去父子兄弟丈夫，以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六七年来日本法西斯军阀所努力进行的“占领满洲，日本一切困难问题都可解决”的宣传，事实上既经证明失败，多年来日本法西斯军阀所狂喊：“三个月内，皇军可以完全占领中国”的谰言，事实上也宣告破产，日本广大劳苦民众从自己切身经验中日益感觉到：法西斯军阀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不仅是反对中国人民利益的，而且是违反日本劳苦民众利益的；不仅是无端加中国人民以无穷的灾难，而且是借端加日本人民以无限的痛苦。因此反战反法西斯的民众运动，在日本国内不断增长起来；虽然因为法西斯军阀实行严密的新闻统制政策，日本民众的许多壮烈的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外间不能完全知道，但即从敌人报纸和外国通讯上有时偶然发表的片断消息看来，也可看出这一运动的严重性。许多次成团的士兵公开表示不愿离开国土去异乡作战；大批组织的索夫团和索子团；今年二月东京七千五百人（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因反战运动被捕下狱，大批的作家、教授和社会名流因反战而被逮捕，在战死和俘虏敌兵日记中，不断发现厌战和反战的记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在这方面恰与我国处在完全相反的情形；敌人方面，因为是法西斯军阀进行奴役别国人民和荼毒本国民众的侵略战争，所以敌国民众与军阀间的矛盾和裂痕愈演愈深，战争愈延长，

敌人内部民众反军阀反政府的斗争愈广泛愈尖锐。而我国方面，则因为我国军民进行的保卫民族生存的民族自卫战争，所以战争愈持久，社会各阶层愈团结，人民和政府及军队的关系愈密切。敌人国内民众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增长，这毫无疑问地是敌人的心腹大患。（四）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日深——这首先表现在法西斯军阀与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日本政友、民政两党中，显然存在有一部分反法西斯军阀进行对外持久战争的资产阶级分子，虽然这些分子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是害怕在军阀长期对外冒险战争中将日本经济闹到完全破产的地步；有的是害怕军阀在长期对华战争中遭受失败，因而引起日本国内不可收拾的危机；有的是简单地希望有和平环境以便继续对华的商业关系；但他们对法西斯军阀消耗一切来对华长期作战，显然是不满意的。民政、政友两党中大多数党员及一部分开明领袖对法西斯军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事预算和总动员法案在议会中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勉强通过的事实，法西斯军阀公开提出所谓合并一切党派为一个法西斯党的威吓……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敌国内军阀与政党间矛盾的增长。（五）军力不敷分配——敌人有五十个师团的动员部队，原来计划以十五个师团进攻中国，以三十五个师团对付苏联，现在敌人派到中国来的已经在二十五个师团以上，而且因为战线延长几千里，来华的二十五个师团的兵力又已经感觉到顾此失彼不敷分配的困难；在这样情形之下，敌人如果继续增派军队来华，则国防上感觉到极大的空虚，对苏联进攻的计划方面受到极大的破坏；如果不增派军队来华，则不仅战胜中国的计划归于泡影，而且已来的军队，有被中国歼灭的危险。因此，敌人现在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企图在已被他占领的区域内，利用汉奸组织中国人的伪军队来协助日军作战。虽

然在有些地方，敌人曾经能够在汉奸帮助之下组成以日本人作军官中国人当士兵的军队来助战，但无疑义地，这些少数中国同胞受欺骗受威胁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进行艰苦的政治争取工作，他们早迟是会掉转枪头去攻打中华民族公敌的。（六）战线延长，有被我各个击破的危险——敌军深入我国土数千里，所居的是中国领土，所残害的是中国民众，所敌对的是中国军队，所依靠的是中国给养和中国交通工具，因此，四方八面感受到各种威胁和危险；同时，因为兵力分散在各个战线和城市及交通要道，时常被中国军队和武装人民袭击和打击；最近敌人在山西山东各个战线上每日遭受数千人马的损失，便是他遭受这种危险的开端。（七）来华军队的迅速堕落腐化——敌军在我国被占领区域内的奸、掳、焚、杀的非人暴行，固然给了我国成千累万同胞的人格、生命、财产以莫可言喻的损害，但同时，也造成了敌军在思想上、行动上迅速堕落腐化的结果，因而一方面形成敌军纪律废弛和战斗力减弱的现象，另一方面形成敌国政府不许来华军队再回本国的企图，以致造成敌军将士悲观绝望的情绪。（八）远近后方的不稳——敌人国内各种矛盾的增长，不能不影响到后方的不安；此外，不仅敌人特别倚重的我东北后方，有变成前线的可能；而且台湾、朝鲜均正在酝酿着与日俱增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台湾数千矿工武装起义进攻日寇的驻军，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弱小民族准备进行大规模解放运动的信号。日寇这种后方不稳的危险，一定随着中国抗战的坚持和日寇困难的增加而与日俱增，这是毫无疑义的。正因为日寇具有这些基本的困难和弱点，正因为日寇这些困难和弱点随着战争延长和扩大而日益增长，所以我们不仅深信我们能够制止日寇的无止境的侵略，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坚持长期

抗战中取得最后打败日寇的光荣胜利。

第三个条件是国际形势基本上与我国抗战有利。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主要地表现在：（一）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我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自卫战争，不仅是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的战争，而且是捍卫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战争；因此，我国抗战不仅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团体（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西班牙、美、英、法、日、德、意、捷、墨西哥、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社会民主国际及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首先，是法、英、美、西班牙、德、意等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各种工会国际和苏联、英、法、美、捷、西、墨等各国家的工会组织）的同情和声援，不仅能得到亚洲、非洲、中美、南美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赞助，而且能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拥护和援助（如包括各界各党派参加的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国际青年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国际联盟之友联合会，世界学生会，国际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许多基督教青年会和天主教青年会，英、美、法、加、捷等各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等团体）。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及爱好和平人士给我们的实际帮助虽然还不够，但是他们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是与日俱增的；我们必须认识和相信：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帮助，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帮助苏联人民打退过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进攻；这种力量曾经而且正在帮助西班牙人民坚持反抗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军队及其走狗的侵犯；这种力量，对于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事业，一定表现出一天比一天增强的伟大作用。（二）社会主义的苏联民众和政府，

对于我国民族自卫抗战的精神同情和实际援助——在我国抗战一开始时，苏联政府即与我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给侵略者精神上以打击，给我国精神上以援助；苏联各种报纸杂志上充满对我国抗战同情的文字，苏联外交代表在国际联盟各种会议上仗义直言地对日寇谴责和对我同情；苏联在物质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苏联人民对我国的同情和援助一定是随着我国坚持抗战和中苏友谊增进而逐渐加强的。苏联现在是一等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与中国有数千里疆界连接的国家，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本着其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立场而抱着绝对真诚同情的国家，是与中国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问题方面有共同利害的国家，因此，苏联对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同情和援助，是一种莫大的实际力量，是中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国外条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三）世界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法、美、英对我国抗战的友谊态度——虽然法国在远东方面没有英美那样重大的利益，虽然法国主要地忙于欧洲紧张局势的应付；但是，由于法国人民战线各党派——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急进社会党、法国总工会等——对于反法西斯反侵略和捍卫和平的极大努力，由于法国政府依靠着人民战线的力量，由于法国感觉到其在安南的统治和中国的利益受日寇的威胁，所以法国人民和政府对于中国反侵略的抗战，始终抱着友谊的态度。虽然美国直到现在未能公开改变所谓“孤立”政策，虽然美国直到现在对远东问题未能采取其应有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但是，从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立场看，美国是不能放弃或漠视远东问题的。近年来罗斯福和赫尔再三发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及拥护民主的声明，美国民众和正义人士不断表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美国在太平洋上海空军力量的逐渐加强，都是

表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适当办法保障其太平洋东岸安全和利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抗战保持着友谊的态度。英国张伯伦政府最近采取的公开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让步的政策，的确不仅鼓励了德国法西斯蒂实行武装并吞奥国和德意法西斯蒂大举增兵西班牙的举动，而且实际上造成了日寇在中国更加放胆横行的环境。不过，截至目前止，我们虽然还未见到英国对制止日寇侵略采取应有的积极政策，但同时我们也还未见到英国已经决定采取与日寇妥协来宰割中国的政策。我们固然知道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既不愿日寇独霸中国，也不愿中国战胜日寇，而是希望中日双方在长期战争中相互减弱，以便增强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但正因为英国是不赞成日寇独占中国的，所以直到现在英国政府对我国抗战还是在许多方面加以帮助的。（四）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内部的冲突——虽然德日是订有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同盟国，但日德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显然有两种冲突存在着：第一，德国法西斯蒂害怕日本在中国战争中消耗过大的兵力，甚而有遭受失败的危险，以致不能执行德日意军事协定的义务；第二，德国法西斯蒂每日狂呼收复战前殖民地和租借地，以及重新分配殖民地，中国不仅过去有德国的租借地，不仅一般地是一个广大的市场，而且中德经济关系近几年来有极大的进步，因而德国不愿意日寇独占中国；正因为这样，所以德国政府不仅再三企图出来“调解”中日战争，而且同时也出卖军火等给中日双方。至于最近德国法西斯蒂承认伪满一事，这不仅是为的表示他对所谓侵略同盟国的精神上的帮助，而且是作为他自己以武力并吞奥国的一笔伏案和张本。由德国并吞奥国和准备进攻捷克以及德意增兵西班牙而引起的欧洲战云密布的紧张环境，的确给远东法西斯强盗暂时更

横行无忌的机会，但事变发展的最终结果，未必会即有利于日寇侵略的。最重要的，日寇现在的所谓同盟国，实际上不能真正以军事同盟国应有态度和程度来帮助日寇的。德国法西斯蒂并奥暴行和扰乱全欧的大阴谋，并不是由于其国内政治力量加强和巩固的结果，而是由于国社党与国防军冲突尖锐化以及国内经济困难增加和人民对法西斯政治不满深刻化，德国法西斯蒂企图用对外冒险行动来转移国内视线和强迫国防军对外作战的结果，德国既忙于干涉西班牙，又忙于并吞奥地利，更忙于准备扰乱全欧的大变乱，同时，国内的经济情形和政治情况又极端严重，当然很难于给日寇以有力的帮助。意大利法西斯蒂既忙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又忙于西班牙的干涉，更忙于应付欧洲行将到来的大事变，同时，国内经济财政更到了极窘的境地，当然也难于给日寇以有力的帮助。

正是根据上述的这种种情形，所以中共中央认为，虽然我国的国际形势，还不能满足我国抗战的要求和愿望；但是，一般的说来，国际形势对于我国的抗战是有利的；至少我国的国际形势，比我们的敌人要好些，日寇除德意法西斯蒂的同盟者外，已成为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虽然在抗战中始终着重于“自力更生”的原则和信念，但同时，我们经常指出要善于运用我国有利国际环境作为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和揭露那些用“中国国际环境与抗战不利”或“中国的国际环境根本没有出路”等作遁词，来掩饰“抗战必然失败和抗战没有办法”的投降主义的人们的原形。这些人们既否认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声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又故意造谣侮蔑素以平等待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混为

一谈；更否认今日愿意维持现状和保卫和平的民主国家，与已经武装进攻西班牙和中国以及已经武装占领阿比西尼亚和奥国的法西斯侵略国家之间的分别，当然他们不能不归结到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而这些人们，既对本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表示怀疑和反对，又对国际形势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当然不能不得出不能抗战和抗战无出路的失败主义的结论。当然，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作日寇应声虫的托派政治间谍，有些是国际常识不足的幼稚朋友，我们对他们的批评态度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分析国际形势的“理论”，事实上是妨碍抗战事业和便利日寇侵略行动的。

由此可见，无论中国本身条件，无论敌人方面条件，无论国际条件，基本上都是说明我国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我国抗战的国内外条件全部顺利，我国抗战已经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弱点，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预先有了保证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八个月的抗战，固然造成了我国空前未有的进步：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空前团结，统一政府和统一军队的建立，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开始逐渐改善，武力开始与人民结合，中华民族和国家地位在国际上的增高和世界先进人类对我国同情的空前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同时，我国抗战无论在政治方面，无论在军事方面，都还有极严重的困难和弱点：军队新式武装和新的军事干部的不够，军事工业的缺乏，军事运输的迟缓和不够，军事战略转变的不充分，统一军队条件的不充分具备，这一切，都是军事上不容否认的弱点和困难。抗日各党派本身力量都还不能满足抗战形势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达到应有的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政府设

施还不能完全适合抗战的需要，战时民意机关的缺乏，民众运动和民众组织的不发展，贪污土劣的横行，这一切都是政治上无容讳言的弱点；大批难民和失业同胞的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许多军事原料和军用品的供给不足，大量的财政消耗，许多地方物价的高涨，这一切，无疑义的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欧洲的紧张局面，英国张伯伦的对侵略者让步的政策，国联的软弱无力，美国的动摇政策，这一切，都是目前我国抗战的国际形势中的困难和弱点。

全中国军民的任务就在于：不仅清楚地认识中国抗战的国内外的一般的有利条件和优点，而且能够勇敢地看清我国抗战中的各种严重的弱点和困难；不仅明白地认识这些困难和弱点，而且能够大胆地找到克服这些困难和补救这些弱点的有效办法。

为的使第二期抗战能胜利地进行，为的使我国能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我们对于目前抗战的许多重要问题有坦白表明意见的必要，这不仅是为的使我们党的全体同志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共同的了解，而且是为的使我们这些意见能提供国民党同志和国民政府当局以及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和全体爱国同胞，作为讨论和实行的参考材料：

一，对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甲，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初期只是八路军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不能作阵地战，因为没有重炮），在平型关、广阳等战斗中，获得显著的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胜利。在第二期抗战中，大部分在山西和山东、河南等战线上的我国部队，也都开始在采取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在江、浙、皖各地，我军和地方人民武

装也开始比较广泛的采用游击战术；所以能获到最近一个时期部分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成效，特别是鲁南和山西各战线上的相当重要的胜利。为的保卫武汉和在河南、山西、山东各战线上给敌军以更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坚决确定及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为的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必须：（一）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二）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三）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

乙，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为的战胜武装优越的敌寇，须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还远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便即公开地提出。我们所提的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既不是说离开中国原有军队而纯粹另外去创造新军队，也并不是说把中国所有军队联合统一起来换作抗日联军的名称，而只是表示我们希望：第一，把原来国内各种不统一的军队，联合而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第二，这个统一的军队要担负起保卫国防的责任，在中国现在具体条件下，即是说，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统一军队要具备那些基本条件呢？我们始终认为它应有下列几个基本条件：（一）统一指挥；（二）统一编制；（三）统一武装；（四）统一纪律；（五）统一待遇；（六）统一作战计划；（七）统一作战行动。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军队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甲）过去各种不同系统的（如中央军、红军、各种地方军队等）军队编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乙）这些军队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正在努力执行统一作战计划和表现统一作战行动。但是，同时对于统一纪律、统一待

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等问题，却至今还未能做到。统一待遇和统一武装，既为抗战本身的事实需要，已成一切抗战军队的共同要求，所以毋庸加以解释；至于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方面，我们提议：一方面根据作战需要和利益，另一方面选集各军队的优点和长处，来建立一个真正尽善尽美的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怎样才能做到部队的政治坚定呢？在今天，这至少需要进行下列三件基本工作：（一）立即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最近军事委员会下已设立政治部，这是一件值得注意和称赞的事情。我们希望政治部负责人员和工作干部，能毅然恢复北伐军时代的政治工作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参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政治工作机关，慎重地选择政治工作人员，认真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以达到提高我军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以达到建立军民一体的亲密友善关系，同时，达到瓦解和夺取敌军的目的。（二）军官与士兵共甘苦共死生，达到官兵一体的地步。（三）迅速普遍地改善征兵制度——我国既无国民必需服兵役的教育准备，又无详细的人口登记和调查；同时，再加以实行征兵时也未明白规定应征兵役的年龄和期数（即第一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年龄达若干岁之壮丁，第二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之壮丁等），因而变成普遍抽丁的办法；于是，许多地方的土劣及保甲长乃得乘机将征兵变为敲诈勒索的差事，有钱的人家虽壮丁多也可以出钱买别人去顶替，没钱的人家虽壮丁少也被强迫拉去当兵；甚至在许多地方发生强迫捉人当兵，闹成天怒人怨的现象；那些被强迫捉去当兵的人，既然不能明了当兵的意义，当然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力。为补救征兵制现在的缺点和特点，我们以为一方面必须在广大民众中作抗战和兵役的教育解释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暂时仍采取以募集志愿兵

为主的办法,以逐渐过渡到实行普遍征兵制;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人民爱国热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绝不愁没有千百万壮丁自动到抗日军队中去尽抗日救国的神圣天职。只有战士们都懂得为什么而战和为何人而战的军队,才是政治坚定的武装力量。怎样才能使部队的战斗力强呢?在中国今天的具体条件下,除上述的统一和政治工作等外,必须:(一)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战略战术的训练;(二)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技术(航空、坦克、铁甲车、军事化学、炮科等)的教育和学习;(三)培养大批新的军事的和军事技术的干部人材;(四)加强现有军队的近代武装。

丙,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我们绝不能使我国几百万军队都有足够数量的新式武装,但我们不能不努力建立几十师有现代武器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为的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一)利用一切时间空间和争取更多时间空间来建立这种部队;(二)坚决抽出成立这几十个师为建立这种新军之用,平时绝不轻易动用这些部队;(三)努力取得必要数量的新式武器;(四)认真培养善于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的技术干部和能指挥近代作战的军官人材;(五)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从各种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队伍出来作为建立这种新军的组成员,抛弃一切派别和门户的偏私之见,只有在一定时间内我国能创立出相当数量的有新式武器的国防师作为全军的骨干,才能真正谈得上准备了对敌人反攻的军力,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三要求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和全国军民,用异常严重的注意和决心来解决这一个对抗战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丁,迅速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和加速军事交通——以我

国落后的技术基础和抗战的时光迫切，当然我们不能很快建立高度的军事工业(如摩托及重要机件制造等)，但是，我们应当而且可能把我国一切工业基础和物质条件搜集和利用起来，在友邦技术和人材帮助之下，迅速建立起最起码的新式的军事工业(以装修飞机、坦克、装甲车等开始，直做到买得摩托后，可以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同时，应大大地扩大现有的兵工厂，以便大大地增加枪炮子弹等的出产量。此外，必须努力改良和扩张军事交通网，以便利国内外军事运输，现有的军事交通情形，是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不仅是现时抗战中的一个最关紧要的问题，而且是使中国国防力经常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三建议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严重注意这个问题。

戊，加速普遍地给军民以防毒的常识和设备——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上海和北方战线上曾开始试用过毒瓦斯来毒死我国军民，今后当敌军困难增加和失败屡见的条件之下，将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放毒杀人的非人暴行；因此，我国政府和民众，应该一方面加速努力进行防毒的教育和设备；另一方面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工会和民主政党和团体、卫生慈善团体，以及国际联盟和英、美、法、苏等各国政府起来抗议和制止日寇的此种野蛮举动。

二，对国内政治中几个迫切问题的意见——甲，对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抗日救国团结问题：信仰自由和各党派不能取消而应并存合作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一层真理，不仅由毛泽东同志在其今年二月十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中，代表中共发表过明确的意见，而且已为国民党的贤明远见领袖和绝大多数干部党员等所共信。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

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但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既为人民愿望和抗战事业所必需，因此，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内容，由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等）代表共同商计和拟定。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

乙，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希望——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热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才企图在南京等地伪造国民党组织来污蔑国民党，才希望国民党坏。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女儿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抱着生死与共的真挚的热爱，对于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对于继续坚决对日抗战和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事业，抱着无限的忠诚和信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我国领导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着热烈的希

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大的增强；因为国民党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就是等于抗战事业的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因此国民党愈加进步和强大，不仅是国民党本身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有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诚恳和热烈地希望国民党本身有如下的改进和加强：（一）淘汰贪污腐化及一切不忠于党不忠于抗战革命事业的分子，以刷新党的组织；（二）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和进步人士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以增进新生力量；（三）在组织内实行真正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问题未决定前党员有充分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权利，决定后，无论个人意见如何，必须执行组织的决议；下级必须执行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如对上级决议和指示有不同意见时，可向上级提供意见，但上级未改变决定前仍须执行等等），以健全党内生活和培养大批干部人材；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袖和领导机关威信绝不冲突，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领袖和领导机关才更有威信更有作用。以前中山先生为国民党的总理，同时，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在党章上毅然决定采取民主集中制，结果，使中山先生威望作用更加增大，同时，党的组织内健全生活也建立起来，党内大批新的干部人材，也产生出来，便是明证；（四）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以巩固党的统一；（五）提高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党员均能自觉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国民党的贤明领袖和党员同志们，对于国民党本身工作改进和加强，当然具有卓见，我们谨以友党兄弟之谊，向国民党提供上述几点意见，不过作为参考的资料。

丙，对于统一政府问题的意见——为的保证抗战事业的

胜利，必须有全国统一的政府，这是我们自始至终的坚强信念，所以不仅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上，中共中央便提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同时，再三说明这一口号的意义和内容，既不是推翻现有的国民政府，也不是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名称，而只是说明，须使国民政府成为统一的政府，并实行抗日以尽保卫国防的任务；而且我们早已在实际上将苏维埃政府改成为地方边区政府，以推进和促成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关于边区政府人选及行政系统问题，中共代表曾再三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负责同志说明，并再三得到蒋先生的同意和答应，明令不久即可发表。在陕甘宁边区中不仅共产党有合法地位，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合法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中，因为地瘠民贫，我们还作不出什么值得满意的成绩，我们现在做到的，不过是：肃清了贪污土劣，废除了苛捐杂税，相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给予了人民民主自由，教育和组织民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所有这一切，我们认为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民众热烈欢迎的事情，而且是全中国同胞急切盼望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实行的事情，而且是一切真正中山先生信徒应该进行的事情。因此，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应有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中华民国领土内应该普遍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绝不能说是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意旨，相反地，照我们想，应该是为中央政府赞许的地方自治的庶政。此外，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冀察边区三十几县中，一切行政系统和人事问题，均系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对中央政府与任何地方政府因某种问题有误会和摩擦时，中共总是始终站在维护统一和抗战的大原则下去力求取得合

理的解决，所有这一切，都在事实上证明我们共产党对于拥护统一政府问题的光明正大的立场。

此次政治局会议史一致坚决认为：我们不仅在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因为抗战愈困难，民族危机愈深广，对内对外，统一政府的需要更迫切更必要。因此，有少数企图用陕甘宁边区问题来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行政制度统一”，甚至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封建割据”等，以便破坏国共两党抗日救国的团结，以便挑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误会，这不仅是一种抹煞事实的昧心之谈，而且是一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有害之举。

丁，关于建立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民众和政府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设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至于民意机关的形式，政治局会议认为：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地在于：（一）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二）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戊，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的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全体动员和积极参加，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验过的真理。

关于这一真理，革命导师早已向我们指明过。例如列宁在其批评卢森堡对民族革命战争问题错误时曾说：“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是不可

免的,进步的,革命的。不过它底胜利,当然应有;或者是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例如我们引作例证的印度和中国中几万万人民底综合的努力),或者是国际状况底条件有特别顺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列强因为它们本身的削弱,它们本身的战争,它们本身矛盾等,足以制止他们的干涉行动),或者是大国之中某一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作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最后这一种情形,从对于无产阶级胜利的观点看来,是最合乎希望的和最有利的)。”由此可见,列宁把“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可以取得胜利的一种条件。同时,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上说:“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我国抗战已达八月之久,动员民众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为着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政治局会议认为,我们正应急切的补救这种弱点。我们提议:将工、农、学、商各界按照其职业地域而组成各种职业的联合团体,将青年、妇女、文化界等按照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将已有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无组织的民众吸收到各种群众团体内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这些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发挥各群众团体自己的工作,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此外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帮助政府动员和组织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而且要注意去艰苦动员和组织被敌占领区域的同胞。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帮助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

和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敌军占领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则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反对和推翻敌军及其傀儡组织的统治，使他们在军事上不断失败。因此，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在敌人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工作方法，必须是严守秘密和利用合法可能，以达到动员和组织民众去推翻敌伪统治的目的。

三，对外交问题的意见——在前面叙述我国抗战的国际条件时，我们已经指出，我国抗战固然要首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同时必须认清国际方面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以便善于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此地我想指出的，就是我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不仅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朋友为外援，同时，还须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国民外交行动。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我们提议：（一）由我国各党派各界群众团体共同发表一告世界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国际、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及它们领导下的政党和工会）和一切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国际反战组织、国际联盟之友联合会等）宣言，请求他们给我们更有力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二）迅速派遣包括工、农、军、商、学各界有威望的代表及妇孺难民等代表的代表团，到欧美及东方各国去进行宣传寇敌在华残暴及我国英勇抗战详情；（三）摄制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揭露日本残暴和表现我国民族团结御侮的几部有声有色的影片，送欧美及东方各国放映；（四）加紧供给欧美及东方各国的报章、杂志、通讯社以各种必要的书籍材料照片等；（五）为着顺利进行这一工作，必须政府与各党派及民众团体切实合作，成立一统一机关以领导、计划和执行这一工作。

四，最后，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共本身的强固和改进问题。首先，政治局会议认为：必须向党内党外广泛解释，巩固和扩大共产党力量，对于抗战和使抗战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有绝对的必要。因为共产党是坚决抗战到底和为使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中国第二个大的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力量愈增加愈扩大，即是抗战的力量愈增加愈扩大；因此，巩固和扩大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不仅是共产党本身有利的事情，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因而也就是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有利的事情。今天，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托派们，才努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才尽力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全中国同胞和一切抗日力量，应当而且必然对共产党加以爱护的。其次，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一）我们党今天在数量上还远不能适应抗战事业的需要。因此，要求全党同志把发展党员看作日常工作中的一种最基本工作；（二）我们党的质量（即社会成分）须要有大的变更；过去几年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所以，我们党员的社会成分是农民雇农和手工工人占多数，大城市产业工人的比例不够，现在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一弱点，应当努力吸收重要产业的先进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入党；（三）因为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复杂和紧张，因为新党员增加和老干部理论修养的不够，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常政治教育，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研究，已经成为全党各级机关和每个同志的刻不容缓的严重任务；（四）加紧选拔和培养大批新的党的干部和非党的革命干部，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五）为适应抗战环境的需要，建立和健全地方党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六）加强党报工作和使全党同志了解党报的意义和重视党报的指示；（七）建立正确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加紧秘密工作以防制日

寇及汉奸的破坏和捣乱；(八)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坚决反对那些不懂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长期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分子；同时，无情打击那些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曲解成为无原则的投降，或者对中国革命前途抱完全悲观失望态度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九)加强党内教育工作，保持党员的艰苦、勤奋、牺牲的光荣的布尔塞维克的作风和传统，严厉打击那些思想堕落和行为腐化的个别分子，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一〇)提高革命警惕性，严密注意和打破日寇汉奸及一切反动分子用尽各种方法在共产党内外进行破坏工作的阴谋；(一一)特别注意巩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三 抗战与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所提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问题——我们党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曾通过一个专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上，我们党的中央公开说：“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人说：共产党提出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擅改中华民国的国号，这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问题并不在于国号，而是在于中华民国的实质。不仅照字义说，而且照创造中华民国的诸先烈和全中国同胞的愿望说，中华民国应该是

中国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家；但是可惜得很，二十几年来，中华民国仍未能名副其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才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以说明我们所希望的真正中华民国的性质。至于讲到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与三民主义国家问题，我们已经再三说过，我们所希望的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国，换句话说，也即是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奋斗一生而未能实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其次说到所谓现阶段的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我们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并公开说明在这个阶段上放弃使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愿意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因此，在我们同志中间引起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有的说这是一种策略的改变，有的说这是一种战略的改变。到底我们应当怎样正确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怎样。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呢？“战略就是根据当时的革命阶段来决定无产阶级底主要打击方向，规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后备军）底相当布置计划，在这个阶段底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什么是革命的策略呢？“策略就是无产阶级在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在运动底来潮或退潮时期，在革命底高涨或低落时期内行动路线底决定，就是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等等的方法，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进行的斗争。”战略与策略的相互关系怎样呢？“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和服务于战略的。”（以上所引，均见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印行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八七、八八、八九页）在中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和

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实行了一个战略的改变，即是大的革命力量布置计划的基本改变，而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当然，既然战略有了改变，策略更是随着战略改变而为战略服务了。

四 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去年十二月间，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最近期内召集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具体准备这一大会的工作问题。此次政治局会议认为，前次政治局决议所指出的，在最近期间内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工作，对于党的本身工作，都有最严重的意义，是非常正确的。全党同志现在应该努力进行七次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本身应该立刻进行下列具体准备工作：（一）发布为召集七大事告全党同志书；（二）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同胞书；（三）给地方党部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七

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四）成立大会四个议事日程报告的准备委员会；（五）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大会第一、第二两个议程的政治提纲，以及写关于第三、第四两个议程的论文和其他专门问题的论文，不仅作为地方党部和全党同志讨论和研究大会问题的材料，而且作为一切对中共七次大会愿意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士们的参考。中央政治局要求和责成所有地方党部领导全体同志立即积极进行关于七大议程各问题的广泛热烈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任何一个同志都有权利明确详尽地发表他对于中国革命全部问题——特别是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的意见，在这种讨论中，来教育全党同志学习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研究现在如何战胜日寇，以便建立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基本问题；使这种讨论，不仅成为搜集全党同志对大会意见的有效办法，而且成为用严格自我批评方法检讨我们过去和现在工作的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及找出改正和补救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有力工具；使这种讨论，不仅成为准备大会的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而且成为在政治上组织上教育党巩固党和扩大党的重要武器；使这种讨论的结果，不仅成为共产党本身一个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进步，而且成为对全国同胞的抗日救国团体大事业的新的有力贡献。

三月十一日完稿

载《解放》第36期

署名：陈绍禹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将我们党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对中华民族十六个月的英勇抗战，和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提出了正确的方案，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的。洛甫同志在其组织报告中，详尽地说明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方式；同时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王稼穡同志、项英同志、陈云同志，对许多重要问题，做了详细的报告；此外贺龙同志、杨尚昆同志、关向应同志、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罗荣桓同志等又做了许多地方工作的报告；林祖涵、吴玉章两同志昨天已经做了极有兴趣的发言；而其他许多同志当然还有许多宝贵的意见继续发表。我已经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做了报告，同时行期又很迫切，所以已经不预备发言，但是因为有些同志要我对某几部分问题发表点意见，所以就匆忙地对几部分问题说一说个人的意见。

一 日本法西斯军阀是中华民族的死仇 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

(I) 日寇是中华民族的死仇

甲、日寇侵略中国的一切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1) 国小土地少(《日本论》一二——一三页)；

(2) 人口过剩(同前)；

(3) 原料缺乏；

(4) 本国市场小；

(5) 防共 $\left\{ \begin{array}{l} \text{对中共} \\ \text{对苏联} \end{array} \right\}$ (防共可以变成地质学的名词)；

(6) 安定中国秩序；

(7) 维持东亚和平；

(8) 帮助满洲民族“自决”(根据斯大林所说之民族定义，民族须具备条件：子、固定区域的集体生活，丑、特定文字，寅、特定语言，卯、特定经济社会生活，辰、特定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从这种科学观点看，满族已同化，不备此等条件，即还有少数满族子孙，但绝没有成立满洲国的必要和可能。满洲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人。热河呢？其他中国各地呢？借口不成立)。

乙、日寇侵略中国，乃系长期预定的所谓“大陆政策”的实施；

征服中国为明治以来日寇之既定政策。日寇侵略中国之

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一八九四——一九五〇年中日战争至一九一四——一八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此时期日寇抢去琉球、台湾、澎湖群岛、高丽；第二阶段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不仅先后占领我胶州和青岛，出兵济南，且在一九一五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第三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芦沟桥事变，日寇占领我东三省热河及察北六县；第四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起，日寇进攻和决心灭亡全中国的阶段。

丙、日寇侵略战争之目的，在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1) 日寇一年来所占中国之领土及铁道线之统计材料说明；

(2) 日寇在侵占区内所施行之政策：强夺中国主权，消灭中国军队(包括伤兵、俘虏、老弱、杀人比赛等)，屠杀、掠夺、焚烧、奸淫、毒化、奴化、污辱等残酷兽行；

(3) 飞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的罪行；

(4) 日寇开始使用毒瓦斯屠杀我军民；

(5) 寇机袭击我国境内民航机。

向全世界舆论及全人类控告日寇的残暴兽行。

(Ⅱ) 日寇进行侵华战争给予 日本人民莫大的苦难

甲、百万军队的动员与四十万将士的伤亡；

乙、巨大的消耗与严重的财政困难；

丙、战争使劳苦大众生活更加恶化；

丁、法西斯军阀权力之增长与国内反动政治之加强；

戊、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及日本有卷入更大战争旋涡之

危险；

己、日寇对出征军人的非人残暴(逼迫作战,自杀的很多,火烧伤兵惨剧等)。

我们对日本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我们深深痛惜他们因战争而遭受的痛苦,我们愿意以同文同种兄弟之谊与他们手携手起来反对共同的死敌——日本法西斯军阀。

(Ⅲ) 日寇是一切先进人类的公敌

甲、日寇进行对华战争,威胁了一切列强在华的权益:

(1) 日寇暴行给予第三国主权生命财产之损失;

(2) 日寇在占领区内对第三国权益之公开掠夺和危害(东北、上海等,美十五万万元损失,纸烟卷内放毒事);

(3) 中航机及欧亚机被袭击之意义及教训。

乙、日寇征服中国,是进攻东亚及欧美各国之准备。

丙、对苏联进攻之准备及张鼓峰事件。

丁、日寇是新的瓜分世界大战的祸首,是德意法西斯强盗的帮凶。

日寇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仇,而且是一切先进人类的公敌(此处引国际公开决议上所说的中国抗战与国际关系一段),因此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事业不仅是中国人的事业,而且是一切先进人类共同的事业(此处对德意人民、西班牙人民、奥国、捷克人民说话,说明彼此利害及敌友是共同的)。

二 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灾难的时期， 同时也正处在无上光荣的时代

(I) 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急关头

甲、目前的民族危机，与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所谓民族灾难不同，与元、清时代也根本不同。(1)日寇为异族，元、清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元、清为经济文化较低于汉族的本国少数民族，日寇为帝国主义。(3)元、清之所谓征服汉族，不过是推翻汉族的君主而实行所谓“入主中原”，日寇之政策在使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乙、目前的民族危机，超过百年来民族灾难的总和——自鸦片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被列强分割去的领土，主要的是各藩属和辽远的边疆(安南、伊犁西部、缅甸、不丹、尼泊尔、暹罗、朝鲜、台湾、澎湖列岛、香港等)；列强只强迫中国政府以一部分沿海沿江口岸的城市做为所谓租界(上海、天津、福州、厦门、广州、宁波、镇江、青岛、九江、芜湖、汉口、万县等)；列强主要地只是在租界内及沿海沿江有租界的口岸和城市驻有一定数量的海陆空军力；列强直接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着的只限于一定租借的区域。因此中国国家地位虽然实际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仍拥有自己的领土主权等独立国的资格。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东北四省全部，占领了冀、察、绥、鲁、豫、皖、江、浙、赣、粤的领土的一部，特别是这些省份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及交通线；现在日寇更侵入鄂粤二省的领土，并积极向我国最后的两个

大的沿海沿江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武汉和广州进攻。在日寇占领区域内，我国家政权完全被摧毁，我国的重要经济、财政、交通机关完全被强占，日寇悍然横行无忌，我国的同胞完全被置于牛马奴隶的地位，殖民地的亡国奴的悲运，已经加在几千万同胞的头上，七年来日寇所加于我中华民族的灾难，实超过百年来我民族危机的总和。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生死交叉的道路——或者是完全沦为日寇的殖民地牛马奴隶，或者是奋斗以求民族的生存和独立！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中央可以向全党报告和可以告慰于全中华民族的一点，就是我们自“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天起，就确切指明日寇所企求加于我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就恳切说明我们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不断呼吁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民族生存独立而奋起自卫！

（Ⅱ）中华民族在英勇自卫战争中巩固起来了

甲、中华民族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的英勇自卫战争——不仅日寇的“以华制华”、“不战而胜”的政策完全失败了，即“速战速决”、“三个月内征服支那”的迷梦也完全破产了！“东亚病夫”变成了“东亚英雄”，“东亚睡狮”变成了“东亚雄狮”，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役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只有充满了为民族尽忠，为民族尽孝，为民族报仇雪耻的光荣自觉，才能产生出抗战以来的我们许多民族优秀儿女所表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慷慨牺牲的丰功伟绩。保卫平津战斗

中，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奋战成仁，保卫宝山战斗中，姚子青营长率五百健儿的壮烈牺牲，保卫上海战斗中，四行仓库内谢晋元团附率八百壮士的英勇奋战，在保卫南京战斗中，我数万将士的奋斗牺牲，在北战场上，有郝梦龄师长的英勇殉职，在台儿庄血战中，有王铭章师长的壮烈殉国，在保卫山西战斗中，有周建屏旅长的积劳致死，有叶成焕团长等的奋战至最后一滴血，有林彪师长的亲临前线受伤，在历次空战中，几百个英勇的青年空军战士，不顾伤亡奋勇杀敌，其中最著名的有大队长李桂丹等的壮烈牺牲，有陈怀民的以“肉弹撞敌机”的成仁壮举。在十五个月的战斗中，我数百万武装战士，在劣势武器条件之下，在敌军海陆空军毒气进攻之下，前仆后继，愈战愈勇，其内心和精神力量的来源，便是伟大的民族自觉和伟大的民族美德——为国忘家，为公忘私，为民族命运忘个人生命，所以才能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也只有将士和民众的英勇牺牲和艰苦奋斗，才能保卫淞沪至三月之久，才能保卫南口、忻口至最后关头，才能有平型关、台儿庄、药溪等处的重大胜利，才能使敌人的占领地缩小到重要城市及交通线，才能在山西、河北、察哈尔许多敌军后方省区内，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和进行敌后方的长期苦斗。也只有数百万武装军民的英勇苦战，才能支持已经进行的十五个月的民族抗战，才能建立下今后长期抗战的现有基础。只有把民族命运和民族荣辱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儿女，才能使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党派，相互尊重，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军队，相互敬爱。只有充满民族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感，才能有当代的史可法、文天祥一流的人物出现——如马士宏县长等之被俘不屈，如范筑先专员等的为国起义，如各地救国献金时，工人、车夫、小贩、老乞妇、小孩等均踊跃尽献其一日数

日或甚至一生血汗之所得，军界、政界、文化界、商界等个人或团体，大都能慷慨解囊，踊跃捐输。只有把个人爱、家庭爱转成为民族的伟大仁爱，才能见到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代表们现在所努力进行的“老人之老如吾老，幼人之幼如吾幼”一类的救济难民，保育儿童的运动和工作。也只有充满着大仁大勇的中华民族子孙，才能够以单机飞赴敌国境内，不投一弹，而只投下号召两国人民反对公敌的传单。也只有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廉洁美德，我们才能见到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内的每月由一元到五元——十元的薪水制度，我们才能见到山西、河北在敌后方区域的十五元一月薪金的县长，十八元薪金一月的行政专员，才能相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将肃清贪污劣习而造成全国普遍的廉洁政府和廉洁政治！

乙、中华民族现在为什么能够以空前的英勇姿态战斗起来？因为现在全民族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了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民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发动抗战、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根源。过去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衰弱不振呢？主要地因为民族力量的分裂和不团结。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了抗日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在民族大敌当前之际，为的共同反对民族公敌——日本法西斯军阀，过去敌对的阶级和阶层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农民到地主，包括中间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现在团结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抗日力量；过去的对立党派——国民党、共产党等等，现在合作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抗日核心；过去由历史环境形成的不同系统的军队——中央军、各地方军、红军等，现在团结起来成为统一的国防军队；过去因历史条件形成的

不统一的各种政府——中央国民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各地方政府等，现在统一起来形成为统一的中国政权；过去信任不够和仇忌甚深的各民族——汉、满、回、藏、苗、夷、番等，现在紧密团结为一致抗日的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中华民族，有了以蒋委员长为领袖的统一的国民政府作领导，有了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作民族武装自卫的骨干，有了国共两大政党作全民族团结的核心，所有这一切，就是中华民族现在能够英勇抗战和日益强固起来的基本因素。十五个月的对外英勇抗战，不仅扫除了积习已久的民族中萎靡不振的风气，不仅空前地提高了民族的自觉、自信和自尊心，不仅空前地锻炼了民族中一切有生力量，不仅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步，而且大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人士面前的威信，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中华民族的观感，引起了一切先进人类对中华民族的敬爱和同情。虽然中华民族今天仍然处在非常危急的境遇，虽然中华民族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还要遇到极大的艰险和困难，但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国的曙光（如毛所说），确已显现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面前。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现在不仅正处在空前的灾难时期，而且也正处在无上的光荣时代。

中国共产党中央可以向全党报告和可以告慰于我中华民族的一点，就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们不仅坚决主张“要生存，唯有战”的唯一正确的反对日寇侵略的主张，而且发起了团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发起了这一政策，而且为这一政策的实现作了几年继续的坚决的奋斗，并采取了最实际的有利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具体办法来促成这一政策的实现。为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并且

宣布愿与国民党一起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以达到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以推进和促成全中国各种系统的军队合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实行将苏维埃政府改变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民主政权，以推进和促成全国各种政权的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达到停止内战和各阶级团结抗日的目的。

三 目前的抗战形势正处在 严重困难的阶段

中国目前的内外形势，都说明我们抗战正处在一个比前此十五个月更加严重困难的阶段。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说明中国抗战可能有三个阶段，即防御、相持、反攻等阶段，同时，并特别指明现时为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含有严重困难的过渡阶段。目前这一过渡阶段的内外形势的特点究竟怎样呢？为什么目前这一抗战形势含有严重的困难呢？

（I）目前中国抗战的内部形势 的特点和困难

目前抗战内部形势的特点何在呢？其特点在于：一方面，日寇正以强大兵力包围武汉和进攻广州，同时并声明和准备继续进占西安、宜昌、衡阳、北海以东的地带；另一方面，中国军民虽然已英勇抗战达十五个月之久，虽然中国军民要尽最大可能来进行保卫武汉保卫华南的战斗，但是依靠现有的抗战

力量,不仅不能阻敌前进和停敌进攻,而且有武汉广州不保的极大可能的危险。这一形势正在和将要产生什么严重的困难呢?这一严重困难的根本标志,就是敌力增加,我力不足。第一,因武汉的危急和广州的待援,中日战争的战场更加扩大——原来是华中华北两大战区,现在又增加一大华南战区;虽然敌方也因战区增多和扩大而更加感到许多新的困难(如兵力不足,接济困难等),但敌方海陆空军力依然足以进行其新的进攻计划,而我方则大大地感到军力不敷分配的困难(抗战的主力军在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华中战场上,已感觉到极大吃紧;八路军等在华北战场上的力量,还仅能牵制敌人在华北的大部兵力——十三个师团左右,还不能对华中华南战场起直接牵制和配合的作用;这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第二,在不幸武汉或广州不守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在武汉广州都不能守的情形之下——而这种不幸的情形有极大实现的可能,——即是,中国最后的大的沿江沿海沿铁道线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城市不幸失守的情形之下,无疑问地将发生更大的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中主要的东西,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了,不过为的便于说明问题起见,我再简单地重复一下)。这些困难的中心问题是:抗战力量不够,和此后主要地依靠乡村边区来对抗城市中心(中例,俄例);即是第一,是军力不足,正规军游击队的力量不够停敌的进攻;第二,是财力不足,如外汇不稳,法币跌价,税收更加短少,支出更加增多,物价高涨等等;第三,是物力不足,军事运输和给养(衣食)的困难,军队接济的困难,广九路、粤汉路被切断,平汉路、陇海路被占领,不仅国际军火来源困难,即国内各战线军火接济亦大大困难;第四,是人力不足——这一点特别严重,中国抗战主要地靠无尽的人力,但现在因办法不善,确已感到人力的缺

乏——如征兵困难，前线无人服役等情形，而敌人方面，则不仅从国内增加兵力来华，并且利用占领地的扩大来企图更多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一步向中国进攻（如傀儡政权的扩大和某种程度的合流，尽力企图组织伪军，控制了中国的沿海沿江及铁路交通等）。由此就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的增长，意见分歧现象的增加，某些还在抗日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发生消极怠工以致叛变，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活动的加紧等等相伴而来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全中华民族极大的努力！

（Ⅱ）目前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 的特点和困难

甲、从中日战争整个形势看，说国际形势基本上于我国有利的观点，现在仍否正确呢？我们回答说：仍然是正确的。现在决定国际形势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有三点：（1）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苏联内部“谁战胜谁”——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份，还是资本主义成份战胜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解决，即社会主义完全战胜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苏联在工业生产上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国家，在农业机械化和集体化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在政治方面，苏联成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即基本上没有阶级分别）的实行斯大林宪法的最民主自由的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苏联成为没有失业，没有贫穷，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有衣穿，有房子住，有受教育权利，有提高文化和发展天才的最幸福最优裕的国家；因此，在国防力方面，苏联成为拥有最强大的海陆空各种军力的国家；因此，在国际政治关系方

面，苏联的比重和作用大大的增长了。“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成为一切愿意维护国际和平的人民、国家以至政府的团结中心，已经成为各国劳动者反对战争威胁的堡垒，成为团结全世界劳动者反对世界反动力量的有力武器，社会主义的胜利，把苏联变成为使居民的广大阶层，各阶级，各民族，许多人民和国家运动起来的力量，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与社会主义有利，与资本主义有害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最大的变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见共产国际七次大会通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及其全世界历史的意义》）。（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基本上分裂为愿意维持现状，维护和平的国家与极力主张重新分割世界，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代表第一种倾向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美国，在欧洲首先是法国，代表第二种倾向的国家，在西方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蒂，在东方是日本法西斯军阀。维持战后欧洲暂时稳定局面的凡尔赛条约，已经被德国法西斯蒂撕毁无余（停付战债，恢复全国征兵制，扩充海军，占领鲁尔、莱茵，吞并奥国，瓜分捷克等）；维持战后列强在华均势及太平洋上暂时完全的华盛顿条约，被日本法西斯军阀破坏无余（中国东北四省的被占，华北、华中、华南的被侵占，香港、新加坡、安南、菲律宾、南洋群岛等逐渐被直接威胁等）；同时，西方和东方的法西斯强盗，又公然订立了侵略同盟（即德日意的所谓防共协定）。这些事实在基本上逐渐形成着两种在世界范围内的阵线——即所谓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和平阵线方面的有法国、美国及动摇不定甚至时常危害和平的英国；同时，因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坚决最有力的柱石，所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和平事业上不能不与苏联合作，因此，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世界和平阵线到现在还未正式的(有成文条约法规的)形成，但它确具有极伟大的力量。(3)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先进人类的反战反法西斯蒂进步运动的增涨(继续两年以上的西班牙人民的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佛郎哥的英勇斗争，法国人民阵线运动巨大的成绩，美国罗斯福总统当选的胜利及法西斯蒂希特勒竞选的惨败，世界反战大会、反战青年大会、反战妇女大会的再接再厉的奋斗，各国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力量的人民阵线运动的进展等)。国际形势中这三点基本因素对于中日战争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的意义就是：第一、中国人民的对日自卫战争，能够得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邻国的援助。第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基本困难——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最近苏维埃运动均然——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动；现今中国民族自卫战争所直接反对的只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孤立无援的敌寇——日本法西斯军阀，其他对中国和太平洋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列强——英、美、法，在一定程度内和一定条件下，转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友人。第三、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世界一切先进人类反战反法西斯的有力组成部分，因而，它能够得到欧、亚、美、非、澳各洲无产阶级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声援。此外，日本虽与德意有条约关系，但得不到有力援助，同时，德日有冲突，德在经济、军力、财力上也不能助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比起中国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比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外国干涉时期，比起现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情形，均较为有利。

乙、目前我国抗战的国际形势的困难何在？

(1) 和平阵线未形成, 侵略阵线已形成(主要地由英国负责——反苏政策, 对德意让步政策, 英美矛盾, 法国政府的动摇, 美国孤立派的作祟均是原因)。

(2) 慕尼黑会议和瓜分捷克对于中国战争的影响。中国人一般的认识到欧战对于中国的不利, 但许多人未认识到这样解决捷克问题的方法对于中国的不利。日寇进攻广州的原因, 虽为海军预定政策之实行, 及对武汉军事之牵制, 但从国际关系方面看, 是英国的慕尼黑政策的直接结果(自由党报纸的引证)。

(3) 苏联外交情形的暂时困难(捷苏、法苏关系, 英之四强政策等)。

(4) 欧局紧张, 英国对远东暂不能实行真正强硬的政策, 美国孤立政策仍未打破, 且军备未充实。

(5) 对中国的最直接最大的危险, 就是外援(首先是军火)的暂时减少或部分断绝。

由此产生的基本困难是, 日寇利用这一国际形势更加紧对中国的进攻, 而中国不仅暂时难于得到国际更有力的外援, 甚至已有外援被技术条件(交通)限制和减少的危险。

丙、最近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有无好转的可能? 回答: 有。为什么?

(1) 从国联通过的制裁日寇的决议发展的趋势看——英法等态度; 日英现在矛盾更加紧了。

(2) 从美国主张召集国际会议解决捷克问题的态度看——华盛顿条约先例, 罗斯福、赫尔再三表示(特别本年七月十七日的谈话)反侵略及不承认日寇占领中国等。

(3) 苏联有更加积极援助中国的可能——根据是: 子、苏联革命发展的阶段(引国际七次大会决议九二——九三页);

丑、苏联的国防利益；寅、英美的态度等。

(4)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基本上将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明显对立，而和平阵线的力量终较侵略阵线强大(引斯大林与霍瓦德的谈话二五页)；邱吉尔、艾登演说(十九日通讯)及法英海军协定，殖民地问题，英日问题，英意问题等，矛盾加深。

但主要地还靠中国人民的努力。主要地努力方向应是：子、坚持抗战。丑、尽力保卫国际交通线。寅、加紧外交活动(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更亲密与英美法苏合作，促成国际联盟制裁决议的实行，首先须对英、美、墨西哥、澳洲活动，停止其军事供给日本(宋庆龄演说的引用；对墨西哥及澳洲政府的质问——新华八月二十四日；美国虽非国联会员国，但为九国公约签字国和发起人，且为公开反对侵略者，必须断绝军事原料给日本)。卯、建立与国际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国际，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等)及各国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等)以及一切反战反法西斯团体的亲密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更大的同情和援助，经过他们的要求和逼迫，来好转英法美各国的政策，来督促国际联盟会员国实行个别的以至集体的制裁日寇的行动。过去各国作了，我们很感激日、美、英、法、德、意等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但帮助不够，现在必须做到政府断绝日寇外援，给我们帮助。我们请求和希望社会民主国际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即以统一行动帮助我们！

然而国内外抗战形势的好转须要经过相当时期和中华民族极大的努力，而目前的抗战内外形势，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这是无可争辩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及全中国人民的责任，不在于掩盖困难的真相，而在于认识困难的实

质,同时,不仅在于认识困难的所在,而尤其在于不怕困难,并且找到了方法去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丁、敌人各种困难的增加。

戊、为求抗战胜利,必须向前进步。

四 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和 争取最后胜利的几个问题

泽东同志在其报告中已经指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具体办法,同时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五个基本任务,实现这些任务将不仅能停止敌之进攻,而且能准备我之反攻,以达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我在此地所讲的不过是与这一方面有关系的几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国抗战目前的根本困难,在于敌力增加,我力不足。由此可见克服困难的最中心问题是增加力量,具体说,就是要真正动员全中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来为抗战的军事服役,首先达到在军事方面能停止敌人前进深入,以便准备我国抗战的反攻力量。很明显地,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专靠军事本身,而主要地靠政治上的办法。怎样能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呢?

第一个问题。继续坚持“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方针,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的基本前提。为什么?因为只有继续坚持抗战,具体些说,只有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去坚决进行保卫武汉、保卫华南的战斗,以赢得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为准备在武汉甚至广州万一不守的情形之下,仍坚决地继续对日抗战,才是在事实上表示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的决心,才

能够在事实上产生出克服困难的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坚决地继续对日抗战，才能保证民族团结的巩固和扩大，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坚强团结和统一，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抗战威力的泉源。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增加抗战的军力到适合于各大战区的需要的数量和质量；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设法战胜财政经济的困难；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减少军需供给和军事运输的困难；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打破汉奸亲日派的挑拨离间妥协投降的阴谋；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增加敌方困难，才能增强国际外援；也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在实际上打破悲观失望和消极苦闷的情绪，才能在实际上提高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在目前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首先必须用一切力量打破某部分人的“暂时妥协”或“局部偷安”的有害思想和企图，必须用一切力量动员全体军民在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国策（引蒋最近对华侨宣言，十九日通讯第七页），必须使全体军民认识，在抗战的严重困难关头，任何对于坚持抗战的根本思想和实际行动的动摇和犹豫，将不仅使抗战的前功尽弃，而且有使抗战事业中断，而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危险！有没有投降妥协的可能危险？有！——对国际决议了解——对事实估计：甲、突然事件；乙、阶级观点（资级对财产等）；（1）北方安福系活动为一部份大地主代表；（2）汪精卫等活动亦不能只看作个人问题；丙、国际压力：德意（最近国民党通知）英态度——让步、分赃；丁、投降妥协重大困难。因此应强调反妥协，坚决在抗战中找出路一点!!!

由此可见：坚决继续抗战，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的第一必要条件，离开了这一基本前提，则一切均无从谈起！

第二个问题。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增加力量和克服困难和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是说，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全中华民族的团结。怎样巩固和扩大全民族力量的团结呢？

甲、首先就是要使参加抗战而有利害冲突的各阶级加紧团结。不错，十五个月的抗战大业，已经使中华民族内各阶级在基本上团结起来了。但是，应当承认，这种团结的程度，还远赶不上抗战事业的需要，同时，应当坦白地说，这种团结不够的原因，不能归咎于中国的劳动阶级。中国的劳动阶级——工人、农民、职员等，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已经做了为民族团结抗敌的模范。试看一看我国的工人阶级：交通工人（铁路、海员、汽车、邮电、码头工人等）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下英勇地工作着，国防工业工人（兵工厂、化学厂、矿业、军需工厂工人等）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情形下热烈地工作着，一切国营和私营企业及商店中的工人和职员，均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沉重地工作着，他们为的大敌当前，在抗战期间从未有过罢工、怠工等为难政府和有损生产的行动。试看一看我国的农民群众：认真地停止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行动，勤奋地为着满足前后方供给而增加生产，虽生活条件万分恶劣，但已少见为满足要求而进行反对本国抗战业主的激烈形式的斗争。同时，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了：抗战以来广大劳动者不仅出了自己的力量和供献了自己的生命（当兵、当夫、服劳役等等），而且还出了自己靠以为生的有限资财（各种捐税、救国公债、救国献金等等）。但是，反观我国的有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们，则除了敌军后方的

河北、山西有些地方的一部份有产者，在遭受敌军占领痛苦和我军收复失地重见天日的条件下，曾经在地方抗日政府调解和鼓励之下，自动地实行减租（由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减息（平均减为年利一分）之外，许多地方的地主资本家们，还多半不明国难严重敌当前的民族团结大义，还不能自动对工农劳苦群众作必要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如减租、减息、减税等），有时甚至于相反，有些人利用国难的名义来发所谓“国难财”（对劳苦人民加租、加息、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囤积居奇等），有些人仍对于劳苦群众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以至采取危害的行动（如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的许多县份的豪绅或地方政权的代表，逮捕甚至屠杀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的农民和劳动青年——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及非共产党员）。这些现象，无疑地妨碍着全民族加紧团结抗战的事业。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必须认识：只有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有最低限度的人权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才能够更加发挥他们的爱国意识和抗战热潮，才能使他们自动走进正规军、游击队，以增加抗战的军力，积极的帮助军队运输、担架、侦察等工作，以增加军队作战功效，努力地增加生产和供给衣食，以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同时，只有真正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的贡献知识，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才能使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为抗战建国大业而更加亲密团结。

乙、其次就是要使参加抗战的各党派能更加亲密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团结和长期合作。不错，十五

个月的抗战大业已经使中国过去互相对立的各党派建立了合作，但是应当承认，这种合作，显然地还远赶不上抗战建国大业和紧急抗战环境所需要的范围和程度。现在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提出各党派亲密合作的办法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六中全会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

首先说到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国际指示和泽东同志在其报告中，不仅指出了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必要与可能的各种条件，不仅指出了同其长期合作应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减少两党磨擦和奠定两党长期合作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值得党内外抗战同志们严重注意。那些办法呢？这些办法就是：

第一，再一次确切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和国民党一部份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便是以为共产党对拥护和实行三民主义没有诚意。我们这一次中央全会再一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士宣称：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诚意地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为什么？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中国现代历史阶段的全体人民的要求。对日抗战的目的，不仅在求得民族主义之实现——民族独立，而且为的要建立新的民权自由和民生改善的中华民国。所有三民主义的这些要求，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所发表的各种抗日救国的纲领（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的十大纲领，一九三七年八月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提的基本任务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一九二

三——二七年曾与国民党一度合作去共同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重新建立与国民党的合作，以便共同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央去年九月二十二日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中所提出共产党方面所担任的条件（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份，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政府等等），都已经一一彻底实行了；当然同样正实行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政策，但这一条的实行，不是一时一件事，而是包括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事业，而在今天战胜日寇的事业，首先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最具体最基本的办法和保证，因此共产党用一切力量参加对日抗战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就是真诚地实现三民主义的具体有力的实证。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便是言行如一，表里一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勾当，不仅是共产党所不屑为和所不能为的，而且是共产党所坚决反对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自己诚意地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且要向口头上说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不实行三民主义的任何人作斗争。

第二，再一次确切声明，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承认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领袖，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和国民党一部份同志所疑虑的问题之一，便是以为中国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工作没有诚意。我们这一次中央全会再一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士宣称：我们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是国民党的总裁，同时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领袖。当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口头上这样说，而且在实际上这样做。陕甘宁边区政府诚意地服从蒋委员长和国

民政府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忠诚地执行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都是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事实。自西安事变以来，我们党的中央及其代表对蒋委员长的爱护和亲切关系，更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当然共产党拥护民族领袖的方法与有一部份人有极根本的区别。我们不以为口头上空喊领袖为满足，我们同时要在实际上帮助和拥护民族领袖去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和达到三民主义的实现，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和拥护领袖的办法，是唯一真诚和正确的办法。另外有些人们，虽然口头上将拥护领袖的口号喊的非常响亮，实际上不仅不执行而且反对领袖颁布的有利于抗战建国的法令，实际上不仅不实行而且反对领袖主张发表的抗战建国纲领，结果影响所及，将领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希望，造成“抗战不胜，建国不成”的悲运。这样的人，不是拥护领袖，而是危害领袖。因此，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自己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而且坚决地反对任何口是心非，危害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大业的分子。

第三，再一次声明我们现在不参加国民政府，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及一部份国民党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便是说共产党企图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党的领导人曾再三声明过，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国民政府，现在我们中央全会再一次正式宣布这一点，当然更有力量。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共产党员在与抗战有根本关系的问题——政权问题方面，拒绝给政府以帮助，或不愿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抗战建国的利益，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事实证明，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尽力帮助政府的。例如政府需要我们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便将我们

最好的领导人材和中坚干部去担负这些工作；大家都晓得，担负八路军总副司令的便是我党的著名领导者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彭德怀两同志，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的便是我党的另一著名领导者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同志，同时在这两部份军队中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都是我党多年培养出来的有功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优秀人材和坚强干部。例如政府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去帮助国民革命军建立政治工作，我们便派遣我党著名领导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同志等去担负这一责任。例如政府成立初步的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需要各党各派各方面人材去参加，我党推定当选的便有我党的最著名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秦博古同志，中国革命元老及我党著名领导者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同志。例如，政府需要在敌人占领区去收复失地和恢复地方政权，八路军和共产党地方干部便努力在晋、冀、察、绥、热、鲁等省去进行建立抗日根据地，恢复我国地方政权的工作。

第四，明白地宣布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的支部，这一点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和小部份国民党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说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关于此一点，这次我党中央全会将郑重声明：为的巩固两党合作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征收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加入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共产党的支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抱着不重视或不友谊的态度，绝不是的；我们共产党员诚挚爱护每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官长和士兵，我们尊重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子孙，我们敬爱他们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忠诚战友，我们愿与他们作个人的骨肉之亲的弟兄和生死与共的朋友。

第五，明白地宣布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员中去征收共产党员，这一点同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同时也是一部份国民党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队伍中去吸收党员。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曾经一再向国民党同志说明过，国共两党党员合起来，也不过占中国人民的极少数；在广大中国民众中，存在着有成千累万的优秀儿女，可以作为两党发展党员的对象，两党尽管向无党群众大量发展自己的党员，根本用不着也不应该向友党中进行征收党员的工作。此次我党中央全会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不征收国民党员作自己的党员，不在国民党组织内组织自己的支部，这当然更加正式和更有力量。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员抱着什么歧视的态度，恰恰相反，这只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整个国民党及每个国民党员抱着友爱精诚的态度（泽东、洛甫同志报告都特别说明共产党员要尽力亲近国民党同志），这只是说中国共产党能切实地注意到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利益。

第六，再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进一步的经常形式的问题，这一点对长期合作很为重要。为什么？因为虽然在去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及九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代表国民党谈话公布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便已正式建立；虽然抗战一年来，两党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已为举世共见的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的前线上，两党武装同志的鲜血经常勇壮地汇流在一起，谁也分不清那是国民党同志的血，那是共产党同志的血，他们的光荣的血是为着反对共同敌人而洒流；两党同志的生命经常英勇地牺牲在一起，谁也分不清那个是为国民党的事业，那个是为

共产党的事业；他们的宝贵的生命是为着国共两党及全体同胞的共同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但是，应该坦白地说：直到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程度和范围，既不能满足抗战建国繁重工作的需要，也不能符合国共两党多数同志及全体同胞的希望。在共同担负挽救民族危亡这样伟大使命和艰巨工作的环境中，两党组织之间到现在还不过是存在着不经常的接洽性质的关系，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再三向国民党提议：建立国共合作的某种方式，民族革命同盟或国民革命同盟。具体些讲，就是国共两党须协商和通过一个共同遵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同时并成立一个由两党同志共同组成的遇事协商和共同工作的组织。关于纲领问题，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我们党的代表曾与国民党的领袖和负责同志，作过多次的意见交换。去年秋季，中央政治局曾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的包括四十余条的纲领草案；今年春季，我党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几位中央代表同志又曾经共同协商和草就一个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纲领草案；虽然这两种草案，我们均未曾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今年三四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以说实际上在基本原则方针方面，与两党负责同志过去一年多所再三交换过意见的纲领草案的内容，大致是一致的。因此，当抗战建国纲领公布之后，中国共产党便立即宣布：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方针——坚持抗战和争取民族国家最后胜利的根本方针，与中国共产党过去所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再三声明：中国共产党完全赞同国民党以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同时并愿用一切力量帮助国民党和

国民政府去彻底为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两党合作的纲领问题，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解决方案，即是可以拿抗战建国纲领作为两党抗战期间共同努力的基础。至于两党进一步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共中央在其今年三月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信中，已经具体提出过：或采用国共两党选派代表组织各级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办法和方式，只要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我们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具体建议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时并说明此次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民族革命联盟或国民革命同盟，其方式与一九二三——二七年不同，即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将名单公开，同时并不在国民党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这一提议是异常重要的。我们愿本此方针与国民党同志协商，以期得到实际的结果。

第七，再一次说明国共两党合作的正确关系，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一部份人不了解两党合作的应有的正确关系，或者因为过去的成见而暴露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或者因为不了解党派合作应有态度而闹出许多无谓的行动。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及泽东同志的报告，再一次说明两党合作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友爱，既说不上某一党投降另一党的说法，也不应有某一党压迫另一党的事实，更不应有某一党并吞或消灭另一党的企图。党与党之间，互相尊重友党的党格，两党同志之间，互相尊重对方革命的人格，这是发生两党同志亲爱精诚和友谊团结精神的第一个力的来源；这是保证两党合作愈久愈坚和愈长愈密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否则以互相轻蔑代替互相尊重，以互相

仇嫉代替互相友爱，引起相互间不必要的磨擦，增加相互间可以避免的误会，结果甚至引起相互间的严重纠纷和冲突，在现在中国抗战条件之下，只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只是有利于日寇和有害于中华民族的事情。

同时，泽东同志报告说明：国共两党是共患难、共生死的关系，所以两党不应互相竞争，互相削弱，而应该是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因此报告中特别提到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力量问题。的确，从抗战建国的利益看来，国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之统一团结，国民党力量之壮大，不仅于国民党有利，同时即是于抗战有利，于民族国家有利，亦即于共产党有利；同样，共产党之巩固与扩大，亦于国民党有利。因此，如有国民党员希望共产党削弱或失败，实际上客观上即等于使国民党削弱或失败；同样的，如有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有如此希望，亦为有害。此等党员均为不明民族大义，不知同处利害，不知国共唇亡齿寒之相依为命关系者，必须加以说服教育纠正；如知而不改，则不仅为国家民族之罪人，亦为本党利益之叛徒。当然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只是靠共产党一方面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国民党方面的努力，尤其因为国民党是在国家政权中及军队中居领导地位的政党，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负更大的责任。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利于抗战的事业起见，我们希望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方面对于许多不利国共合作的严重现象，立即加以合理的解决。例如：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还有大批的被监禁共产党员，须立即释放；还有个别地方常有暗杀或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实发生，须严加制止；还有公开反共的报章杂志出版，须严厉禁绝；还有许多地方公然不承认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地方党部合法权利的现象存在，须立加纠正；在有些训练班或学校内公然进行反共教育和反共宣传，须

严加取缔。同时我们希望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六中全会向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建议，讨论和实行两党更进一步在政治上、军事上、民众运动方面长期合作的办法。国共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愿望，而且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朋友的希望。只有国共长期合作，才能保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增加抗战力量，才能够渡过难关、克服困难，才能够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现在说到巩固和扩大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切党派中最大最有力和拥有最多群众的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是一切抗日党派合作的基础，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同时国共两党，并不能包括中国人民中所有的有组织的抗日力量，在国共两党以外，中国还存在着许多参加抗战的党派，如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这同样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建立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以增厚抗战建国的力量。抗日各党派亲密合作的具体办法，如能依据我们以上所说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来采择施行，一定能得到可观的效果。为加强中国各党派及各种抗日力量之间的合作，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须在党内外人士中间解释清楚：

子、对国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党派的认识和估计问题——许多人根据过去经验认为他们均无前途是不对的，因为（A）国内情形变了；（B）他们参加抗日；（C）他们有合法地位；（D）中国有许多中间阶层；（E）中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路上走。

丑、所谓“中国法西斯蒂”派问题——我们曾经再三指出过，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中最反动、最主张狭义的大国主义、最无理性的“恐怖的专政”，其对内表现为恐怖专政，对外

的主要标志是侵略战争。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历史条件，没有组成象德意那一类的法西斯蒂党派的可能；同时，在中国人民遭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和德意法西斯恶魔敌视的今日，更没有形成效法德、意、日的法西斯组织的条件。因此我们再三地公开说明，不能将中国某部份人看成法西斯蒂派。然而应当坦白地说，中国虽然今天没有明目张胆的法西斯组织，但是确有一小部份人相当地受了外国法西斯思想的渲染，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自命为法西斯蒂的学徒——至少是法西斯的手段和方法的学习者。正因为如此，不仅有些局外人有时不免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法西斯蒂派的份子，而且他们本身也时常过着思想混乱和行为矛盾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自称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但是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内容是民族解放，法西斯蒂民主主义内容是民族侵略；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内容是民权自由，法西斯蒂根本反对人民有民主自由，对人民实行恐怖的专政，对思想实行无理的统制；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内容是民生幸福，法西斯蒂是只顾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不顾劳苦民众的死活，拚命帮助大地主大资本家剥削劳苦人民，不允许劳苦人民要求改良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怎能不陷入混乱的境地！他们之中许多人，不仅口头上宣布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政府领导抗战，而且实际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某些部份的工作。在对外政策上，抗战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法西斯军阀，为的抗战的利益，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实行联合英美法苏的外交路线，同时反对帮助日寇的德意法西斯蒂；但是他们为的受了一些法西斯思想的熏陶，于是一方面虽然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工作，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进行袒护德意法西斯和反对英美法苏的宣传。在对内政策上，为的抗战建国的利益，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实行国

共及一切抗日党派合作的政策，但是他们为了受了法西斯思想的麻醉，于是虽然一方面高呼拥护领袖，拥护国民党既定的国策，另一方面却又实际上或明或暗地盲目地进行反共的运动。蒋委员长的言论指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都一再明确的指出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必须组织工、农、商、学、文化、妇女、青年各种群众团体，必须在抗战期间尽可能改良人民生活，但是他们为了有了法西斯思想的错误，于是，一方面虽然高呼拥护领袖训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但另一方面却实际上不执行领袖的这些重要训示和抗战建国纲领的这许多重要的规定。这样一来，他们的言行怎能不矛盾！为的抗战建国的利益，为的各党派亲密合作的利益，特别是为的这部份青年朋友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和前途，我们诚恳地希望和忠告他们说：你们之中许多人是勇敢有为的青年，应该赶快从这种思想混乱和言行矛盾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应该毅然抛弃那些反民族解放和反社会进化的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诚诚恳恳地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寅、所谓“中国人民阵线派”——我们再三说过，这种称谓只是一种无根据的误会和有作用的谣言。关于这一点，不仅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曾再三客观地说明过：中国现在的国家状况和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有进行内争的人民阵线；同时那些被指派为“人民阵线”的救国会的朋友们，曾经再三再四地在言论上、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是坚决拥护政府领导抗战的，他们有时虽然对政府某些措施有所批评建议，但其根本动机，绝不是反对政府，而只是为的帮助政府和爱护政府。为的抗战建国的利益，为的团结全民族力量的利益，为的国家收罗一切有用人材的利益，我们诚恳地希望和忠告对救国会朋友

们有这种误会的人们，赶紧放弃成见和消除误会，因为救国会朋友之中的许多人，确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一部份，确是抱着满腔热血愿在蒋委员长及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

今天中国抗战的严重困难关头，需要一切民族力量的团结，所以消除各党派间的误会和成见，建立抗日各党派间的亲密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亲密团结合作，才能保证全民族力量动员起来去为抗战的军事服务。

丙、必须将四万五千万人民组织起来。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人多”、“地大”、“物博”虽然也有其一定重要的作用，如斯大林所说，十月革命胜利的六个条件中的最后两个便是——《论反对派》一二八页。对此问题引蒋的话，抗战建国纲领的话，承认都是对的，但是“人多”是一切条件中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必须懂得：仅仅人多，并不能成为保证不亡国的力量（如印度是），人多须有组织才能成为力量（现在无组织的痛苦；有组织为什么能保证兵力、物力、财力、智力的动员——工、农、商、学、文化、妇女、青年、儿童的作用；以现在八路军区为例，以北伐为例，以红军为例，以苏联内战及反干涉为例，以西班牙为例）；但要使民众有组织，必须给予以民主自由和相当的生活改善。

丁、加紧肃清汉奸敌探工作，加紧反对亲日派斗争。

(1) 汉奸敌探与亲日派的实质和异同：

子、汉奸——(A)傀儡政权及维持会等；(B)打信号枪及侦探；(C)隐伏在各机关内的日寇奸细。

丑、亲日派——还不是汉奸，他们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但(A)其客观作用与汉奸同；(B)其前途可变为公开汉奸（如王揖唐、陈中孚等）。

(2) 尽量揭发汉奸敌探与亲日派挑拨离间的阴谋：

子、揭穿抱怨中国不应抗战，要求改变抗战国策的阴谋（如日寇策动北洋系军阀通电呼吁和平，或汪精卫等进行的所谓抗战办法不对等）——揭穿办法：以中日关系作例（见《陈集》^①一五九——一六〇页），以奥、捷做例，阿也可作例，以俄、西作例，指明只有抗战是生路，妥协即是投降，投降即是灭亡。

丑、揭破挑拨离间的方法，坚决打击其阴谋。如：

(A) 破坏国共合作，利用国共过去成见及现在磨擦，见国非共，见共非国——答复应是抛弃成见，减少磨擦。

(B) 破坏蒋委员长威信——给以答复。

(C) 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给以答复。

(D) 挑拨政府与民众关系——办法与答复。

(E) 挑拨和瓦解军队——统一团结友爱做答复。

(F) 破坏共产党。

(G) 破坏国民党。

(H) 进行德意外交活动破坏英美法苏与中国的关系。

妥协投降的企图是越战越难，但亲日派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妥协投降的危险仍有可能发生。

(3) 托洛茨基奸徒是最狡猾的日寇奸细：

子、为什么其理论恰为日寇所欢迎，因为其理论是从日寇的武库中搬运出来的（如《胜利之路》、《斗争》、《抗战与文化》等与《新申报》、《庸报》行为主张一致）。

丑、两面派手段和方法，特别是以“左”做词句，掩盖汉奸面目，例如：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并行，民族战争必须与土地革命同时并行，各阶级各党派不

^① 即《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初版。

能合作等等。

寅、极力钻入军队和地方武装。

卯、国际间谍网之联系。

辰、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堕落成法西斯主义的工 具？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所谓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根源：一是不相信农民革命作用，二是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三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表现——打倒沙皇，工人政府，但无西欧工人同时帮助不能保证胜利。一九一五年开始争论的一国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不了解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斯大林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当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胜利（羞忌——仇恨），另一方面为困难（害怕——投降）时，由不相信走到仇视，由反党走到反苏维埃反工农，由联络白党军官、秘密反党印刷工作走到公开与国内反动分子（资本主义残余，外国最反动的苏联仇敌）一起——苏联数次破案托派分子的供词（找几点为证）可证。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其最大错误根源有二：一是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特点，将帝国主义国家革命与殖民地革命混为一谈（否认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与必要）；二是不了解中国封建余孽的特点（商业资本与封建余孽否认农民革命作用及土地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民族统一战线阶段时成为反对者，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开始阶段中，走到与地主阶级一起去反对工农及土地革命；而在新的统一战线时期，一方面由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腐化堕落，另一方面由于国共合作形成，遂走到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方面去——明的或暗的反对国共两党及抗战，因而成了全中华民族的公敌。一部份国民党员及其他派别利用托派的危险——如张慕陶、王公度例子。反托派斗争是反汉

奸斗争的一部份,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

戊、广泛宣传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理论,提高民族自信心。(1)民族革命战争的必然性、进步性、正义性、神圣性(引列宁均见《解放》九页);(2)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引列宁);(3)几万万人的努力能克服技术落后的弱点(引列宁:举北美战争例;苏联例;战争最后的胜利由活的人来决定)。

五 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的中国共产党

毛及洛甫报告说过,我不过企图根据他们的方针发挥其中几个问题:

(I) 共产党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困难和成功

政策转变实质:对外——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到只抗日,并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内联合他们抗日。对内——(1)过去国共对立问题提法是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建国;(2)过去苏维埃与国民党政权对立,问题提法是或者苏维埃政权,或者国民党政权,现在共同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3)过去红军与国民革命军对立,问题提法是或者红军,或者国民革命军,现在是共同建立抗日的统一国民革命军。

所有这一切首先为的从国内战争转到对外民族革命战

争，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增加大量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力量。这种政策完全合于列宁主义策略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特点。

这种政策转变，对中共及各国共产党均是空前的，所以很不容易的，很困难的。成功原因及其条件：党中央的领导；蒋领导国民党改变政策；八路军的努力及威信；全国各党派军民的赞助；共产国际的帮助。

（Ⅱ）中共当前的历史任务

中共要与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力量一起，为共同驱逐日寇出境，创造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共产党员要在这一伟大历史斗争中从事实上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一部份，是最能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事业而战斗而牺牲的英勇、坚决、先驱模范的战士，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正确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Ⅲ）怎样才能正确的实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毛、洛均指出，我们要做模范，即是：一方面我们要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原则，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同时在军、政、民运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一起

模范作用之点有七；不足之点有三；政——陕甘宁、晋察冀等地区之廉洁奉公等模范；民运——大公无私，深入群众，统战作风，不包办等模范)；另一方面要保持共产党及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的做到这样恰到好处，必须对下列问题有清楚的了解：

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党派为反对共同敌人的政治联盟；内容在中国现在包括有各党派、各阶级、各政权、各抗日军队、各民族问题。

(2) 与一般的统一战线、人民战线及民族统一战线的异同的说明。

(3) 因此，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有广大力量和长期存在发展前途。另一方面包括有内部的严重斗争，而且只有在适当的斗争中才能巩固才能发展。

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互相之间的正确关系：

(1)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

子、三民主义的实质(根据第一次大会宣言解释)及其社会根源和社会实质(《列宁选集》七——三四五——三六五页)。

丑、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异同：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中大同，土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方法不同；同时，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则只属于共产主义的。

(2)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相互关系：

子、三民主义的实质决定了国民党在各阶段均是各阶级的联盟(毛报告指出)。

丑、民十三改组后的国民党与改组前的国民党有何根本不同：(A)前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即为资产阶级单独为领导

的,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即无产阶级带领农民加入联盟(斯大林:《论反对派》六二一页);(B)前者工农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的,后者工农以共产党为代表加入的。

寅、国民党中的阶级矛盾及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与其实行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尤其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没有革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造成了一九二七年的两次分裂。十年经验证明国民党的当局反对土地革命,所以此次国共合作时有停止土地革命的条件,此点今后也必须注意。

卯、现阶段国共重新合作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意义,中国革命的阶段问题(引斯大林——见《论反对派》六四五页),现阶段的实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同于前次反帝资产阶级革命,又非前次资产阶级革命,因(A)除资产阶级外,抗日地主阶层及英美买办也加入,其唯一目标是抗日的;(B)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部分领导的;(C)劳动人民有武装力量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因无土地革命)。所以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战略的转变;所以我们说:民主共和国是新式的。

丙、国民党与三民主义能否向前发展?有可能,但要有许多国内外条件及共产党极大努力。

子、斯大林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工农党问题的指示(与中大学生讲话:《论反对派》五六六页)。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指示,我们的预测:(A)过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等为反对土地革命而分裂,有一小部份国民党员赞成工农运动;(B)抗战中阶级力量变动;(C)土地问题的改变办法可能——可采取没收及付价等办法。

丑、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如何发扬

(列宁对中山主义的指示,见《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文)。

丁、由此可见:

子、为什么共产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为实现三民主义是诚意的;

丑、为什么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是必要与可能的;

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在那里;

卯、为什么共产党要对国民党起推动和影响作用——即就是说:自己要前进些,同时要督促他人前进,不能完全随国民党的当时意志为转移,同时也不能走得离国民党太远。

戊、如何推动和影响?

子、对许多问题提出主张和建议,与之讨论。举例说:

(A)对抗战问题。

(B)对民主问题。

(C)对民生问题。

(D)对两党联盟问题。

(E)对青年问题。

(F)对保卫武汉问题。——附带说明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前途与今日口号),党的口号与变成群众口号问题(以中国为例——对抗日、对民主共和国口号等)。

丑、经过协商、说服,动员国民党内进步份子及动员群众逼迫等方法来达到目的。因此:

寅、为的交涉,提议不能过高到现在国民党根本不能接受的东西,也不能过低到只是国民党所想的那样。

己、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问题。

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本质上首先是农

民解放问题(引斯大林)——在中国首先是工农劳苦大众的本身解放问题,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看,不仅是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和侵略,而且是反对财政资本的阶级斗争(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三二页),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和本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看成民族的代表,而不应当把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让给资产阶级作为独占的政治资本(季米特洛夫七大报告九八页),否则异常有害:(A)中国的例子——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分裂时资产阶级以“民族”资本反对我们的教训;(B)德国共产党失败的教训。

丑、但是,同时,民族解放运动,不只是工农劳苦大众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同时又是包括一切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阶级和阶层(连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份地主在内)共同斗争的问题;特别是当外敌武装侵入国土和有产阶级握有极大国家政权实力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政党及劳苦大众,不能不集中一切民族力量去反对外来武装的敌寇。因此,(A)不能不把阶级斗争的现时的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全部的和根本的利益;(B)因此,不能不改变阶级斗争的口号和方式,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工人反对政府的政策和反对资本家的强烈斗争形式等(附带说明阶级合作问题)。

寅、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中,绝不能取消阶级斗争,只能够改变阶级斗争的方式及和缓阶级斗争的程度;同时,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本身中,就含有极严重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同盟者影响及领导权的斗争,此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推动和吸引千百万城乡劳动者(工人、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卷入革命斗争的最有效手段(引斯大林指示)。

卯、必须正确的了解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的相互关系——两者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一个东西;可以分开,可以合流;根据过去经验,这两个革命多半是分开进行的。问题是一个战争还是两个战争同时并行。过去有些人对这方面的误解,必须纠正。必须记住: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不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整个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因为帝国主义才是这些国家的最首要最根本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在各阶段上握紧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和努力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

辰、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放战争不仅是全民族有生力量的锻炼,而且是各阶级各阶层在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大演习;因此,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自卫战争的开展和胜利,在根本上,不仅不能消灭或削弱阶级斗争,而是为阶级斗争开辟出最广泛的战场和安排下更深广的基础;因此,在民族解放斗争(或战争中)各阶级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努力的程度,不仅将决定这个或那个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阶段中的地位,而且将影响到战后一定历史阶段上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及其政治的和经济的地位(以中国现在为例说)。

由此可见,总的结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员必须要用满腔热忱和无限英勇地去参加抗日民族战争的事业,因为这是他最切身的血肉关联的事业;共产党员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一部份,而且正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和劳苦大众的忠实代表。

(IV)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的正确了解

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无

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不同：

(1)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子、狭义的以本阶级为代表、为本位；丑、反对外族对自己的压迫和竞争；寅、自己有可能时仍压迫其他民族(如中国、捷克、波兰等)；卯、在脱离民族压迫时准备同样实行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

(2)无产阶级相反：子、以自己 and 全民族为本位；丑、彻底进行解放全民族的斗争；寅、根本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对内主张各民族平等，对外胜利后亦不压迫任何民族。

乙、革命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永远是一致的：

(1)以苏联为例(斯大林：《论反对派》四五六——四五七页)；

(2)以西班牙为例(引斯大林)；

(3)以日本德意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斗争为例；

(4)以捷克为例；

(5)以中国现在为例。

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1)在帝国主义国家：1.反对本国帝国主义；2.援助被压迫民族。

(2)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表现：1.反帝解放斗争；2.同情和帮助各国革命斗争。

丁、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特有物，同时，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之所在(世界阶级与世界联系)，因此，国际主义者参加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最坚决最彻底的战士(引马克思)，同时，他的参加使这一运动成为更有力的运动——国际解放运动的一部份和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援助。由此，应该得到的结论是：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党，因而不要民族主义不要保卫祖国，因此抗日不是共产党应有和应做事的人们，有些是对共

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实质不了解的人，有些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如叶青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问题》便是明例)。事实上，共产党员之所以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而且正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V) 正确的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甲、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来源：(斯大林指示，恩格斯指示，见《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一九六——一九八页)：

(1)“左”右的阶级根源(恩格斯指出)；

(2)“左”右倾在革命中发生的必然性及历史时间性(引斯大林《论反对派》六四四页)；

(3)“左”(瞿、李)右(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分析问题的方法(对敌我过或不及的不合实际的想法)；

乙、“左”右机会主义的异同和相互关系(斯大林指示，见《列宁主义问题》三六三页)：

(1)以托为例；

(2)以陈独秀主义为例；

(3)以立三路线为例；

(4)以张国焘路线为例(原来“左”——硬拚，以后右——逃跑悲观；以后对统一战线“左”——对张、对蒋；以后右——主张取消党等以至叛变)。

丙、现阶段“左”右倾的主要危险和根源何在？

(1)季米特洛夫指示的危险——“左”为破坏或不注意统一战线，右为作尾巴失去独立性(见季米特洛夫中共十五周年

论文)；

(2)斯大林指示的所谓“到民族浪潮中浮水淹死”的意义。右到作资产阶级尾巴,完全同化于国民党。“左”脱离群众,不能真正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同样会使共产党孤立和失败。

丁、正确的斗争方法:

(1)真正到了倾向,则应打击(斯大林《论反对派》六四四页)。

(2)戴帽子问题——不能乱戴帽子。

(3)深广的教育说服工作(毛、洛说的均对)。过去立三路线,上海工作时期,中央苏区后期方法等不对。

(VI) 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甲、现时条件下理论特别重要性(引《列宁主义问题》上册一六一——一七页)。

乙、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上对此问题指示的重要,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同时,要注意以下各点:

(1)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政治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因此,必须加紧学习马、恩、列、斯学说。

(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引季米特洛夫报告一〇一

页)；

(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

(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

(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具体例子，联邦共产党经验的国际意义(列宁说布尔塞维主义原则对于各国均是适用的)；法国经验，西班牙经验对我党新政策之影响；德国经验的宝贵；美国此次大选及工农党经验；各国国会斗争的经验等。同时，中国经验对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均有用处。

(VII) 特别注意党员干部和非党人材问题

甲、一部份党员对非党员的不正确关系问题。

乙、党员与非党员正确关系(少数先锋队，广大后备军)。党员离开非党员，如鱼离水，因此，善于接近和帮助非党员(否则即忘记了来源，忘记了责任)，是每个布尔塞维克应有的品质。

丙、要改造社会及解放人类，必须各种党的和非党的人材共同努力。

丁、中国现在条件下非党人材的特殊作用：

(1)过去推动统一战线，如救国会朋友、鲁迅等伟大作用。

(2)现在非党人材的作用。

(3)将来还有更大的作用。

(Ⅷ) 认识领导机关及领导者的严重责任——对全党及同情者之影响，对下级犯错误之应有态度(纠正而不是袒护——如对蒋所说的)

(Ⅸ)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团结统一，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引用国际指示及毛、洛报告，并说明政治局讨论均着重此问题之意义。中国党现在力量还不够；须使党成为全国党和群众性的党，党须有各种人材和有威信干部；现在已有宝贵人材——党、政、军、民等干部，但还不够用，因此，须使党的各种力量发展。在党发展及统一问题上，特别注意日寇利用其走狗——托匪等混入以两面派手段作祟问题。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我们党的伟大任务——四万万人民最后的命运握在我们党手里，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存亡关键由我们负责，每人须感觉到大时代的大责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不辜负国民革命导师(孙中山——见《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所载，《解放》第九页)及世界革命导师(引斯大林对中国估计，见《陈集》二二八页所载)的希望。同时，也就是不使日寇的朋友(引德国对日估计，见《陈集》二二九页所载)，这类估计失望。换句话说，有四万万人民团结统一的艰苦奋斗和长期努力，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

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署名：王 明

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①

(1925—1940)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一九二五年		
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	5月10日武昌商科大学《商大周刊》 第三卷第五期	陈绍禹
三种不同的面目	同 上	绍 禹
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 希望	同 上	陈绍禹
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 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	写于5月27日，发表于12月武昌 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	同 上
一九二七年		
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 权问题	写于5月26日，发表于6月15日 《向导》周刊第一九八期	
英俄断绝国交问题	写于6月1日，发表于6月8日《向 导》周刊第一九七期	同 上
一九二八年		
《武装暴动》的序言*	写于5月16日，发表于1929年4 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 六期	韶 玉
广东暴动纪实	写于11月1日，收入1930年12月	同 上

① 这个目录是根据我们已收集到的资料编的，内容包括文章、讲话和通讯。凡已收入本书的篇目，一律在篇目右上方加*号。凡同一篇文章有不同出处的，选几个主要的出处列出，以便于读者查阅。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著 名
	25 日出版的《广州公社》	
	一九二九年	
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9 月 1 日《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十期	韶 玉
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0 月 12 日《红旗》第四十八期	同 上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	写于 10 月 15 日, 发表于 17 日《红旗》第四十九期	慕 石
准备着应战	11 月 7 日《红旗》第五十一期	同 上
太平洋会议的内幕——赛狗会	同 上	同 上
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	11 月 10 日《红旗》第五十二期	同 上
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	11 月 13 日《红旗》第五十三期	同 上
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	11 月 13—16 日《红旗》第五十三—五十四期	同 上
太平洋会议的总结	11 月 16 日《红旗》第五十四期	同 上
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	11 月 20 日《红旗》第五十五期	同 上
反对派还是反动派?!	同 上	同 上
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	11 月 23 日《红旗》第五十六期	同 上
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 究竟是什么?*	同 上	同 上
论陈独秀*	11 月 27 日《红旗》第五十七期	同 上
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	11 月 30 日《红旗》第五十八期	同 上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	同 上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调和倾向与调和派	同 上	同 上
“西北问题解决”后	12月4日《红旗》第五十九期	同 上
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	同 上	同 上
检阅我们的工作	同 上	石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	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十一期	慕 石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	同 上	同 上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	12月7日—1930年1月4日《红旗》第六十、六十七期	同 上
“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战争	12月11日《红旗》第六十一期	同 上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同 上	同 上
“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	12月18日《红旗》第六十二期	同 上
军阀战争与取消派	同 上	同 上
没有一个好东西!	12月20日《红旗》第六十三期	同 上
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	同 上	同 上
为那一种“民主政治”而战?	12月25日《红旗》第六十四期	同 上
欢迎朝鲜的“五卅”	同 上	同 上
阎张等通电后的政局	12月28日《红旗》第六十五期	同 上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的中国	1月1日《红旗》第六十六期	慕 石
“狐狸尾巴都露出来	1月4日《红旗》第六十七期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了!”		
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	1月8日《红旗》第六十八期	同 上
军阀战争的“成绩”	1月11日《红旗》第六十九期	同 上
为什么反对派要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	同 上	同 上
再论反富农问题——富农问题的严重*	3月26日《红旗》第八十七期	韶 玉
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	4月10日《劳动》第二十八期	兆 雨
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	同 上	玉
“四一二”与蒋介石	同 上	石
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	同 上	慕
要饭吃! 要工作! 要土地!	5月1日《劳动》第三十期	石
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	同 上	同 上
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	5月14日《劳动》第三十一期	兆 雨
“赤俄”与“白俄”	同 上	石
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5月15日《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	韶 玉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 ——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	5月17—24日《红旗》第一〇二——一〇四期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著 名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 胜利的意义与教训	5月23日《劳动》第三十二期	兆 雨
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險口 号!	同 上	同 上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	同 上	玉
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	同 上	石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 的胜利	5月27日《红旗》第一〇五期	韶 玉
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 行动起来!	6月7日《劳动》第四十三期	石
什么是“流氓”与“匪”?	6月21日《红旗》第一一二期	韶 玉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 土地”——还是“没收 一切土地”*	7月2日《红旗》第一一五期	同 上
两条战线(又名:两条路 线的斗争、为中共更 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 争)*	写于1930年秋冬, 1931年7月15 日出版单行本。	绍 禹
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 义第三时期	12月14日《实话》第三期	韶 玉
一九三一年		
中国反帝运动的新高 潮*	11月《共产国际》(俄文)第三十二 期, 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 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王 明
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 动——在赤色职工国 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上的发言(又名:	《国际工人运动》(俄文)第三十六 期、1932年《赤色工会国际》(俄 文)第一——二期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中国的革命危机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	
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又名: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	3月31日《布尔什维克》(俄文)第五、六期合刊,6月于苏联出版中文单行本	王 明
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	《革命的东方》(俄文)第三——四期	同 上
苏维埃中国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	《共产国际》(俄文)第二十三期	同 上
国民党组织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新策略	《共产国际》(俄文)第二十五——二十六期	同 上
广州公社五周年和中国现状	《共产国际》(俄文)第三十五——三十六期	同 上
	一九三三年	
东北情形与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又名:东三省情形和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	《共产国际》(中文)第二期、《共产国际》(俄文)第四——五期,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王 明
给亨利·巴比赛、罗曼·罗兰和巴黎反战青年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信	《共产国际》(俄文)第八期	同 上
五卅事变八周年及中国现状	《共产国际》(中文)第六期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中国红军底大胜利	《共产国际》(俄文)第十八期、《共产国际》(中文)第八期	同 上
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	《共产国际》(俄文)第二十四期、《共产国际》(中文)第九期、《中国问题》(俄文)第十二期	同 上
《苏维埃中国》引言	写于9月27日,载于1933年苏联出版的《苏维埃中国》	同 上
中国革命运动的苏维埃阶段——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的报告	《中国问题》(俄文)第十一期	同 上
革命 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又名: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	《共产国际》(俄文)第三十六期,1934年《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中国问题》第三期	同 上

一九三四年

中国革命不可战胜——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周围世界》(俄文)第三期	同 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	2月21日《斗争》(油印,上海版)第六十四期、6月30日《斗争》(铅印,苏区中央局版)第六十六期	同 上
东方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青年共产国际》(俄文)第三期	同 上
苏维埃中国的新形势与新战术(又名:新条件)	11月23日《国际报刊通讯》(英文)第二十六期,收入1935年苏联出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与新策略)	版的《新条件与新策略》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又名:十三年来来的中国共产党)	11月30日《共产国际》(中文)第十一期	同 上
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又名: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	11月30日《布尔什维克》(俄文)第二十二期,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新条件与新策略》	同 上
中国苏维埃是特殊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订正速记报告)	《共产国际》(俄文)第三十一期、《马列主义函授教程》第十一期	同 上
一九三五年		
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又名: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论反帝统一战线)*	8月发表于苏联《真理报》、《革命的东方》(俄文)第四期、《共产国际》(俄文)第二十五期,10月在巴黎出版中文单行本	王 明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序言	载于1935年苏联出版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	同 上
一九三六年		
新形势与新政策*	1月9日——3月10日《救国时报》第六——十七期、《共产国际》(中文)第一、二期合刊、《共产国际》(俄文)第二期	王 明
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	1月29日《救国时报》第九、十期合刊	同 上
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	同 上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年纪念		
致罗曼·罗兰信	写于1月19日,发表于4月10日 《救国时报》第二十三期	同 上
怎样准备抗日	4月30日《救国时报》第二十七期、 《全民》月刊第四期	陈绍禹 (王明)
致纽约《商报》主笔信	写于5月27日,发表于6月5日 《救国时报》第三十三期	王 明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名:为中国人民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十五年、新中国论)	《共产国际》(中文)第四——五期、 《共产国际》(俄文)第十四期、《共产国际》(英文)第四十四期、《救国时报》第五十五、五十六期(“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专刊)、 《全民》月刊第七、八期合刊、《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陈绍禹 (王明)
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共产国际》(俄文)第八期、《共产国际》(中文)第五期	陈绍禹
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7月12日《救国时报》第四十二期	同 上
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	10月25日《救国时报》第六十三期	陈绍禹 (王明)
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	11月12日《救国时报》第六十八期	同 上
一九三七年		
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团结救国论)*	《共产国际》(俄文)第三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第八期、《救国时报》第九十四期	陈绍禹 (王明)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悼冯洪国同志	8月5日《救国时报》第一一五期	同 上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共产国际》(俄文)第八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第十七期、《共产国际》(英文)第十期、《救国时报》第一二三——一二四期、《解放》周刊第二十六期、《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	同 上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时之中国(又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	11月7日《救国时报》第一三二——一三三期、《共产国际》(俄文)十一——十一期、《共产国际》(英文)第十二期	王 明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	收入1941年编的《六大以来》(上)	同 上
与合众社记者白得恩的谈话(又名: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及对抗战的各种主张、谈国共两党合作的任务)	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国共合作与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三集等文集	陈绍禹
挽救时局的关键*	写于12月27日,发表于《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四期、《解放》周刊第三十期、《救国时报》第一五二期 一九三八年	同 上
谈抗战中的几个问题——在抱冰堂的演讲	1月20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八期	陈绍禹
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1月下旬《战时青年》第二期。收入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又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	《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	
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	2月11日《新华日报》	同 上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写于3月11日,发表于《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解放》周刊第三十六期	同 上
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年	3月12日《新华日报》	同 上
今年五一节与中国工人	5月1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第三十六期	同 上
中国青年和国际青年联合起来——在招待世界学联代表团会上的欢迎词(又名:世界青年与中国青年的团结)	5月26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同 上
在《新华日报》招待战地记者会上的发言	5月28日《新华日报》	同 上
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共十七周年	收入1940年出版的《英勇奋斗的十七年》	王 明
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	收入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陈绍禹
过去与将来	7月7日《新华日报》	同 上
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	7月13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又名:国共合作在发展和加强)	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解放》周刊第四十八期、《共产国际》(俄文)第十期	
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来团结全国青年——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10月15日《新中华报》	王 明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收入1941年编的《六大以来》(上)	同 上
给《新华日报》编辑部信	11月7日《新华日报》 一九三九年	陈绍禹
旧阴谋的新花样——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的演讲(又名:反对汉奸)	《解放》周刊第六十二期、2月7日《新华日报》、《共产国际》(俄文)第六期	陈绍禹
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希望	2月10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共产党员与妇女解放运动	3月8日《解放》周刊第六十六期、4月14日《新华日报》	同 上
在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	3月16日《新中华报》	王 明
五四运动的二十年	5月1日《中国青年》第一卷第二期	陈绍禹
在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纪念“五一”劳	5月7日《新中华报》	王 明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		
论妇女解放问题	6月1日《中国妇女》(延安)第一卷 第一期	同 上
反共是日寇汉奸和投降 派的阴谋	6月6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 危险	7月7日《新中华报》、《解放》周刊 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合刊	同 上
在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 的讲话——投降是目 前的主要危险,“反 共”是投降的准备	7月11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在女大开学典礼大会上 的报告	7月20日作报告,发表于8月8日 《新中华报》	同 上
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 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	8月18日《新中华报》	同 上
为死者求冤	8月20日《解放》周刊第八十一期	同 上
在欢迎尼赫鲁大会上的 欢迎词	9月5日《新华日报》	同 上
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 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 ——在《新华日报》工 作人员会上的报告	9月20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 第八十九期	陈绍禹
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的 演词	10月20日《新华日报》	同 上
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 向	12月9日《新中华报》、《解 放》周刊 第九十三期、《群众》周刊第四卷 第五期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一二九”四周年	12月16日《新中华报》、《中国青年》第二卷第三期	王 明
中国妇女与宪政运动	12月20日《中国妇女》(延安)第一卷第七期	同 上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会上的演词	12月30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在追悼古从军会上的演词	12月25日致悼词，发表于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	同 上
	一九四〇年	
谈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月20日《新中华报》	王 明
在自然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1月6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展览会上的讲话	2月3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	1月29日《解放》周刊第一〇〇期、2月7日《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二期	同 上
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的讲演	3月29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全中国是工人的，全世界是工人的——在延安纪念“五一”劳动节会上的讲话	5月7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学习毛泽东——在泽东	7月5日《中国青年》第二卷第九期	同 上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中的讲演		
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	7月5日《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第一一一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七期、《中国工人》第七期	同 上
在延安各界夏季公祭成吉思汗大会上的讲话	8月3日《新中华报》	同 上
在女大成立一周年纪念、第一届同学毕业大会上的讲话	9月8日《新中华报》	同 上
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	11月20日《共产党人》第十二期	同 上
在延安一九四一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月19日《新中华报》	同 上